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鲍若望，是个中法混血儿，他从小生活在中国，并在中国娶了一位妻子，但他保留着法国国籍。1957年，他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64年中法建交，他被特赦，从此离开中国，一直居住在巴黎（在国立语言与东方文化学院教授中文）。作者以自己在中国监狱及劳改营中七年的亲身经历及其所见所闻撰写了本书，这是一本从犯人的角度描述我国牢狱及劳改生活的书，作者以细致和幽默的笔触描绘了囚犯在特殊境况下的生活及其种种心态。

值得介绍的是，获得1988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末代皇帝》，其中的几个情节均取自于本书的描述，为此，该片导演贝尔托卢齐赔偿本书作者10万法郎，并公开道歉。这一消息在国内的报道，使该书为我国读者所熟知和期待。为此，我们译出此书，以飨国内广大读者。

本书由田国良组织翻译，各章翻译人员是：

第一章　倪行敏

第二、三章　何祚康

第四、五章　田国良

第六、七、八章　陆宏荪

第九、十章　倩光亚

第十一、十二章　陆震伦

第十三、十四章　魏海生

第十五章　何祚康

全书由何祚康统稿校对。

一九八九年一月

作者的话*

临近1969年底，我在巴黎初次遇见让·帕斯夸列尼。我是作为生活杂志社记者来到巴黎的，在这之前我在莫斯科呆了两年。当我得知他有第二个名字，也就是中国名字——包若望——时，我一点也不吃惊，因为他的外貌远比他科西嘉式的西方名字更象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我们成了好朋友，而且很快我就发现我非常喜欢听他没完没了地谈他过去在中国劳改营中的生活情况。他的经历已够令人惊奇的了，但我尤其为这个很少见的特殊人物所具有的非凡的记忆力而感到惊奇——人名、日期，甚至谈话内容，他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回忆起来，虽然他所描述的是10多年前的事了。

他在中国监狱及劳改营中度过了7个年头。这是个既离奇而又不平凡的事实。我们周围没有什么人有他这种经历。可能有成百的西方人曾被中共用某种方式拘留过，但他们多半遭驱逐，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劳改营中呆过，他是唯一有这种经历的人。

在他谈论他的劳改营经历时，有一次我就向他建议“为

---

* 本书作者之一鲁道尔夫·切尔敏斯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就读于塔夫特学校与哈佛学院，自1962年起，在《生活杂志社》工作，直至该杂志停刊。最初他在巴黎工作，1968—1969年，任该杂志驻莫斯科采访部主任。1969年，他与让·帕斯夸列尼相识，在他的提议下，两人开始合作撰写这本书。

什么你不把监狱生活写本书呢？你可以成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的。”

“我不是作家”，他说，“我试过，可是我写不好。”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合作的。但我仍然不理解，自从他被大陆释放以后，在巴黎已呆了5年，竟然没有任何作家或新闻记者抓住这个机会与他一起写他的经历。作家和新闻记者们也太不敏感了！

让和我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构思本书，这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描述的营地应尽可能地完整与准确（我们所写的每件事都是他经历过的，只是由于明显的原因*，将多数人的名字更换了；另外，还由于我们俩都有其它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占用我们全部的工作时间，仅仅在周末及假期，我俩才能在一起。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承认这使我很感惊奇）无论让本人或我们所写的这本书，毫不反华，甚至也不反共。在劳改营里，他被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但他仍然佩服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以及他所遇到的大多数共产党干部的忠诚及献身精神。虽然他已被释放9年了，但他的故事中的每一点，现在看起来都是很恰当的，因为这基本上也是建设新中国的故事。今天，劳改营在中国仍然存在。

这7年使让了解了自己，也了解了生活在他周围的中国人。他得出的教训之一就是：最好的办法是以幽默来对待苦难。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应该把本书献给将他投入监狱的人及使他出狱的人，即“献给毛泽东和戴高乐将军，他们两人不自觉地为我做了很多”。

---

* 本书中所有人的名字及提到的囚犯的名字，除了路易斯·福坎普尼及作者本人外，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份，都已作了变动。

第一章

1964年11月13日星期五下午，一名政治犯在中国深圳边境检查站被释放了。这里是由陆地进入香港的主要人口处。他是个无名之辈，既没有代表团，也没有记者、亲戚去欢迎他。在罗湖桥的另一端，只有一名普通的英国殖民地警察在站岗，他能看到对面穿制服的中国人在边境车站灰砖建筑物周围忙碌着；再过去是深圳货场，在那儿蒸汽火车头往返地拉着车厢穿梭着，车厢上贴满了中国大字写的标语："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

下午1点30分，这名警察看到在桥的远端站着他要接的那个人。他有一张典型的中国人的脸，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戴着黑边眼镜，驼着背，步伐匆忙。他穿的灰色羊毛衫，显然是政府发的；白衬衣的领子对他来说太宽太大了。他毫无表情地跨过了桥，再也不回头望一下。所有的警察都知道他是一位法国公民，他的名字叫让·帕斯夸列尼。由于他有着地道的亚洲人的外貌，所有这一切，看来都显得相当地奇特。

这名犯人就是我自己。我将带在口袋里的6元港币（相当于1美元），在西方开始我的新生活。我将去我的祖国法国，虽然我从未到过那里。1964年是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正式承认的一年。作为中国政府非常宽大的特殊姿态，我被特赦了。我这个拿着法国护照的公民，原应服满12年的

刑期，这次却被提前赦免并被驱逐出境。在那以前，我在中国监狱及强制劳改营内已度过了7年。当我跨过了这座桥，在我后面留下了我出生地的全部文化、所有的朋友和我的妻子，她为了她自己和两个儿子不得不与我离婚，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但我却了解有关劳改的情况。

劳改——劳动改造的缩写——是20世纪的一种发明，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向人类贡献的一种制度，意思为通过劳动进行改造。

在我们这个公平、愉快的世界内，许多国家的现代文明都是建立在流放地、集中营、监狱农场的基础上的。苏联人在这方面尤其有名。他们的强制劳动营体系在全盛时是很大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与1949年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劳改营相比，它是残酷的、野蛮的、简单而又低效率的。苏联人从来不明白而中国共产党一直懂得的是：假如囚犯是被强迫或严刑拷打而劳动，那末这种劳动就永远不可能是有成果或有经济效益的。中国人首先掌握了激发犯人劳动热情的艺术。这就是劳改的全部意义所在。

我要讲的故事，就是我那7年的监狱生活。

本书目的既不是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为中央情报局创造些胡说八道的材料。以下所谈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亲眼见到以及从别人那儿听到的事。

共产党劳改营被大家想象成“人间地狱”。当然这种想象有其真实的一面，但它是被歪曲了的想象，因为这种想象是不全面的。这里的实际情况与苏联劳改营的幸存者们所说的是一样的：即在许多方面劳改营内的社会不仅比外面的大社会要单纯，而且也更自由些。在中国监狱及劳改营内，友

谊的观念和个人自由的观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这是多年后我发现的一个有讽刺意义的事实。

尽管近来中国的门户已经大开，但在西方，对中国的片面了解甚至误解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有关监狱制度的传说就更多了。不少西方人——新闻记者、牧师、商人、士兵——在中国曾被监禁过一段时间，也曾把他们的经历写成过书。然而几乎所有的这些人，由于懂得中文不多，甚至一点也不懂中文，因而所写的东西受到了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大眼睛的外国人，一律受到特殊待遇——他们住单间牢房，粮食定量高，并与中国囚犯隔绝。任何西方人不允许采访监狱，甚至毛泽东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也不行，当然更没有人有幸被选送进劳改营了。

我有此荣幸是因为警察当局实际上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特殊的人——一个生于中国的外国人，能象当地人一样说这个国家的语言，有一张中国人的脸庞。审讯者称我为生在草丛中的一条蛇，他们说得很对。

我是一个奇特的混血儿，多年来人们搞不清我的真实面目。我的姓——帕斯夸列尼，直接来自我科西嘉籍父亲，他是一位有冒险性格的人，在20世纪初离开了他的祖国（据我了解，他离开时有些匆忙，我常怀疑他是否卷入了一种族间的血仇），加入了法国部队，最后驻防北京——那正是每个西方国家都从可怜的、羞辱的中国割据了一小片土地的那个时代。随着战争的结束，我父亲复员了，他选择留在中国。他进入了商界，并娶了一位中国妻子。我是他们的独子，最初我被当作一个中国孩子与我的中国小伙伴们一起长大。后来进入北京法国公立学校及三所不同的教会学校，接受西方教育。这些学校是由马里斯特兄弟及赫莱西亚神父们管理

的。后来我的看守经常指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教育。

英语——这是我现在愿意使用的一种语言——是我孩提时偶然学会的。当我已经会说中国普通话及法语时，我父亲送我到天津的一所教会学校去读书。开学那天，我站错了队，站在说英语而不是说法语的那个队里。这对我挺合适——我很喜欢这一队的孩子们。当我回到北京渡假时，我父亲在车站接我。

"你好吗？"他慈爱地用法语问我。

"哦，好。爸爸，你好吗？"我用英语回答他。他听到我会说英语时，吃了一惊，当他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他决定让我继续呆在那个说奇怪的、他听不懂的语言的队里。

对赛莱西亚神父们来说，我是让·帕斯夸列尼，对中国人来说，我叫鲍若望，"鲍"来自帕斯夸列尼中"P"的音，"若望"取之"让"的译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到生为混血儿，是会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混血儿参与了两个社会，但在哪一个社会里，都感到不自在。但我与教会学校里读书的那些混血儿在一起时，却是例外。我所有的亲密朋友，都象我一样，一半是中国人，另一半是其它民族或国家。如：爱尔兰、俄罗斯、波兰、捷克、犹太、德国以及天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人。我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属于与世上其它地方有关系的亚文化。我是他们中最象中国人的一个。

在我整个青年时期，中国遭受了许多困难痛苦，有些是自然造成的，如经常发生的水灾、旱灾、饥荒；而有些却是人为的，象几次外国的入侵、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侵及占领、内战以及最后中国共产党全面胜利后发动的历次清洗和惩罚运动。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变化多端、无法预言、

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但不可否认又是激动人心的时期。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长大成人的。在这种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如有人自认为能预知未来，那他一定是个轻率的人。我的命运在年轻时就已决定了，这缘于我所受的教育及个人的不幸（我的双亲在我成年以前就去世了）。我受到教会与法国大使馆的监护，我住在法国医院孤独的小房间内，由修女们照顾。虽然我在班上考试是第一名，但我的父母没有留下钱，也没有遗嘱送我进大学。日本投降以后，我从工业学校毕业了。我开始寻找工作。出于个人愿望，我本能地倾向到西方外交和军事代表团去工作，因为我是混血儿，并会四种语言（我又学会了意大利语），在这些地方，我会有用武之地的。可是这一决定，就使我向麻烦跨了一大步。

我最初干的两个工作，对我思想的影响胜于教会学校多年的教育。1945年9月，我19岁。我开始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团工作。我很快由吉普车驾驶员升到师部宪兵队的译员，和负责当地事务的文职人员。我与这些随和的美国人相处得很好——他们不仅把我当成“人”，而且当作成年人来对待！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就是在越南犯下暴行的那种美国人吗？我简直不敢想象）。当时我正年青、有热忱，我认为海军陆战队的生活是理想的——我有一次甚至问过，我是否能到帕利斯岛去受训。当我20岁时，我已是一个人物了———一名穿制服的享有军官特权的文职人员，挣的钱很多，能在军用合作社购物。如果不是由于我的第二职业，生活对我就会象玫瑰那样美好。

这第二个职业是法国使馆里我的监护人给我找的。这工作使我了解了法国人、中国人以及我自己。那时法国人对北京电车公司很感兴趣。这公司拥有普通人乘坐的电车。他

们正物色一名工头。我认为在海军陆战队，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傍晚及晚上，那么我可以在白天做这项工作。由于我是法国人，我可以做这项中等技术水平的工作，然而由于我是一个混血儿，他们交给我的责任也就到此为止。因为更高一级的行政职务是给纯血统的法国人的。

法国代表把我介绍给中国经理，他立刻让我当一名稽查长，一个中国人要工作20年后才能达到这个位置。我到车库报到的第一个早晨，就受到了教育，我见到了不久使毛泽东掌权的那些人（译按：指工人）。他们围着小火炉挤成一团，咳嗽着，穿得破破烂烂，吃着我以后在劳改营内吃的小窝窝头。（我在教会学校里以及与我的家人住在租界时，我是受到完全的保护的。）这些人是司机、售票员及维修工，一个月才挣 4 美元。几个礼拜后，我带给他们一些消毒剂、磺胺药、APC 等，这些是我从药剂师那儿骗来的。他们开始称我“半美式”——是按美国方式作事的一种人。我怀疑美国人是否了解在中国有多少人对美国人有好感。至少在成为征服者及教训人的人以前，年纪大点的中国人，对美国人是有好感的。

1945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我乘电车回家。天快黑了，但在寒冷的晃动的车厢内，我清楚地看见售票员将手伸进钱柜。这是难以置信的一霎那！这是你看到了一个自以为未被人发觉的人的一霎那！我震惊了。我不加思索地过去斥责他。电车停了。我看看几乎是空的车厢，见到驾驶员向我走来，手里拿着驾驶杆，当他在昏暗中认出我来时，他站住了。

“是你啊！”他说。

“我应该履行我的职责。”我义愤地对他说。在教会学

校里，我接受的教育是：偷窃是一种可怕的罪恶。但我没学会要同情别人。司机看看正在角落里哭泣的那个可怜的人。

“你运气不好。”他对这可怜的人说。

这时有个人站在我们的后面。这是一位刚上电车的中国查票员。他年纪大些，仍然穿着制服，几秒钟之内，他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假如你要写报告，”他说，“你就在这儿写吧。”

他递给我一张印好的报告表格。继而他似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让司机把车开回到车库，并要我跟他出去。

前，在北京繁忙的街道上，我又见到那位查票员，这次他穿着人民警察的制服，显然他一直是共产党。既为了不使他为难又不想与当官的相见，我本能地转身离开了，以为他也会这样。可使我惊奇的是：他急急忙忙穿过拥挤的人群，向我打招呼，握着我的手说：

“别担心，就我所知，你给我们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你以前为我们做的好事，我们不会忘记。”

我在海军陆战队工作一年以后，就结婚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结合——一部分是感情，但主要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交易。这交易始于1937年，这时日本人正公开寻找借口要控制中国。我的父亲与北京一个有势力的官员的大家庭很友好，他住在城北鼓楼附近，拥有占地很广的270间房子。每次战争来临时，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就成了有钱的中国人的抢手商品，因为租界与外交地区，几乎自动地就成了不受攻击的安全区。芦沟桥事变时（1937年7月7日），北京富商们花大价钱，躲在大使馆的地下室内。另一种方法则有些危险，但当它起作用时，是更好的方法，那就是在他们的房屋上挂上外国旗。

拥有大批房产的家长是一位杨老太爷，他向我父亲提出了非常优惠的提议：假如我父亲愿意去杨宅居住，他愿意提供宽敞的第一流的住房而不收房租，而且每月给200元法币。我父亲是一位从来不拒绝好建议的人，我们收拾了一下，就搬去与这位大官员住在一起了。法国旗子高高地飘扬在杨宅的屋顶上。

杨老太爷是多么古怪的一个人啊！他的生活象一部惊险的中国电影。在他生活中，既有冒险、阴谋诡计、玩女人、暴力甚至谋杀，有时却又显得温文尔雅。他出身于满洲，是

末代皇帝的一位亲信，担任着钟表馆的高级职务。每天，他穿着长袍，后面跟着相应的随从，在宫殿中用他挂在腰际链子上的金钥匙，一个钟一个钟地上发条，他用其多年为皇族服务所得的财富，建造了北京最好的私人住宅。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他孙女在他住宅内一个院子的小池塘边玩的情景。他的孙女名叫杨惠敏，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我双亲去世后，我就靠我自己了。杨老太爷把我叫去，向我提出了另一个提议。他丝毫没改变自己的想法。他问我愿不愿意与他孙女结婚，当然有一份嫁妆，我可以得到一所很漂亮的房子，建设我们的小家庭。在这一交易中，我应做的事，就是通过我与美国人的关系来帮助这家人。正如当时中国人常说的，为美国人工作，象披上了一张老虎皮，谁也不敢碰你。

我接受了这些条件。我必须承认这是因为我所得到的利益和对老人的尊敬，而不仅是为了爱情和情欲。如果西方人对此感到奇怪，这在东方是很正常的事。

在中国，夫妇的结合没有西方那样多的感情，关系也不密切。我和我妻子只是夫妻而已，没有更深的感情。当我成了囚犯，她由于我受苦，几乎与我一样挨饿。当她最终决定与我离婚时，我并不认为她背叛了我。离婚对她是最好的出路。

我们婚后就搬到前马厂胡同17号，这是三间中国式的平房，象所有房子一样坐北朝南，灰色的砖墙，尖屋顶。婚后第二年，我的长子——毛——出生了，两年后，我女儿——咪——出世。我比较喜欢我的女儿。可怜的咪，当她三岁时，死于伤寒，我们的第二个儿子——荣，生于1953年。

当海军陆战队第五团自北京撤走时，我转到美国陆军去

工作。起初在通讯兵里当一名技术员，然后成为刑侦队的文职联络员。这项工作后来在对我审讯及判决时，是很不利的。假如中国共产党（其实对这种事，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会是这样认为的）把外交及新闻工作者作为间谍来看，那么我的受雇于刑侦队，更证实了他们的结论：我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专职特务。实际上，我的任务是很普通的，跟踪被美军雇用及解雇的人。我一直呆在北京各个美军机构里，直至1948年他们匆匆撤离，这时距共产党占领北京不到一个月。

围困北京是在12月中旬开始的。除掉中国人没有别人能用这种方法。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不想流血，也不想让后来成为他们首都的北京遭到破坏。他们已经占领了农村；现在他们正等待城市象成熟的水果一样落入他们的手中。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

我们在城内照常地生活、工作、吃、住。我们见到战斗的间接迹象是北京城内和沿城到处可见的国民党军队，但他们是被包围的。见不到面的共产党在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允许对居民物品的正常供应，穿过他们的战线运向城内，似乎什么也没变化。他们占领了城外25英里远的电站，但继续供电，只是偶尔为了提醒人们谁在管理电厂才停电1—2小时。

当包围圈越来越紧缩时，国民党人绝望的情绪也越来越大。他们甚至变得“善良”了。他们的士兵第一次不再掠夺和敲诈钱财，他们知道共产党会毫不留情地要他们对每件有证据的罪行负责。国民党司令官傅作义甚至设置了流动法庭，即在道奇牌卡车上设置军事特种法庭。这种卡车被派到发生罪行的现场，法庭当场听取证言，进行审判并判决罪犯。判决由行刑队执行，一切都按军法行事。

当外围的飞机场落入共产党手中时，国民党已奄奄一息

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到那时，他们的问题只是尽量逃出去。他们开始在城内建简易机场。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第一次的努力是由于日本人的干扰而失败的。按理说，这简易机场似乎该建在东城的宽广而有草地的使馆区附近。那儿是外国人用于打马球的地方。该地南面是内城城墙，北面是一个大市场。这块地区象“L”字形，最长的部分东西向，约有一公里长的草地。对国民党来说，万幸的是：日本人已在那儿建造了一系列强大的钢筋水泥掩体，恰恰在长跑道的中央。他们想把这掩体炸掉但都失败了。除了在“L”形跑道的南北向一边建造简易机场外，别无他法了。为了使C—47飞机起飞时能有更多的空间，他们精选了一队工程兵把处在向北飞行的航线上的建筑物屋顶炸掉了。

应急机场多少能强差人意，当然也必然会出事故。最令人难忘的一件事——这件事整个北京城谈论了好几天——是在12月末，一架超载的C—47飞机，起飞不久后，发动机忽然停止。飞机栽入了人口密集地区。几百码的道路上撒满了金条，许多抢到金条的穷人变富了，而一些将军们却失去了他们珍藏的财宝。

外交官们象过去遇到麻烦时那样，当天就在他们住宅上空，挂出了他们的国旗。

北京是在1949年1月30日解放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早已逃离，留下来的军官与共产党代表进行谈判。共产党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那儿，他们穿着棉冬服，安静地、井然有序地包围着城市，准备按照他们的风格进城。下午，围城的所有部队都已到达永定门及西直门，步兵戴着大皮帽，装甲部队驾驶着日本旧坦克，史蒂贝克牌卡车后面牵引着美国105毫米榴弹炮，这些是他们在战斗中从国民党那儿缴获的战利

品，或是从国民党腐败官员中买来的。战士们举着毛泽东和全军领袖朱德的像。这是一个寒冷的多风的日子，老百姓们夹道欢迎，挥舞着在家做成的小红旗。

“欢迎人民解放军！”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欢呼着。

新中国诞生了，可我却失业了。在我为美联社记者工作（当助手及口译员）了一小段时间后，6月底我的工作便结束了。我失业了三年多。没有人管我们外国人，但我们的活动是受到限制的。新政权正在建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并立即获得苏联的承认。那时，共产主义光辉灿烂的新时代的曙光似乎已经来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结成了神圣同盟，一批又一批技术、军事顾问自莫斯科来到了新中国，政府鼓励人民称苏联为“老大哥”。

令人奇怪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苏联笨手笨脚地将事情弄糟了。苏联自认为是反帝的领导力量，开始用近于斥责的傲慢态度来对待中国。自然中国政府部门对此很谨慎，但不久中国人民对来自北方的“老大哥”形成了他们自己正确的看法。

苏联对这事处理得很糟糕。虽然有新的革命理论，中国人仍然是非常顾及威望和面子的人民。人人都知道苏联受到一场残忍战争的破坏，他们的外事专家应该显得更聪明些。苏联顾问成了人们厌恶的对象。

北京人通常称呼他们为“穷光蛋”——这是中国人认为卑劣的、最差劲的一种人的形象。他们土里土气，甚至当他们自己已成为笑料时，还那么专横无礼。据说苏联人总是在夜里由公共汽车匆忙地被直接送到大旅馆去，不让当地人看见他们。在旅馆里，裁缝们很快地为他们缝制黑色的有两个

大口袋的衣服，极宽的袖口。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装束成了苏联人的标志。当他们穿着好后，就走向最近的零售店，大量抢购所见到的消费品——行李袋、布匹、食物、器皿等等……

中国人称苏联妇女是“活水桶”。苏联人丢尽了面子。与美国人被称为“虎皮”，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毛泽东所做的最得人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将苏联人踢出了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为什么至今仍那么爱戴他的主要原因。

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后，很快地就清洗内部。首先遭难的是明显的罪犯及剥削者。杨——我那有钱的老岳祖父，作为一名堕落分子及聚敛钱财的坏分子而被逮捕。他在服劳役期间，被命令去挖沟，后死于狱中。城里的许许多多妓女被召集起来，去亲眼目睹处决拉皮条的及鸨母们的场面。这些人是在外城城根处由行刑队处决的。

解放三年之内，运动开始了。第一个运动是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每天进行几十次公审，并鼓励人民去观看。人民法院公审情况在公共场所通过扩音器广播出来。复仇之火一直延续三四个月，然后象人喘不过气来似的逐渐减弱下去，反动阵营人数开始减少了些。在第一次运动中，我的一些外国朋友及混血种朋友，由于与外国人的关系而被捕。我在这段时间内，只拜访一些可信赖的朋友，或在公共图书馆大量阅读，使自己不引人注目，从而躲过了这次运动。

当复仇的高潮达到的危险境地时，我申请出国签证。这是我第一次申请出国，但被拒绝了，或者倒不如说是不予理睬。每次我询问外交部有关签证的事，总被三言两语地告知“签证尚未批下来”。这事一直拖到1955年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译按，指肃反运动，下同）开始时。我的朋友很多

人被逮捕了。关于签证的事，外交部仍然没有答复。我被难住了。我担心、害怕地坚持等待着。

1953年，我终于找到了工作，做某个西方使馆一名官员的私人助理。哪个使馆，我可不能说，因为与我一起工作的人现在仍然在北京。我在那里的工作与任何文化、政治、经济参赞处人员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对新秩序来说，它就是间谍活动。如果我向我的上级汇报有关最近定量配给的标准，或者在人口繁杂的茶馆里度过一下午，倾听谣言及来自工人们的私人谈话。我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他评价他的国家与年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我是在1954年对外国人进行人口普查时，才知道新中国完全不喜欢我的工作。

这事发生在11月。由于要发给我们身份证及居住证，我们被召集到北京公安总局，填两张很大的履历表，要我们对在中国所做的每件事都详细报告，并要列举我们个人的经济来源、财产情况。对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了个别谈话。轮到我是在11月份。我被带到外事组的一间舒适的接待室里。室里有沙发、安乐椅、茶及水果。三名穿着灰制服的人员接见了我，但只有其中年纪最大的一名与我进行谈话。

“你最近情况怎么样？”他兴致很高地问道，“你的工作怎么样？你家里好吗？对有些物品目前仍然短缺，我们感到抱歉。但这种情况会改善的。不管怎样，你如果需要什么特殊东西或有什么请求，请不要犹豫地向我们提出来。”

“谢谢您，”我说，“一切都好。”这种过分的关心，反而使我更有戒心了。

“那么，你一切都好，对吗？”他继续说。

“是的。”

"好，假如我是你，但愿一直这样好下去。"他话中有话地说，"你要明白，我们对你的一切都了解。我们不准备计较你的过去，那时是国民党当权嘛。至于解放初期，你可能不了解情况——毕竟没有人警告过你，对吗？但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长期容忍人们干反对我们的事的。我们可以不咎既往，但你不要以为你很机灵，鲍若望，你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不要小看我们。我们对你的了解比你想象的要多——这么说吧，就象你了解你自己一样多。我们不是恐吓你，也不是在吹牛。我们只是在讲事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把可疑的一切情况都向我们报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不了解你在干什么。我们是了解的。要守法，要遵守规定。不要再干有害于我们的活动。假如你的行动遵守法令，你可以与你的家庭一起呆在中国。否则，你将仍然呆在中国，但却不能与你的家庭呆在一起啦。我们是宽宏大量的，鲍若望，你也要对我们友好些啊。"

"多谢你善意的忠告，"我答道，"我愿向你保证：我没有做反对你们的事……"

他没有让我把话说完。他的脸显出极不耐烦的表情。

"不要这样说嘛，不要再犯新罪了，今天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了，好，就谈到这儿。"

我离开这幢楼时，甚至比以前更担心了，但我的自信心没完全丧失。我猜想，他们毕竟不会真正了解我的一切。我大错特错了！

现在回顾起来，我看清了，我的被逮捕就象一部电影。这电影的开始是在北京公安局的办公室，在第二次镇压反革命期间升级，后来由于尼基塔·赫鲁晓夫而达到了高潮。

由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苏联人在中国已经不

受欢迎了。但斯大林个人的形象，仍然是神圣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党代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现代有名的反斯大林演说，象在鸭子池塘里投掷了一块可怕的石头，引起了一阵骚动。中国领导最初谨慎地作出了反应，在全国报刊杂志的头版登载了一篇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承认斯大林曾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又强调斯大林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从而得出他的功远远大于过的结论。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出现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极为温和，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即令这样，也由于在波兹南发生了波兰学生的骚动而突然停止了。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像一挂鞭炮被点燃了。正统的中国共产党谴责这些事的发生是由于苏联放松了领导权。匈牙利革命只是证明非斯大林化是错误的。年底，毛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文直接针对苏联，谴责匈牙利既不是一个专政的国家，也不是民主的国家，认为这种暴动是能够也应该避免的。毛并告诫共产主义世界，应从这些暴动中吸取教训。

毛的这种激进的做法使中国国内出了问题。毛鼓动起的争论，进行得那么激烈，以致在他周围发生了争论及对抗情绪。学生及知识分子们变得难以控制，并开始自己提出问题。不久以后，党内统治集团开始感到为批评所刺痛。毛犯了一次错误。

毛决定说：让我们到群众中去。假如我们的确没犯什么错误，我们就什么也不怕，如果是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教益。让我们欢迎批评吧。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1957年3月，运动开始并立即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公开争论文章、大字报甚至歌曲中，批评的反应势不可

挡。普通公民鼓起勇气，提出要求降低物价及终止定量配给。学者和教师们对控制学校的党政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的责难，学生们大胆地传播赫鲁晓夫的演讲，尖锐地要将共产党员请出各级组织。这是一个危险和爆炸性的时期。许多人甚至要求完全解散政府组织，并认为中国的未来应类似东方的南斯拉夫那样。到6月份，不再认为批评是评论，而是右派的挑衅了。双百方针停止了，由整风运动取代。由于党的反击越来越有力，转变成了反右斗争。

这场运动猛烈地席卷全国，直至1957年12月底才结束——这个月，我被逮捕了。

第二章

我终于在圣诞节后两天的一个滴水成冰的星期五晚上被逮捕了。六个星期以前，警察通知我，在最后的通知到来之前，我必须呆在房子里或住处周围；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等待着警察的来临。在警察来时，我所到的唯一声响就是轻轻的、有礼貌的叩门声。这时，我正在床上看书，而我的妻子已入梦乡。我拖着一双旧拖鞋到了门口。

"谁？"

"我是老夏，警察局的。"

这口气当然是很友好的。在一个很短的瞬间，我感到很乐观、有希望：这可能意味着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了。我象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抱有幻想。我打开了门，一股寒气向我袭来。我简直就是被五个表情严肃、态度坚决的人倒推着进屋的——三名警察，穿着蓝色棉制服，每人带着一支手枪，以及夏和街道治保委员会的一名板着面孔、毫无表情的妇女。这时，他们不客气了。他们戏剧性地进到屋里，靴子踏地的声音惊醒了我的妻子，她向上看了看，又斜眼看了看旁边，问出了什么事。我这时又惊又怕，只嘟囔着一句平时的客套话"没啥事"。个子最高的警察严肃地站在我的对面，另一名警察站在我的旁边，第三名小心地坐在床边上。夏和治保妇女关上了门。这妇女显然对她自己的这项工作很满意。高个子警察发问了：

“你叫什么？”

“帕斯夸列尼。”

他不满意。“你的中国名字呢？”

“鲍若望。”

“你的国籍？”

“法国。”

暂时，他所要问的就是这些。他缓慢而谨慎地打开公文包，抽出一张印了字的纸，将纸打开，纸的一角夹着一张我的照片。他很清晰地说出下面一套公事文章：

“鲍若望，原名帕斯夸列尼。我们发现你长期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我现在宣布依法逮捕你。这是逮捕证。”

“逮捕”这个字是个暗号。一听到这个暗号，在我旁边的警察猛地抓住我的手腕，第三名警察从床边冲过来，将一副钢手铐“啪”地一声扣在我的手腕上。高个子警察是他们的负责人，将逮捕证递过来让我签名。我艰难地签了名。

“把时间也写上。”他看了看手表“9点17分。”

他们对我进行了搜身，并匆匆检查我的文件，最后找到了我的护照，将它装进了公文包。

“带走！”高个子命令说。

他们将我推出去时，我看了我妻子最后一眼。她哭了。“去，好好学习！”她喊道。

天啊，她肯定在这匆忙中学到了她的第一课。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能说什么别的话呢？在中国，要求人们对各种情况都要有个正确的态度。这监牢不是牢监，而是因犯错误而学习的学校。重要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你叫它什么。我的妻子，如果固执，或者没有表现出正确的态度，就有可能

因为明知故犯地与反革命分子一起生活并且包庇他而自己也被投入监牢。在门关上时，两个孩子还在睡觉。

我是乘坐俄国的胜利牌黑色轿车进入监牢的。我坐在后座，两旁各坐着一名保安警察。路上没有什么车子，我们很容易地驶过了鼓楼、故宫后面，最后到了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路上。这是有名的草岚子胡同的入口处——草岚子监狱。中国监牢的名字是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过了边门，我们进入铺有地板的接待室。他们将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有一粗暴的年轻警卫看着我。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专政的味道，也是第一次受到屈辱。

“蹲下！”他命令说，“头低下！”

为了使我的头低下，他粗暴地将我的头按下，直到我的下巴碰到胸前为止。5分钟过去了，静得象在坟墓里。然后他吹个口哨，打个手势叫我站起来。他仔细地又搜查了我一遍，将文件、圆珠笔和身份证都拿走了，堆成一堆，开列了清单，我在清单上用他的笔签了名。然后，他又要我蹲下。我看着地板，直到另一名警卫赶着我快步走过院子，到一间空房子里。房间里有一把椅子是给他坐的，在墙角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凳子，似乎是给调皮小孩预备的。我们沉默地坐了20分钟，警卫在看书——我注意到，这不是毛泽东的书。电话铃响了，他回答了几句听不清的话。我们又走了，我走在前面（这时，我才知道犯人总是走在前面的，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最后，我们到的地方是真正的监牢。一个胖胖的黑眼睛向外鼓的小看守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三个人在走廊里走着。走廊两旁有一排厚厚的、外表一模一样的门。走到一半，他停在一扇门旁，拉开门闩，看着我。我们一起进了屋。

屋子的天花板上，高高地点着一盏25瓦的灯泡，我看到沿墙是一张通铺，上面睡着一长溜人。看守将一名犯人推醒，叫他给我腾出个位置。他又推又挤，让出了一块宽不足一呎半的地方。看守转身走了出去。我看了看周围。这号子深不足八呎，宽约20呎，通铺占满了房间，在铺前只有一条狭窄的走道。装有铁栅的两扇小窗嵌在刷着白粉的砖墙上，窗框上厚厚地结着一层冰，在窗台上有两摞整齐的书、小册子和报纸。在远处墙角，摆着两只涂着漆的铁桶。睡在我前面的人，头发似乎有些乱，但很干净。每人都睡在床垫上，身上盖着棉被，有少数人甚至在头下有一小块漂亮的枕巾。

因我的到来而被推醒的犯人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叫我不要出声，并打手势叫我躺下。在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下，我会服从任何人的指挥的。我脱了鞋，爬上了通铺。在我设法睡下时，看守突然又带着一床被子来了，将被子扔在我身上就转身走了。我躺在那里，瞪着眼盯着天花板，脑子一片混乱，神情沮丧，难以入睡。

我知道，我妻子的日子会很艰难，但可能她能找到一份工作。使人最担心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从现在起，他们必须承担着有一名"反革命分子"的父亲的污名与同学相处，而我的妻子也不能保护他们。

窗外北风呼啸，室内越来越冷，我蜷缩在被子里。门上面有烟筒穿墙而入，越过我们的头顶，又穿过窗子上的一个洞出去，号子里的唯一的热气就来自这烟筒。因为睡不着，我坐起来，爬到刷有漆的铁桶去小便。在便桶叮咚作响时，我身后响起了一片嘘声。显然，在夜间小便是违反规定的。我内疚地回到铺上，拉上了被子。新生活就这样可怕地开始了。

我最后一定是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因为在走廊里哨音大作时，我觉得似乎只过了一会儿。在我还没有醒过神来时，每个人都站在地上了。我大为惊奇，第一次看到中国监牢里作息时间的精确。有两个人分别站在铺的两头，将被、褥折成整齐的三角形，就象中国餐厅里的餐巾。另一个人蹲下去，从铺下面拉出一个瓷盆，用勺子将冷水舀在六个搪瓷脸盆里。六个犯人在脸盆里洗脸，另四个就在便桶旁刷牙。刷牙的人刷完牙后，正好与四个洗脸的人互换位子，并且换了洗脸水。除了吐痰声和溅水声外，屋内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只得在床边站着看。

每个人漱洗完毕后，洗脸盆里的水都倒在便桶里，另有两个人将它们拎到门旁。我的号友在便桶后面排成整齐的一列。我自动地入列，不知道这个队是干什么的。我估计我们总共是18个人。我应该猜到我们是列队到厕所去。我们安静地穿过走廊门，出边门，经过一个院子，进入对面的一幢房子，穿过房子又走到一条沿着监牢外墙的小道。在小道尽头，有两长排很干净的水泥坑。在坑的另一头，有一座瞭望塔，保安警察从上面毫无表情地向下看着我们。卡拉奇尼科夫耸起了肩膀。可怜的人啊，如果他必须看的最有趣的事就是一群犯人在解手，他的生活不可能是丰富多采的。就是在这里，仍然是有组织的，拎着便桶的两个人干净利落地用碎砖头在清扫便桶。我们回到号子，爬上床，盘脚坐着，开始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简直就象一群和尚。

“你叫什么名字？”

坐在我旁边的人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抬头看，他就是昨天夜里被警卫叫醒的那个人。他问我，我是否知道被逮捕的原因。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还没有学会。

"我不清楚。"我说。

他极为平静地看着我，然后以长辈的口气说："你是个反革命分子。我们都是。要不，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想要知道，他能告诉我多少情况，我假装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就是一堂劝诫课。我在教会学校读书时，对早祷很熟悉，我以后对这种劝诫课也熟悉了。在中国，总是让犯人改造犯人。这个人讲的话带有很重的宗教色彩。他一定能背得出这些话了。

"这是北京公安局的拘留所。门牌是西城区草岚子胡同13号。只有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思想犯才到这里来。我们中有些人是因为解放前的所作所为来到这里的，这些人叫作历史反革命分子。因为解放后做坏事而被逮捕人叫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人既是历史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但不管我们是哪一种反革命分子，我们都犯了罪，因为我们的思想很坏。"

他的眼睛扫视了整个号子，表示他说的话是讲给全体人员的。他的声音很响，其他人都能听到，但没有人表现出要参加谈话的意思。可能他们都和他一样对这些话很熟悉了。

"我们必须改造这些坏思想，重新做人。你被捕24小时以后就会受审。他们来叫你时，马上就去。要快，不要叫看守等你。到了号子外面，要走得快，低下头，眼睛看着地，不要向前看或者向旁边看；警卫会指点你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拐弯。审问时，你要认罪，不要给政府制造麻烦。要坦白，要严肃。你是否得到宽大就看你在审问时的态度了。你在这里一天，审问的房间就不会变，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房间号码。你的书面报告和交待都是交到那个房间去的。"

他说话时，我觉有一股我熟悉的感情在我心中冲动，这是一种又模糊又急切的感情，但也是一种期望的冲动。我第一次进教会学校时就是怀着这种感情去的——要学习那么多的规则，又有那么多的事不应该做，在那么多的方面要做努力。这时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想学好的学生的角色，急于向校长保证一定品行端正。

“一会儿我们就要吃早饭了，也就是上午这一顿。一天吃两顿饭，一顿在早上8点，另一顿在下午4点。每人有一个窝头，一块咸菜和一碗玉米粥。我的名字是卢德邻，我是这个号子的班长。在这里，我们相互叫全名或叫‘同号’。我们在这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政府监督下，我们一起改造自己，相互学习。”我几乎能听到他在脑子里大声念着标语：“如果我们向政府坦白，老实做人，遵守狱规、配合政府、清除脑子里的坏思想，改造思想，我们就能受到宽大。”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小张纸，递给了我。这是他谈话的中心意思。我顺从地看着（也是茫然地看着，因为那时我只会说，但不会读中文）纸上的字，他读着：“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减罪，立功受奖。”（译者按：卢自行改了几个字，见后文）

卢将字条收回，慢慢地折起来，放进衬衣里。他的面部表情既严肃又平静和松弛，完全是一个因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感到高兴的人的表情。这是洗脑的成果吗？我不能肯定。要看出这点来是不容易的。我知道，一个中国人总是有要好好干、表现出信心和决心的愿望的。这是典型的中国国民性。但是这个人，还有其他人，显然似乎感到有必要表现出忠诚来。当然，所谓洗脑的主要宗旨简单说就是：服从别人的意志。一旦有了服从的行动，将它从勉强服从变成热诚

服从，甚至是狂热服从，都不是难事。问题是当局的权威有多大。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这权威的无所不在的威力，但不久我就知道了。用不了多久，我也就屈服了。

早餐的时间到了。两名犯人下床，从铺下拿出两个大陶盆，站在门旁等看守开门。其他人递过来碗和木筷，几个人拿出了自己的小盐袋。领早饭的人回来时，我才知道监牢将是个挨饿的地方。窝头小得可怜，还没有我在家吃的一半大，重量不超过五两。每人只有一片大约半吋厚的炒萝卜，而玉米粥稀得象清汤。我想，天啊，如果以后就是这样……

饭后，卢将我叫到一旁。他还没有说完呢。"有些同号对你提出了批评"，他告诉我，昨天夜里，你起来小便时把每个人都吵醒了。你要学会在夜里做事要慢，要轻。便桶盖要轻轻地拿下来，小便要尿在桶边上，不要尿在桶当中。注意不要尿到地上。"

我点点头。卢转身对其他人说："新来的人不知道我们的规矩，我已告诉他并批评了他。他诚恳地接受了批评。我建议这次就原谅他。"

我开始越来越喜欢这个怪人了。他外表厉害，实际上，人却很厚道。他只是认真地对待他的号长工作罢了。

9点钟，走廊里又响起了哨音，每个人又盘腿坐在床上。这是学习时间。卢开始大声地读《人民日报》。读到一半，门闩被人拉开了。门打开后，一个高个子警察站在门口，他就是逮捕我的那个人。

"鲍若望"，他喊道。我跳下地，伸脚穿上鞋子，很快地走出去。我没有想到这样快就来提审我。我有些紧张。

这个大个子警察只将我带到看守的桌子旁，将我交给一个穿着黄绿色棉制服的保安警察。我走近他时，他慢慢地从

身后枪套里抽出一支很大的0.45吋的勃朗宁手枪，将枪闩向后拉了一下，顶上一颗子弹。我猜想他是装样子给我看的，但是这个猜想并没有用，我还是怕得要命。

他叫我出去，我赶紧出了门。但是我忘了卢告诉我应该采取的姿势。

"低头！"他大声喊道，"再低些！"

这是个什么情况啊！除了我的脚和地板而外，我什么也看不到。将我关起来还不到24小时呢，只要这个我不认识的人愿意的话，他就可以叫我撞到墙上。

"向左！继续走！向右！"我盲目地按他说的做，向前迈着步，喘着气，这是由于害怕而不是累。我们走到院子里，不一会就冷得发抖。我们经过一长排房门，听到其他审讯员的大声叫喊和威吓声。左一右，左一右，又穿过一个院子，最后他带我到了一个深绿色的门前，门中部有一个结了冰的窗框。窗框上有一个木板，上面写着"第四十一室"。

"你去报到！"我喊了一声，不太响。保安警察不满意："再喊一次，响些！"这次我大声喊了，但我的声音尖得出奇。

一个声音平静地叫我进去。进屋后我发现这房间很大，屋顶很高，象是医院的房间：平滑的地板，粉白的墙，萤光灯，迎面的墙下有两张书桌，书桌之间有一个木柜，木柜上面有一个大红星。在我后面墙上，有一张毛的彩色像，两眼看着我的背，但这张像，是我离开这房间时才看到的。在书桌后面坐着两名年青人，都穿着深蓝色的法兰绒制服，这是共产党标准的干部服。这两个人看上去都不到30岁。一人穿着军用黑皮鞋，手里玩着一支派克51型钢笔，使用这种钢笔是共产党人里地位高的象征，说明这人是两人中地位较高的

一位。后来证明他就是我的审讯员。他的同伴是记录员，穿的是棉鞋。

审讯员对房间当中的一个小矮凳作了个手势。我坐下时发现在凳子的两条前腿之间有一支粉笔。审讯员注视着我，从头问起：

"你的名字。"

"鲍若望。"

"你的原名呢？"

"帕斯夸列尼。"

"用那支粉笔用大字写在地板上。"

这就是这粉笔的用途。然后是老一套——被逮捕前的住址、工作单位、国籍……他机械地问着这些，显然感到厌烦。他一直显得懒洋洋的，但到他长篇讲话时就不一样了。审讯者都是天生的演说家。

"在开始以前，有几件事要告诉你。你号子里的人可能已经告诉过你政府对待因反革命活动和政治活动被逮捕的人的政策。你能看中文吗？"

"不能。"我承认。虽然我的普通话说得和当地人一样好，从来没有人教我读或写中文。这是后来在劳改营里才学会的。审讯者指着钉在墙上的标语，念给我听：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将功赎罪，立功受奖。"

我注意到这标语与卢在号子里告诉我的略有不同。显然，他是加了工的。

"这是政府的政策，"审讯员继续说，"这是对你的挽救。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坦白，服从政府。这样就可以有新的生活，另一条是抗拒政府法令，坚持与人民为敌到底。这条路会产生最坏的后果。这全由你来选择。你认

罪越快，就能越早地回家。你坦白得越彻底，就能更快地与妻子儿女团聚。

“你不用担心你的家。政府会照顾他们的。你是有罪的，他们没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在各方面都不受歧视。如果他们有困难，当地政府会帮助他们的。所以，你放心好了，你要彻底坦白罪行。如果你做得好，到时候我们会提出对你实行宽大。但是如果事实证明你是个顽固、死硬的帝国主义分子，拒不改悔，那么，后果是很可怕的。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我点了点头。事实上，听到他说政府会照顾我的家，我就放心了。在那时，这是个好消息。到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劳改营时，我的妻子和孩子还不如我吃得饱。

“坦白有两种。我们称之为牙膏式和水笼头式。牙膏式的犯人要时常去挤，否则，他不肯彻底坦白。水笼头式的犯人，开始时要费大力气去拧开水笼头，但是后来就什么都说出来了。你是懂道理的，又聪明。我想，我们用不着来压你。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点点头，等着他说下去。

“好，我们开始吧。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犯了第一个错误。“逮捕我时，他们说我是反革命分子。”

我的审讯者生气地在椅子上将身子向前探。

“人家说你是反革命分子？你就是个反革命分子！你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用不着别人告诉你，这是个事实！你要老老实实地，否则没你的好处。说！”

我想一定是他的粗暴态度使得我仅有的一点脾气也突然爆发出来了。我进去的时间还不长，不知道犯人是不受保护

的，是无理可讲的。我犯了回嘴的错误。在中国，这是我最后一次自作聪明。

“我不是中国人，我怎么会是个反革命分子呢？”我问道。

他瞪眼看着我，有一会儿，什么也说不出，然后勃然大怒。

“你怎么竟敢提问题？你的活动已经损害了革命，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你这一辈子都是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我们有证据——有许多证据。”

很快，他平静下来了。“现在从头开始。你好好讲讲你的过去。”

“从哪里开始？”

“从解放前，你为美帝国主义干事时开始。”

我开始从头讲起，陆战队、通讯兵、合众社等等，但是审讯者越来越不耐烦了。他插话说：

“我们不是要你的传记。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工作过。这些我们都有档案。我们要的是你坦白你的罪行。你什么细节都说了，但没有说你反人民的罪行。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你是帝国主义的特务，是美国的忠实走狗。把你为他们干的肮脏事都说出来。我们档案里有完整的记录，我们有过去受你迫害的人的正式控告。把你在陆战队宪兵队里当翻译的事说一说。你做的事仅仅是翻译吗？”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的目的是什么。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现在是遇到麻烦了。不管我怎样缩小译员的作用和地位，我总免不了给自己加上罪名。共产党总认为宪兵队是镇压中国人民的组织，是搜集情报的单位。我不仅领了他们的薪

水和听从他们的命令，还自觉自愿地参加了他们的全部活动——有些活动是很令人难受的。我参加了袭击黑市邦会，充公，各种取缔赌博、违纪警察队的活动，参加了审讯平民。许多人都认识我。有许多从事黑市交易的人、夜总会的老板、娱院老板、妓女，还有天知道是些什么人，共产党掌权后，号召过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些人都可能编造各种受美国人迫害的故事。我开始谈在陆战队里的情况，一直谈到12点半。这时他叫我停下，由一名警卫把我送回号子去。

"怎么样？"卢问我。

"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还要叫我去的。"

"当然还会叫你的。"卢象校长一样兴高采烈说："可能要叫几十次。就是为了审问我们，才叫我们到这里来的。审问是件好事。这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我们越是坦白，很快地结束审问，就越是能尽快地离开这里。你一定要努力尽快离开这里。"

这用不着他来多说。虽然卢是个令人厌烦的人，我现在却真的喜欢他了。但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起话来象个共产党干部。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明确其原因。后来证明，对我的审讯长达整整15个月。经过15个月，我说起话来也象卢一样了。我要求把我送到劳改营去。生活是奇妙的，但人的思想却更奇妙。

用不了多少时候，犯人就会失去自信心。多年来，毛的警察已将审讯方法完善到我愿控告任何人的地步，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你捏造并不存在的罪名，而是使你承认你以前所过的日常生活是腐朽和有罪并且应该受到惩罚的，因为这种生活不符合他们，也就是警察所认为的应该如何生活的概念。他们取得成功的秘诀就是令人

绝望。犯人认为他完全是在看守的掌心之中，永远也逃脱不了。他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逮捕他是有确切的证据的。(在我被关押期间，我知道有一个人是被误捕的——同名同姓但不是一个人。在发现误捕后，当局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劝回家，因为他感到自己确实有罪。）对犯人不进行审判，只有大约半小时的预先布置好的走过场，没有与律师商议的权力，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上诉。我说西方意义的上诉，因为确实可能有上诉，但是这是一场歪曲的、有讽刺意义的闹剧。这种闹剧，只有卡夫卡、奥威尔或约瑟夫·海勒（译按：均是小说家）才能想象出来。我们在本书后面就会看到。

不久我就知道，没有人能帮助我。我妻子怕得要死，又穷困不堪，并且她自己也有被关起来的危险。那时，法国与人民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奎道塞肯定不愿为我找麻烦。我只不过是由于出生的原因碰巧有一张法国护照的混血儿罢了。我不是詹金斯（Jenkins)，没有人会为我的耳朵而打仗……（译按：詹金斯原为美国一船长，西班牙人抢劫该船后，割去詹金斯一只耳朵。这事成为美国与西班牙人的战争的一个原因。）

正当我竭力想将这些事弄清楚时，突然又叫我去接受第二次审讯。我又大吃一惊，不能自制。为什么在下午8点钟又来审讯？每人都说他们要花几天功夫来消化第一次审讯的材料。我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我早上的供词完全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准备从另一个角度再审讯一次。我猜得一点都不错。在警察——这次是另一个人，但也带着那支大手枪——带我穿过曲折的走廊时，天已全黑了。在我们沉默地穿过院子时，我越来越害怕，在看到印着“四十一号”的绿色门时，反倒几乎有一种友好亲切的感觉了。我大声喊报告，走

了进去，低着头，象螃蟹似地慢慢走向墙角的小凳子。

“不要坐下。”说话的是审讯员，“这次，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

我站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看着地板足有5分钟，另一名保安警察才进来。我们几个人一起走出去。这次我荣幸地享受到四名警卫，四支手枪护送的待遇。我们大踏步地走向黑暗，我象以前一样盲目地走在前面，左—右，左—右。我们来到一幢三层楼的大建筑前，我估计这是行政楼。我们进去，穿过一间没有多少桌椅的大会议室，来到了一段红砖砌成的很陡的楼梯，旁边的灯光很昏暗。我走下楼梯，身后的靴声橐橐响个不停。一道铁门拦住了我们，一名警卫拿着钥匙走到前面来。门打开后，我看到有另一段楼梯，比前一段更昏暗，楼梯投下了半圈阴影。走廊更狭窄，仅能容我的双肩通过。每走一步，空气似乎就愈加潮湿、闷热、有霉味。我觉得我似乎在走向疫区。我的口发干，怕得要死。在走廊尽头，有一扇木门，包着铁皮。

“喊报告！”有人在我后面给我下命令说。

我大声喊着我的姓名，门打开了。两名穿着蓝色棉制服的人将我拉了进去，同时将我的双臂拧向后背。又向下走了十级楼梯，过了入口处，我发现我站在一个刑讯室里。

我想一个人在怕到极点时，是不会叫喊的。这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呆住不动。我想，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但是在我面前确实有一个老虎凳在那里闪闪发光。我感觉麻木地看着它，浑身发冷。老虎凳是一种很简单的两节相连的木板。受刑者身上几个地方被紧紧地捆在木板上，然后以各种方式将一节木板抬起。人家告诉我，最先折断的是股骨。在老虎凳旁边是水和毛巾。这是古典的水刑必不可少的用

具。将毛巾盖在犯人脸上，慢慢地将水倒在毛巾上。犯人不是窒息而死就是被水呛死。这是一种很简便的刑具，因为它又轻又小。这种技巧在越南战争时很盛行。我看看四周，看到竹片和榔头，甚至看到煤火上还烧着一节链条。如果没有两名警察在撑着我的两臂，我想我是会瘫在地上的。审讯者的面孔象铁板一样，他走到我的面前。忠诚的记录员跟在他的后面，手里拿着笔记本。最后，经过一段很长的戏剧性的沉默后，我才发现这种作法的奥秘所在。

“这是个博物馆，”他说。“不要害怕。我们叫你来看看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审讯犯人的。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人道主义政权之下。我们不使用这些残酷的、不人道的方法。有人用这些刑具，因为他们与受刑的人相比，他们是弱者。相反，我们比你们强大。我们对我们的强大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用的方法比这些要有效得多。”

他厌恶地环顾四周，又回过来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命令警卫：“把他带走。”

我出来后，心里想：毛主席万岁！从这时起，对我的审讯就进行得很顺利了。

第二次我看到审讯员时，他对我作了一番政治教育。

“鲍，你那天晚上看到我们的博物馆时那么害怕的原因是你中了帝国主义宣传的毒。我们让你看那些东西，就是让你知道只有罪恶的蒋介石政权才使用酷刑。现在你有了教训，你应该知道你的唯一出路就是坦白。这样对你、对我都节约时间，而且还会有许多好处。

“你要我坦白什么呢？”

他看起来有点难过。“我们不告诉人应该坦白什么。如

果我们告诉他，那就是控诉，不是坦白了。你难道看不出我们是给你一个机会吗？鲍，我们对你的一切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要你坦白只是为了给你一个争取宽大的机会。如果你说的与我们所掌握的相符，我可以保证，你会得到宽大处理的。但是如果你只说出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你就永远也回不了家了。”

“我从哪里开始呢？”

“有各种方式。有人喜欢先讲最重要的事，然后再讲细节。但是大多数人的方式与此相反——他们先讲一些小事，然后一点一点地讲到真正重要的事。你可以认为，他们是想将最重要的东西留到最后讲。对我们来说，这都无所谓。我们知道，我们最后什么都会知道的。还有些人记忆力很差，只能谈最近的事，他们似乎不愿谈过去的事。这就全由你自己决定了，鲍。我们有的是时间，但是有一点：不要想要弄我们，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办不到的。”

我开始从 8 岁时起讲我的历史。审讯员很少打断我，非常专心地听我说。记录员非常快而准确地用中文记录。这一次一共谈了 6 个小时。以后，每次审讯的间隔越来越长了。我有许多时间可以考虑，可以观察我的新居，并熟悉这里的规矩。

我们这个草岚子胡同小天地的名字起得颇富诗意。我听说原来这里是一座和尚庙，后来被国民党破坏建成监牢。这一大块方形的地被分为四个小方块，每一块就一个院子，分别叫东、南、西和新院。整个监牢由一堵刷了粉的砖墙围着，墙高约20呎，上面当然有电网。每个院又分成块，每一块又分成号子、办公室、储藏室等。每个号子大小不等。我

受审的西院A块里。每个号子住20个人。地是水泥的，窗上有木栅栏。木头很结实。窗框外面有东西遮着，使人看不到外面，感到完全与世隔绝。

我第一次见到草岚子胡同，就为它的严密的组织工作而惊奇。每个人都有打扫卫生的任务和时间。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就象季节一样是固定不变的。坦白和审讯每周用5天，星期日进行政治学习和反省，星期二打扫卫生。两名同号刷地板，这时其他人在通铺上擦窗，扫墙或补衣服。另一人将棉被拿到院子里去晒。如果有人损坏或用破了被、褥和衣服，号长就会申请针线。

星期二也是刮胡子、剪指甲的日子，这两件事都是用指甲夹来完成的。用夹子一根一根地夹掉胡子，我要用一个小时，但一个小时后，我的胡子夹得很光，就象用刀片刮得一样干净。刀是禁止用的，因为有危险。每一个号子有一个小盒子装剪下来的指甲，在我们之间传来传去。到月底，看守将盒子收去，交给监狱当局，卖到外面去。指甲与其他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以当作中药用。我从来不知道它们能治什么病，但是卖得的钱却使我们每四个月能有一场电影看。电影当然是枯燥无味的宣传电影（在中国没有其他的电影），但总还是调剂了日常生活。

要申请使用的工具，有一套固定的形式。卢在早晨某个时候站在门旁，等待看守路过。在观察窗打开时，他就大声喊出一套词：

"第14号号子报告。请给我们四把指甲夹，两根缝被子的针，六根小针，二十根白线和四十根黑线。"

在观察窗再次打开时，所要的东西就会从窗子外递进来，每一把夹子下都挂着一个牌子，还有针和线，每根线约

[illegible]

[illegible]

还有食物，这是整个监牢里最大的乐趣，也是最大的烦恼和动力。我运气不好，在我到草岚子胡同后，将粮食定量作为审讯方式的一个组成部份已有一个月了。没有比食物更能诱使人合作的武器了。清汤似的玉米粥、一小块硬窝头和一片蔬菜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东西，随着粮食定量制度的继续执行，我们越来越瘦，我们学会了每吃一口都极为小心，让它在嘴里尽量多呆一会。这里流传着谣言和幻想，说在劳改营里犯人吃得多么好。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审讯员故意散布的，以便使人坦白。这种饭吃了一年以后，为了多得到些食物吃，我什么事都愿意承认。

这种饥饿方法是经过精心研究的——所给食物足以使我们活下去，却又使我们忘不了饥饿。在我呆在审讯中心的15个月期间，我只吃过一次米饭，肉则从未见过。我被捕6个月后，我的肚子完全瘪了进去，我的关节仅仅由于身体与通铺接触而磨破了，这是典型的病。我臀部的皮松弛得象老妇人的乳房一样。我的视力模糊了，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我患维生素缺乏症已到了脚指甲不用夹子就可以折断的地步。我的皮肤一擦就能擦下一堆干皮。我的头发开始脱落。简直困苦极了。

“以前的生活不象现在这样坏，”卢告诉我。“我们每隔15天吃一顿米饭，每个月底吃一顿白馒头，在大节日时如新年、‘五一’和‘十一’，还有些肉吃。”

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在双百时期。人民代表团来视察监牢，他们看到犯人能吃饱，感到极为震惊。他们说这些反革命分子——社会渣滓和人民的敌人——竟然生活水平比许多农民要高，这是不能容忍的。从1957年11月以后，在节日，犯人就再也没有大米、肉或面粉吃了。

我们全心身地被食物所困扰，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失去了理智。我们为了食物什么都愿干。这是审讯的最好时机。我们每个人都申请到劳改营去。离开草岚子胡同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曾提出过书面申请。申请书甚至有了格式："请求让我到劳改营里劳动来赎罪。"

后来，不管劳改营里的条件怎样恶劣，令人难以忍受，每个看守都会对我们说，我们是自己要求到那里去的。

第 三 章

一、必须遵守政府的各项命令。

二、在号内说话必须大声，至少能使两三个人听到。严禁用外语或黑话谈话。

三、严禁犯人私自交换或借用物品。例外情况必须得到看守的同意。

四、犯人不得相互寻求同情（译按：原文如此，在我国，一般规定不得谈论各自的案情）并不得隐瞒罪行。犯人应随时相互监督，应提高依靠政府的认识。

五、犯人可书面或口头向政府提出要求，在口头提出要求时，犯人应距与之谈话的看守至少三米远。

六、犯人应牢记，在处理案情时，将考虑犯人在审讯期间的良好态度。

指导我新家的这个规则是印在小卡片上并钉在墙上的。时间一周一周的过去了，我对环境也逐渐习惯了，第14号已成为我的家和我的世界了。一开始，在我抵达这里后不到5天，卢和其他人叫我参加了我第一次参加的每周检讨会。在会上每人都表示要与同监犯和睦相处，与审讯员配合并依靠政府。结束时，卢又发表了一通训话，然后开始谈论分配工作。号子里每人都有工作可做。但在任职以前，必须先讨论、分析并要每人自愿提出他所愿负担的工作。在讨论结束时，我的工作是扫地。我感到很奇怪，那个以前倒小便桶（这是最不

要做牢里最令人讨厌的工作）的人竟热情地自愿继续倒便桶。这证明我这时还不懂监牢里的心理学：他只是想表现“进步”，并证明他正在自我改造。

他姓尚，曾是共产党的干部，但是他犯了在双百期间说得太多了的常见错误。前共产党员是我在监牢里所遇到的特殊类型的人。由于在党内经过多年的教育，所以他们是模范犯人，总是随时准备做榜样并解释官方的最新的复杂作法。但是尽管他们随时准备服从政府的规定，他们始终知道既然他们与我们关在一起，他们就是人民的敌人。这就使他们具有一种奇怪的、悲哀的双重心理，这肯定使他们生活得很为难。同时，他们又是同监犯的好朋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前共产党员变成告密者或者斥责同号的人。

尚总是努力做得更好些。有一天，他给小便桶做了一个纸板盖，后来，他设法弄到一些旧布，将布盖在纸板上，起了帐篷的作用。卢很高兴，书面表扬他关心集体。

卢警惕性很高，甚至监听我们的谈话内容；即令在偶然的闲谈时，他也总是要注意我们的思想健康，在无话可谈时，他总是引导我们集体讨论或者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一切可以使人们想到其他的东西，如家庭、食物、身体锻炼、癖好，或者女人，是绝对禁止谈论的。口号是“在政府领导下我们应该一起学习，相互监督。”在监牢里，到处都是这样写着。这种告诫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太累了，饿得软弱无力，根本不可能想到女人。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愿多要一块窝头，不要女人。

每天有半小时，我们被赶到外面去运动，我们在号子与主墙之间的狭小空地中，围着小圈子跑步。我们常听到主墙隔壁的小学里的叫喊声和笑声。我们排队和跑步的次序是按

我们的床铺位置排列的，以便警卫只要看一下他随身带的号子位置图就能认出犯人。

就是在运动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一个矮胖、剃光头的日本人，他一直在监牢院子里忙碌着，不停地喃喃自语。尚告诉我，他是个战犯，是前日本宪兵队的上士，被国民党逮捕后投入草岚子胡同的。共产党来后，又肯定了他的无期徒刑。多年来，他已成为一个全面的公务员，主要是负责清扫便坑。他清扫的便坑干净极了。他和看守一样有自己的号子，和充分的行动自由，但是当然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牢。

另一个永不离开监牢的人是监狱医生，他是一个高个子、白头发的学者型的人，显然他在草岚子胡同至少呆了20年。虽然他是个老百姓，却穿着干部蓝制服，戴着干部帽，大家都叫他王医官。和那个日本人一样，他也是从国民党那里接收来的，他毫不费劲儿地就转变到新思想这边儿来了，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宣传人员。

王有一副好心肠，每当犯人到他这里来看病，他总要说教一番，以比喻或实例来规劝人。他告诉我们要学习，学习政府对我们说的话，否则我们会滑回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再也学不好了。要好好学习，因为在劳改营里我们就再也没有时间学习了。

这是言过其实了。我们在劳动营里也是要学习的，但我们却是在审讯中心才了解到学习的重要性的。学习使犯人知道政府的观点，学习向他解释他为什么被逮捕，为什么必须逮捕他，为什么他必须随时应该配合政府（译按：意译，原文为“取悦政府”）。每一个号子每天都有学习时间，每人都必须参加。

最常上的课就是读《人民日报》的片断，由号长读报，

全体号友讨论。一名犯人被指定为记录，负责将每个人的发言记下，然后写成摘要，放入个人档案内。如果犯人说了不该说的，或犯罪的话，他的发言会全文归入档案，而他是要为此吃苦头的，如一段时间的禁闭，延长刑期或被斗争。斗争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我们下面就会介绍斗争是怎么回事。犯人们知道他们的发言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很快就学会用空洞的口号来说话。当然这样有一个危险，即他们最后都是以口号来思维的。他们大多数确实就是这样来思考的。一般说，一直要等到他们过上了劳动营里的生活才能使他们摆脱这种习惯。

每当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件发生时，平时的学习课就改成全体会议，在会上解释政府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例如，在1958年，美军在黎巴嫩登陆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件，以致一切审讯都停了下来，进行全体犯人的学习。在台湾海峡危机和国民党以新得到的响尾蛇导弹打下一架中国飞机时也是如此。在这些课上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正在出口非人道的武器。还有其他会议介绍人民公社运动、总路线和大跃进。这三个运动统称为三面红旗。

我参加的第一次这种特殊课是关于毛的“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下面我将详细地再说这次学习（冗长的发言，喊口号等等），因为这是中国的典型学习（监牢内外，到处都有这种学习），这一过程的某些知识对想要了解革命后中国人的心态的人是极为必要的。

学习总是在下午开始，这时审讯已结束，全监牢都很安静。我们在号子内集合，盘腿围着卢坐在通铺上。

“现在注意听，”他提醒大家说，“因为一会儿每人都必须发言。没有人能例外。”

卢读了约有一页纸长的一段书。这本书象有名的红色语录一样是分成小段的，以便消化。卢读得很慢，然后将书放下，环顾四周。

"都清楚了吧？我读得太快吗?"没有人说话。"那好。现在大家考虑几分钟。"大家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卢清了清嗓子（即令是清嗓子，他也是一本正经地），然后说了最后一段话。"在我们开始讨论以前，我要为文化水平低的人解释几点。"

这种直率的说法在中国并不被认为是侮辱性的。有些犯人是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没有人认为卢说这个事实有什么恶意。他还另有用意。过去，有些犯人以文化低为借口不参加学习。卢接到明确指示，不让任何人逃脱学习。他很自然地又回到他往常的说话态度。

"首先，我们今天读的是毛主席的一篇著名文章。这是他在双百期间做的报告。现在都按照这篇文章在解决人民之间的不同意见和误解。这是整党和反资产阶级及反右派的根据。

"有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一般不严重的错误。第二种矛盾就危险得多了，这些矛盾不是错误或缺点，而是犯罪，如对政策不满，反革命活动，有意识的反对国家的行为。第一类矛盾可以由人民自己通过讨论和耐心的解释来解决，但第二种矛盾就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至于我们这些犯人，政府给我们时间来认罪和表示悔过，我们应该彻底坦白。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机会，如果我们不肯利用这些机会，这只说明我们仍然想造反，仍然与人民为敌。如果我们坚持错误，我们就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

对象。我们有机会来坦白，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原来能够很容易、很快地解决的错误就会变得更为严重。如果我们不相信政府，政府也就只能不相信我们。这就是我们到这里来的原因。”

卢的平静的言辞对整个号子里的神情沮丧、感到无望的人是极有说服力的。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官僚的判决。每天，都要犯人们相信能减轻他们未来刑期的，不是司法程序、不是证据和法庭上的辩论，而是他们的态度——也就是他们的表现。我们与国家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而不是象西方法理学传统的那种成人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孩子必须完全信任父母，因为他别无选择。

“好，现在开始讨论。”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这次讨论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虽然我们以前不老实，不严肃，政府现在还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赎罪，认识我们的错误。”

卢指了指坐在通铺尽头的一个身体结实、50多岁的人。他姓吴，由于进行农业上的反革命活动而被捕。他是新秩序打击的第二批农民。第一批当然是地主，他们在革命以后很快就被严厉地打击了。吴有地，但完全是自家耕种的，他不剥削人，只管自己的事，与人无争，也无前科。但逐渐他成了前进的典型绊脚石：他拒绝参加合作化运动。

“我被捕，”吴说，“是因为有人说我妨碍合作社运动。他们说我是绊脚石。在这以前，在共产党来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农民爱怎样干就怎样干。他们说不强迫人参加合作化运动。在他们告我不参加合作化运动时，我会怎样想呢？以前说可以自己干的嘛。”

吴还没有学会悔过，这次会就是要使他回到正确的道路

上来。卢象平时一样平静地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吴摇了摇头，卢就要其他人发表意见。老一套的说教开始了。

“吴看不起工人。”有人开始说。

“吴的思想不好，”另一号友以女子学校校长的严肃态度大声说。“我们必须帮助他认识这一点，他才能好好坦白。我们不希望看到他被枪毙或者被判无期徒刑。我们必须善意地帮助他。”

每个人都举手要发言，卢点头示意，于是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批判、指控。每个犯人参加这个活动的目的既是为了帮助这有罪的号友，也为了表现自己有悔过赎罪的决心。每个人都知道档案里有这样的发言是有好处的。会议继续在进行。

“吴想要搞特殊。”

“他在破坏合作化运动。”

“凡是不参加合作化运动的人就是反对这场运动，如果你反对这场运动，你就是反对政府。”

“政府要我们学好，就象父母告诉孩子不要偷窃一样。但是吴不考虑别人，他只想自己发财。”

“吴在我们社会里是没有位置的。地主是一定要消灭的，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列宁的教导。”

可能由于这个人一知半解地提到列宁，许力插进来说：“我们不要说得这样过分。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问题。”

许力，象尚一样，曾在政府中工作过。他是山西的一名经济学家，在双百期间下台的。他是个改革家，他提出以奖金奖励生产多的个人的方案，这使他在整党中挨了整。他被逮捕了，罪名是搞物质刺激。这时，他40多岁，瘦瘦的身子，对

自己要求很严，但说话时有一副教授的派头，他研究党的思想已经多年。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吴的事。他说他没有破坏合作化运动，因为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妨碍。好，他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在我们看待他的这些思想时，应该记住他的出身。他是个富农；作为农民，他喜欢为自己种地。这是他的天性，是从他的祖先传给他的。他不希望别人分享他的收获，但是如果别人比他努力，他倒愿意分享别人的收获，是吧。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使吴相信政府对他的指控是公正的。

“合作化运动是个群众运动。成千上万亩的一片片土地都连在一起了。我们现在的田地不是30或40亩一片，而是千百亩一片，如果在这片地当中有个体农民的10亩地怎样办呢？如果大家决定种水稻而他却要种玉米，那他就将整个体系打乱了。大家不能穿过他的地去犁地，因此只好绕过去。可能他还会使别人对参加这运动和与别人共享收获有其他的想法。他是个坏样板。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下令进行的，所以吴是在违反毛主席的指示。”

许这时越说越激动，提出了他的中心意见。“如果是这样，我恐怕也得同意其他号友的意见，他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没有位置的。”

就纯粹的宣传鼓动而言，这是最厉害的说法了，但是作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虽然他已经倒台了，但他却真心实意地希望能说服吴而他也知道确实是有办法去说服吴的。

“吴号友，”他这时热诚地问道，“在解放前，你有多少粮食？你年产多少粮食？”

“大约每人250公斤，”吴老实地回答。“这不包括秋

皮在内。"

"现在是多少？我是说，你被逮捕时是多少？"

"大约320公斤。"

"你怎么会多收70公斤呢？"

"现在的损失少些。以前水利情况不好，我们还常受到当兵的抢劫"。

一切都按许的设想进行，他知道会这样的。"现在当兵的还来要粮食么？"

"什么，当然不了。"吴似乎要生气了，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解放军不会干这种事的。"

"现在水利情况怎样了？"

"你知道在1953年有一个兴修水利的运动。这改善了水利情况。"

"你不但不感激共产党改善了情况，你还去破坏这个制度。你看到你是个什么样的混蛋了吧。"

卢插进来说，声音里带有恼怒的成份。他必须叫许记住批判的规矩。"不能叫他混蛋，"他说得很肯定。"你应该知道，在学习时间里是不准骂人的。我们不能用这种话来说号友。"

许用了官方坏字眼里低一等的词。"那好，就叫坏蛋。"

"不行，"卢摇着头反驳说，"这也不行。你可以叫他坏分子或者反动派或者臭地主。地主也够不上，我们可以叫他富农（译按：原文直译为'一般的富有土地持有者'，现改译'富农'）。"这时，他以法院法官的派头转向吴说："你看你引起了多少麻烦。"

吴感激地点点头。思想上已被折服，也有点害怕。但这种表示还不够。卢要的是正式的表态。

"是，我开始认识到我的错误了，"吴小心翼翼地说，"我以前没有认识到我不参加合作化运动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即令到了这时，吴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结束。卢还要以一番说教来结束它。

"毛主席为了大家好才发出这指示的，"他说。"这不是由你来决定的。你以为不参加合作化运动是很聪明的做法，你以为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你错了。你很愚蠢。你的这种态度给你带来的结果就是被送到这里来，现在你已什么办法也没有了。现在还有人要发言吗？"

他四周看了看，等待有人发言。没有人说话。吴的事总算完了。卢又向一个瘦得皮包骨似的秃顶、灰白胡子的小老人作了个手势。他的名字叫魏伊萨，这是"伊萨克"的中文译音。魏是个美以美会的牧师。他说话时很自若，因为他经常当众讲话。

"为了使以前没有听过我谈身世的人能了解我，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新教的牧师，这就是说，我是教会里的人。我是在20几岁时加入教会的，40多年来，我一直在教会里。我不隐瞒我是为美国人工作的。"

"帝国主义分子！"有些积极的号友大声喊道。

"有些事，我还不懂。人民政府解放北京的时候说，允许有宗教自由，但是帝国主义走狗和破坏国家治安的人要受到惩罚。这很好。后来，他们说，为了使教会不受外国人的影响，他们决定改组教会，使教会成为中国的教会。我完全拥护这一措施，我不希望看到中国人的利益服从于外国人。事实上，我是第一个改组委员会（译按：指三自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们派一个非教徒来委员会时，我就有点担

心。他负责制定今后的计划，但他根本没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这个职务应由被任命的牧师担任。但是我想他们可能是有道理的。多少世纪以来教会都是由教士管理的，可能现在是让非教士说话的时候了。好，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与这个人一起工作，后来，在1955年，他们做了件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事——他们竟派了名共产党员来监督我们的活动。他当我们的领导！这时我开始认识到，他们改造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取消教会。不久，就不准我们向孩子们传道了。然后委员会开始要我们少管宗教事务，多管我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所要的是不传道的教会。如果你不传道，要教会干什么？”

许多面孔都含有敌意地仔细看着他，但没有人想要回答他的问题。

“在下一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对他们说，共产党说他们允许有宗教自由，但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取消宗教。委员会告诉我，我的看法是对政府的诬蔑。第二天，他们逮捕了我。我就到了这里。”

当然，人们称魏是反政府人士的走狗，为外国势力工作。他象许多中国的教徒一样，他的信仰使他不够屈服。他执着到了近乎天真的地步。

“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我的审讯者所说的话，”他继续说，“他们说我是间谍，但我从来也没有打听过什么。”

魏的这番简单的话，对西方读者说来是相当温和的，但对我们的号子、监牢和整个中国说来，却是挑衅。

“不准他说下去！”一名犯人喊道，“他在诬蔑政府。”

卢插了进来。“这是个特殊情况。到目前为止，魏还没有坦白过。换句话说，他还不承认他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他目前的表现这么坏。这就要靠我们尽量去帮助他。我今天

要打破惯例，我来开始向他提问题。”

这时，卢忘记了他要举止得当。他并没有向牧师提问题，反倒发表了长篇的批判，其激情之高令人吃惊。

“牧师，你的问题是，你已经不再是个中国人了。”这个说法太过分了，魏想要反驳，卢不让他说话，并且继续说：“你的想法已不象一个中国人了。你指责中国政府是一群骗子！”

这完全是煽动，引起了一片愤怒的喊声，这原是可以预见到的。魏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

“如果你不信任人民政府，你就不可能相信政府向你作的保证。无怪乎你到现在还没有坦白。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使你更深地陷入你自己造成的困境，你拒绝对你的挽救。总有一天，他们会把你拉出去枪毙的。你说你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不是外国势力的间谍；但是你40年来，间也不间地就执行了外国宗教势力的指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果人民政府要在宗教方面作些改革，它完全有权这样做。但是你不愿看到这些，是吧？你好日子过得太长了。你又有钱，又吃得肥胖。”

魏一声不吭地听着。除此而外他还能怎样呢？卢想到一个绝妙的三段论法来结束这场谈话。

“不要以为你最后会成为一个殉道者。你是个叛徒。你自己的人民都在反对你。你说，你的思想象一个共产党员吗？”

“不象。”

“你的行为象吗？”

“不象。”

“那么，你到这里来是一点也不用奇怪的。”

就象"啪"的一声将书合起来一样，他结束了对魏的提问，转到下一个人。这次会在下午4点才结束。

对学习会的自然补充是斗争会。它是许多人，有时甚至是成千人的集体对一个人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这个会上，被批判者根本不能辩护。我第一次见到的斗争会是在我到草岚子胡同几个月后，在我们隔壁的号子里进行的。整个号子都在斗争一个新来的犯人，他们的叫喊声太响，我们平静的学习会都进行不下去了。

一名警卫打开了我们门上的观察窗，卢打手势叫我们挨个地去看这场面。我们看的时间很长，因为他几乎走不动路。他的脚戴上了脚镣。这是一根一呎长的铁棍，两头有圈套在脚踝部。有闩子将两头的圈套固定紧，从铁棍当中伸出两根链条套在手腕上，这两根链条又由另一根链条联结着。这刑具总重32磅，犯人必须将从脚上引出的链子握在手里，绕几圈，因为它长得会拖在地板上的，而这是不允许的。

斗争会是在30年代里兴起的。那时共产党在中国大片农村中颇为得势。经过多年的试验与改进，它成为审讯地主和其他落入造反的农民手中的敌人的标准方法。这种方法有一个体系，而且还有理论根据。共产党以前是，现在仍然是非常讲究形式的：即令对一个人的惩罚已经事先定下来了，在惩罚以前一定要叫他坦白认罪。

诉苦会在心理上也起着同样作用。从农奴制解放出来的农民被邀请去证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在阶级敌人手里所受的耸人听闻的苦难。

当然，今日在监牢里仍然开的斗争会既是对态度不老实的人的惩罚，也是迫使人坦白的工具。但在一般平民生活中，也颇盛行。1949年以来在中国进行的五六次政治运动

中，斗争会成了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人可能为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前讲的话被斗，因为在一般人的生活中，也有人记录下他所说的话。他也可能被在城市里无所不在的检举箱所检举。外国人可能将检举箱误以为是邮筒，因为它们也被漆成欢乐的鲜红色，上部有个投信口，并有锁。下面是放标准的检举单的架子，架子上面有用中文写的"检举箱"字样。检举单包括下列项目：

检举人的姓名与住址

工作单位

被检举人的姓名与住址

年龄

性别

出生日期

原籍：省、市

外表特征：头发、眼睛、身高

爱好

特长

你是如何认识他的

你与他的关系

检举时用单页纸写。每张纸检举一人。警察每日收一次。监牢和劳动营内也有检举箱，还有所谓的建议箱。

如果一个人被检举，并被斗争，最好还是立即承认，因为斗争会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斗争会的主持人认为被斗争的人悔罪还不够，斗争会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就象其他非刑讯的方法一样，斗争会的目的是要被批判的人承认对他们所作的任何指责。因此，斗争会很少能很快地结束，否则就太容易过关了。开始时，即令被批判者说了实话或者完

全承认对他的指控，人们都要对他说的每句话表示不满。一天结束时，他被关在一间房间里，有点吃的东西，并告诉他第二天的斗争。

往往有一天假期（如星期日），他被关在房间里，至少斗争组里有一个人不断地监视着他。如果他向窗外看，看守就斥责他不考虑自己的问题，他必须专心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如果他打瞌睡将他拉醒。这样三四天后，他就开始编造他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希望通过承认重大的罪行能使他得到暂时的休息。这样斗了一个星期后，他什么话都愿意说了。

在中国，思想与行动是同样重要的，而斗争是使正确思想进入人的脑袋并控制其思想的最有效的武器。几年以后，我在劳动营里时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时，给我们号子分配了斗争一个偷了吃的东西的犯人的任务。我们每天在从田里收工以后的休息时间里斗他，连斗了三天。从下午5点半到9点熄灯时止，我们又喊又叫，而其他号子里的犯人则自在地休息或打牌。人们都精疲力尽了。最后，我向看守请求饶了他。

“看守，你看，”我说，“我们在过去三天里已经斗了他10个小时了。他承认他偷了窝头。他是因为饿才这样干的。这还不够吗？难道我们一定要他说，因为他饿，所以他就是个卑鄙的资产阶级么？”

他又给我上了一堂课，这是我应该早就预料到的。他问我：“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犯错误，他又怎样能改正呢？”

看守伸手取来一个插有野花的瓶子。他将花拿出，将瓶子里的脏水倒掉，将瓶子递给我。

"把茶壶（译按：原文如此，应为热水瓶）里的水倒进去，"他说，"就直接倒进去，不要洗它。"在我将瓶子装满时，我感到说教已经向我袭来了，因为瓶底一层厚厚的渣子翻上来，干净水又浑了。

"鲍，只要瓶子里还有脏东西，水就不会干净，是吧？你的号友就是这样。他脑子里有脏东西，但他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只要这些东西仍留在他脑子里，你们的善意批评就进不去。"

因此，我们继续进行斗争，直至他认识到偷东西对思想的影响。

我们那位模范的精神领导人卢是被斗争以后到草岚子胡同来的。他原是个很好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党员。在双百期间，他判断错误，说了些话。几个月后，这些话被用来批判他并要他对政府说清楚。晚上他被关在办公室里，白天挨斗，他慢慢地彻底坦白了，承认他的坏思想和一件件的事，甚至说出他以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过。他这个案件的高潮是他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全面的坦白。会后，让他回去工作。他以为他的事已结束了，但三个星期后，他的党支部书记叫他去，告诉他不好的消息："你要准备去好好学习。我们认为你的思想需要清理。你的思想情况很不好。党很关心你的政治健康。"三天后，他被逮捕了。

在我看到他时，他已经渡过了我感到的那种痛苦时期。他承认将他关起来，对他完全有好处。他告诉我："如果坦白罪行的人都不受惩罚就放出去，那么中国就成了到处都有罪犯的国家了。"

卢是个模范犯人——谦虚，积极执行命令，思想正确。这个可怜的人以为他的表现会减少他的刑期。他错了。

在审讯中心中除了卢，我记得最清楚的人就是翁爱国。他的生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最后竟会不光彩地到了监牢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是在阴历初一到我们号子来的，那时我们刚吃完下午那一餐。门打开了，进来一个身材结实、穿着黑皮鞋和西服的人。他似乎60多岁，在中国人里算是高个子，宽肩白发。他的东西卷在美国的军用毯里。我们按规矩给他腾出了位置，卢叫他去，问他的姓名和其他一般情况。

"我叫翁爱国，从北京来。"他说。

"你老家在哪里？"卢问。

"没有老家。这就是说，我不知道。"

卢当时没有继续问。显然，他不愿多说。后来，在就寝时，他使我们大吃一惊——他从包里抽出一套有条纹的睡衣！在无产阶级的监牢里，这是闻所未闻的，我们都是穿内衣睡的。一名号友忍不住从阶级观点提出了批评。

"臭资产阶级！"他大声说。

翁手里拿着那卷橘红色和蓝色条纹的衣服，轻蔑地看着他。"你是什么？如果你比我好，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穿上了睡衣，卢叫他们两个人都住嘴。几个星期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历史。他不知道父母是谁，他是个孤儿，以前在天津街上要饭，后来一对美国教会的夫妇可怜他，带他回家，给他吃，给他穿，并叫他上了教会学校。最后，这对夫妇收他为养子，送他到美国读国际法。他与一名美国女孩结了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战略情报处短期回到中国协助起诉日本战犯的工作。但是，他在中国的短期停留足以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堕落产生了深刻和有根据的厌恶的情绪。回到美国后，随着导致共产党胜利的内战的进展，他越来越

感到兴奋和骄傲。象许多海外华人一样，他决定回中国，将知识贡献给年青的共和国。经过许多艰难曲折（在麦卡锡时代，同情共产党的人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终于登上了一艘驶往日本的货船，从日本又乘小客轮于1950年底到香港。

过了9个月，他才与中国人联系上，并使他们相信他是真心诚意回来的。1951年3月，他跨过了边界，受到盛大欢迎。欢迎以后，他成了外交部长的法律顾问。他有了工作，也就有了房子、司机和高薪。随着年月的逝去，他的特权也逐渐被取消了。他发现这个政权对海外归来的人有着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感。

1953年要求他捐献一个月的薪水给在朝鲜的士兵。喜欢负责人的党员批评他的房子太奢侈，工资太高，他那长期受资产阶级影响的阶级意识觉醒了。他感到惊奇，也感到无路可走，他只得承认，他是个自私的逐利之徒，要求减少他的薪金50%。即令这样，他的薪金也比他的同级要高出许多。下一步大幅度取消了他看书的特权。“我们不反对你看英、美杂志”他们对他说，“但是我们觉得你应该开始多读些我们自己的书。”

显然，翁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是他还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后来，他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责他的主人有意地欺骗他和其他从海外归来的人，他们都是自愿在革命成功后回来的。你们给我房子和司机，但我从来没有主动要过这些。而现在你们指责我没有阶级觉悟。至于杂志，我看它们是为了及时了解国际形势发展情况的。

这些话都成了他为自己建造的监牢的砖头。他拒绝按要求收回他的意见，并且说他说的都是事实。他的逮捕比我迟

两个月。

在劳改营里，我见到另一个象翁那样的人——詹姆士·秦。杰米（译按：詹姆士的爱称）是西方文学方面的学者，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英国任教20年，他听说祖国需要教员，就回来了。在这里，英国语言的高级课程用的是苏联宣传文章的英译本。他的基本教材是《真理报》的英译本。尽管他努力克制，他还是免不了在思想上和学术上感到恼火。在说了几句温和的抱怨的话后，他就处在通向劳改营的道路上了。独立思考是不受欢迎的。

第 四 章

整个1958年我都是在草岚子胡同度过的。这是中国的一个不可思议而又令人难忘的时期——大跃进的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浮夸风盛行，一种不现实的激情笼罩着这个国家。似乎凭借某种主观愿望，生产和建设就可以戏剧性地增长，并试图借此一劳永逸地证明中国人民及其正在指导着他们的思想的伟大。报纸报道，新技术神奇地提高了每亩地的水稻产量，同时还刊登这样的照片：一个人站立在长得密密实实的庄稼上面。（数月之后，这些庄稼在收割之前就已经倒伏，报纸却不予报道。）大量的新花白菜和其它蔬菜将被栽种。每个小村庄都有一个粗制滥造的炼铁炉，他们希望用这样的炉子炼出钢铁。甚至在监狱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炼铁炉。我当时还在草岚子胡同受审，没有资格参加生产劳动，从而失去了参加炼铁的机会。就我个人而言，整个这场运动给我留下的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我的妻子当时写信告诉我，她把我们的铁床献给了钢铁运动。

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是毛泽东的通往共产主义的便桥。这两场运动同时进行，带来了某些令人惊讶的局面。事实上，这两场运动都失败了，但是，直到运动结束，依然斗志昂扬的贫穷的中国人再一次白手起家以前，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和他们的苏联老大哥相比，中国农民基本上热情地支持

了公社化计划。他们的逻辑是：让个人生活见鬼去吧，因为党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共同行动和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以极大的干劲和热情建起了公共食堂。将这个逻辑又推进一步，他们吃饭不要钱了，家庭小灶不时兴了，许多农民砸碎了瓷盆瓦缸，将铁锅铁盆送进了什么都吃的熔铁炉。这些炉子呼呼直响，发出灼热的白光，流出他们以为是钢铁的涓涓细流。他们为自己的智慧感到惊讶——毛泽东不是说过一切聪明才智都在农民身上么？——他们欣喜若狂地得出结论：工程师只不过是些寄生虫，因为事实说明任何人都可以炼出钢铁来。

随着这种幼稚可笑的、农民式的自高自大情绪的增长，生产（无论是粮食还是毫无用处的钢铁）开始下降。农民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公共食堂和他们的家庭上。个人投机取巧自然随之而来，于是食堂工作人员私自出售食物，或者至少给自己留下最好的食物。更糟的是，如果一个农民对乡村生活感到厌倦，或者不愿意把繁重的体力投入土地耕种上，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大跃进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无止境的。

那时，到处都是建筑工程。农民们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他们在城里能立即找到工作。雇工队甚至在城门口堵截进城的农民，用简单的爱国口号动员农民去参加他们那个具体的工作。农民们发现，在城市生活是一件美事，除了每月14元钱的工资外，还有电和自来水。

不久，农村开始感到了劳动力的短缺。这事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国家的粮食出现危机。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使农民返回土地。党的书记号召留在农村的家属规劝在外的浪子返回家园，但是，毫无效果。最后，政府采取了措施，

扣压了有关家庭的粮食供应卡。这样威胁是简单明了的：或者让家里的男劳力回来，或者不吃饭。

青年农民开始慢慢地、勉强地、成群结队地回到了农村。但是，他们根本不能原谅党所采取的措施。他们重新投入了土地耕种，但只是半心半意。这种情绪低沉的懒散态度为1960、1961和1962年的农业歉收铺平了道路。

我们呆在草岚子胡同的人也进行有关大跃进的学习，并且学习时间被延长一倍。看守、警卫和审讯员从不错过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犯人是毫无用处的社会渣滓，说监外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建设共产主义贡献一切，而我们却什么也不做。我们表达革命热情的唯一方式是好好坦白交待。我们和卢一起参加的学习会越来越充满了表达热情的话语。我们象斯达汉诺夫鹦鹉似的，总说些老生常谈的话。

经历第五次审讯之后，他们开始给我以写交待的殊荣。由于我是外国人，所以可以使用英语，总之，从2月20日到4月底，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用700页打字稿交待了我的全部经历。每星期有三天，我低着头被人领着通过一条长廊，来到一间小小的审讯室。这里有一架打字机，有纸，还有一名警卫监视我。由于他的看守任务不重，所以，他把时间用来绘制一张十分详细的香港地图。图上标出了每盏红绿灯和每个警察岗亭的位置。只有天才知道他为什么要绘制这张地图或者是谁下令要他这样做的。也许有一天这个美丽城市的居民会找到答案的。

我们俩静静地工作，旁边的火炉上坐着一壶热水，嗞嗞作响。喝水没有限制，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这是个特权，但我必须小心谨慎。囚犯们常常通过喝水来对付持久不息的

饥饿，但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办法。我早就听说了饥肠辘辘的囚犯死于水肿的传说。使我自己不饮过量的水对我说来就象我最终放弃吸烟一样困难。

象其他人一样，我希望我的交待尽快得到认可，尽早宣判，以便摆脱草岚子胡同的慢性饥饿——到劳动营去。上帝呀，我是多么渴望去劳动营呀！我们天天听到和重复着劳改营有好多食物的传说。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3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发现我的文字作品正在被认真地加以研究。晚上10点，牢房里的犯人都入睡了。我被叫到一个三人审讯小组的面前。其中有一个是我自从被捕就认识了的。他举止文雅，十分讲究。显然，夜间提审我是他想出的开玩笑的主意。

他问我，“你过得怎么样？鲍。你来这里好长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这是一些自问自答的问题，并不指望我回答，我也没有回答。他对我的关心是令人感动的。“鲍，你瘦了，大概你的问题令你憔悴。这也是我们想和你谈的。我看了你的交待。你尚未交待多少问题。或许你正在扮演连载小说作家的角色，试图引起我们的兴趣，使我们希望能买到下一期的杂志。是不是这样？鲍。有许多人名你没有提到。你还记得琳达·李吗？”

对了，琳达是一名从事绘画教学的中国姑娘。我知道，她和许多外交官有过风流韵事。她是我的好朋友。

“她就离这里不远，知道这个你可能会很高兴吧。实际上，你们现在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想，这可以帮助你交待。”

确实，琳达知道我和西方国家各大使馆的所有关系。显然，她已经将她所知道的关于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审讯员：

审讯员只不过想叫我明白，我想要隐瞒是没有用的。

但我还是作了小小的努力来隐瞒。我没有提及我在刑侦队里的工作。我肯定，除了美国人，没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没有写上这一条就结束了我的交待，静等着审讯员的回音。6月4日晚上，回音来了，他们又使我大吃一惊。

这次，审讯室里很暗，只有一只昏黄的灯照在审讯员的面部。这种布置是想故意制造戏剧性的气氛。审讯员漫不经心地翻动着我那700页交待，再三询问是否还有什么需要补充。我们用一小时回顾了我所经历中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但他还是继续提出这个带有暗示意味的问题，我仍然回答说没有什么补充。这时，象演戏似的，从我背后的黑暗中响起一个第三者的声音。这个人说的是英语，我对这口音很熟悉。

“转过去，帕斯夸列尼。”

审讯员将他头上的灯泡转向第三者，灯光下，我看见罗伯特·陈站在我面前。在刑侦队办公室，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是我的好朋友。罗伯特身着政治警察制服，由此看来，他一直就是他们的地下工作者。上帝！

我彻底地垮了。我只得和盘托出。最终，他们真正得到了我的“彻底坦白认罪”。

以后3个月里，我没有再和审讯员见面，时光大都在无所事事和饥饿中挨过，终日里渴望去劳改营。在卢召开的象弥撒似的学习会上，我象做礼拜唱祈祷文似地发言。每当召开斗争会，我就大声辱骂并对他人威吓。而平常总是忙于料理生活。

那是在6月下旬发生的唯一的重大变化。上头规定，所有犯人在下午睡两小时午觉。这条规定照例对任何人都没有

例外：即使毫无睡意，也要求躺在自己的铺位上，闭上眼睛。看守不时通过窥视孔朝牢房里盯上一眼，检查睡觉情况。谁要是睁着眼睛，他就会收到一张谴责单。谴责单积到一定数量，就要挨斗。我们都表现很好，都是好孩子。

9月中旬，看守把我叫去，告诉我，我的问题已临近尾声了。现在是我写悔过书的时候了。悔过书的正式名称是"自我交待"。悔过书是中国刑事制度的杰作之一。一个犯人不仅要经历数月乃至数年的极其耐心的审问，而且还必须将所有这些审问推向一个高潮，那就是产生一个亲自写并且由本人签名的罪状梗概。犯人小心翼翼地、尽可能精心地拟出对自己的起诉，因为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交待总是会被退回来的。这样，犯人就将继续留在审讯处。如果犯人写出的材料终于通过了，政府就掌握了一份材料，那么，依据对这材料的解释，政府实际上可以作出任何年限的判决。这正是检察官所梦寐以求的。

我用4个小时写了16页的交待，没等多久就有了答复：通过了。就在第二天，我被叫去和书记员进行最后一次谈话，这位书记员一直参加了我的所有审讯。

"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他固执地坚持这个问题。他这样作是对的。一旦查出犯人的新的罪行，就可能将他从劳改营提出来进一步审问，这是监狱生活中最令人恐惧的事情之一。这样的话，草岚子胡同的整个痛苦的经历就可能重新开始。由于对政府的态度不老实，10年的刑期可以无限延长。

"我不敢说已经交待了一切，"我承认说，"因为我可能遗忘某些微小细节，但是，所有重要事情都已经交待了。"

"你能绝对肯定吗？"

“是的，绝对肯定。”我说。

“那好，起立。”他摆出一副这种场合所需要的庄重的表情，宣布说，“我们特此通知你，你的审讯期结束了。你还想说些什么吗？”

当然要说。我早已准备好了标准的话语。这句话，每个犯人都会说，而且是等待着在这一时刻说出来的。多年来，这句话口口相传，每个犯人都知道，这也正是政府所要求的回答。

“我希望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现在，该轮到书记员说话了，他也有他的套话：“如果你表现好，自然会得到宽大处理，到时我们会加以考虑；如果你表现不好，提再多的请求也不会得到一丝一毫的宽大。”

我本以为他的谈话会稍长一些，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竟转换了话题，他问我：“告诉我，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认为我们或许哄骗了你，使你交待了一些本来不必告诉我们的事情？或者认为我们对你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你甚至是否认为可能你说得太多了点？”

“没有，根本没有。”我立即回答。我当然说没有，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但他依然坚持地说：

“不要如此简单地回答。我们现在谈的事情对你极其重要。它会影响到你以后接受劳动改造的态度。你知道，我们现在希望驱散你头脑中的疑雾。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要你为你的将来生活作好准备，所以，你要如实告诉我，你是否有过类似想法？”

“那好吧，”我承认了，“去年某个时候，我确实怀疑是否我说得过头了。”

他似乎很满意。“好，很好。现在你过来，看看这个。”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文件夹与西尔斯和罗巴克目录的大小相仿。

“你读读这个，鲍。你将看到仅仅对一个人——也就是你——的大量检举和控告。你会看到，你的交待与这些材料几乎完全一致。我们给你看这些材料，不是让你对这些为国家尽了职责的人们产生报复情绪，而是向你证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对你进行立案侦查是有根据的。现在，你可以坐下来读读这些材料。”

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情况。为了保险起见，我决定采取谦让和悔悟的态度，这一般是比较好的办法。于是，我表示：“不必读了，我相信你。”

“你现在可能相信我，但是，以后也许会有疑虑。拿去，从头至尾把每一个揭发材料都读一遍。”

我拿起这一大堆材料。由于我当时不能阅读中文，所以，书记员坐在我的身旁，为我朗读。阅读这些材料花了好几个小时。这是些令人胆战心惊的揭发。这数百页揭发材料都出自我的同事、朋友和只见过一两次面的各种各样的人之手。回到牢房，我暗自庆幸，我的狱中生涯终于达到了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但也有些头晕脑胀——多少我曾经绝对信任的人竟然背弃了我！我陷入了深深的怨恨之中，因为我自己从未填写过一张揭发单。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去参加最后的仪式。我的审讯员也在场。他的语气近乎是友好的。

“祝贺你。”

“我请求政府给我宽大。”

但是，事情尚未完全了结，我抱有太多的幻想。

“宽大？”他带着讽刺意味地问道，“你可以用你的行

动去赢得宽大。但仅仅交待你自己的罪状还不够，还需要揭发其他人的罪行。明白吗？”

当然，现在是我背弃我的朋友和同事的时候了。

“我们不是叫你当告密者，”他向我保证，“不过你不是单独一个人从事犯罪活动。你有同伙。我们想让你改过自新，但是，你如果不把你的同伙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认为你是真的走在正道上呢？揭发他人是赎罪的好办法。在你转到移交处以前，还要在这里呆几个星期。你回去时，我们会给你一些揭发单。希望你通过帮助政府查出敌人来表达你对政府的感激。”

我带着这些检举单，慢慢地回到了牢房。以后的两个星期，我都是在填写检举单。我尽可能不伤害被检举者，保证我所检举的人是已经受到更严厉指控的人。这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情。我自始至终向往着离开草岚子胡同，想能再一次吃饱肚子。我的头发掉了，我以前的肚子现在成了一个凹面三角形。又有新的传说，说满洲的劳动营格外美妙——鱼和野味很多，蔬菜能魔术般地从土地里钻出来。我沉缅于对食物的幻想，慢慢地填写了检举单。

11月的头一个星期，我终于从西院搬了出来。这时，我们牢房的最后一个人也已作了彻底交待，递上去的悔过书获得了认可，他要求政府处理他。于是，我们一起搬到了东院。一个寒冷的、下着小冰粒的天气，上午9点左右，一位看守跑了进来，命令我们把东西收拾好。我们捆起个人的行李、衣服、被褥和笔记本，留下所有的水桶、脸盆和其它用具，静待警卫发布出发的命令。我们18个人，低着头，走了500码，到了东院，在大门口蹲了下来，等待出发。一名警卫走来，他依次念着他手里的名单，这时，我感到失望，因

为，我们这帮人完全分开了。我只和另外5个人一起被安排在一间小牢房里。号长还不到30岁，满洲人。他在通铺上给我指定了一个位置，并例行公事地说了几句话："看到你的问题已经解决，我很高兴。既然我们来到这里，就让我们继续学习，尽量不让政府失望。"

我了解到，我们牢房中，有一个已经宣判。我们其他人都急切地想知道他被判了多少年——因为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指示器。同时，我们非常清楚，监牢里是不准谈论这种事的。我们的号友不吐露一个字。按规定，犯人在整个监禁期间都无权泄露自己的刑期。但是，只有初来乍到的人才会为这条禁令所限制。我们从这个朋友身上能够了解到的是，他的情绪极其沮丧。两天后，我又转到另一间牢房。我这次转移的结果似乎有点象家庭的团聚。

我匆匆来到新牢房，第一眼就看到了安东尼·刘。他曾在另一个西方大使馆担任联络工作，是我的好朋友。4天后，约翰逊·翁也来了。我和约翰逊认识已经多年。象我一样，他也是一名华侨，一直在一个西方大使馆工作。但后来由告密者变成了政治警察。当他没有太多用处时，他们把他甩了。可怜的约翰逊，他身体虚弱，毫无特征，但我一开始就对他深表同情。几年后，在劳动营，我埋葬了他。

不过，我最喜欢的号友是巴尔泰克。他是我在监狱中见到的第一个非东方人。当时，他50刚出头，一头棕色的头发，一脸棕色的胡须。脸型略长，显得很漂亮。微笑时，褶起一脸皱纹，一双深深的蓝眼睛闪烁在那皱纹丛中。他随身携带了大量读物，不久，这些读物给我们俩带来了麻烦。

"欢迎你来我们号子，"头次见到他，他就快活地喊了起来，说的是标准的北京话。他背靠铺盖卷，穿着棉背心、

蓝棉裤和中国鞋，鼻子上架一副厚厚的眼镜，他正在浏览一本英文版《北京周报》。他是外国人，被允许阅读非中文读物。对我来说，就象发现了一块绿洲。只开头谈了几句最简单的话后，我就象饿鬼一样一头扎进了巴尔泰克的书堆之中。

这种好运只持续了三天——我被叫到看守办公室去，受到了严厉斥责，因为我说了英语。他们提醒我，那些外文读物是只给外国人读的。我只得再次收拾东西，搬到另一个号子去，我从此有了两地分居之感。

安东尼·刘也犯了说英语的错误。在我们一起从新院子走出来搬到另一栋房子的三人一室的号子时，他走在我前面。这里倒是相当宽敞舒服，但冷得出奇，因为他们忘了给我们安火炉。这是那种三个人关在一起的禁闭室，只有一扇大窗户，还有一束从天花板上透进来的亮光。我们三人在灯下可怜巴巴地抱成一团，似乎这样可以得到些温暖。这天，很晚了——我无法知道准确的时间——一个警卫闯进来，问我们为什么不睡在床上。

"我们没有听见哨声。"我试图解释。

"这里不吹哨子，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他说。

这里有特殊纪律，只允许低声说话。第二天，我发现，原来这里关着几名美国人。

由于一个异乎寻常的职业性错误，在我上厕所之前，警卫没有检查。我看到地面上有一只空的美国烟盒！几年前，我就知道，有两个美国飞行员被拘留在北京。现在，至少可以证明，这两名美国人已经收到红十字会包裹了。还有一次，我从厕所出来，听到一名美国人的声音，说他想要一盒火柴。而且，在看守的办公桌上，我还看到过他们的食物

——每人两大碗汤和两碗米饭。他们一日三餐——汤、中国汤圆、米饭、肉、蔬菜。和我们相比，他们的待遇要好得多，但他们不得不忍受西方外国人必须忍受的孤寂。这种孤寂感使人丧失活力。我们至少没有这种孤寂感。在牢房里，我和安东尼·刘没有谈起过这两名美国人。因为我们毕竟对牢房里的第三个人还不了解。这个人也保持沉默，大概因为他也一点不了解我们。相互监督甚至通过假想也能起到作用。

日子在慢慢地逝去。我们整天无所事事，没有运动，没有娱乐，也不准读书。我们呆呆地盯着墙壁，翘首盼望一日两次的菜汤和窝头。就在这个星期，我们发现汤越来越清淡，窝头也越来越小了。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实在熬不住了。为饥饿所迫，为了填饱肚子，我准备铤而走险。第二天，到食堂取饭时，我趁警卫不注意，多拿了两个窝头。当我把这份意外之财分一个给刘时，刘目不转睛地盯了我好一阵，但他一直守口如瓶。

第二天，我又故技重演。但是，这一次，在返回号子的路上，看守叫住了我，他要检查我的饭盒。看到两个多余的窝头，他很是惊讶，当即斥责我偷窃政府的粮食。我毫不在意。这时，我不感到有什么难为情，只沉缅于对食物的追求之中。看守威胁我时，我甚至怒目而视，冷漠地耸了耸肩膀。

但我并未完全丧失意识。他命令我写一个交待和一个悔过书，我都照办了。偷窃是一码事，而拒绝交待是对国家专政基础的抵制。我写了两份简短的材料：

"今天吃饭时，我偷了两个馍，这是盗窃政府财产的行为。我保证不再重犯。恳求领导帮助我，使我不再发生类似

行为。”

“今天，我对看守的态度不礼貌。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当时，我的情绪不正常。因此，我保证，我将尽最大努力不再重复这种行为。”

这天晚上，我被叫了出去，我预想，有一顿斥责在等待着我。我对看守说：“空着肚皮很难作到诚实，当你象我一样长时间饥饿时，也几乎不可能诚实。”

“不要急，鲍，你在这里时间不会长了。”

奇怪，他的话象是很有把握似的。第二天，我去取我们三人的早餐，警卫让我拿9个窝头——每人3个。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个圈套，但不管这些，我拿了9个。

“这是管政治思想的看守的命令，”警卫说。即使到今天，对他命令给我们这几个窝头，我依然很感动，我要感激这位看守。不到一星期，我和刘又搬了回去，和巴尔泰克住在一起。警卫告诉我，只要我们用汉语交谈，就允许我阅读巴尔泰克的所有书刊。对我来说，读书是一种短暂的休息，尽管依然有没完没了的饥饿，但我可以暂时从学习会的套话和检讨中摆脱出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驰骋。巴尔泰克的书，除了必然会有的《北京周报》、《苏联文学杂志》和俄国出的英文版的《双城记》以外，还有《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孤星血泪》。我在一本《莫斯科新时代》上看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本叫《日瓦戈医生》的新书诋诽苏联人民。不读书时，就参与巴尔泰克和刘的创造小小奇迹的工作——维持炉火不熄。监狱供应的煤球是由经过压缩的煤灰、锯末和泥土组成的混合物。为了维持这个旧铁炉中的煤火，我们得有一个人，象照看病弱的新生儿一样，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们围着火炉而坐，喝着开

水，偶尔也烘烤那可怜的小玉米馍，说说话。就在一个漫长的、寒气袭人的、无所事事的冬日，巴尔泰克给我们谈了他的被捕经过。

巴尔泰克* 是波兰人，是一名真诚的天主教徒。他生长在哈尔滨一个富商家庭。他自己经营印章生意（当时相当赚钱），偶尔也涉足不动产投机。从各方面来看，他的生活很富裕，而且也乐意住在中国。后来，他和一位白俄姑娘结了婚。当时，这位白俄姑娘还定期从澳大利亚给他寄来红十字包裹，使他维持着相当奢侈的生活。象其他许多这样的人一样，内战逼近上海时，他开始走上了麻烦之路。由于形势越来越危急，美国军队仓促决定立即撤离，并和巴尔泰克达成协议，使用他的一个空仓库。直到1953年，警察才决定搜查他的仓库。他无所顾虑，给警察出示仓库存货单。存货单上注明，几十个大木箱中装的是古董、衣服和机器零件。问题是当共产党人撬开箱盖时，一眼看见的是一堆堆上好了油的优质美式步枪。进一步搜查，又发现了5000美元的小额纸币、40条黄金、许多贵重布料和几箱手榴弹。

巴尔泰克陷入了重大的麻烦之中。这事很严重，引起了北京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他们把他押到首都——开头没有关在草岚子胡同，而是关在公安部的最高级的专用小监狱里。巴尔泰克在那里呆了一个月，生活还算平静。他听说，和他关在一起的其他要犯还有费克图和唐尼。这是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他们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一次未成功的空投间谍行动中，在满洲上空被击落的。另外还有CB—29侦察机

---

* 根据准确消息，直到1975年12月，巴尔泰克仍然关押在北京地区的一所监狱里。

的机组人员，他们后来由于哈马舍尔德的干预而被释放。他们回忆说，那里的伙食很好，一日三餐。早餐是传统的英国果酱、黄油面包，再加上油炸花生、米饭、腌菜。中餐有馒头，再加肉或者鱼。晚餐和中餐一样。后来，巴尔泰克转到草岚子胡同，和我们关在一起时才降到住在这样冰凉的混凝土地板上。巴尔泰克说，他并不了解箱子中的具体货物，但是，审讯员从不相信他的话。他们指控他准备指挥一次游击行动。

巴尔泰克经历了15次审讯，于1957年下半年开庭审判。这是我见到他很久以前的事。不幸的是，他很执拗。当他得知要判处他5年徒刑并没收他的全部货物和财产时，他抵制了。他准备坐5年牢，但他不想失去毕生经营的一切。巴尔泰克提出上诉。显然，他没有接受任何聪明的囚犯出于第二天性都了解的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对判决不服而提出上诉，就意味着该犯对其罪行没有悔改之意，也意味着他不承认政府的宽大。上诉本身就说明，他尚未吸取犯罪教训。因此，上诉就是要求更多的惩罚。

复审时，政府只提出了一项指控，并只出示了一个证据：一张旧照片。这张照片是巴尔泰克1934年在哈尔滨照的，照片上的巴尔泰克身配军刀。拍照的所在地当时由日本人控制，巴尔泰克和几个朋友由一个日本军官邀请来到一个不久前和中国抗日力量发生了小规模冲突的地方。巴尔泰克没有考虑会有任何后果，就拿起这把军刀摆了一个姿式。他被指控参与了对中国爱国者的大屠杀。他的判决也改成了无期徒刑。

约翰逊·翁和我们关在同一间号子里，因为他也曾经上诉。在我被捕以前很久，他就被捕了，被判了20年。服刑未

满一年，他就认为对他的处理不公正。这是一个傻瓜。由于他的上诉，他不得不再从头至尾经历一次草岚子胡同的整个程序，他不得不再次准备迎接作为法律赋予他的权利的第二次审判。在我们看来，约翰逊对我们有特殊的用处，因为他已经去过移交处，移交处是我们前往劳改营路上的下一个停留站。他告诉我们，移交处的工作很艰苦，但至少食物问题会最后得到解决——在移交处，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这是一种乐观的前景，但也有些虚无飘渺：约翰逊是在食物定量之前到过移交处的。他不知道那里的生活条件和草岚子胡同完全一样。他和我们一起呆了大约一星期后，就离开我们去面对着新的审讯和审判。两年后，我在劳动营再次见到了他，他的判决也改成了无期徒刑。

12月下旬，在前往劳改营的路上我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时，我被紧急召回审讯处，参加中国所谓的审判。当时处在大跃进时期，那时的安排也是"多快好省"。法庭设在一间空房子里，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我开始了在草岚子胡同所经历的一切。在许多人中，我是唯一受审者。一张巨大的桌子上堆满了档案材料，给人一种忙碌的气氛。

"这不是审讯，"检察官宣布，"你是在接受审判。你不一定要说话。但只有要你回答时，你才回答问题。我们选了一个人为你辩护。"

开头照例是询问姓名、地址等等，一会儿就过去了。紧接着由检察官大声宣读我的交待和他的正式指控：

"你被指控犯有下列罪行——

1.为帝国主义国家收集情报。

2.从事非法活动和损害国家经济的非法交易。

3.散播谣言，企图蛊惑群众。

4.诽谤、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领导人。

5.散布帝国主义宣传，企图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人民民主的声誉，枉费心机地腐蚀中国青年。

6.破坏中国和各友好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

我承认，我没有什么要从交待中撤回来，检察官对我的指控是真实的、公正的。于是，检察官要我的辩护律师发言。这是一位约30岁的青年小伙子，穿一身毛式服装。他的辩护词简单扼要。

"被告是自愿承认上述罪状的，因此，无需辩护。"

检察官把我送回号子，鼓励我在宣判之前加强学习。

大约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那段沉闷的日子里，我唯一记忆犹新的是一次斗争会。我是这次斗争会的直接参与者。这天，我们大约1000名犯人被召集在主楼旁边的一个大院子里，所有牢房空无一人。开会之前，干部们命令我们赶快上厕所，因为会议于一点半钟准时开始，会议期间不许离开。我们低着头，静悄悄、急匆匆地一个挨着一个上厕所。警卫们为我们把草垫铺在冰冻的泥土上作为基本的防潮物。我们都尽可能穿得暖和一些，但我们没有合适的冬季服装。一开始，我们就冷得哆嗦起来，身子缩成一团。士兵们在我们的外边围成一圈，警卫们站在屋顶上，他们的轮廓映在灰珍珠色的二月的天宇中。

被斗者是一名中年犯人，他被指控作了欺骗性交待。一位干部把嘴对着一个纸壳喇叭筒大声呼喊，他说，被斗者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鉴于他的行为，他将作为我们其他犯人的反面教员。他说，我们热情地参加会议或许能够

帮助他彻底坦白地承认罪行。我一直不知道被斗争人的姓名。他低着头坐在一块空地上，没有草垫。我们群情激动地把他围在中间。这时，会议开始了。

“打倒顽固不化的罪犯！”“老实交待，否则自食其果！”我们高喊。

“他说的是老实话吗？”那位干部大声喊。

“不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声音里带着嘲笑。斗争会就这样持续了8个多小时。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越来越感到了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也变得越来越出言不逊了。我几乎认为，为了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会把他撕成碎片。后来，有了时间思索，我认识到，在斗争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斗争我们自己，无论被斗者的是非曲直如何，我们从内心深处都准备着热情地接受政府的立场。被斗者最后对着警卫大声说：

“不要再浪费他们的时间了，按照规定处罚我吧！”

这是一种要求，同时又是一种挑衅。几名警卫拿着镣铐走上前去，这镣铐是被斗者用顽固的态度挣来的。当着大家的面，警卫们把铆钉深深地铆进他的脚镣手扣里。

一星期后，看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出示了一个中文写的文件，让我正式要求去劳改单位，不再呆在审讯处。我立即签了字。几天后，我转到了移交处。安东尼·刘和我一起转来。我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第五章

我和王属于同一批抵达移交处的囚犯。一路上，我们乘着一辆密封的平板卡车，前面由警用吉普开道。囚犯们通常称移交处为南院，看守们称它为北京拘留中心，对外则称作北京实验科学仪器厂。移交处正好处在风景秀丽的陶然亭公园附近。已经完成审讯和正在等待出庭、宣判的囚犯，等待转移到另一个监狱或劳改营的囚犯一般都要在这里停留。依据是否已经被宣判，我们所有犯人被奇特地区分为“已决犯”和“未决犯”。我和王都属于第二类。当我们从卡车上爬下来，在院子里集合时，我趁机打量了一下这个地方。

在我们前面，有一栋四层大楼，从大楼伸出两个巨大的灰白色砖砌的楼，成 K 字形。在我们身后是一栋行政大楼，从一堵沿着半步桥（音译）公路修建的20多呎的围墙望去，就可以隐隐看见少年管教所，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里收容17岁以下的少年犯。K 字楼一边的后面，是用红砖砌成的三层技术大楼，这栋楼供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翻译家等知识分子囚犯居住——这些知识分子为南院的各个企业作知识性工作。其它除了商店、库房和职工宿舍以外，还有一栋特殊建筑，引起了在冷空气里站着的我们每个人的注意，那就是中心食堂。大团大团的水蒸气——在中国监狱里，总是用水蒸气蒸那种坚硬的、湿辘辘的玉米窝窝头——从排气孔中滚滚涌出。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食堂。它本身就

象一个工厂。我们以饥饿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

食堂旁边，有一栋相当小的 L 形建筑，正好座落在墙脚里。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死刑犯的牢房。旁边是一排排禁闭牢房。不久以后，我就尝到了住禁闭牢房的滋味。囚犯们称整个这一可怕的区域为西北角。这个名称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于是，立即成为了每个犯人的常用词：留神，否则你会死在西北角的。

这天上午11点，我和王来到 K 字楼。我们就象走进了虚幻中的神庙一样。我们站在一个巨大的、四面透风的中央大厅里，这个大厅一直通向玻璃屋顶，四周有四层楼。空气中弥漫着杂酚油的气味。在一层楼上，挂着一幅大彩色工人广告画，他严肃地俯视着手中的一叠书纸，右手象著名的山姆大叔的招募广告一样。下面是用巨大的黑体字写的告示：

“损坏一页书就是毁坏整本书。

毁坏一本书就是剥夺一个人的教育机会。”

毫无疑问，我们来到了一个极其严肃的所在。人们在我们面前来去匆匆，手里搬着一捆捆三、四呎厚的书页，时而消逝在门洞里，时而又突然出现在通往各层楼的楼梯上。锤击声，水泥楼道里的脚步声，在光亮的灰色混凝土地面上回响，正好作为宣传鼓动员的尖尖的男高音的伴奏。宣传鼓动员从一层跑到另一层，站在架在角落里的凳子上，一手拿笔记本，一手拿铁皮喇叭筒，高声呼喊着。他的职责是鼓动生产，从不休息。

“17号号子已经向1号号子提出了挑战。”我听他喊道。

一位看守把我们带到第三层。这时，另一名看守打开铁门，让我们进到走廊里。我和王都分在三队 B 组。一名模

范犯人带我们在通道上走，通道的两旁是一个个集体牢房的木门。犯人们沿着两面墙根坐着，正在折叠书页。同时，其他犯人将书页装订起来。通道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从这些犯人身边经过时，小心翼翼，择路而行，就象走在山路上。这里没人说话，比中央大厅安静——只有偶尔的哼哼声和竹条拍打纸张的声音。牢门全都开着。在牢房里面，集体用的木板床被拆开组成两个大型工作台。每个工作台的一边坐8个人，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折叠书页。当时的中国机器不多，但有许多犯人当作劳力。

这个工作似乎并不太难。每一张纸大约长三呎，宽两呎，折叠四下，然后堆放一旁。每个牢房的墙壁上都有一条印刷的告示，清楚地提出了对我们的要求：

“政府制定的指标是6000页。平均产量是4500页。初来者的定额是3000页。所有人都必须努力超额完成指标。”

我们站在通道里时，进餐时间到了。那位模范犯人让我们稍等片刻，我们就会有吃的。饮事班来时，我们每人领到一个粗瓷碗、一双筷子。接着，第二个犯人端来一大盆热乎乎的玉米窝窝头，给我们每人8个。这里的窝窝头比审讯处的小，但比那里的沉，因为这些窝头做得很瓷实，以便蒸笼中能蒸更多的窝头。这些窝头大约四吋高，成圆锥形，看起来象一发发长长的子弹。难道这就是约翰逊·翁所谓的好伙食么？我们都感到怀疑。不过，第三个人舀来的汤比审讯处的丰富，除了土豆皮，还有小块土豆，甚至还有几块肥肉。这是多么令人爽心悦目的事情！我和王坐在铺盖卷上狼吞虎咽起来。

一位看守拿来几大张表格，要求我们填写，以便存入个人档案。我再次花了几乎两个小时，写了一个关于我的经历、

被捕原因、审讯和判刑的梗概。填完以后，另一位看守给我们指定了号子。我被安排在14号。号长草草地说了几句欢迎的话，就在工作台旁给我指定了一个位置。并让我旁边的一个犯人教我干活。我拿起竹条，费力地开始了折叠。

我们一直到下午6点才停下来吃晚饭（饭和中午的一模一样），晚饭后继续干到7点半钟。这时，通道里的一位看守发出停工、洗手、准备参加学习会的命令。于是，我们把已经折好的书页堆成一堆，标上自己的号码，搬到通道里，以便收去。我只折了300张。

我的号友们以极其熟练的动作把工作台举起来，眨眼间，工作台变成了两个通铺，两床之间留有一条窄窄的过道。我们一律盘腿坐在床上。这时，一名模范犯人拿来一个鞋盒，鞋盒里装的是我们每个人的香烟。我刚从审讯处出来，我既没有烟丝，也没有钱购买，所以一直没有抽烟。学习会是关于大跃进的问题。

我的一名号友向我解释食物定量制。那是一种简单的模式：一个犯人的食物定量取决于他的生产指标。我是初来者，定量较低，给我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达到最低生产的指标。以后，或者保持这个水平，或上升到第一流水平，或者下降到被惩罚的水平。但是，他告诫我（我也能够猜想得到），除了生产，犯人的态度对于决定食物定量同等重要。即使是一个技巧娴熟的折叠者，如果工作起来没有明显的热情，或者在学习会上心不在焉，他的食物定量也可能下降到仅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

定量标准分四个类别：初来者、弱劳力、强劳力和受惩罚者。初来者——达不到3000张最低指标的犯人——每月14公斤、250克谷类食物——总共大约31磅。这个定量似乎并

不太少，但是，我们的食物中几乎没有什么油水，因此，我们的身体只能从淀粉类食物中获得能量。我们几乎从未见过肉，只有节日，炊事员才偶尔在玉米糊或者菜汤里加一点点油。我是初来者，头两个星期内我的早餐是两碗玉米糊，中餐是菜汤加三个窝窝头，晚餐和中餐一样。炊事员制作窝窝头的技巧简直是天衣无缝，1公斤玉米粉作16个窝窝头，其中个个重量相等，丝毫不差。犯人们总是象饿鹰一样盯着别人的一份食物，唯恐某人多吃了几克。

到达了3000张的弱劳力的定量要多得多——一个月41磅，比初来者每天多3个窝窝头。到达6000张或者6000张以上的强劳力的定量提高到43磅多一点，或者说比初来者每天多5个窝窝头。另外，熟练折叠者每月15日吃一餐麦面馒头，每月20日吃一餐大米。受惩罚者的食物定量由看守确定。

不同定量标准的犯人混居于同一间号子容易产生尖锐的仇视心理——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优秀的号长试图尽量消除的一种现象。这里的菜汤比审讯处的稠些。据说，禁闭号子里的囚犯通过观察菜汤中的不同蔬菜能够判断四季的变化。我计算了一下，一名犯人一个月的伙食要花费中国政府三美元。其中还包括过年给我们的肉类食物。

学习会一结束，就到了熄灯的时间。这时，一位看守站在牢门口点名。这样一间号子关40个人，即使考虑到中国监狱中犯人的密集程度，也是够拥挤的。每张大床上睡12个，两床中间的过道地面上睡4个。然后，两床中间搭一块木板，上面再睡4个。这样，过道就成了一个双层床。剩下的8个人搬到外头的通道里睡觉。我们象鞋拔一样，紧紧地硬塞进自己的位置。一躺下，就没有人敢翻身，也没有人敢单

独起来从铺面躺着的一个个身体上爬过去上厕所。第二天早晨，当我们被叫醒时，我惊讶地发现，才早晨5点。

"我认为6点才起床呢。"我对一名号友说。

"少说话"！——他回答说。他活动了一下肩膀，开始拆卸床铺。只几分钟，又重新搭起了工作台。大家默默地，把各自的铺盖卷扔到角落里，拿起竹条，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了折叠。我呆呆地看着他们，直到有人对我大喊了一声叫我赶快干活儿。我的头晕乎乎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身边的人早已折完了10多张，而我才刚刚完成第一张。

到6点半钟，那名模范犯人才送来早餐。我天真地放下竹条，准备吃饭。我旁边的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边干边吃。"

这个模范犯人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工作台上放一浅碟咸菜和一小碗玉米糊。我的号友们几口吞下咸菜，然后把玉米糊放在地面上任其冷却。现在，唯一的事情是折叠，不停地折叠。

这时，从院子里的扬声器里传来了音乐声，那里工作人员在做广播体操，有经验的犯人知道，已经是上午10点了。10点是一个重要时刻，通常，如果一名犯人到了10点还没有完成每日工作量的1／4，那他就根本不能完成全天的工作量。午餐时，我们都很快地喝完汤。这天收工时，我只完成了1500张，即使3000张也似乎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我的手臂僵硬，稍动一下就钻心地痛，后背就象有谁猛击了一掌。

三天后，我被叫去接受常规性体格检查。检查并不细致，只是简单地查一下。但是，自从被捕以来，我这是头一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整个身影。我吓一大跳，我的体重下

降到110磅。我的皮肤松松垮垮地挂在骨架上，与工作台接触的地方是蓝色，但磨起了厚厚一层硬茧，其它地方成了灰白色。这晚上，我简直无法入眠。

休检之后，我交了好运，转移到三队 A 组。这个号子远不如前一个那么拥挤——总共才22人。号长是一个俊秀的年青娃，才21岁，姓侯，东北当地人。由于在大鸣大放期间的激烈言辞而被判了20年。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资本家家庭。他告诉我，他甚至有一位女朋友在加拿大。看到他和我一样，会唱许多美国传统歌曲，我很惊奇，也很高兴。我们常常一边折叠，一边一起哼哼，以打破折叠时的单调枯燥。在全部关押着东方囚犯的号子中，常常荡漾着《我的肯塔基故乡》、《斯旺河》、甚至《很久很久以前》的曲调，我估计其讽刺的意味是偶尔经过号子的警卫所不能理解的。

尽管侯受过教育，有着特殊的出身，但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劳动者。他一再鼓励我增加产量。卢在审讯处所念念不忘的说教，只是按要求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他只想让我们都获得头等食物定量。尽管他有这一片好心，然而要达到这个定量标准唯一途径是增加产量。

3 月底，我达到了3500张，获得了弱劳力的食物定量。侯告诉我们，重要的是每天确定一个力争达到的个人指标。以后，我们每天公布我们的计划，审慎地对完成这个指标作出保证。当然，我们从没有时间阅读手中的书籍。这几个月，我们折叠的材料各式各样：有《农民词典》——一本简明手册，收录有关于历史事件和思想意识方面的词条；有关于电子学的技术教材；有带有政治倾向的侦探小说——由群众出版社（直属公安部领导）出版，这些小说是抓间谍的一般故事；有精装本《堂·吉诃德》；有象《收获》、《和平

与社会主义问题》一类的杂志，最后，还有毛泽东的著作和诗词。我们把毛泽东著作和诗词的折叠当成一项政治任务，要求特别小心。我们的产品装订成书以后，送往新华书店向公众出售，新华书店是城区国营图书销售中心。侯告诉我们，手工劳动优于当时的机器设备，因为机器不可靠，而犯人很少出错。

学徒期间，我头一次在狱中观看了文艺演出。举办这次演出虽然是为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但还另有一番秘而不宣的意图。我们不管这些，从常规的学习会中摆脱出来，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是颇受欢迎的。晚上6点30分，正好晚餐以后，我们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成双行排队来到院子里。我们每人都带了一点衣服，垫在我们那瘦弱的、皮皱皱的屁股底下。我们刚坐下，天就黑了下来。

“你怎么不抽烟？”

象其他人一样，坐在我身边的一名犯人刚一坐下就点燃了一支烟。这人我在通道里见过，但并不认识。

“我没有烟。”

他一声不响地递给我一支——大福牌，一种中国产的最便宜的烟。但味道不错。自从一年零三个多月以前被捕以来，这是我抽的头一支烟。

“我没有东西和你交换。”我说。

“没关系，好东西应该共享。”他又递给我四五支，“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劳改营里再见面的，那是一个小世界。到时你再还我。”

后来我没有再碰见他。他的姿态是我遇到的头一例出自内心的慷慨，而这种慷慨在劳改营里却是司空见惯的。

这个晚上的演出内容是关于满洲兴凯湖劳改营的事情，

名字叫《水坝》。这次演出是动员志愿者前往中苏边界劳改营的运动的开端，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节目。

当然，关于这些劳改营，我们都知道一些情况。这里被人们称作不毛之地，它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模范故事从这里涌现出来，就象从战争年代中涌现出来一样自然，因为这块不毛之地是共产党曾经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认识到，满洲平原具有成为巨大的农业生产基地的潜力，但是，没有人能够克服其自然障碍。即使是聪明、勤劳的日本人，在花了14年时间（牺牲了上千的中国人的生命）努力开垦之后，最后也放弃了。国民党人根本不屑一试。第一批劳改犯——4000名——1954年从北京到达这里，两年之内就生产出了粮食。1958年大跃进时，从这块不毛之地生产出来的粮食足以养活上百万人。这里有9个劳改营，分布在64个村子里。

很奇怪，兴凯湖激起了我们这些初来者的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根据普遍的传说，满洲的生活比我们现在要丰富得多。我们听说，吃的很好，主要有大豆，不时有野猪肉，有大量的鱼、家禽、鸡蛋，甚至牛奶，因为，政府在那里建起了加工厂和罐头食品制造厂。而且，还允许早期去的犯人携带家属，他们是将来的新居民区的核心，这有点类似于现代澳大利亚建设初期的办法。这些细节都是诱人的。但是，更为人知的是北方生活的严酷的一面。严冬的气温下降到零下40度，一些新去的犯人往往只是由于未戴口罩，吸进了冷空气致使肺部和喉管结冰而死亡。整个这个地区都是沼泽地，夏天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炎热，还有蚊虫的侵扰——这是一种巨大的，极难对付的蚊虫，能够刺透两层衬衫。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计划中心的哪一位具有宣传鼓动经验

的聪明的官员出了这个主意，他认为在招募去满洲的志愿者的过程中，激起犯人们热情的一个好办法是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表演。结果，产生了一个拥有上百名演员的新生剧团——由犯人组成——在我们观看时，他们的表演技巧已经排练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我相信，即使在百老汇也能表演和卖票。谁知道呢？或许通过表演能真动员更多的志愿者。

舞台暗了下来。在一小束聚光灯照射下，一位解说员走到台前。他穿着一套笔挺的毛式服装，看起来象一位真正的中国英雄。但刚才塞给我香烟的那个人并不为他的魅力所吸引。

“如果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一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低声说。

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对的。很可能他是一个成功的戏剧演员或电影演员，也许是因为个人生活问题被捕的。剧团里的几乎所有犯人都是因为私通、偷盗或被怀疑是同性恋者而被捕。

“同学们，”他用一种激动人心的、洪亮的声音喊道，这种声音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我们从荒芜的大东北来到这里。今晚的表演述说的是兴凯湖劳改营的故事，我们一起回顾这些劳改营的开创和斗争历程，一起展望它们的未来前景。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合作。这些劳改营的建设证明了劳改计划的伟大。请认真观看，充分体味我们的骄傲。这是一个胜利的故事。”

这时，从舞台侧面走来两名同样身穿毛式服装的人，他们抬着一本巨大的书籍模型。书籍的封面写着两个大字：“水坝”。当两名演员翻开第一页时，灯火通明，舞台上出现了荒芜的、杂草丛生的、泥泞的沼泽地。从舞台右侧，出

现了一对身着传统农民服装的老年夫妇，他们在沼泽地上艰难地跋涉着。到了舞台中心，他们开始向下陷落。老头越是奋力解救他的妻子，就陷得越深。突然，灯光暗了下去，地面上只留下两双饱经风霜的、紧握着的手。

第二场开始了，这一场述说的是大饥荒年代活跃在这里的几十名乐观主义的开拓者。可是，恶劣的气候和沼泽地的变化无常使他们的努力付诸流水。收场时，舞台上是一大片曝晒于日光下的累累白骨。第三场描述1931年的战争年代，当时，日本人侵占了满洲。为了开拓这个地区，他们驱赶着大约15万中国人从事奴隶般的劳动。演员们表演了凶恶的日本人挥舞刺刀，驱使中国人象牲口般地犁地的情景。不时，一队队中国人陷入沼泽。有时，甚至日本监工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国民党人接管满洲。这时进入第四场，出场的大都是财主和军阀，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中国人民的命运感兴趣，也没有一个人对这块不毛之地感兴趣。他们对这片土地一点也不屑一顾，动也没有动这片土地，有时，还将大片土地当作贿赂或者礼品。这里象荒野似的冷寂，一年四季云遮雾罩。就在这时，透过灰濛濛的云雾，出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红点。红点逐渐扩散，成为了旭日的万道霞光。红色的霞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强，一轮红日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毛泽东，在东方升起！我们获得了解放。

“但是，这是什么样的解放呢？”一个演员问道。“这是一块以富庶闻名的土地还尚未耕种、还在任其荒芜的解放么？这块土地必须解放，人民必须解放。但是谁能解放这块土地呢？”

真正是谁？这就是美国人称之意味深长的问题。除了犯人还能有谁？

解说员继续说，中国人民正在经受着朝鲜战争的困苦，国民经济还在奋力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留下的灾难。正是这时，政府给了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1954年，第一批4000名犯人来到了这个前人遭到多次挫折的地方。

接着的一场场都很威武雄壮。开始的情景是第一批犯人住在冰天雪地的地窖里、夜间用树枝盖着身体；勘探队分头出动；农学家抽取土样；工程师作出结论：这里有修筑水坝的坚实基础——水坝能治理沼泽地的水患，形成一个人工湖，排出地面上的积水，使这里的土地能种植大豆、玉米和高粱。尽管当时的气温在零下40度，而且没有工棚，4000名无所畏惧的犯人还是于1955年元旦破土动工了。经过8个月的奋战，大坝竣工了。但30多人献出了生命。他们是在土坝坍塌、洪水泛滥时死亡的，他们力图堵截水流时，大多数人被洪水吞没了。这些人死后都获得了特殊的荣誉，从人民的敌人变成了劳动模范。他们在村子里的家属也摘掉了“人民敌人的家属”的黑帽子，从此以后，能够自称为“社会主义建设英雄的家属。”

后面一场表演的是，水坝一竣工，其他人就开始了保持土壤肥力的工作。他们将干麦秆撒在地里，点火燃烧，留下丰富的草木灰。这里也有10个人死亡，因为风突然转向，他们被吞没在火海之中。同样，这些死难者也成为了英雄。

下面一场反映的是1955年下半年建设大队到来的情况。建设大队！这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奥威尔式的胜利。这个建设大队的各小组由400到500名建筑师、管理人员、勘测员、运输专家、工程师、木匠、石匠等等组成。他们全都

是犯人，过着和我的其余的“同学”一样的生活。他们的职业，实际上也就是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周游中国，建设监狱。他们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收拾起行李、野外炊具和工具，象东方杂技团那样，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总是不断完善自己的技艺，也总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而夺得红旗。犯人是最佳的监狱建设者。

建设大队为这些不毛之地的移居者，在为人民种植粮食中所经受的考验所感动，他们又突破了新的纪录。他们日日夜夜地工作，4个多月，就建造了大约1000个单元（或者说1000间牢房）。这些是相对说来堪称豪华的红砖结构的监狱建筑，墙壁是空的以便在其中生火。这种移居者和施工者之间的团结配合堪称楷模。

最后一场戏把我们带到了那64个村庄，这些村庄给兴凯湖带来了生气。每个村子都居住着面带微笑的、热情的和吃得很好的犯人，他们正在建设新生活，为自己，也为他们的家庭。我们这些可怜的折纸者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我们那拥挤的牢房，我们希望离开北京，与满洲的英雄在一起：这次演出获得了预期的成功。

第二天定为休息和反省日。我们听剧团演员一个一个地演讲，他们赞美东北生活的欢乐和长处。当时，正在计划建立新的村庄和农场，国家迫切需要新的人员，仅仅从移交处就至少要抽调2000人。但是，静夜的沉思，加上招募人员过分的情绪，熄灭了我们的热情，我们开始害怕了。确实，东北的劳改营似乎妙不可言，但是，每个犯人都知道，这是一去不复返了。假如能够带家属……，招募人员会很快打破这种幻想：只有经过挑选的少数几个人允许携带家属，因为家属将带来更多的管理问题。在自愿报名以后，政府将确定谁可

以携带家属。

自愿报名？结果说明，这是多余的。我们很快发现，这次演出和鼓励性的谈话仅仅是一种形式。我们再次体验了党办这类事情的热情。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被集合在一个潮湿的院子里，排成长队。一位身着黑色毛式服装的人走了过来，他表情严肃，步履从容，迅速走进队伍，一边观察，一边挑选合适的人选，没有任何规劝。

"这个，这个，还有你，你……"我们听他一边走一边说，一名助手迅速记下每名志愿者的排列位置。由于我们是按牢房中睡觉的铺位次序站列的，所以过后很容易和名字对上号。偶尔，挑选者会停下来问一问候选人干过什么农活。然后又继续挑选。

"行，他很合适，写上他。嗯，这个也行……"

我禁不住在想，德国人也是采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强追挑选他们的战时工厂工人的。啊，上帝，他没有选中我。在他看来，我太单薄了。

这天晚上，夜深了。我们回到牢房。看守大声呼喊已经被选中的犯人的名字，他们很快被转移到院子里的另一个地方睡觉。这就象检疫一样。然后，看守把我们关在牢房里，每一扇门都上了拴，谁也不许睡在走廊里。清晨三四点钟，我们还没有入睡，这时，听见汽车的声音，这是前来接被选中者的车辆。我们牢房走了12个人。第二天早晨，生活一切照常。

在那些日子里，有大量书页需要折叠，所以，鼓励一般市民把书页带回家里折叠——每千张30美分。我们犯人也以每千张30美分记入帐目（纯粹是名义上的）。这样，一名编

熟的折叠者一天可以挣得一个月的饭钱。难怪我们不断敦促自己加紧生产。在我离开审讯处7个月后，我的指甲所剩无几，右手的小拇指象一根涂黑的树枝。但是，我一天能折1万张。我学会了爱惜书籍。

4月1日，看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我的妻子给我带来了一个小包裹——三包香烟和相当于1.50美元的人民币。我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她带来的东西太少——为了这么点东西，她不用如此劳神费力。我顾影自怜地回到了牢房。直到5月份宣判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包裹对她来说意味着多少代价。

后来，我见到了卢。可怜的卢，我上厕所时，看见他默默地朝通道里走来。再次见到他，我很欣慰。

“唷，卢，见到你真高兴，你好吗？”我说。

“不好，鲍。”他回答说。我相信他，他似乎情况不妙。

“宣判了吗？”

“很重，鲍。”他摇了摇头，似乎有点茫然。“一切都完了。我妻子要离婚。他们判我无期徒刑。”

“你表现那么好，也没有减刑？”我惊讶不已。

“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不知道怎么办。别说了，太使我难过了。”

这次与卢见面后，一种一辈子出不了监狱的恐惧纠缠着我。既然卢只是因为历史上曾当过国民党员就受到如此严厉的判决，那么，他们怎样看待我和英国人、美国人的联系呢？我在心理上已经作好准备，只要不判我无期徒刑，我就感恩戴德了。

我们一星期洗一次澡。洗澡是颇受欢迎的休息，因为可以暂时从单调的折叠工作中摆脱出来(很公平的是，定额中扣除了洗澡时间)。同时，洗一次澡也意味着一次舒适的散步。最重要的是，这样可以有机会欣赏一下第一监狱的气氛，浴室就设在那里。第一监狱就在 K 字楼东面的围墙外头，但对我们来说，却是梦寐以求的地方。这是一所模范监狱，是人道和体面的地方，住在这样的监狱，真是犯人的幸运。这里，粮食没有定量——想吃多少吃多少——工作是真正的和体面的工作，甚至还付给犯人以工资。显然，对于到北京观光的国外旅游者来说，第一监狱现在依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他们的反映也是可以预想的。自从我获释以后，读到了多少关于中国监狱制度的明智和人道的衷心的赞美之词啊，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第一监狱的优秀工作。我自己最后曾短期在那里呆了一阵子，我深深地留恋那个地方，那里几乎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第一监狱的天堂和我们自己象蜂房一样的牢房之间的悬殊是令人吃惊的，也是令人沮丧的。在第一次过墙洗澡以后不久，我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屈辱的教训。我的后脖颈上长了一个毒疖，非常疼。侯把我送到一名姓马的狱医那里就诊。他不但没有给我治疗，相反，因为我去他那里而被他骂了一顿。我简直目瞪口呆了。

“混蛋！”他叫喊道，“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吗？这是监狱，你是来劳改的。滚出去！下次真的有病再来找我。”

他扔给我两块纱布，让我自己包扎。最恶心的是这家伙也是一个犯人。侯耸了耸肩，叫我不必生气。有些人就是不能有权。

4月13日，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了——宣判。这时，我

每天折4500张，并且梦想要达到6000张。这样，我就有资格达到强劳力的食物定量标准了。这天下午，一位警卫大声叫我的名字，让我去一趟看守的办公室。我扔掉竹条就奔了过去，也顾不得考虑仪表了。当时，我的样子相当难看。由于天气热，牢房里人又多，我只穿了一条灰色短裤头，一件很脏的白汗衫和一双拖鞋。这时，我至多只能用旧手帕把脖子上的毒疖包起来。这并不十分卫生，但至少可以不使虱子到伤口里去。我越过书页堆，急匆匆沿走廊走去。在看守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一位英俊的青年人，他穿一件橄榄色夹克，穿一条蓝裤子。

“这位是人民法院的代表，他想见见你。”看守说。

经过一些例行的公式——姓名，以前的职业、和地址——以后，代表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张写有中文字的纸。

“我们叫你来聆听宣判。”他说着，开始宣读公文。“被告人被指控由于充当过帝国主义势力的忠实走狗，参与了欺压中国人民的活动，从事非法活动和黑市交易，散播谣言，企图蛊惑群众，诽谤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同时还散布帝国主义的宣传，企图腐蚀中国人民。

“被告是在自由意志和毫无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供认上述所有罪行的，人民政府特此判处你——鲍若望——12年徒刑，刑期从1957年12月27日被捕之日算起。你将在劳改单位服刑。”

毛泽东万岁！我本来以为要判我无期或者20年的，而只判了12年。多么令人宽慰！在这一时刻，我想，我真的热爱毛泽东，热爱他的警官，热爱人民法院。

我的宣判过程很特别，异常直截了当，没有要任何花样，这或许因为我是外国人。党认为，我自己的行动应该判

12年，而这恰巧就是他们给我的刑期。数年后，一名曾经当过法官的犯人对我说，我的宣判程序完全不同于一般。

他说，在中国，政府的宣判权力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有一个通俗的比喻，那就是橡皮筋——刑期可以根据十多项非客观因素延长或缩短。一个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可能比判10年的人提早出狱。判决通常由一个了解犯人案情的三四人的委员会作出，其中包括犯人被捕前负责监视犯人活动的公安警察，另外还有审讯员和书记员。他们一起确定合适的刑期，然后，根据他们对待被告的态度，对判决书加以润饰。例如，象我一样，实际刑期是12年，他们可以对犯人说是20年，甚至无期徒刑。他们通常告诉犯人，只要努力改造，给其他犯人作出榜样，就可以减刑。这样，犯人努力改造一年以后，就可能得到政府的补偿：从无期徒刑减为20年。犯人喜不自禁，感恩戴德，更加努力改造，3年后，又减至15年。2年后，再减至10年——仅仅还有10年！由于已经服刑5年，而且继续以热情的、感恩戴德的态度服刑，所以再等7年（一共是原来的12年），这时，政府就宽大释放。无期徒刑变成了12年！犯人变为自由劳动者以后，内心里充满了对政府的感激，一心帮助政府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的另一个有意义的发明是死刑的缓期执行——只有对看守人员认为态度恶劣的犯人才执行死刑。这种作法容易产生模范犯人。前中国警察首脑罗瑞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了权力，我不知道他现在何处），1959年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这一制度作了解释并为这一制度提供了法律根据：

“在我国的刑法中，就有一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规定。帝国主义曾经污蔑这是最大的

残忍，其实，我们说这是最大的人道。连罪犯都很了解，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是人民政府刀下留人，给他们最后一次自新的机会。事实上，得到这种处理的罪犯，一般都保留下来了。试问，古今中外有过这样伟大的创举吗？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找得出这样人道的法律吗？”（《人民日报》1959年9月28日）

“你对宣判书有什么意见？”法院代表问我。我当然没有意见。

“你希望上诉吗？”

上帝！不。我所听到的有关巴尔泰克和所有其它人的令人战栗的故事使我消除了上诉的念头。“不，”我加重语气说，“我知道我有上诉权，不过我对政府的判决很满意。我不希望上诉，只想赶快签字。”

“举起右手”，他命令我。“你承认得到的是一个公正的审判和公正的判决吗？”

“是的。”

“签名。”

回到号子时，我沉浸在欢乐之中。我告诉侯，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同意我的看法，判决结果似乎出乎意料之外。这天晚餐的汤也似乎格外鲜美。只有熄灯以后，我才开始考虑我的处境。还有10年。10年时间似乎好长好长。

第 六 章

我在灭虱运动之后放出了我的第一颗卫星。灭虱运动和放卫星这两件事，哪一件我也不会忘记。灭虱运动是在一个傍晚展开的。每个囚室住人的地方都要进行彻底的打扫。其间，警卫们把我们所有的衣服和床上用品都集中到一起，并丢给我们每人一床又小又薄的毯子。那时的夜晚仍然是寒冷的，我们难受地蜷缩在木头凳子上，光着身子裹着毯子，等待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衣服拿回来。这些衣服正在楼下进行蒸煮。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衣服拿回来了，当我们打开衣卷时，它们还冒着温乎乎的蒸气。展开时，我们发现所有的衣服都一律变成了制服灰色。中国最佳的洗烫技术可不是这样的，但这也还罢了，最糟糕的是，当这令人愉快的热气很快消失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是穿着湿衣服躺在潮湿的毯子底下。这真是可怕，我们比刚才还要冷，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入睡。更够呛的是，第二天清晨点名之前，看守就把我们叫到走廊里宣布说，我们有幸被批准发射一颗卫星。

卫星表示最高产量。中国共产党人很喜欢搞比喻，每种劳动，劳动的产量，都有相应的称谓和比喻。不管监狱内还是监狱外，所有工厂每月至少要综合一次其劳动成就和情况；通常他们的机器和车辆上都标有适当的标记。在这些日子里劳动得最好的人便被标为火箭，而次一些的依次被标为飞机、火车、汽车、自行车，最后是牛车。我知道南苑临时

收容所有一个家伙，他离完成工作任务差得很远，甚至连牛车都标不上，而是被标为一个乌龟。这是双重的丢脸，因为乌龟不仅是表示慢，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它还表示戴绿帽子。为了突出这件事的重要性，他还被单独监禁了一个星期。

从我们第一个叠书劳动日的早晨开始，我发现，即使是正常劳动日，劳动时间也超过了官方的标准。这是由于我们"自愿地"比监狱标准的起床时间早起一小时，以便尽可能在早晨5点钟之后便立即开始折叠。在高产日（为了……而大干和苦干）起床时间为早晨4点，在放火箭和卫星的日子则为3点半。总之，在放卫星日我们要工作16小时。

负责生产的看守和中国任何单位里的任何人一样，也和中国的所有看守一样，总是对我们训话。我不可能把我第一次听到他训话的那些用语一字不差地重新讲出来。但是，回忆我经常听到的那些讲话用语则是最轻而易举的事了。在一条狭窄的监狱走廊里，四五百名衣衫褴褛的人们在水泥地面上盘腿而坐。周围号子里挤满了那些在过道里找不到座位的人，他们把头从门口伸出来。在我们面前，靠近铁栅门的地方，一个穿着毛式蓝制服和棉大衣的看守，高高地站在一把凳子上，通过一个铁皮喇叭对我们高谈阔论。在他的右手里，有一本卷得很紧的杂志，当他需要加强语气时，就将杂志前后左右地挥舞。下面是讲话的梗概：

"今晚我要讲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他说，"虽然你们全都在这里进行劳动改造，但你们是完全了解外面社会上所发生的事的。你们有广播听，有报纸看。政府为了关心你们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改造，认为你们不应该脱离我们社会的伟大运动，你们都知道，现在全社会劳动群众都已投入到大跃进

中。他们以高涨的革命热情无私地进行劳动，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并决心完成他们的光荣目标。他们决心在15年内，在工业产量上赶上英国。他们已出色地创造出了奇迹。由于全力以赴地工作，他们忘掉了吃饭和睡觉。有许多工人在机器旁一站就是20小时，甚至30小时。现在每天劳动16或17小时是平常的事。机器是不需要休息的；它们需要的是有人管。

“你们这些以劳动赎罪的人，不应该比外边的人干得还少。因为你们以前企图暗中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所以你们现在是被强制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由于这一点，也由于五一节即将来临，政府决定将明天定为放卫星日。你们要学习外边的劳动人民，要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你们也是愿意投入大跃进的，而不是以你们少得可怜的产量在后面爬行。

“劳动群众他们不是罪犯，但有时还要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劳动。你们想想，你们应该比他们干得少吗？你们这些新社会的罪人，必须更艰苦地劳动才能赎罪。

“明天，你们应该将指标提高百分之百。任何人，我重复一遍，任何人都不得低于6000页。达不到者将作怠工处理，并将罚以单独监禁和吃糊糊。所有达不到指标的号子将吃一星期的糊糊。今晚你们在上床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自报明天的定额。所有号子应在这个基础上定出自己的指标，今晚11点钟以前交到我这里来。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对这件事有不正确的想法，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允许你们参加大跃进对你们来说是一种光荣，因为社会早已不承认有你们这些人了。”

那个夜晚在我们回来前，侯向上级保证我们要达到20万

页左右。

保证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睡个大觉，因为睡眠意味着力量。

早上3点半整，一个犯人积极分子象平时一样把我们叫醒。他站在过道底端靠近铁栅门的地方喊道：

“喂，大家起床！”

在那儿一直就是这样叫人起床的，不吹哨子，不打钟，也不拉汽笛（即使他想沿着过道走过来，他也会被满地睡着的人挡住）。在他喊后的几秒钟内，整个楼内就回荡着成百上千人拆卸床板并把它重新拼装成正规的工作案子的响声。那些睡在过道里的犯人，把他们的铺盖卷成卷，放在背后；而我们这些住在号子里的人则把铺盖一股脑儿地塞进床头碗柜式的小洞中，因为没有时间来叠它们或把毯子卷起来。在移交处内，每一秒钟都是重要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日子里，我们也是加倍地工作。几分钟内，我们全都已在案旁坐定，准备开叠，尽管睡眠朦胧，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但还是准备就绪了。

这种催命式的火速行动造成了一种令人惊奇的行为方式。到我离开时，我已习惯于这种方式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另一个放卫星日的前夕我遇到过的一个犯人，以后我再也不曾见到过他。那天晚上，我们睡得早一些。半夜2点钟左右，我爬起来急匆匆地往厕所走，这位老兄穿着他那肮脏的衬衫，笔直地坐在靠近厕所的入口处。他的伙伴还都睡着，而他却在叠着书页。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他叠得太慢，怕完不成定额，还是装出积极的样子以取悦于政府。但是他的确就是这样在起床前已叠了一个半小时。我怀疑我以后是否也会这样做。

当我们拆床时，我们的值班员（由侯指定的一个同号人）将集中起来的书页分成一堆堆并放在我们身边。我们则准备好洗漱用品——一条毛巾，万能的搪瓷杯子，牙刷，以及一小块肥皂。每样东西都整齐地放好，准备着。我们每个人都往牙刷上挤一点点牙膏，并把它放到毛巾边上，把牙膏管放在一边——并开始叠书。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来来回回地使用竹条子进行这无休止的、不动脑筋的、机械的折叠，每张折四下。我们的姿势越规范，动作越机械，速度就越快，而且折痕清楚。脑子里要全无杂念，专心致志地集中在折叠上。

在外边，我们可以听到指挥上厕所或洗漱的喊叫声。“四号，准备洗漱！”犯人积极分子叫着。当叫到我们号子时，我们全跳起来，急速冲出门，一溜儿小跑到盥洗室。这里有八个冷水龙头，水流到嵌入墙内的水泥池中。另一边是小便池和一溜水泥的大便坑。一个号子同时干这些事花不了多少时间。我们一半人在左边迅速地刷牙，另一半人在右边大小便，而后轮换。我急速地刷完牙，啜一口水，挤过人群，然后快速蹲到大便坑上，用一小块报纸擦完屁股立即出来，小跑回号子，路上就遇到下一个号子的人。回到号子里，我们将杯子挂到钉子上，把毛巾挂到头上的绳子上晾干，便重新开始折叠。

不，还不完全是这样。首先我们要按一种固定程序——这是移交处独特传统的一部分——将三支香烟首尾相接。这是为了造一支尽量长的香烟，因为只允许我们每天点一支烟。我们从第一支烟的一头敲出一些烟丝（我们的香烟常常是卷得很粗的，烟是最次的，所以很容易倒出一部分），将另一支烟插入空隙中，用一小条纸，以及每个号子都有的浆

糊（它是用来在已完成的书页垛上粘贴标签的）粘牢。等接上第三支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中国式的古怪的庞然大物。这时，我们准备继续工作。浆糊造成一种古怪的味道，但管它呢，香烟终究是香烟啊！

“火来了”，侯预告说，当火到来时，这是一日中最好的时光。点烟是从铁栅门边开始的，然后一个一个往下传。一位看守走过来，把一根火柴递给犯人积极分子，小心看着他点燃他的香烟并把火柴弄灭，（这一过程是缓慢而平静的。这样就不致于将火弄灭或把烟尾弄坏）。犯人积极分子顺着走廊走过来，每回只将他的烟递给一个号子的号长，号长将他自己的烟点着后将烟还给他。点烟的过程继续进行，一直到整个大队都用那一根火柴吸起烟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根长度相同、一头下沉的烟。由于吸烟使人精神振奋，也由于这是一个放卫星日，我们甚至在午饭后又得到一次吸烟的机会。看守们让我们多吸一次烟是为了刺激生产。

到早晨7点吃早饭时，我才叠了800页多一点。但是其他人大多已大大超过1000页了。与他们相比，我仍然是笨拙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也不断地进步了。到我离开移交处时，在卫星日我能叠到10000页以上。在吃早饭时，我们一点不挪动位置，贪婪地把食物狼吞虎咽地吃进肚子，吝惜着每一秒钟。日子在一种古怪的、梦幻般的、晕头转向的、无休止的重复折叠动作中逝去，没有任何东西能打断它。既没有工间休息、学习，也没有专门的吃饭时间，我们甚至尽量少喝水，怕小便浪费时间。我们总是能完成定额，虽然我往往达不到指定的份额，但其他更熟练的老手弥补了我留下的差额。因此，一切还都顺利。我们能维持住我们的口粮定量。我们晚上11点15分上床。虽然我们精疲力竭，天昏眼

花，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愉快的。

我们的折叠工作当然仅仅是整个书籍生产线若干步骤中的一个。拿到移交处来的是六英尺宽，四五英尺长的印刷好的大张纸。用机械切纸刀把它们一切两半，这就成为张或条，我们把它按书的章节叠好。每人每天都将产品垛好，捆成捆，贴上标签，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号子的号码。最后把它运到四楼，那里的一台机器将其边沿打三个孔。

五号楼是装订车间，值班的犯人将章节分类排好次序，然后把它尽力塞入桌上的一个一码高的木箱中。这些犯人夜里就睡在这种桌子下面。在靠窗那边另有一张长桌，上面有夹钳和能穿透一本书厚的订书机。一个犯人牢牢地把书页按住夹紧，然后猛力将一枚订书针打入书页，使之成为成品书的模样。另一装订手将线穿过三个孔，完成后就取掉订书钉。

装订工作有时会将他们的手损伤得很厉害，但是，移交处最差的工种是那种把叠好的书页搬上楼的搬运工。这是名符其实的搬运工。这些苦力们（没有其他更好的字眼可以描述他们的工作）每人负责搬两个装订工人装订出的书，而装订工每人每天定额是 700 本书。一天内他们要用他们的肩膀将1400本书扛上四楼，每次30或40本，堆在木板上，用一根绳子绑在肩上。他们必须跑步才能完成定额，如果谁停下或摔倒，后面的人就会超过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在“百花齐放”的日子里发表了反政府言论。他们被称为反对派。他们仅被处以三年劳动教养。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连续完不成任务，就会从劳教改为劳改。他们干得极为艰苦。

叠书页使用的是古老的黑点制。我们不仅必须让每一页

的边与黑点对齐，而且还要让页码依次排列正确。损坏一页就倒霉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牢牢地、清清楚楚地记住悬挂在K型大楼中央的那个巨大形象，那是一张招贴画，画上是一名工人正在用手指指着我们。每天劳动结束、晚读之前，一位看守就来检查损坏情况。这时我们已都迅速地洗漱完毕，并盘腿坐在床上等待检查。这应该是一个吸烟的好时光，但是仅允许我们在早晨吸烟。侯拿着一张纸挨个点名，我们挨个报告自己损坏的数字。损坏三四张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因此一般可不受批评地过关。但是，超过这一数字就会带来严重的麻烦。有时，有些十分幼稚的新来的人企图假报损坏数，把损坏的书页藏到床底下。但是，这种诡计经常会被发现。在中国监狱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藏得住。每月月终，根据我们的产量和损坏量给我们打分，并记入我们的档案。所有这一切都将影响我们的未来。

我们号子里一件最大的事故发生在5月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犯错误的人竟是一个叠得最快的人，他姓胡，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胡也能叠出7000—8000页。他叠得太快了，有时不太整齐。但是他认为这无关紧要，装订工可以帮他码齐。胡的问题是他太固执和不能接受批评，同时他又是文盲。一天黄昏，侯被从号子里紧急叫走。当他回来时，脸色严厉而难看。我从来还没见到过他的脸这样难看。他手里拿着一叠准备装订的叠好的纸。

“胡，你将会受到处分，”他脸色煞白地说，“你这一星期干的好事。”

胡听出话里有话后非常吃惊和愤怒：“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做了什么啦？”

“你做的事太可怕了，胡，我都不愿说它。”善良的老

侯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这使我震惊。他说的话象卢说的一样。胡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他高声回报。

“侯，你说话当心点。你知道上星期我总共损坏的不超过5页。如果你是指那次窗子事，你记住，我是要求关窗的。刮风不是我的过错。”

侯摇着他的头：“要是仅仅是窗子的事就好了，但是，胡，你已使国家遭受严重损失了。”

“侯，你不要乱扣帽子。”胡这时勃然大怒。他这是指号长在造谣。

“我刚才告诉你的事是他们告诉我的，也是我亲眼看到的。胡，这不是5页或6页的问题，而且300页。”

他脸色苍白，这是一种可怕的指责。

“这不可能。”

“不可能？”侯拿出他带来那些纸张，“这是你叠的吗？”

胡靠过去，仔细地查看，然后严肃地点点头，“这里没有什么错的。”

“看看底下，胡，号码不相连，它们不是从16而是从25开始。”长时间的沉默。“现在你还要说你没有错吗？”

胡因这件事被关了禁闭。在中国，犯人们都有自己支配的时间，例如，从学习时间中抽出一些时间让犯人读书和写字。因此，不识字不是犯错误的理由。胡不能怨任何人，只能怨他自己。在胡因为把纸张搞得乱七八糟而被关押的不愉快事情之后，我与同号人一起认真地学习中国字了。到我被释放时，我读写中国字的能力和我说中国话的能力一样好。当胡从禁闭室回来时，他脸色灰白，掉了八磅肉。

“你还算走运，”侯告诉他说，“那个切你的纸并排号

的家伙被罚了两个星期禁闭。”

一年中有几次——取决于生产进行情况——要各个号子召开口粮平定会议。口粮评定是刑事系统最不好的制度了，因为它使犯人们相互孤立，并制造出一种紧张气氛。它使我们相互监视，而这正是官方的意图。它抓住了我们的肚子，这是一处最薄弱的地方。要每个号友对其他人作出评价。他投票时，必须要考虑到被评定人的劳动态度和产量。开会的

常不严肃地发表议论。他以为他是在住饭店吗？他是来受惩罚而不是来享福的。他是2月中旬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即将进入5月份了。他还能继续吃轻劳力口粮吗？这是浪费政府的粮食。这是可耻！他可能以为他还能轻松愉快地继续好吃好喝呢。那些来了刚一个月的犯人都已达到每天6000或7000页了”。

一片沉默，侯环视周围，但是没有人再要发言。“我自己没有更多要说的，”他总结说，“不过我认为，如果任何时候，哪位感到非要对别人提出批评的话，我以为还是记住自己的产量数字是什么为好。我们不希望争论或个人之间的争吵。我们现在是评议在下次会议以前鲍若望该吃什么样的口粮。你们当中有一位建议吃重劳力口粮，另一位建议他应降到惩罚性标准。让我们投票吧。谁赞成重劳力口粮？一人举手，我感谢他，但是我想我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轻劳力口粮。”

除了刘和我自己以外，（被讨论的犯人从不投票。）都举了手。这样，如果看守同意这种评价，那么在下一次会议以前，我便被定为吃轻劳力口粮。在移交处期间，我一共经历了三次这样的会议。我很高兴地回忆起，有少数几次我们没有按照官方的要求办。不过，刘这个恶棍在两次会议中都跳出来表演了一番。

陈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他是因为偷窃被抓进来的。由于某些我不清楚的理由，当局决定把他放在移交处劳动改造而没有把他送到劳改营去。因此，他在这里不是过渡性的，而是老资格。到那时为止，他对这一切都已很熟悉了。

“我的产量是每天7500到8000页左右，”他说，“政府很优待我，让我吃重劳力口粮。”

“陈是个例外，”一位号友评论说，“他产量高，效率

也高。由于政府不能再提高他的口粮等级，我提议我们向政府建议给他奖励。”

“好！”侯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就把它记入记录。”

果然不差，刘又尖声开腔了。

“陈同学自高自大地吹嘘他的产量。他态度不端正。他对什么都不在乎。我敢肯定，如果他对事更严肃些，不出洋相，少上几次厕所，他产量会更高。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他坚持骄傲自满态度，我们就要降他的口粮级。我这番话算是对他的警告。”

“好，刘，”侯叹口气说。“我把你的意见记下来，让看守来决定吧。”

我所遇到的一件最可怜的事是有关一个满面红光的犯人的事。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时口号满天飞，他却说话直率，敢讲事实，甚至毫不掩饰地进行冷嘲热讽。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了，说话的声调是厌烦的单调。

“我是由于反革命活动而到这里来的。我是地主的走狗。当然我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将我关进监狱是完全正确的。给我判了长期徒刑使得我不能再作恶了。现在，我再也不能阻碍革命进步了。我的产量是4500页左右。但是，由于政府认为我能干得更好一些，所以我现在仍然吃初来的人的口粮。我的态度不端正，过去5个月都是如此。我们犯人没有权利，因此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我们评定口粮。政府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所有人必须努力多出书，以此来赎罪，以此来重新获得政府的信任，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在争什么，我们是在争多一块窝窝头，是吧？政府可能认为我可以叠得比4500页更多。但是，我只吃初来的人的最低级口

粮，所以我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如果你们问我是不是希望吃轻劳力口粮，我说是的，这不是因为我认为我能挣得更多，而是因为我肚子饿。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

他看了刘一眼，但这时刘闭口不言，罗愉快地接下去。他为我们算了一笔帐。

“这完全取决于纸张的种类和我的情绪。4个月来，我一直是重劳力口粮，时间够长的了。下星期我可以提高到10000页——我发现了一个提高速度的窍门。这窍门以后会告诉你们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以为这种重劳力口粮是不公正的。那些每天叠6000页的家伙吃的粮食和我一样多，而我叠得比他多60%。现在，如果叠6000页的人仅能得到叠3000页的人一样多的粮食，他一定会嚷嚷这不太公平，是不是？如果我叠9000页，难道我不应该有理由要求比叠6000页的人多60%的粮食吗？”

他以一种讲道理的姿态伸开他的手掌要求一个明确的答复。他充满着善意继续说下去。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看看他会得出什么结论。

“当然，我知道，我的要求是不可能达到的。口粮是有限额的，是吧？而且政府知道如何回报我们。因此，我希望同学们投我轻劳力口粮票。我希望下两个星期轻松一下。”

这真是一颗炸弹，它使得我们大家都目瞪口呆，侯无言地坐着。他只是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开玩笑。

“我不是开玩笑，”罗抗议说，“我不认为在下个月或其他时间吃轻劳动口粮会对我有什么不好，我感到很合适。如果我降低到每天5000页，这对我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罗，你知道你的行动会得到什么结果吗？”

“当然知道，但是，我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啦？是特殊待遇吗？我所要求的不过是稍微休息一下。同学们，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讨论了他的要求，并迅速决定随他去。直到下一次开会以前，他一直是吃轻劳力口粮。他得到了一个小小的个人胜利。愿他好运。

在我呆在东院的审讯中心期间和在正式判刑前呆在移交处期间，不允许我妻子来探望。法律只允许她每月一次来到我关押的地方，留下一封信或是孩子们的照片。她的信自然都是一些乐观的话，这是意料中的事。如果不是这样，信就永远不可能送进来。而她自己也会冒着被指控散发反政府宣传的危险。虽然我知道这些，我还是渐渐地让我自己进入一种家庭一切平安的不真实的虚幻的感觉中。我估计，他们会一切都很好。而且从一开始，所有看守们都向我担保说，罪犯们必须受到惩罚，但是国家会照顾他们的家庭的。

终于在1959年5月，我第一次看到了她，这是在我被捕一年半之后。允许我用官方的明信片给她写信，并要她于探望日来见面。我在供个人写字的两行地方要求她带香烟和换洗的衣服来。在探望日的前一天晚上，我匆匆地到理发员那里。按照习惯，我有权要求刮脸和理成平头。虽然这样，我还是怀疑这对我的外表有多大的帮助。长在背上和颈上的疖子仍然没有治愈。而且穿的是标准的制服，铁灰的短裤，皮便鞋，以及肮脏的灰衬衣。

傍晚5点半，我们这些接受探监的人列队走下楼梯，进入主要的过道内。我带了一床被子，准备要她带回家洗一洗。它太脏了，而且现在天气逐渐暖起来，可以不用盖它了。开始点名了。一个看守大声发口令要大家排好队以便检查。检查的开始是搜身。然后看守们把我们带的书逐页看过，然后用刀片拉开我们外衣的线缝。在检查过后，我们走过去，面对墙壁立正，最后听训话。

"好，不一会儿你们的家属就要来探亲了。要尽可能简短一些。第一次见到家属的犯人不得激动。说话要大声，要使警卫能听见。不许讲方言，只能说普通话。不要把任何东西偷偷递给家属。有人看守你们的。不许打暗号，不许相互接触。任何人犯了规，看守将当场终止探望。"

我们向后转，走出过道进入院子。那里已经摆起一长串象障碍似的设备。这些是下面垫着砖头的五英尺宽的木板。这些木板齐腰高。每排之间站着一个警卫。我们这些囚犯，顺着这条线来回寻找，想找到自己的家属。杨正站在箱子的另一边，手里抱着我们最小的儿子荣。荣是我的宝贝。他使我回忆起可怜的小咪，她死于伤寒。荣现在六岁，他几乎不认得我了。我不知道他来到监狱里在想些什么。我妻子不忍心把我的遭遇真实地告诉孩子们。她至多只能说我在别的地方工作。她还答应他们说，在我回去时会带给他们糖果点心。杨看起来十分憔悴，虽然她穿上了她最好的裤子。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然后转过脸去。她所看到的一切都涌上她的心头——她开始哭了。我猜想我看起来一定象个鬼。杨也浑身颤抖。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没有回答。

"不许激动，"警卫说，他是不会放过任何一点情况的。

"荣，你好吗？"

可怜的的孩子，他怕得讲不出话来。他丢给我一个小包，仍然不敢看我。这里是一块手帕，两条香烟，一张报纸以及若干洗漱用品。

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勉强装出来的。我告诉杨，不要担心

我。她也说了同样的话，要我不要担心她和孩子们。大男孩在上学，一切都好……

"我知道判决了"。她最后说，"我一个人怎么抚养孩子12年呢？"

"不许谈这个问题，"警卫大声喊叫。

我把被子递给她并要她给洗一洗。探亲到此结束。一共6分钟。当他们离开时，荣向我招了招手。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杨的一封信，她抱歉说她没有能带钱给我。她十分简短地讲了讲她的境况。我这才了解到，为了这次探亲，她经历了多么大的苦难。当我在审讯中心时，她能够相当定期地带包裹给我，因为我们住在北京城北面靠近鼓楼的地方，离草岚子胡同不到一英里。但是移交处在城的南边。杨没有钱，连乘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而在中国公共汽车票价却是便宜到了可笑的地步。她只能步行到南院。僮孩子实在太累时，她还得抱着荣。然后，她还得照样走回家去。而且还额外增加了我交给她的被子。单程一趟约八英里。

尽管如此，她遇到的事至少使我恢复了对人道主义的信心。为了加快速度，北京的公共汽车站间距离比较大。当杨惠敏抱着孩子艰难地跋涉时，一位驾驶员自行在中途停车，并询问她是否需要中途上车。我妻子只得向他说明她没有钱。售票员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她招手让她上了车。

"没有钱买票，同志，"她说。"车费我给你垫上。你可以记住我的号码，等你有钱时再还给我。"

汽车一直把她拉到离家门50码的地方。

当我在移交处时，杨还探亲过一次。这次探亲可以称之奉命表演。用监狱的术语叫做"不光彩探亲"——是为那

些表现不好或顽固的犯人而设立的。这正是我被从禁闭室放出来的时候。那是6月15日，是我从那个洞穴中回来后的第四天。那时天很热，在一次下午休息时，我正坐在地板上打盹。我的睡梦被一个一脸正经的看守打断了。

“站起来，鲍，”他告诉我，“你有一次不光彩的探亲，有必要让你的家庭知道你的表现，让她对你谈谈你的处境。”

他领我进入一个空荡荡的院子。那里，在主楼大门边站着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荣和毛。毛向学校请了一天假。小梁又哭了起来。看守允许我抚摸他们。杨开始朗诵她的讲话。

“我最近接到通知说你表现很坏。”

“你的行为使我很不好过。”她用古怪的高声继续说下去。“在学校里，孩子们……他们的全体同学都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反革命囚犯。但是，一个愿意改过自新的反革命分子与一个不愿意这样做、抗拒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一样的。鲍若望，这些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我要你听从政府的指示。好好劳动，好好学习。这样政府才会宽大和原谅你的罪行。”

这次探亲持续了大约10分钟，除了她的演说外，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当她讲完后，她留给我一本政治小册子和两条香烟。荣和毛由于害怕和感到屈辱，什么也没有说。他们离开时，两人都没有向我招手。

第七章

叠书页劳动已经够使人心惊胆战的了，但是，在移交处期间，我所经历的一个小小插曲却更为可怕。4月的一个星期，我被调到第四大队去。这是一个技术大队。因为在我的简历上，我说我曾受过技术训练。我在赛莱西亚神父学校学习过。可能是由于有人被调到劳改营去而引起人员不足，使得机器工具生产车间人手不够了。我是那些去补充的人员之一。

当我离开我的号子时，侯和其他人都为我高兴。还有什么会比地狱般的叠书页更糟的呢？我终于能象一个技术工人那样抬起头来了。据传说，那边的口粮也要多一些。我与所有的人都握了手，然后随同警卫走上两层楼到K楼的另一端去。当我到达时，我惊讶地发现号子又脏又乱。但仔细一想我明白了原因：所有人整天都工作，只回来睡觉和学习。技术大队产量的压力很大，以致于学习会议上完全不谈政治，而谈如何增加产量。

第二天一早，我从供应间拿到我的工具并走到分配给我的车床边上。这是一台破旧不堪，生了锈的老家伙，估计是第一次大战时的产品。在我周围，犯人们正在车、镗、切。到处都是金属屑、烟和灰尘。车间头头丁给了我一根长六英尺，直径三英寸的旧铁管子。要我用这根管子做出尺寸精密的环来。看到我们使用的这些机器的状况，这种精密程度却

使我有点胆怯。我第一步是从管子的外部削去一英寸，然后，从里面也削去一英寸。当一切就绪后，我就把管子切成环，丁告诉我我必须从我的机器里的这根管子切出110个环，不能少。我的定额是600个环子。到下班时我仅仅达到450个。丁骂了我一顿。

第二天我达到了600，但我受到了更严厉的指责。因为，我虽然达到了定额，但是我浪费了管子，每根管子只平均生产85个环，而不是110个。我处于产量和节约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的两难境地。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保持了定额，但仍然只能每根管子平均出95个环。我生活在不断受训责骂的气氛中。到星期末，我的刀具坏了。丁大发雷霆，并要我回去叠书页。

“你这无用的混蛋！”他咆哮着，“没有给你处分算你走运气。政府对你宽大。弄坏工具的犯人是要关禁闭的。”

我知道丁对我使用辱骂语言是违反规定的，但是我没有抗议。我乐意从他和他那个倒霉的车间离开。我就此离开了。

很明显，我是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工作的。因此，我返回叠书页分队时，分配我到另一个号子去。号长是一个壮实的东北人，姓严。他被捕前是医生。在我将要结束劳改营的生活时，我们又再次相逢。

“有一句成语。”他告诉我，似乎是让我了解一种秘密，“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以为确实如此。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成语。我又重新回到这种不动脑筋的，不断重复的叠书页中，拚命增加产量。

4月28日，我们按号子列队到第一监狱去理发。这是因为“五一”节即将到来了。在中国，和在苏联及整个共产党

国家一样，“五一”节是国家大节日之一。我们急切盼望这些节日。因为它们意味着额外的食物，一些休息和娱乐。29日下午，在完成了半天劳动之后，我们收起了工具，排队下楼进入院子里。然后六个号子为一队排站在和煦的阳光下，由挎着自动武器的警卫看守着。这是举行一种新仪式的时间。

“立正！”值日官发出口令，“你们当中任何人，如果有违反狱规的违禁品，应立即放在你自己面前的地上。这样可不受惩罚。但是，如果在随后的搜查中在你们身上发现了这些东西，你们就要受到处分。”

一本书扔出来了。有一些纸片，这些可能是在犯人之间传阅的纸条。还有一支铅笔。士兵们走向前来，搜查我们的衣服和身体。他们从我附近的一个犯人身上没收了一支廉价的钢笔，并记下他的名字。我们感到自己是一群废物，受到羞辱。半个小时后搜查完毕，我们回到各个号子。号子里一片混乱。所有东西都被翻了个过，扔得满地都是。我们的铺盖和私人财物都被撕开，甚至棉被的线缝也不漏过。我们开始抢拿自己的东西，但是严有头脑地命令我们停止。

“大家都坐到床上去。每个同学单独去找他自己的东西。”他说，“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他拿了什么。这样做就不会混乱了。”

这个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们全花在重新整理上了。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五一”节纪念，那就让他们保持下去吧！

4月30日是假日，一天吃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这样很好。下午还允许我们到院子里洗衣服。在号子内，我们可以玩扑克牌等和谈论与政治和生产无关的话题。晚饭后，约5点钟，我们下楼到院子里看戏。自然，首先由

一个监狱长讲话：

"我们在这里庆祝五一节。虽然，你们这些犯人是没有权利参与庆祝的。但是政府认为，对你们建设性的劳动应该有所回报。至于生产，我可以说我们干得不错。我们为国家贡献相当数量的利润。你们应该比其他人为国家多创利润。因为你们是欠了国家的债的。因此，政府在此宣布：为承认你们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明天发给你们两块钱津贴。"

当他从台上下来时，我们的唯一反映是沉默。鼓掌是不行的。接下来演的戏叫《林海雪原》，由新生剧团演出。我们舒适地坐在临时卷起来的东西或铺盖卷上，吸着烟等着开演。戏台上方挂着一个大标语牌，上面用红字写着："必须拥护政府的决定"。演员们为我们表演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支人民解放军的小分队进入满洲，通过打入敌人的司令部而消灭了顽匪。这是一出好戏。新生剧团是第一流的。

到了"五一"节，早餐有白面馒头，炖猪肉，粉条和马铃薯。还有二两粮糖果。吃完后，我们被集合到中央大厅，去听广播电台播出的北京大规模的游行实况。对游行我们很了解，不过是又一次人潮汹涌和一大堆口号和英雄式的决心，听着这些就心烦。但是我们能干什么呢，我们是囚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工人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接着是女工，然后是农民，接着是学生、运动员等等，等等。他们按着似乎是没完没了地重复的音乐节拍前进着，每个人都喊"毛主席万岁"。坐在我近旁的一个犯人犯困了并点起烟来。

"把烟掐掉，"警卫厉声地说。"你们是来听广播，不是来吸烟的。"

如果有人说话，就会叫他闭嘴。如果有人看书，他的书

就会被没收。如果有人睡觉，屁股上就会被踢一脚。游行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这些在北京的人受到了严格的锻炼。对于我们来说，到下午4点晚饭时，整个白天都过去了。晚餐是大米饭，粉条，豆腐和汤。从任何标准来说这些都是好食品。我们怀着满意的心情看晚上的电影《边寨烽火》。这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说的是国民党如何残害少数民族，新政权如何待他们视如兄弟的故事。

在"五一"节后的星期末，我们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我们自己样式的小型百花运动。这运动对我说来是不怎么好的。星期五傍晚8点钟，在院子里，监狱指导员，一个高高的大胡子陕西人，宣布运动开始。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他开始说，"都有这样一种错误思想，就是认为你们在这里仅仅是从事劳动。不，这是不全面的。为了改造你们自己，你们不但要劳动，还必须要清除你们的坏思想，就是消除那些有关对政府、对领袖、对政府的政策，对政府的盟国，以及对共产党的错误认识的坏思想。为了清除这些坏思想，你们必须要把它讲出来。这样，政府才能教育你们。你们不要怕讲出你们的坏思想，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有这些坏思想，不然的话，你们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因此，从下星期起，叠书页分队停止劳动一星期。机械车间日班下午不劳动，夜班11点前不劳动。在政府给你们这些时间里，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写下你们所有的坏思想。从你对判决有什么想法，以及对你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开始。那些还没有判决的必须讲讲你认为应该判多久。你们必须彻底坦白。记住这是帮助你们的运动，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来挽救你们自己。把坏思想留在头脑里就会腐烂。它们不利于你们的思想改造。因此分队长和号长们必须保证每个犯人

写出有关他头脑里真实思想的可靠的书面材料。任何人不许干扰。那些不会写的人由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帮助。”

这样，运动就开始了。我象一个书呆子，按照命令说话了。我很天真幼稚，回想起那时的极端愚蠢现在还感到害怕。我在一张纸上写下我在移交处的经历。使我认为，政府所说关心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一种谎言。它真正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是我们的廉价奴隶劳动力和最高的产量。当时我很愚蠢，昏头昏脑的。甚至在同号的人表扬我的坏思想很真实时，我还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骄傲。我认为我的坏思想是天下第一号的，没有人有我这样坏的思想。约一个月以后，随着揭发运动的开展，我为它们付出了代价。当然，我原来就应该想到会这样的。在6月15日傍晚，这位指导员告诉我们：

“为了保证你们都受到应有的教育，我们现在开展一个揭发运动。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揭发别人讲的或做的反政府的事。不要感情用事。揭发同号和别的号子的人是你们的责任。不要害怕揭发。没有人能报复。与其得罪政府，还不如得罪同号的人。”

我们列队回到我们号子并且坐下考虑了一会儿，以便整理思想，进行揭发。逐渐地，我们找到要说的东西了。记录员把它们记下来。象通常那样，开始揭发时调子是低的，号长仍是稳健的。

“我看見某人从盆里偷东西吃。”

“什么时候？”

“两个月前。”

“为什么你不汇报？”

“因为他给了我一半。”

这是一种良好的、轻松的开始。但是事情迅速变坏。一个家伙被人揭发不但从厨房中偷东西，而且用食物换香烟。这是一种交易——黑市交易。

有人说他看见我在写家信时使用密码，还用外国文写。

室内空气变得紧张了。这时，以前的相互监督起作用了，而这正是看守们所希望的。我感到震惊，这是不可思议和不道德的。

一个星期后，我获悉，政府也在他们自己的干部中对我们进行揭发。我被叫到看守的办公室去。

“鲍若望，我有一些事要告诉你。”他脸色阴沉地说，“你被挑选出来做再教育的典型。你有特别坏的思想。政府决定要对你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希望你以正确的态度来接受它们。要记住，应该感谢政府对你的关心。”

他要我回去，我怀着不祥的预感回到囚室。当天傍晚7点钟，我们被叫下楼，到院子里去。这是运动的高潮。我们坐在地上并朝上看着讲台。那里，指导员坐在铺着绿呢子的桌子后面。周围是他的助手们，总共约15人。在他们后面，有一张大幅的毛的像以及一个新的标语牌，上面写着：

“惩办那些拒绝政府再教育的人”

指导员站起来做报告。我屏住了呼吸。我没有把看守找我去谈话的事告诉我同号的人。

“揭发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成功。结果是很好的。它证明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关心思想改造的。”

他停了一下，表现出话中有话的样子。

“但是，你们当中有些人，非常少的人，攻击党和政府。这些人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又停了一下。他改用激动的，洪亮的声音说：“鲍若

望，反革命分子，33岁，被判12年徒刑——站起来！”

即使我想再坐着也不可能。在发出这一信号后，似乎在百万分之一秒内，我亲密的号友们以极大的革命激情将我拉起并推向前去。我站在人群中间。这里站着的只有指导员和我。他说：

“这个人攻击国家伟大的劳动改造方针。更坏的是，他还胆敢污蔑人民解放军，说平定西藏叛乱不过是一种帝国主义侵略。”

他明显地曲解了我的话。但是，在那一瞬间，使我震惊的是，他竟然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了解到我早先在侯那里的一次学习会上所讲的话。我明白了，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被遗忘的。所有听众以死一样的寂静听他继续讲下去：

“根据这些以及在这里来不及讲的数量极多的其它污蔑性言论，政府决定给他带上镣铐，关入单间，直到他表示悔悟为止。”

指导员坐了下来，这似乎是一种信号，院子里爆发出狂潮般的口号声。

“中国人民政府万岁！”

“打倒顽固分子！”

“严厉惩办帝国主义间谍！”

“我们衷心拥护政府的决定！”

我的狱友们不但高呼口号，而且高举拳头以示坚决。我看见周围一张张仇恨的脸对着我。我突然感到，如果指导员提议，我的狱友们肯定会把我撕成碎片。四个狱友没有接到命令就抓住了我，并把我向前通过人群推到讲台前方，那里有两个警卫将我接了过去，一边一个抓住我的胳膊，按下我的头，把我拖向可怕的西北角。那里有一个看守等着我。他

不动声色地看着警卫搜了我的身，并拿掉我的腰带和鞋子。

“给他带上镣铐。”警卫说。但是看守突然窘迫不堪。如果我当时不是怕得要命，我可能会发现他所承认的事是很滑稽的。

“我没有脚镣了。”他不安地说，“全都用完了。”

“那么给他带上手铐。”警卫说。

胳膊背在背后，低着头，我踉踉跄跄地进入西北角。这里很暗。现在我发现我自己正在一条长长的阴暗潮湿的走廊里，一边是高高的带铁栅栏的窗，另一边是一排小门，似乎是为侏儒制作的，这里有一种狮子笼的味道。一名警卫打开一扇门，另一个警卫将我向前推了一下。我摔下了并几乎躺倒在厚厚的门槛上。我弯着腰挤进洞里。门槛到门顶高不过三英尺，而牢间本身大约只四英尺长。水泥墙间宽约三英尺，房顶高四英尺半。刚好够一个人坐着或蹲着，根本不可能站起来或躺下。我的押送人扔给我一条肮脏的毯子并“砰”地一声关上了铁门。我的身体弯成了弓形，胳膊背在背后一点也不能动。我设法靠墙坐下并环顾四周。门上开了两个洞。一个靠近顶端，是供警卫监视的窥视孔。另一个接近底端的圆洞甚至更小，刚够送食物的木勺子伸进来。有一个木桶供大小便用。有一盏电灯嵌在天花板里，昼夜长明。

我感到绝望和痛苦。他们叫我们讲出脑子里的东西，而我是唯一按照他们说的话去做的人。有些人永远不会学乖！我的胳膊疼得厉害。我担心我根本不能入睡。不过至少还不冷，这可算是某种安慰。我打盹度过了第一夜。第二天早晨，一个警卫打开了我的门并弯身进来。

“政府决定宽大你，”他说。一瞬间我升起了希望。我将被释放吗？不，这是幻想。警卫让我靠过去，使他能够着

手铐。他打开了它们。

“把你的手放到前面。”

他把手铐重新铐上。这就是宽大！至少我现在可以坐得舒服一些了。半小时后，另一个警卫打开门，扔给我一个生锈的罐头盒，大小与肯普贝尔汤盒差不多。盒边仍然锋利而不光滑。9点钟左右，外面一个声音命令我：

“准备吃饭。”

我拿着盒子等在圆洞的下面，一把象水壶底样子的勺子从洞里伸了过来，把滚烫的玉米糊糊倒满盒子，溢出来的粥流到我的手上。由于猝不及防并感到疼痛，我本能地丢下滚烫的罐头盒。

“笨蛋！”他怒吼着。“你这是浪费粮食，粮食是人民的血汗。你会为此而受惩罚的。我要把你的态度记下来。”

“你这狗娘养的，”我心里想着。你是干得出来的。怀着狂怒、羞辱，充满着自怜，我把剩在盒内的糊糊都舔了。但我并不想把地板上的糊糊也舔掉。5分钟以后，警卫回来拿盒子。他后面跟着一个拿钥匙的人，他重新把我双手铐到背后。原来只是在吃饭时才把我的手放到前面来。我还算好的。有些犯人双手一直被铐在背后，甚至吃饭也不变，他们只能像狗那样地去舔食。

我弓身挪到角落里，并设法弄得舒服一些。我听到另一个号子里有呻吟声。下午一个警卫走来，把我的手又重新铐到前面。

“对不起。”我说“我把裤子尿湿了。”他看着我，似乎我是一条毛毛虫或癞蛤蟆。

“怎么啦？”

“我能不能换一换？”

"拱！你知道这是在哪里？"

他给了我另一个盒子并关上门。这一回当食物来时我做好了准备。即使是滚烫并溅到手上，我也不丢失一滴。这一回是菜汤，里面有一些绿色的番茄。

外面有人提醒说："如果你还想要糊糊，赶快把汤喝掉。"

我狼吞虎咽地喝下去，忘掉了疼痛，强迫自己的嗓子接受这种极烫的汤。当他拿糊糊来时我已做好准备。奇怪的是，晚饭后，他们没有把我的手再铐回到背后去。我的情况有了改善。从那时起，只是在白天9点到下午5点才把我的手铐到背后。这是按着办公时间给我上手铐了。晚上9点钟左右，一位医生来看了看我的手腕。

"没有什么。"他对警卫说。然后以专家的口气对我说：

"睡觉去。"

那个夜晚以及以后的若干天，我听到有人对自己发狂似的唱歌。真他妈的，为什么警卫们不让他闭上嘴？对此我一直不解，直到后来才想明白：在走廊尽头都是死牢。对警卫来说，这些人已经死了。既然他们已不存在了，何必还要费劲去制止他们唱歌呢。

第三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种声音把我从睡眠中惊醒，原来是警卫们拿着一木桶水泼进我旁边的一间牢房内。到这时我才注意到牢房地面略有倾斜，这样就能象大力神冲洗爱琴马厩那样冲洗掉牢内的脏物。关在那个牢房里的人开始大骂警卫。他的大胆使我吃惊。

在单人牢房中，下一个新鲜事是虱子问题。想起来令人恶心。我看着这些小虫越长越肥。它们在我的皮肤上到处

痒。由于我双手被绑着，无法够着它们。特别是白天，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后，更无法够着它们。不过至少长的疖子及时地好了。不然我很难想象在又是虱子又是烂疮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保持神智正常。

到了第五天，我被带到单间区值日看守那里。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要见公安部的代表。”

“为什么要见他？”

“因为是公安部送我到这里来的。”

“那么你不想讲？”

“不，我要讲，但我要求和公安部代表讲。”

他们把我送回笼中，但是三天后我如愿以偿。只要犯人能自我改造，他们什么事都愿做。他们把我领到一间会议室，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穿制服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官员。我为此而感谢他们。如果犯人了解中国共产党所坚持使用的方式的话，他常常可以利用这些方式来得到好处。我正在开始研究它。

“怎么啦？”这位官员问道。“我来这里是专门来听你的意见的，你说吧。”

我估计我必须说得厉害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为自己的辩护的话必须符合辩证法这个颠扑不破的原理。

“我上当了。”

“你的同监人都是一帮罪犯。”他耸耸肩膀回答说。“你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真理？”

我直截了当继续说：“不，我是被人民政府骗了。”

他抬起眉毛等我继续说下去。他用不着告诉我说话要小心以及我会因此而被多判几年等等。

我慢慢地仔细地陈述我的观点。我引用了指导员的讲话，他要求我们把最坏的思想写出来，并保证，说老实话一定会受到奖励等等。由于我完全信任政府和党，就按指导员所说的做了，而现在我得到了单间的回报。我什么地方犯下罪？这位官员和我谈得很好。离开时他向我保证要查查这件事。

今天我可以肯定，我对官员的伪善的谴责在北京官僚们中发生了一些影响。毛主义具有特殊的完整性，这是他引为骄傲的。但是由于运动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定，而又有一套明确的教义要遵守，因此它缺乏灵活性。但是可以巧妙地执行这些教义。他们决定把我从单间牢房中释放出来。但是，由于中国人爱面子，简单地解除对我单独监禁的惩罚并让我趾高气扬地回到原处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找到一种折衷办法：我必须挨一次斗争。

在我被禁闭了10天后，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被铐上手铐，满身污秽，臭气熏天地被带到K楼我原来呆的那边儿，站在经过挑选的500名同学面前。他们尖声叫喊的第一个口号是要我把头尽量低下去。我照办了，我看见我们囚室的绝大多数人都在人群中，这真有意思。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行动。我应该能知道的。

“鲍若望回来作公开检讨。”看守宣布。“你们大家看看他检讨得是否深刻，是否认识了他的罪行。”

我讲了。

“我想用这个机会告诉政府，在过去，我利用各种学习会议和运动，散播了不合适的思想。”

头开得不很顺利。

“你不老实。”

开始了嘘声。

"你没有讲真话。顽固不化。"

我再次采取主动行动准备讲明我的意见，但是看守制止了我。

"别说了！"他命令我。这是一种微妙的差别：他没有说"闭嘴"。"别说了"是相当客气的话。这看起来越来越象是一种宣样文章的斗争会。

他接着说，"好吧，你们现在开始批判他。"

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的发言给其他人定了调子，他说得很好，特别是一些比喻。他象背课本似地念了一遍。

"鲍若望是一只狐狸，他现在再也藏不住尾巴了。他是作为一个帝国主义间谍，散布帝国主义宣传被审判和判刑的。现在，他竟敢在监狱里执行他的帝国主义任务。我们要求政府按照法律给予严厉的惩处。打倒帝国主义分子！"

其他人也加入了批判。有时他们一起高喊他们喜欢用的口号和恶骂。"社会败类"是一再重复喊的。我能清楚地听到我同号的某些人的声音，这些声音与其他人的声音一样刺耳和无情。这是为了和别人一样。约45分钟以后——对于最严厉的斗争，这仅仅是开始——看守宣布停止。

"已经够了"，他简单地说。"你们该回号子去了。谢谢你们给予鲍若望的帮助。"

我回到单身牢房，但事情明显地好起来了。第二天早晨，警卫去掉我的手铐并允许我洗漱。当我洗完后，他们没有重新给我带上手铐。无疑，我就要出去了。

我的饭虽然还是老样的糊糊，但是似乎我吃饭的时间比平时要早一些。这是另一个好信号。我开始捉虱子。我觉得满身都是，一个一个地捉。当我用指甲把它们压成两半时，

每次都发出令人满意的响声。我看起来一定很象癞皮猴一样。

中午，警卫给了我两个窝窝头。第二天我又重新恢复了轻劳力口粮。7月的第一个星期，我被领到医务室进行身体检查。医生开的处方是洗澡和换衣服。单独监禁结束了。当我回到原来的号子时，我受到所有朋友的热烈欢迎，虽然他们斗争过我，并且在我被拉出去单独监禁时他们也欢呼过。

“鲍，欢迎你回来。”他们说。“抽支烟吧。”

我准备拒绝，但是他们中有一个人塞给我一包“大洪运”，“你以后会需要它的，”他告诉我。当然他是对的。使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怎么竟能这样若无其事呢。过了一些日子后我开始明白了。我有什么可恨他们的呢？他们是被迫斗争我的。他们别无选择。这在中国的生活中是一个最明白不过的事。他们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他们档案中会有一个污点。而且可能最终他们自己会挨斗。因此，参加斗争，跟着剧情发展一起走，并让它尽快结束，然后忘掉一切，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路可走。

第八章

1959年9月我被转到北京的模范监狱第一监狱。这就开始了我整个监禁生涯中最好的九个月。不是由于传闻，也不是由于我们几次去那里洗澡时匆匆地看了几眼，才使得我对生活所发生的戏剧性改变有所准备。

一个月以来，移交处的犯人一直不固定。新犯人象移民浪潮那样地不断到来，而大批老犯人在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的监督下转移到各个劳改营去。由于没有足够的囚室来容纳新来者，走廊里挤得满满的。我与另外30个人却因此而受益。9月5日，一个看守手中拿着一张纸条来到叠书页分队走廊。

"注意啦！"他喊道，"下列犯人到大厅集合！"

我也在这名单上。在当时，我们谁也不清楚我们将去何处。但是这无所谓，因为有什么地方会比移交处更坏的呢？我们甚至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就把铺盖摊开以备检查。当看守查过后，我们重新捆好并下楼到院子里去，低着头，保持沉默，但心中却暗自欢喜。当我们来到阳光下，看到并没有卡车或大客车等着，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这是一个肯定的讯号，表明我们将去一墙之隔的第一监狱。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我们对面高达25英尺的红砖墙，和第一监狱的其他建筑都是一个世纪前的慈禧太后时代建造的。即使在那时，它也意味着中国在刑事理论上的一种进步。中国人通常不喜欢直

接称监狱，因此它被称为清河联合工厂。它座落在北京一处风景秀丽的传统地区，靠近天坛。但是它的门牌号码已更新并革命化为“自新路125号”。

整个建筑是新巴罗克式的。包括五座三层的八边形主楼（工厂），用18条高顶棚的幅射型的走廊相联接。里面有众多的囚室、办公室和仓库。囚室里的水泥地面上有中国式的高架木床，这是解放后才有的。以前在慈禧太后和后来的国民党时代，犯人们都是睡在夯实的地面上。为了对比，共产党将一个老囚室完整地保留下来以供参观。囚室的窗户上不安铁栅栏，木门不上锁，而且任何时候都开着。犯人逃跑的危险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有疯子才会希望从这个天堂换到别的监狱里去。这是中国最好的监狱。而且即使有某种奇怪的冲动驱使一个犯人逃走，他仍将面对着顶端装着电网的高墙。

我们成单行通过墙上的门。在墙另一边的院子里有一小队卫兵看着我们。有一组新的看守来检查我们的财物。检查很快而且不仔细，似乎仅是走走过场。

“这就是你所有的衣服？”一个看守带着惊异的神情问我。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进来的？”

“我是反革命分子。”

“判了吗？”

“12年。”

“那么你必须努力改造自己。”

“是的，先生。”

“我看你有一些高级香烟。”

确实是这样。仅在几天前，我从在北京代理法国利益的领事代表那里收得一盒大前门。我认识他多年，他给我的只有这盒香烟。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在狱中时，法当局对我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对法国政府来说我不过是拿着他们护照的半个法国人而已。

"你随时可以抽烟。"看守说。他懒洋洋地翻过我行李中的字典和其它书籍。

"这些就是你仅有的书？"

"是的，先生。"

"我们这里有图书馆。"他打了一个检查通过的手势。"这里一切都不错。你可以整理一下行李。"

真没有想到！他们把我当作人来对待，使我非常吃惊。当我们开始走向宿舍时，恰巧另一位看守从容不迫地走过来拿起了我的铺盖——不是为了检查，而是帮我拿！天哪，我想，真好，真好……

我新家的走廊比起移交处来既宽敞又令人愉快。没有犯人在这里劳动和睡觉。走廊的一边是一排囚室，另一边是看守们的办公室（也是一样的房间，不过只供一人用）、药房、生产办公室、储藏室等等。我被领去的房间约长10英尺，宽12英尺。有着一般的高架木床，上面还很阔气地放着日本式的"榻榻密"。一个陌生人，他后来成为我的朋友之一，名叫唐永明，正坐在床上背靠着铺盖卷抽着烟在看书。他穿着衬衣和黑色短裤。

"嗨！同学，"他愉快地招呼我。"如此说来你就是他们告诉我的那位了。看见你很高兴。这就是你的地方。不过如果你愿意靠墙，我可以和你换一换。"

"不用，"我情不自禁地回答。我被他的称呼可亲吓了

一跳。“这样就很好。”

“你的裤子怎么这么窄？”他的眼中有些幽默的表情。我怀疑是否他已经知道了。

“移交处的地方不宽。”

“好，没关系，这里够宽的。”

当他解释床铺的安排时，我明白我将有比三英尺还要多的地方。真不敢相信！我问他哪里能吸烟。

“走廊那一头有一支点着的香，它一直点着。你什么时候想吸烟，去那里点就行。你看来累了。”

“是的，下一顿饭几时开？”

“4点，今天不是工作日，所以吃两顿饭。”

“你在这里吃哪种定量？”

“定量？”唐愉快地笑了，“老兄，这里不定量。你愿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过你最好当心点。有几次，你们这些新来的人因为吃得太多得了病。”

我又疲倦、又饿、又脏，但是我被愉快笼罩着。我开始放好我的行李，拿着搪瓷脸盆到洗脸间去洗漱。我刚把脸擦干，唐来了。

“嗨，同学，”他说，“看守在走廊的那一头要见见你们新来的。”

我拿起所有的东西，跑回房间，当唐回来时我已穿着整齐并准备好走了。我小跑出门时正撞着他。他宽容地笑着。

“老兄，不要紧张。别人还以为你要逃跑呢！不要忙。他们会等着的……”

我走着，我确实是走到集合地点去的。这是我做的第一次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几分钟后我碰到了赵看守——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看守。

赵是一位伟大的人。如果我今天能见到他，我一定会象对待兄长那样地拥抱他。我来移交处，以为遇到的是些大头目和奴隶监工。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发现赵是一个诚实的、道德高尚的人。如果所有共产党人都象他一样，那么共产主义运动可轻而易举地席卷全球。我不久就知道，他是极为少有的能够亲近和平等地对待犯人的看守之一。赵是个高高的个子（近六英尺），约莫40岁，高颧骨，黑皮肤，小眼睛，蒜头鼻子，活象是W·C·费尔兹。他穿一件浅蓝色的毛式上装，蓝裤子和中国式便鞋。他看起来很随和，令人喜欢。

"我用不着说你们是在哪里，"他开始说。听他的口音我估计他是河南人。"在第一监狱，我们是在进行真正的劳动。这里所有的人都被分配到清河塑料厂工作。我们为这个工厂而骄傲，因为它是中国第一家塑料工厂。它开辟了中国的塑料工业。我知道你们原来在哪里，经历了些什么。因此，要给你们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你们现在还不适宜于工作。你们需要休息，我们将让你们休息。你们有二三天的时间——如需要也可以一星期，放松一下。两小时后你们吃饭。今天，还是吃玉米糊糊，抱歉，还是面糊糊。但是可以尽量吃饱，这是为了你们的健康。大概明天，你们可以吃些平的。就讲这些。散会。"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正在吸烟，一名犯人积极分子走进房间告诉我说，赵看守要与我在他办公室里单独见见面。尔后的小小拜访，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估计赵也同样见了其他犯人，也给予了他们同样的接待。心怀疑虑的人可能会说，他所表现的仁慈和善意不过是古老的牢里的大棒加胡萝卜的把戏而已。它可能是一种精心安排的计划。也

可能是经典的巴甫洛夫方法，你愿意怎么称呼都成。但是我向你保证它是起作用的。经历了两年的痛苦和羞辱之后，他的合乎礼仪的举动确实令人感动。我是十分佩服并近乎热爱这位人物和他所代表的监狱的。如果这就是洗脑筋，那么我赞成这种洗脑筋。

赵的办公室差不多就在我们号子的对面。大小完全一样。他有一张小桌子，还有一张用三块粗糙的木板拼成两头用木凳支着的床。一切东西摆放得很得体也很整洁。在床旁的墙上有一张装饰着流苏式丝织物的毛的像。在小小的床头柜上是一张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墙上挂的日历上当然有毛的肖像，还有一个塑料的毛的半身像被恭敬地放在书桌的中央。在后面墙的高处是一张朱德（那时是红军的总司令）的彩色像。赵看守邀我坐下，我们进行了一次标准的自传式的问答。当我们谈完后，他对我讲了一席低调的话。

"不要灰心，政府分配你到这里，因此你能用你的技术和才能来弥补过失。你会有一切机会获得进步，但是你必须信任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强迫你信任，但是除非你信任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使你赎罪。我们是帮助你改造的。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和你说道理。你有坏思想并犯了罪，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看到你开始获得新思想并不再犯罪。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思想的、政治的、或任何其他的——你来找我，我们一起谈。我的门一天24小时都是敞开的。如果你需要，半夜来也行，没有问题。这是我的工作嘛。"

他打开了我的档案，并翻到他已看过的一处。

"从这报告中我了解到你缺衣服。如果你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政府可以给你一些衣服。你跟积极分子说一下，他会

帮你想办法。同时，要抓紧改造自己。这样你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早出狱。现在可以回去了。”

我充满感激之情，并准备证明这番话对我是起作用的。休息三天之后，我被分配到塑料厂的维修分队，负责保证机器的良好运转和零件的充分供应。与叠书相比，这是愉快和文明的劳动。劳动和生活状况的各方面都反映了与围墙那一边的巨大差别。工作以外，我是第二组的组员，全组共12名成员，都是专业人员。我们的工作没有定额。我们这12个人住在相对豪华的三间囚室里，只有吃饭和学习时才挤在一起。没有号长。但是奇怪的是有一个人，当某种仪式需要有号长来或多或少地担负起这个任务时，他就承担这个角色。他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矮胖、小个子、灰白脸，名叫胡定温。他经常面带笑容。我碰到他时他刚刚27岁，但已入狱8年。他曾经是一个街头流浪儿，无依无靠，自己谋生。但是他的自由主义观念使得他做出了嘲弄并向解放军战士身上做污秽手势的错误。他被判刑10年，而这确实似乎使他得到了改造。他是我遇到过的尽职和快乐的一位劳动者。

同组人中成为我的朋友或至少时至今日还存在于我记忆中的有马洪方，他是来自北京的一个穆斯林，他负责安排整个塑料厂的定额；李明，一个漂亮的运动员式人物，他是大队的宣传员；陈，厂部的会计；刘高升，小队的勤务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戴友林，他是一个老犯人，他多次给我提出了忠告使我避免了麻烦。我们都叫他方脸戴，他熟知各种秘诀。

大家对食物从不斤斤计较，这使我大为惊异。那天傍晚我第一次与他们一起吃饭时，他们的伙食是洋白菜汤，漂着厚厚的油。当勤务员给他们舀汤时，有些人要求不要打得太

多！我头脑急速地在思考，这怎么可能呢？遵照赵看守的指示，我仍然吃面糊糊。有一大木桶糊糊放在大厅里。我吃了四碗就再也吃不下去了。我怀疑有多少人知道那种胃里装满糊糊后所感到的舒适。

晚上7点，一个警卫喊叫"学习"。我们集合到中间的房中，脱掉鞋，盘腿坐到床上。

"今天晚上我们读报纸。"胡说。

"好，"有些人回答，"这次读些有趣的东西，不要总是生产。"

这种说话对我来说简直是自我纵容的邪说，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点点麻烦的迹象。胡把报纸浏览了一遍，找到一个故事，写一个将军和从乡下来探望他的父亲间发生的事。这位将军在多年掌权并和一个出身于非劳动阶级的高雅的妇女结婚后，已经变质和资产阶级化了。他拒绝会见父亲。我们讨论他最终会受到的公正处分，一直讨论到晚点名。有人告诉我这时已是9点半了。这时就点名确实是早了一点。

赵看守把我们召集一起进行晚点名并讲话，这简直相当于一次思想上的安抚。他把我们新来的30个人介绍给其他人。还给我们新来者介绍了一些清河塑料厂的创业史，并且再次提醒我们不要把自己当犯人，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劳动者。如果我们是劳动者，那么他就是劳动者的牧师。这种比喻一点不过分。赵以及和他一样的千百万的不知名的传道者是现代中国政权的骨干。

第二天早晨，我条件反射地自动就在5点钟醒来了，而其他人都还在熟睡。我下了床，走向洗脸间，后来我才想起一切再也不用匆匆忙忙的了。我感到局促不安和鲁莽，又悄悄地回到床上躺着等待早饭。开早饭时我高兴地看到面糊糊

中有咸菜。我的号友们都只吃一碗，但我的饿劲还未过去，我吃了三大碗。

几个星期愉快地过去了。我的维修机器工作是令人感兴趣和有用的，工作时间也是符合人性的。第一监狱完全象是一个男子工业寄宿学校。每天的活动从6点钟开始。届时，一个犯人积极分子从走廊的一头喊醒我们。6点到7点是上厕所、洗漱（勤务员夜间已将我们的脸盆倒满水）和早饭时间。早餐是面糊糊或麦粥加上蔬菜。我发现，如果我把酱油洒到麦粥和蔬菜上，它就变成一种过得去的肯普贝尔罐头汤的仿制品。我与我的美国朋友经常在北京吃这种罐头。

7点半我们去工作。午餐时间是十二点整，饭是浓浓的汤和玉米面馒头，用木桶抬到工作地点。够阔气的是我们有整整45分钟时间来吃饭、吸烟和休息，不必着急。下午6点钟，另一班人来接班。我们回到号子洗脸和吃晚饭。7点半各组集合开"碰头会"，集体讨论如何解决生产问题。从晚8点到9点半是传统的学习时间。学习结束时，根据每人的生产情况贴出各种旗帜。一天生活结束时自然还有赵看守的一次讲话。吸最后一次烟和在熄灯前呷一口茶，这是一种文明生活的象征。

赵喜欢对我们说"我希望你们在正常的工作日中完成任务，而不是靠发射你们知道的那种东西。"

他关于火箭和卫星的批评性讲话真是太正确了。

虽然第一监狱是中国刑事机构中最好的模范，但它也有它自己又苦又甜的故事。例如，那里有一个翻译大队。你可以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第一圈》中读到类似情况。这个大队由140名专家组成。我后来了解到，原先他们也准备将我派到那里去的。我所以去了塑料厂是因为当时翻译大队已超

词。

翻译大队的定额是每人每天4000字。人们分组工作，一人翻译，一人校对。隔一天一换工作。他们是一个杰出的、多才多艺的集体。中译外、外译中都干，可以译成各种现代语言。

他们大显身手之日是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时。有些政府部门眼看着期限不断追近，而他们手头还有若干讲话没有翻译出来，也找不到人来完成。很明显，每一级的党员负责干部都要就十周年发表讲话。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的讲话都必须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以供来访的贵宾阅读和向新闻界发布。当他们把讲话送给官方的翻译人员，他们客气地拒绝了。他们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在10月 1 日以前译出这么多的文种。此外，我们还有自己的纪念准备工作要做呢。

这一下乱了套了。于是有人想起了在清河的这些人，他们有时间，而且没有他们自己的纪念工作要做。接下来的故事是，他们对把这么多的国家文件交给一批反革命分子去译有些犹豫不决。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不交给翻译大队，要不就无人翻译。中文的讲话稿于 9 月29日早晨交到自新路，而国庆周年是10月 1 日。

典狱长亲自宣布这条新闻。

"我为你们带来了好消息，"他开始说。这些翻译们听后不寒而慄。这种话语带有一种看守在讲"政府关心你们思想健康"时的威胁性。看守继续说下去："几个月来我一直很不安，因为我想不出我们这个大队在这国庆10周年时能给政府献什么礼。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想，我们不能象工厂那样以增加产量来参加这一活动。我们的光荣任务是将政府高

级官员的六篇讲话译成20种外国语言。让我们以大跃进的精神来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完成了这任务。10月1日之前一切就绪。10月3日，翻译大队被授予一面红旗。

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大跃进日子里，到处是标语口号，官方的大跃进路线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普通公民，不论他是操纵钻探机的、种水稻的、还是改造沼泽地的，都归纳为简明的三句式格言：“干得快、干得省、干得好。”

在第一监狱，每个工厂，每个作坊和每个院子里都装饰着相同的大标语牌，那是在红色的底板上粘上用三合板做的金字，牌子经常彻夜用大灯照着：

了解形势

加速改造

勤奋学习

热情劳动

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

前途一定光明

在我们维修车间，墙上贴着有我们自己特点的口号：

感谢政府

如何感谢？

忘我地、热情地劳动。

赵看守办公室里的口号是一段毛的语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在那儿时，中心厨房的一个炊事员由于将语录应用到生产食物上面获得了红旗。中国监狱中的主食通常是蒸馒头（平时是玉米面馒头，特殊日子有白面馒头）。成形的面团

摆放在带许多小洞的蒸屉上，然后放到一口盛水的大锅上直至蒸熟。由于这种操作很慢，而且多次重复，这位炊事员就产生了一个新思想：为什么不利用工厂和锅炉房现成的蒸汽呢？他把这一想法向看守说了。看守出于谨慎，说他怕不成功，这样馒头就会浪费掉，监狱会因此而受到批评。他宁可照老规矩办事。但是这个炊事员给他念了一段毛的语录从而说服了他：

"敢想、敢说、敢干。"

炊事员走到锅炉房，并把这个想法和机械师说了。使他惊奇的是装配起他所希望的设备非常简单。机械师拆掉炉子上放锅的那部分，在那里装起由六根铁管组成的高架子。从一间作坊中他定做了一组方形的蒸屉，将它们一个摞一个地放在蒸汽喷嘴上。第一次试验放了四屉馒头。当他打开阀门时，蒸汽把它们冲飞了。这证明太轻了。他增加了两屉并换了一个可控制蒸汽流量的新型阀门。其结果成为大跃进胜利成果之一（虽然不大）——六屉馒头15分钟就蒸熟了。而过去一屉就需要半小时。厨房立刻被授予一面红旗。

炊事员逐步地增加蒸屉，很快他有了一套非常有效的办法，14屉一次完成。他又加上两个铁笼子——一共42屉！他被正式命名为劳动积极分子，并被任命为炊事班长，并在他墙上挂上奖状。当我遇到他时，我问他为什么不每架放15屉呢，他承认这是一个值得一试的好数字。但是试验结果证明不好。14屉是极限。在第15屉上的馒头只是半熟。他的方法推广到整个劳改系统。在这一成就之后，他又发明了一种自动的窝窝头模压机，它能生产形状完整的窝窝头，并排列整齐，比手工操作快两倍。

除了各个专门人员的队和妇女分队外，清河还有一个二

百多人的少年犯大队。只有当他们超过18岁后才能进入成人劳改营。在那以前，他们是和其他犯人分开的，单独从事磨制照相机镜头和各式各样的光学仪器。它们的原料是可口可乐瓶。恣意挥霍的美国人把它们成千成万地抛弃，而中国人知道它们是用高质量的、近乎无瑕疵的玻璃——厚而透明——制成的。这些孩子每天工作10小时，磨制从可口可乐瓶子上熔化下来的玻璃。我今天还带着的眼镜片，有一片就是用可口可乐瓶底直接制取的镜片。由于玻璃有色，我的右边镜片比左边的稍暗一些。

我的监狱天堂意外地变得不愉快了。那是在1959年的9月末，也就是快到中秋节的时候。中秋节就是农历八月十五，是一年中月亮最明亮的夜晚。按照传统，这是一个结清债务的日子。公安部就在这时跟我清算了一次。

我得到通知是在一个犯人积极分子把我从维修车间叫到负责教育和纪律的看守办公室去的时候。看守给了我一份长长的表。

“鲍若望，政府需要你提供一些材料。写下你姓名，大队和分队；然后填表。就是这样。”

我把纸叠好回到了车间。当我看完表后我的心一沉。在表的顶端是一句简要的话“政府需要下列人员的详细材料：A·P医生及其妻子（我这里隐瞒了其真实姓名）。有关他们的个人历史和交往、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活动（包括合法和非法的）、他们与外国使馆的联系以及在这些活动中所花的时间。”

整个下午我都在琢磨怎样填表。回到号子后于当天傍晚的学习时间，我独自在一个角落里把表填好。

“P医生是一位印度籍的外科医生。他的父亲是一个印

度祆教徒，母亲是中国人。他在英国受教育，后又在法国深造。他于1939年回到中国，在天津担任中国铁路系统医院的一名医生。他与一位中国女性结婚，他们有四个孩子，住在北京。他是为西方外交使团服务的外科医生之一。”

我签上了名，并叠好交还给看守。他看也不看一眼地把它放入抽屉。显然，表的内容不属他管。还不到24小时，我又被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不是他一个人了。站在桌边的是一个来自公安部的官员——橄榄绿的制服、肩章、各种饰物和职业标志。他以一种干巴巴、短促的声调讲话：

“告诉你，这些问题是我叫你填的。你的回答使我非常吃惊。鲍若望，你以为我们是干什么的？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不需要你告诉我P医生是一个印度籍外科医生。自1955年以来你就熟悉P夫妇。你们是好朋友。你差不多每天都去他们家。你很了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材料。”

是的，我是了解的。不过，我不会说出来的。

“我不否认你所说的一切。不过我已经都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固执显然是不受欢迎的。他眯起眼睛。

“鲍若望，当心些！你拒绝与政府合作吗？事情会变得对你非常不利的。”

我当然不希望与警察摊牌，但是，如果我揭发朋友我就是混蛋。我决心勇敢地面对他。我知道我是有某种根据的。

“好，”我说得尽量客气，“让我们严肃地谈一谈。如果我是一个中国公民，就不需要你老远地蹬着自行车来到这里。我可能老早就揭发P医生及我所有的其他朋友了。我了解P医生可能是你们的敌人，但是他不是我的敌人。由于我不是一个中国公民，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担义务。”

这位警察平静地看着我。他不是那种一触即跳的人。但

他也留着一些对付我的武器。

“对政府隐瞒情况是要受到惩罚的。我不想给你加5年刑……”

他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我用下列套话回击他。

“5年，凭什么？”我天真地问道，“如果你是在审讯中心说这种话我可能会吓得昏过去。但是现在我已经认罪而且已经判决了。我熟读了有关惩治反革命分子的八十七条条文。有些事你们能做，有些事你们不能做。这里面有四条有关外国人的条款，我相信你是看过的。由于我是外国人，我没有义务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将我所知的一切讲出来。你不能违背我的意愿，强迫我去做这种事。我犯了反对中国人民的罪，我正在为此而赎罪。但是除此而外我没有任何義务。”

对话变得对我有利。我的理由是正确的，这位警察是知道的。他不敢当着看守的面来威吓我。

“好，”他说，“可能是我讲得太匆忙了。我忘记你是外国人。让我们这么办吧。如果你帮助中国人民政府，我们会感谢你的。你也会因此而获益。我可以建议宽大你。你不愿缩短你的刑期吗？”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与世界历史相比，50年是短暂的’。不久前，我感谢了政府对我的宽大。我的罪行很严重，我认为判我12年实在是很宽容的。我只能听从政府的决定并接受这个判决。”

“这就是你最后的回答？”

“是的。”

“随你的便。但是记住我给了你机会。”

“我知道这种机会。我在审讯中心就听到过。黎得预过许多机会，但是以得到终身监禁告终。我不需要机会。”

“如果我是你，我会注意我说了些什么话的。”一种威胁性的暗示又出现在他的声音中。我打出了最大的王牌。

“这不写着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这位警察合上他的公文包，走了。

“我希望你不要为此而后悔。”看守说。

“我讲的有错吗？如果有，请指出。我将非常感谢。”

他必定认为他看到的是一个怪物。

“改天再说，”他叹口气说，“现在不早了，回去吃晚饭吧。”

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位警察。当我后来回想这次会见时，我为我的傲慢态度感到不安。这的确不是很聪明的办法。但是他把我逼到墙角上了。

这位警察是正确的。P医生确实是我的好朋友。他于1961或1962年离开中国，现在安全地住在香港。我所知道的足以使他那时遭到麻烦。

中秋节后几天，我的家属来探望我。这是我到第一监狱后的第一次探望。那天太阳和煦，天气温暖，院子里搭起的木板桌子看起来也令人愉快，似乎是在准备野餐。这时，我终于有了一些送给孩子的东西。我用在维修车间挣到的零用钱，买了一些糖果和两个月饼——过节的小小的圆形精美食品。我买的是豆沙馅的。当我走向会见桌时，一个警卫打了一个手势，好象要从我这里拿走糖果包。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并走了过去。可能是由于太突然而来不及反应，他让我过去了，从而使我的孩子得到了这些月饼。

傍晚，我去看赵看守。

“看守，”我声明说，“我承认我今天犯了个严重错误。我在探监那会儿给了一位警卫一个白眼。我忘记我是一个被判

刑的犯人，而他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我为我的行为道歉。”

他听后没有表态，也没评论。他在仔细地想怎么回答。回答是这样意外地使人愉快：

“我知道你今天做的事。我接到了报告。但是你似乎认为我们是不近情理的。我们是具体事情具体处理。大多数犯人把月饼自己吃掉了。但是你把你的月饼给了孩子，虽然他们可以在外边买到月饼。大多数犯人要求家庭为他们作出牺牲。而你恰好相反。鲍若望，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你已在改造上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前面还有许多路要走呀。”

如果我不是一个犯人，我一定会握住他的手的。

当建国10周年大庆临近时，我们在塑料厂里的人也和翻译人员、针织工、电工技师和清河联合工厂的所有其他分部的人一样，努力超额完成定额，以向政府作出特别的贡献和献礼。我们分队把塑料腰带产量几乎提高了一倍，达到日产值4万元。自然，这种单个项目大量增产意味着其他货物的生产被推后，但是腰带使监狱得利。它的需要量很大，因此能卖好价钱。在织袜工厂，他们发明了一台能给尼龙丝染色的机器。但是为清河赢得最高荣誉而成为赵看守一次特别讲话主题的是电工分队。他们组装了200瓦的扩音器，这是供毛本人在天安门广场10周年大典上使用的。电工分队赢得了一面红旗。

这个月底，我经历了第一次全面的思想总结，也称月总结。在移交处时，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残忍的劳动，我们只有周思想检查，不太深刻，也较简短，等于是口头说明、坦白和自我批评，由记录员记下。这在第一监狱也有。但比起思想总结来则要差得多。由于这种总结很费时间，事实上，截止60年代早期，只是每三个月才进行一次。

我们连着花两个学习时间用于写个人报告，第三个学习时间（特别长）用于向全体同学报告。文盲由政治指导员或号子里的学习监督员帮助。每个报告都得全体一致通过，没有例外，号长也如此。通不过的报告要重写，直至被认可为止。每个报告念过后的批评会很快使得新来者了解什么样的报告能被通过。当一个报告被通过，号长就在纸边上写上他自己的评语，然后送交看守。

在思想总结中所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与中国公民们在生活中所用的原则是一样的。它们归纳为四条规则，按等级分类：

1.理想的坦白应该是自觉自愿，它应该象化学反应那样，在每个公民犯了错误或违反规定的当时就自动地进行。

2.如果不是这样，其他人就应立即给犯罪者以“耐心的帮助”以便促使他认识错误或罪行。

3.如果耐心帮助无结果，接着应进行“由具有良好愿望的人进行善意的批评。”这种批评应不抱个人恩怨，并忠实地按照“对事不对人”的基本原则进行。

4.当其它办法都无效，作为一种最后的办法，确定给予犯罪者各种严厉处分——斗争，单独监禁，等等。

我在下面写出的是我在第一监狱按要求格式写的“思想总结”。如果读者认为它荒谬不经或言过其实，那他很幸运，因为他一定从未在中国监狱中蹲过。即使在今天，在那个国家中，这也是很典型的总结。

对于本月思想改造的估价、对比和检查

姓名：鲍若望

单位：四大队二小队

1. 对于个人罪行的认识、理解和遵守法律及规章制度的情况：

在人民政府的教育和帮助下，经过一定的反省，我已开始认识到我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和可恨。它给政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并因此妨碍和推迟了社会主义建设。它也严重地伤害了人民。最后，它也给我自己的家庭带来了痛苦。虽然我的罪行极为严重，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但是党和政府还是对我表示了宽大。我认为判我十二年劳动改造是特别宽大和公正的，我愿利用这个机会向党和政府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但是，我深知不能光用语言表示感谢，还必须有实际行动。因此，我将过去一个月的活动和完成任务情况摆出来，以便人民政府审查我是否按要求去做了。由于我们都在这里一起生活和劳动，我也希望同学们审查我的报告是否实事求是。

2. 遵守规章制度和纪律情况：

一般地说，我对所有的规定是遵守的。就我自己所知，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没有犯任何严重的错误。但是仍然有不少小错误。这与严重违反纪律差不多一样地坏，因为许多小错误可以发展成大错误，更何况这些小错误加起来也会严重影响我自己的改造。我有很多小错误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举，在此我希望同学们为我指出。我忽视了相互监督的规定，它要求我们通常要两个人以上集体行动。有几次我单独离开了房间，主要是在上厕所的时间。此外，在学习时间，我不能经常保持坐得端正，有时斜靠在铺盖卷上。这不但违反了监狱的规定，也是我追求享乐的一种表现。如果一个人允许享乐思想的侵入，他怎么能够很好地汲取教训呢？今后，我

一定要对这种危害思想改造的坏思想保持高度的警惕。此外，我在劳动时间内有时说话太多。政府曾教育我们在劳动中要尽量少说话，否则会影响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领导要求我们把有关工作的谈话放到学习会前的每日工作会议中去谈的原因。更不好的是我的谈话常常与改造无关。这公然违背了指导我们的原则，即“有助于改造的要经常地、充分地说；与改造无关的要尽量少说；不利于改造的绝对不说”。虽然我讲的内容不是反动的，但是实际上它分散了别人的注意力，从而影响了生产，造成对改造不利。因此，我决心在劳动时间内不再讲话。除了这种谈话之外，我有时还谈论食物问题。我对洋白菜汤和用来做窝窝头的玉米面的质量有过反映，埋怨食物不好，实际上是对政府给我们的待遇的不满。我必须牢记我应该给什么就吃什么，比起旧政权下的工人和农民，我现在好得多了。我吃的蔬菜和粮食都是农民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不满意现在的食物就是对农民的不尊重。作为一个被判了劳动改造的犯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这里，我保证纠正我的行为，今后要更加谨慎。

3. 工作情况：

因为我是维修小队的成员，我没有劳动定额。我应把此看作是政府对自己的宽大。虽然，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一般都完成了要求我做的工作，但是仍然有一些思想问题需要克服。我对待工作没有正确的态度，我希望同学们帮助我克服这种错误，使其不致发展得更严重。首先，我把维修车间看得高人一等，因为我们是唯一没有定额的车间。而所得零用钱与其他车间效率最高的工人一样。骄傲使我看不到这样的事实，正是为了使第一线操作人员有完成或超额完成定额

的一切必要的东西，才需要我们维护机器并保证使其可靠地运转。我必须牢记不能以愚赐的态度对待操作人员。其次，我有一种以个人关系来待人的倾向。我必须牢记个人关系是禁止的，应该按照“根据工作而不是根据人”的原则办事。我喜欢不喜欢一个人是不重要的，我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为政府工作的同学。偏心妨碍生产。在改造中偏心是没有位置的。第三，我有时不能把我全部的知识用到政府为我安排的工作中去。我的态度是“干吗多花劲?”我忘记了把我分配到维修车间是因为政府高度重视我的才能。我至少要充分发挥我的才能。

4.依靠政府问题：

我不得不承认，在依靠政府和相互监督方面，我实在做得不好。这表明我仍然深深地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没有充分向上级报告在号子里和工作中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切事情。我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对汇报那些与我好的人我是很不愿意的。此外，有一种不好的思想使得我认为“你不汇报别人，别人也就不会汇报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改造自己，在改造中，温情主义是没有地位的。当政府给予我们这样的信任，让我们自己改造自己，对这种信任我是如何回报的呢？很不好。汇报别人有两方面的好处：它帮助政府了解所发生的事情，也使当事人能够认识错误。至于好的方面，我可以说我已经有几次主动地向政府暴露过我自己的坏思想和反动思想了。

5.学习态度：

这是我取得进步的唯一方面。在坐同学中，我是接受了

最落后和最反动教育的人。我受帝国主义代理人及其走狗的毒害特别深。我成为反共分子不仅是为了赚钱，同时也是出于真正的信仰。但是，通过学习以及人民政府对我的耐心教育，加上同学们善意的帮助，我开始认识到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认识是多么的错误。我从帝国主义分子手中接受的腐朽的教育使得我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和反对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学习会上特别注意学习。记录可以证明，在讨论中我经常积极发言，并且经常愿意讲出我对某件事的想法和观点。我希望同学们继续给我宝贵的帮助，加速我的思想改造。

6.遵守卫生规则情况：

这方面我要讲的不多。我是完全按规定办的。我自愿担任了清扫厕所和保持车间清洁卫生的工作。在过去一个月内，这两处都得到了卫生红旗。

7.决心：

我庄严地保证要克服所有的缺点，保持优点，在所有事情上听政府的话，全心全意地继续进行劳动改造。这是我补偿我的罪过和得到人民政府宽大的唯一道路。

当我第一次遇到那些对其被判的刑期向政府及他们的狱吏表示真诚的感谢的人时，我是怀着惊讶和轻蔑来看待他们的。后来，当我在第一监狱进行思想总结时，我也这样做了。不过有一点小小的内心保留，就是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是为度过服刑期而不遭到麻烦的可取的方式和方法。然而在我离开中国监狱之前，我也写下了这些话并且真心相信这些话了。

第九章

当我到达这里时，第一监狱已成为某种收容所，专门监禁从事间谍活动遭到失败的台湾国民党员和他们的美国朋友。他们当中一个最好的样板，恰好就住在我的牢房，他叫李明，是一个大队宣传鼓动员。

在当今中国，不论狱内狱外，宣传鼓动都是至关重要的。担任这种职务的人都是根据条件精心挑选的。不具备某种教育和知识水平，就当不了一个好的宣传员。因为他必须随时都能够很快地撰写出过硬的文章，有时甚至要写诗歌，他不仅必须通晓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还必须熟悉技术和生产行话；最重要的是他要具备传教士的本领，能向人们灌输激情和热情。李具备了所有这些品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出生在上海，在那里长大、上学。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也是我所见到的对政府路线最热情的支持者。他是真正的劳动积极分子，模范囚犯。

官方称他是"一个最有用的人"。

尽管他是我的号友，我并不真正信任他。他得意洋洋，过于相信他是管教人员的依靠对象。即令别人干得对，他也要讨好似的站在政府一边，我们这些囚犯对此都如芒刺在背，难受之极。我们总是听到他不停地向我们唠叨有关生产统计的数字。

我对他这种自以为是的愤恨，终于变得表面化了。有一

天，李精神抖擞，自负骄傲地匆匆走进维修车间。

"跟我来，鲍。"他高声说，"看守要见你。"

他的无礼态度，激起了我的愤怒。

"你是什么东西，这样跟我讲话？"我大声地回敬他，"你也不过和我一样是个囚犯嘛，李。如果看守要找我，他会派一个警卫来的。"

这件事我做得真笨。后来，李向赵看守汇报了我的情况。赵叫我去，让我对此作出解释。我过去曾有过不服管教的错误。

"不是我不服从你的命令，"我坚持说，"我不喜欢的是他那副样子，他总想把他自己凌驾于其他犯人之上。"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赵沉着地回答说，"你可以来找我，让我了解嘛！就这样。"

这样处理挺合情合理，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我丝毫也没有宽恕李。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老戴听。

"李的问题是，"戴说，"他被授予劳动改造积极分子的次数太多了。他的所作所为仿佛忘记了他自己的老底。他比资产阶级分子还坏，他是国民党员。"

尽管从法律规定上说，他不应给我介绍李的历史，但他还是这样做了。

"李第一次被逮捕是在1955年，"他说，"他要服很长时间的刑，要比你或我长多了。"

在李被逮捕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国家出版社干着校对工作。他是在贪污的现场被抓住的。为了讨好一个女孩子，他笨手笨脚地想偷点钱。因为钱数不算太多，被认为犯罪较轻，判了6年。他被关进了第一监狱。总而言之，也够多的。

在塑料厂成立以前，他被分在织袜组。由于他自我改造成绩显著，不久就被提升为积极分子，他就这么顺利地生活了三四年。后来，来了一批新的囚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曾经乘坐过某一架运输飞机……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1952年。有一架自台湾起飞的美国造B-52飞机，空降了5名国民党特务之后，在离上海不远处被击落。按照间谍活动的传统做法，这几个人在上飞机前互不相识，每个人只知道其余人的代号，跳伞后，除了1人外，其他4人都分别被抓获了。这个幸免于难的人从此谨慎而又不惹人注目地过着平民生活，最后他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了工作。他就是李。

当新的一批犯人抵达后，他的哑谜也就结束了。因为新犯人当中有一个当年乘坐B-52的人，这个伙伴还记得他。这个人要求警察把他带到教育和惩戒部门。他提供的情况引起了很大的震惊，因而，他很快就被带到了满洲的沈阳劳改营，与那另外3名特务对证。警察认为毫无疑问，他们经历中的每个细节都完全一致。4个人被押送到北京。此时在北京的李，正在袜厂无忧无虑、美滋滋地继续当他的模范呢！

警察在等待时机，观察研究他们的对象。这是猫与耗子之间的一种关系，只不过在这个案子中耗子是瞎的。大约两个月以后，他们把李带到了负责教育和惩戒的看守人员面前。考验的时刻到了。他们给他自动交待的机会。

“这几年你表现得不错，”看守说，“如果你真得到了改造，象你表现的那样真正进步了的话，我们是会十分高兴的。那么，你告诉我们，你对过去的罪行是不是都交待了？你还有没有其它事情要坦白交待？”

他不够精明，没有马上抓住这个暗示。他变得过份自信

了："没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

"你最好回去好好想想，"看守说。

第二天就更加严厉了。看守拿出一张旧报纸铺在他桌上，报上的大标题是：

"在浙江抓获了4名空降特务"。

李站在那里等着。

"城里正在放映根据这件事改编的电影，"看守说，"前两天我去看了，正想和报上说的对比一下。李，你能想起这件案子，是不是？"

"嗯，我隐约记得一些，"他试探着回答，"但记得不太多。"

"好象他们当中有一个人逃掉啦！？"

"是的，中国这么大，蒋帮特务是很狡猾的。"

真令人作呕！看守不再做戏了，他举起了李的在B-52上四个伙伴的照片。

"也许你认得他们，嗯！"

李知道这下完了。接着看守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通：

"你知道，几个月以前你就应该向我们交待。政府对你进行帮助已好几年啦！如果你早一点交待，哪怕5分钟以前，我们也会考虑是你自己坦白的，建议对你宽大处理。要不，你想想为什么我会给你这么多提示呢？你已经错过机会了！李。"

他叫来两名大个子警察。他们突然戏剧性地出现在办公室，将李带上手铐押送到草岚子胡同去了。3个月以后，李被判处无期徒刑，回到了第一监狱。看守对他说：

"我们充分考虑了你过去的表现，由于你的劳动记录不错，我们对你采取了宽大处理。一般象你这样的特务，都会

立即处死的。所以，李，你应该懂得我们对你够公正的了。不要辜负这种信任，应当感谢政府。”

从李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心诚意地感激政府的犯人，他在检讨会上那么真诚的原因，也就都明白了。

11月初，我们队度过了一段痛苦的生活——颁布大赦。那是“国庆”10周年时候，监狱的辛指导员通知我们，为庆祝建国10周年将要颁布大赦*。只有那些服刑达到刑期的2／3，以及曾经受过特殊奖励的才可以考虑。当晚各个牢房都按指示对大赦问题进行讨论。不过，我们牢房里没有人热情发言，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刚开始服刑，没有任何希望从政府这次宽大中获益。我们在牢房中无精打彩地谈论着，说一些看守指望在罪犯档案中能看到的套话。例外的是小胡。可怜的小胡对自己的赦免抱有很大期望。他的幼稚头脑认为他会得到宽大。

“我听到这条消息时很激动，”轮到他发言时他说道，“我想我是够格的。我在这儿已经呆了10年。判了15年，因

---

*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毛泽东致信人大常委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建议对下列各类在押罪犯宣布特赦：

① 蒋帮和伪满战犯，服刑期满10年以上者。

② 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反革命分子，服刑期满2年半者；以及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反革命分子，服刑期满2/3以上者。

③ 一般刑事犯，服刑期满1/3或1/2者。

④ 判处死缓2年的罪犯，可改判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

⑤ 无期徒刑服刑期满7年者，可改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适用以上赦免的必需条件，是罪犯必须弃恶从善，确实得到了改造。

特赦于1959年9月17日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到1959年底，共赦免了12082人，其中2424名反革命分子，9269名一般罪犯，其余389人为无期徒刑和死缓罪犯。

表现好减了3年。算下来只有两年多点就可以出去啦！10年里我三次被评上劳动改造积极分子。还得过很多特别奖励。我没有犯过任何严重的罪行——你们可以去问赵看守。现在我还是积极分子的评选委员呢！我想政府会对我宽大，我有把握，他们会让我成为一名自由的工人。”

“这话不该由你说，”大下巴戴没好气地说着，他老得几乎都可以当小胡的父亲，“别太骄傲了。”

11月的第一周，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清河监狱有54名罪犯符合大赦条件。第二天上午，天刮着风，我们排着队到院子里举行仪式。胡激动得容光焕发。辛指导员和他的助手一起站在我们前面的木制台子上。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庆祝日，”他大声嚷着，“你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你们当中哪些人够大赦条件。现在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宣布名单。”

这个公安人员先从袜厂开始宣布，接着是机械组、翻译大队，最后念到了我们塑料厂。名单上没有出现胡的名字。

我们必须再多等几分钟，为的是听另外的一组名单——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的，死缓改为无期徒刑的。

我们回到号子后，小胡哭了，——对任何地方的罪犯，尤其是对善于克制感情的正常中国人来说，这种情形都是难得发生的。胡掩盖不了他的极度失望。赵看守知道胡对这次特赦抱有希望，他带着早已准备好的训词进了牢房。

“小胡，怎么啦？”他慈父般地问道，“是不是有些难过？又生气啦？怎么象小孩儿一样？嗯？”

“我一直表现很好，赵看守，”胡眼泪汪汪地争辩说，“为什么没有我？”

这种问题对于赵来说是事先早已料到的。正象大家所说

的，他回答起来很自如。

“小胡，你好象忘了你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决定提出疑问。政府和党比你了解的要多。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认为这是国家对自己的一次考验。我想这次考验你没有通过。当政府没有满足你的要求时你就埋怨，而你还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别哭啦！现实一些。谁知道呢？说不定明年3月选举积极分子时，政府会给你一份礼物呢！不过，你现在必须好好考虑向国家做献礼。”

胡擤了一下鼻子，不再哭泣，就回去工作了。他的命也真够苦的。3个月以后，他母亲去世了。赵看守作了一个特殊姿态——他弄了一张为期3天的通行证，让胡回去参加葬礼。就我的号友们记忆所及，给予这种特殊宽大还是第一次。

竟想不到，那时我生病了。尽管当时不知道，但我这一病却使我离开了舒适的第一监狱，踏上了一条走向劳改营的不平坦道路。我的病时好时坏、起伏不定，而且最不典型的症状是经常没有食欲。在机械车间发生一起小事故之后，第一个不祥征兆就来了。我在加工一块金属材料时，钻头断了。我的一个号友迫不急待地要表现他的革命热忱。

“你应该小心点，鲍。”他警告我说。

真是凑巧，姓李的那个宣传鼓动员正在场。他不失时机地训斥了我。

“嗨！李。”我不耐烦地说，“这是个偶然事故。”

“是啊，可是你应该记住这都是人民的财产。”

“可是你也知道，李。这该死的钻头不管怎么说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李向赵看守汇报了我的态度。接着，他们俩一块回到了

机械车间。赵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我拒不认错。事情变得荒谬可笑了。

“我不是有意破坏钻头，”我争辩说。赵什么也听不进去。

“鲍，如果你工作时稍微集中一点精力，钻头就不会断了。钻头断了，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去磨它。你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教训吧！”

赵没再多说就走了。当天晚上，我就吃不下饭去了。因为任何反常的事情都必须向看守汇报，赵知道了这件事。9点半钟，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

“坐下吧！你怎么啦？”

“没怎么。”

“那你为什么不吃晚饭？”

“我不饿，觉着有点不舒服。”

“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训斥了你？”

“不是。”

“不要让批评破坏了你的食欲，鲍，没有批评就不可能进步。我要你好好改造自己。如果你不想吃东西，最好去医生那儿看看。因为吃不下饭，就不能劳动。我向你提出两点：如果因为我训斥了你而吃不下饭，那么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必须改正；如果是因为生病，你就必须去看病。就这样，睡觉去吧。”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医务室，告诉他们我没有食欲。医生给了我一些象糠麸一样的药丸，帮助消化。我仍回去工作，但从此再也没有感觉正常。发烧经常折磨着我。我变成了到医务室去取常规万能药阿斯匹林的常客了。

1960年2月最后一周的某一天，我造成了一起愚蠢的车

间事故。它几乎把我带进了真正的困境。我那时正在锻造一块钢材，这是一件经常做的工作，首先要把烧红的钢块浸入水中，稍微冷却一下再浸入油中。我神不守舍地，竟把灼热的钢块直接扔到了墙边的油箱里。油溅出来了，燃烧着的油沿墙蔓延开来。蓝色的烟滚滚升起。通常用水对付这类火情是无效的。但我对着墙泼过去满满一桶水后，火熄灭了。或许把火象其它什么东西一样是给吓灭了。虽然如此，事情还是被我弄得一团糟。最糟的莫过于赵看守那天恰好不在，代替他的是个狂热分子。他一点也不同情我们。他指控我企图破坏工厂。这个指控太可怕了。蓄意破坏意味着将被判以死刑。他把我送回号子等待政府作出决定。

不到半小时，通过扬声器我听到了有关我犯罪行为的戏剧性细节。我想，这根本不是公正的审判。看来他们似乎要拿我作为一个典型。我怕得要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还是我的朋友戴救了我。他编造了一些借口，放下工作离开片刻，匆匆跑回号子，提出一些应急劝告。

"该死的，鲍。"他气喘吁吁地说道，"马上开始行动，给他们写个检讨，越快越好，就说是你不够当心，没注意油槽就放在那些木椽子下面。就说你已认识到你的行为有多么严重，也认识到它可能造成的一切危害。立刻把这些都写上。"

戴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伙伴。他已经在第一监狱呆了7年，因而监狱里的什么事他都知道。我写了检讨，表示服罪并请求政府给我以应得的严厉惩罚。我签了名就一路小跑把检讨送到看守办公室。

"认识到你的错误，这很好。"看守粗暴地说道，"但是，你犯下的严重错误是会造成人员死亡的，检讨改变不了

这个事实。我们要把你的检讨送交我们的上级。只有他们才能决定对你采取什么措施。”

此后的两个半星期内，我都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中。从神秘的领导集团那里，没有传来关于裁决我的检讨的丝毫消息。戴始终叫我甭发愁。然而，令我发愁的是：奖惩会议每6个月才召开一次，最近的一次会刚刚开过，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我的案子了结以前，我还必须等5个多月呢？所以，戴保持沉默，我却烦燥不安。终于在一天晚上，赵看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看来心情开朗，似乎在开玩笑。

“好啦，好啦，”他说，“是啊！我们的外国罪犯。我一不在你就惹麻烦——而你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进步。我知道你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懊悔。鲍，不过表明你悔过的最好办法首先是要避免犯错误。现在太晚啦！所以这件事必须按正常程序办理。今天晚上我就要宣布对你的案子的处理。就这样吧！”

我走回号子，希望这件事最终或许会了结的。赵看守的情绪就是一个好征兆。那天傍晚，当李刚为当日生产发完旗子时，赵来到了门厅里。

“我知道你们都很累了，”他平静地说道，“所以我讲话尽量地短一些。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我先说最严重的事。你们的同号鲍，有时忘了他在什么地方了。他几乎造成了一起严重事故。但是幸亏其它人有警惕性，才没酿成大祸。我现在决定对他的处置。我看过他的检讨并转交给了政府。检讨还不错，至少对他的错误行为有所认识。所以，这次我们对他就不处罚了。”

我感动万分！

“他作出了检讨，这是给你做出了榜样，可是你们所有

的人必须记住一件事：政府的宽大绝不是无边的。”

“我早对你说过了，”后来戴愉快地对我讲，“在狱中幸免于难的唯一方法，是立即写交待。而且，要把你的罪恶写得看起来越邪恶越好。永远要把你自己痛骂一顿——甚至要夸大一些。但是不能暗示监狱当局或政府也要负任何一点责任”。

数周以后，我有了一次机会来检验他对我的忠告。不过我搞得很糟。我被派去安装窗户玻璃。我试着往上装时打碎了一块新玻璃。这块玻璃的价值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匆匆忙忙地只给赵写了一份草率的检讨。

“今天，”我写道，“我因不注意打碎了一块玻璃窗。玻璃太薄，而我又用劲大了一点。所以，我犯了一个大错误。玻璃是属于人民的。犯人理应为人民生产财物，而不应该破坏他们的财物。我要求政府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赵看守把我叫到屋里，他很不高兴。

“这份检讨不能令人满意，你检讨的重点不对。因为玻璃太薄，所以不应该怪你；倒是要惩罚生产玻璃的人。还有，监狱也不该买这种薄玻璃。你说你太用劲儿了。是啊，你在劳动时是应该用劲的。可是，你也承认你劳动时没有集中注意力。为什么你不集中注意力？鲍，是不是你对政府不满？干活时精力不集中就是你对政府不满。对政府不满你就毁坏玻璃。我要你回去重写一份检讨，明天给我送来。”

挨了训，我精神恍惚地回到号子，再次和戴商量。大约和他谈了10分钟，我就拿出笔来重新开始。

“我特此进行交待，”新的检讨是这样开始的，“1960年8月14日，我犯了破坏罪。在劳动改造过程中，我毁坏了一块玻璃。我精力没有放在干活上，而是在想别的事。”

我用同样的思路写了两页纸。末尾，又写上坚决请求处分。当赵看第一行时，先是一怔，接着吃了一惊，

“这是谁写的？”

“我写的。”

“谁让你这么写的？”

“是你，看守。我想如果我有胆量打坏玻璃，我就同样应该有勇气去承认它。”

赵盯了我好大一会儿，看我是否在开玩笑或有意挖苦。

“行啦！”他最后说，“这件事就了啦。但是，我要把你这份检讨保存起来，等你以后如果再犯错误就拿给你看。我看到你有所进步很高兴。”

“老兄，你又帮我安然逃脱了。”当我回到号子时对戴说。

他咧咧嘴笑了。

“这些年来我也该学乖了，不是吗？”

当我们熬到了暖和的春天时，我开始感到越发的虚弱。而且，一阵阵地发烧，次数越来越频繁。而各种事情接踵不断，真是祸不单行。一天下午，当我把一块很重的钢块夹到车床上时——我没抓住，这块该死的东西砸到了我的脚趾上。从当时的疼痛中我知道是骨折了，我非得上医院去不可了。胳膊夹着铺盖卷，我一拐一拐地穿过庭院。担心我伤势的赵看守陪伴着我。

“对大跃进来说，这太糟糕了。”我低声抱怨着。我对自己不能参加生产，确实感到心烦意乱。

“别发愁，”赵向我担保说，“他们不会让你住长的。现在你有时间了，还是好好地休息吧！”

一个护理员把我领到一间宽敞整洁的房间，里面有四张

铺着草垫的木板床。我放下铺盖卷，坐了下来。马上有一个戴白口罩的护士——可能她感冒了，想避免散布细菌——急匆匆走进来，告诉我把铺盖卷给她。这个铺盖卷在她们医院是太脏了。我很高兴地照办了。自从被捕以来，我第一次享受到躺在真正的被褥里。

整个住院期间，尽管我那受伤的脚趾恢复得很正常，但我的体温一直很高。显然还有什么别的毛病。最后，谭医生（主任医生）给我诊断为结核。谭医生的案情令人感兴趣。他自己就是一个犯人，因逃往香港未遂，来到了清河。

解放前，他是一个极为成功的、颇受北京外国侨民欢迎的私人开业者。尽管他是地道的中国人，可是他第一个就读的是法国教会学校。以后，又在上海震旦大学学医。我很高兴和他用法语谈话。（这是严格禁止的。不过，第一监狱是个比较宽松的地方。）没多久我就知道了他的经历。他曾经与一名西方外交官联合策划了一个看起来是巨大的逃跑计划：找一个正当的借口——传染病或其它这一类借口——外交官正式要求允许谭作他的陪伴照料他的健康，直到抵达香港边境前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广州。他们认为到了那里就可以找到只要给钱就能带他越过边界的行家。谭很不幸，不知怎么的警察得到了关于这次带有风险的行动的消息。他们在广州谭所住的旅馆房间里逮捕了他。后来当外交官在晚上找他时，外交官遇到了一种奇妙的、象小说家卡夫卡和奥威尔描绘的一个场面：

“谭医生吗？”“从来没有谭医生在本店登记过。”“先生，你肯定弄错了。”“你要看看登记簿吗？”

谭医生* 被判了20年。他是一个古怪人物，属于那种官方的强制灌输对他们似乎完全不起作用的那类少数人。一个拒不改造的反动分子。人们总可以看到他对扬声器里的最近通告和生产统计，进行冷嘲热讽的对答，似乎在同这些无形的代言人对话。当然，他是被批判斗争的一个固定对象。可是没有一个人怀疑他的医术价值。他的这种医术经常使他逃脱厄运。当一些大人物病得很厉害，而谭在狱外的一些同行们需要进行确诊时，就经常有警察来找他。当局认为他无可救药，但有使用价值。

当谭告诉我X光片子明白无误地表明是结核病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法语问他，我必须明白它有多严重。

“Je suis foutu? ” （“我会死吗？”）我问他。

“On te soignera, ” （“人们会照顾你的。”）

他许诺着，“我们会照料你的。”在第一监狱发现结核算我的运气好，因为至少这里有一些好药。我开始定时服用“雷米封”并搬到了一间大的结核病房——我们14个人每人都睡在大的单人床上。

我搬入大病房住了2个月。就在这一段安静舒适的时间里，我遇见了顾，并彼此成了朋友。在以后的劳改营生活中，我们俩共同度过了一段最苦的日子。事实上，在1961年大饥饿时期，是他照料了我，使我恢复了健康，是他救了我一命。由于顾几乎有6英尺高，我们都叫他顾大个。顾是个高尚的人。

---

* 谭医生得知他提出在北京市区人民公社工作（这样离他家近一点）的请求被拒绝，并且刑满后必须继续留在监狱工作以后，上吊自尽。

6月13日，这种安逸生活发生了变化。那日，我们正在洒满阳光的庭院里坐着。医院管理人员和两名看守还有身穿褪了颜色但挺干净的绿军上衣的两名不知姓名的官员一齐来了。他们谈话声音很低沉，并且还记着笔记。肯定要倒霉，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我们要调动了，”有一个人说道，“每回他们用这种眼光看我们时，准是要转移。”

他说得真对。四天以后，来了一个犯人积极分子，他把我们的储蓄簿递过来，让我们核对一下里面的金额是否对。即使在医院里我们每月都有5元钱的零花钱。我简单地认为这大概是要把我们送回原来的号子去。但是这种如意幻想，看来是不现实的。当我瞧见重伤员们也都拿到了他们的存款簿子时，我明白我们要离开了。第二天，我们被送回号子，清理我们的东西。

当大下巴臧前来告别时，我正在吃我在第一监狱的最后一顿午饭。

“他们要把你转移出去了，”他告诉我，这话打破了沉闷的气氛。“我猜想路会很远的，鲍。”

臧——这位坚韧的老犯人，执意要给我一些临别赠言。他很难过，但他忍住了。他显然认为他是我的兄长了。

“我要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美好事情，鲍，记住：不论他们把你送到哪儿，事情都不会轻松，也不会有什么改进，更不会给你钱花。你要考虑的是人们喜不喜欢你。在劳改营中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在用桶掏大粪。如果你对别人友好，而且人们喜欢你。他们就会帮助你摆脱困境。这是在劳改营中能侥幸混过去的唯一方法。要记住这些。”

他穿着一身结实的蓝工装，扎着宽皮带，和我握握手，

然后就快步走开了。他回过头来，再一次地向我招手。我感到很伤心。后来，劳改营中的一位前红军官员，一个挨了批判的很好的共产党干部告诉我，共产主义者最害怕的就是个人间的人类情感。这种感情是他们永远不能完全控制的，而且它会阻碍对他们所从事的有危险的事业的忠诚。

徐是负责教育与惩罚的看守。他向我们宣布官方通告。他说，考虑到我们都是病号，政府决定把我们送到一个更适宜于康复的地方。我们需要的是充足的新鲜空气、阳光和新鲜的食物。所以，要把我们送到清河劳改营去。

这可是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都曾听说过清河。有小道消息说，那里工作轻松，可以吃到丰富的食物。我们真的被感动了。

清河就是清澈的河。我们很快就要沐浴在它那清澈的水中，出水时就会成为健康的人。徐把我们送回医院，指示我们就政府对我们的照顾进行讨论。那天直拖到深夜11点，我们才被召回。尽管这么晚，气温仍在华氏100度上下。警卫们命令我们穿过有聚光灯照明的院子，走到紧挨着青少年劳教所的另一个庭院里。在那里有12辆大客车在等着。除一辆外，其它车都已装满了人。我们这些伤病号们上了那辆空车，没人说话，没人吸烟。一个看守上来站到驾驶员后面，对我们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在火车上要守规矩，不准低头，如果谁要上厕所，向看守打个手势——四指握紧伸出拇指。可以吸烟和说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看守奉命可以开枪。

我们的车队终于出发了。当我们的车轮滚滚穿过死气沉沉的市区抵达永定门火车站时，大约是凌晨3点钟左右。

车站月台上混乱不堪，几千名年龄不同、身材不一的罪犯（其中很多人拄着拐杖，还有一些瞎子。）围着水龙头在

抢地盘。一排排的警察鸦雀无声而又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点名后我们一批批地依次排好，等火车进站后上车。车厢被涂成绿色，很漂亮，崭新而有光泽。我们很讲排场地奔向劳改营。

最后当我们离开北京时正是凌晨 4 点半钟。太阳开始升起。那是1960年 6 月18日的清晨。在朦胧的晨曦中，列车不停地行驶了 2 个小时直达天津。在天津，为了让其它火车通过，停了15分钟。等火车再次启动时，阳光已普照大地。我们沿着辽阔田野飞速前进。

当我们最后停车到站时，我们的车厢正对着一个巨大的标志牌，上面用粗红笔写着："禁区"。

这里就是茶淀火车站。我们爬下来到木制平台上。对着我们的是另一个标志牌："清河国营农场"。牌子两边地方很大，对称地堆满了干白薯片。我想它们可能是喂猪的饲料，但是我错了。

第 十 章

顾大个和我站在密密麻麻的约有2000人的犯人群中，等着有人来通知我们该干些什么。当我们刚一下火车时，我们这些人就被赶到了铁路路基下面一块很大的凹下去的操场上。这里以前可能是一片旧水稻田。阳光热得令人厌燥——正值中午，气温可能有华氏90多度——细微的浅色尘土悬浮在空中，涌进了我们的嘴和鼻子。到这时，著名的清河农场已经和我们曾经编织的那些美好幻想毫不相干了。

终于，一个穿短裤带草帽的看守爬上了从车站搬出来的一张桌子上。他说，由于我们正赶上收割麦子的高峰，而且粮食年景不好，没有车辆给我们使用。除了跛子和截肢者外，其它全部人员都必须步行到营地——距离22.5公里。我想，这倒不错，每个人都必须要长行军了。那个看守命令我们，路过老百姓村庄时要低下头来，眼睛不准东看西看。

我们三人一排和第一批人一起出发了。这支队伍一定有1000人。第一个钟头，由于我们和路基平行，路基挡住了视线。所以看不见很多东西。但后来我们拐到一条高出来的路面上，从这里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我们曾听说过的大旱所带来的后果。仔细看来，大地并不象清晨我们从火车上看到的那样茂盛、翠绿。我们经过一些葡萄园，葡萄叶子已经泛黄、卷曲。接着，我们走进了一直伸延到地平线的田野上，田里主要种植的是玉米，庄稼秆虽然是浅绿色的，但叶子已经变

成棕褐色了。谷物发育不良，也不结果实。1961年的饥荒正处在酝酿之中。

太阳升高了，天气也更热了。我在头上平铺了一块手帕以挡住一些阳光。但是，大气仍热得让人受不了。视野以内没有一支小鸟甚至也没有一个昆虫。天太热也太旱，自然界的生命都动弹不了了。远处有一排树荫和一些电线杆子。在一条路上，偶而露出一个骑马的警卫侧影。尽管在饥荒时期，警卫们的马仍然饲养得好好的。警卫们必须能够走得很快。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接近正午时，我们进入了第一个村庄。村庄居民是一些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人，他们创建了新的农业单位。象所有的中国公社，也象苏联的国营农场一样，这个农村也以鲜艳夺目、隆重的大门来显示他们的存在。大门是两根红砖柱子，中间安一块胶合板，上面写着"清河农场"。两边的柱子都在红底上写着白字：左边是"劳动不讲条件"，右边是"劳动不计报酬"。村内还有小型补充标语，号召是"一切为了农业"和"一切为了丰收"。

一些小孩聚集在一起，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有一次，我见到一个老人大步走过去，嘘一些小孩回去。我莫名其妙地感到羞愧。我们是一些被放逐的大军。在村里的抽水井旁，我们重新灌满了自己的水壶，又继续前进。下午3点，我们通过了另一个村庄，但仍然没有东西吃。这里的庄稼是水果和麦子。但如同早些时候路过玉米地所见到的一样，它们都奄奄一息。我们被炎热和疲劳弄得昏昏沉沉，只好缓慢地走着。阳光直射下来，稀稀拉拉而又泛黄的麦子上反射出闪烁的太阳微光。吸一口气就象吸火一样。

4点半左右，我们终于看见了远处的营地。从我们的有

利地形看去，它只象一些暗红色斑点，旁边耸立着一个类似世界各地礼拜堂塔尖的细高建筑。我知道这不可能是教堂。随着越走越近，我看清了那是一座象别的建筑一样用红砖建成的水塔。我们营房给人的总印象是一种19世纪的工厂或磨坊。长方形的院子被高大的砖墙围起来，墙上装有电网，墙被一条壕沟包围着。院墙的每个角都有看守塔，桥和大门处于中央部分，上面照例是一块宣传板。

宣传板提出："让我们争取劳动和思想改造的双丰收"。

我们整队过桥，进去后走到一座未完工的礼堂高墙边上。礼堂顶上架着一个巨大的红五星。在我们的左上方，还有三条标语挂在水塔的侧面。上面写着："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我们周围是一排排砖墙圆顶、一面靠墙的平房，象被栏杆围起来了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住房。每间可容纳20个人。

看守告诉我们可以坐下，晚饭前休息。顾大个和我四处走动，仔细看了我们的新居。它又脏又乱。营房是新建的——我们是第一批居住者。——但是一切还都未弄完，仅仅是大致完工。很明显，还必须要我们去清理。

"嗨！看这儿！"

说话的是我们一个从医院来的同学。他站在伙房那儿，发现了一块宣传黑板。在黑板下端用粉笔写了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

"由于今年收成不好，必须减少伙房口粮的配给。在有新的通知以前，犯人的主食应是：小米、玉米、白薯干相掺和的食品。"

原来在火车站外边的那些成堆的白薯干不是给猪吃的……

晚饭时，我们每人分到了两勺面糊糊菜汤——一种菜粥——和五个小米面、玉米面和白薯片做的小窝头，窝头黏黏糊糊的，还有点甜味。

"难道他们就指望我们靠这个干活啊！"顾惊叹道。

"也许明天他们会多给我们一点。"我说着，但自己也并不怎么相信。

我该怎么形容紧接下来的那10天呢？它们肯定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10天。回想起来，它们就好象是某种我必须经受考验的特殊磨难或启蒙。究竟要考验些什么，我并不明白。但是，必定与艰难的生存有关。

那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然而，我们这一列车的人匆忙被送到清河来显然是帮助抢救这次损失重大的收割的。劳动力和机器都随叫随到，以尽可能地从枯萎的庄稼中多收获一些。我们在麦田里只干了10天，但这是地狱般的10天。每天早晨4点，就被锤子打在一段铁轨上的"叮咚"声弄醒——这是劳改营普遍用的一种报时钟——伴随着从大喇叭高声放出的滑稽而不谐调的中国音乐，我们洗漱后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5点钟就到了地里。那里有一个斜眼的农业技术员和几个看守在等着我们。他们从装工具的车子里取出短把镰刀递给我们，我们就开始按规定的架式开镰收割——不能坐着也不能蹲下，总是要弯着腰，一次3撮麦秆，18撮扎成一捆，要捆扎整齐。当然，我们都有定额。但是，第一天没有一个人（甚至以前当过农民的）能达到定额。休息时，我们喝着有些温乎的绿汤。这是伙房用菜煮的水——据说，它也许包含了某些营养，但是大家仍渴望喝上干净清凉的水。午饭是有甜味的窝头和汤。接着，从12点到3点是强制性的午睡。我们都得闭上眼睛，尽管太阳和蚂蚁使得我们不可能入睡。

规定就是规定！

接近收获中期，有一天，当我边干活边认真地考虑自己的身体能否支撑得住时，顾走来，给我带来了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的东西。他利用警卫不在的瞬间，来到我身边，那时我正在打麦子，对别的事毫无察觉。顾大个弯下腰，好象他也在割麦子；同时从他的衫衣下面拿出一件东西，那竟是一个小西瓜！

“老顾，这东西你究竟从哪儿弄来的？”

他不说话，轻轻地咕哝了一声，接着用他的镰刀把西瓜砍成两半。

“甭问，”他说着，脸已经埋下去吃那又凉又红的西瓜了。我们埋掉了剩下的西瓜皮。

“感觉好点吗？老鲍，”

“嗯，好一点。”

“你知道吗？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吃的。”

顾大个是个好“清扫工”，是我曾经有过的最忠实的朋友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我不可能在劳改营里活下来。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的早上，顾和我以及其它30多人，从集合好的一排人中被叫了出来。其它人都干活去了。看守没来以前，我们围坐在一起抽烟。看守要我们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他有事要对我们宣布，他一开场就是不祥的词句：

“政府关心你们的福利。你们的健康状况不容许你们留在这个农场继续干活。我们要把你们送到一个有较好的医疗设备而且口粮也较充分的农场。”

顾大个和我面面相觑。无法相信这些话。上午7点我们

过桥离开那里时，我们警惕起来，准备应付各种情况。目的地并不远，几小时就可以走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北元宝村。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村以“死亡劳改营”而闻名。不过，侥幸的是这次顾大个和我到那里仅仅是为了过渡。

我们精神十足地走着——不管怎么说，我们逃避了平日上午的艰苦劳动——离元宝村还有几里路。当我们到达后，我们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那里没有墙也没有看守塔，而只有一片红砖平房、一个大的土压场地和一个地面不平的篮球场。当然也有更多的标语：“人人都要参加技术革命”和“试验就是生产”。然而，这里的建筑物并不是给我们住的。我们继续往前走，到了村北头的一个大门。这才更象一个监狱的院子。前面我们经过的那些出入自由的建筑，是给自由劳动者及其家属们住的。

我们自己的院子，这里有几小群老人——简直看不见年轻人——他们正无精打采地以各种各样的动作显示他们还活着，其中很多人正用纸做的苍蝇拍打苍蝇，然后，小心谨慎地把它们装入瓶中。苍蝇是有用的。当时正在开展全国性的消灭苍蝇的运动。没有其他事干的犯人每人每天都要消灭50个定额苍蝇。超额打死的苍蝇可以存起来，用来换烟。

一个看守终于从一间房子里走了出来，处理我们的事情。就是他，也是一副可怜的样子。他只有一支胳膊，衣服比烂布稍好一点，而且看起来又脏又不整齐，就象一个贫穷的农民。他冷淡地看着我们，领我们进入一间泥地长形房间。房内堆满了杂志、报纸和少量书籍——这是图书室。

“我姓王，”他说，“我是队里的一个大队领导。把你们送到这里加入老弱病残队，并不是说你们可以不干活。你们当中能干活的都要干。”

他给我们交待了关于我们住房、劳动定额和吃饭等事宜，接着把我们带到一排用竹席子搭成的临时性小棚子里。在那里我们把铺盖卷放下。棚子并不怎么样，但至少可以挡住太阳。我们去伙房吃午饭，一碗菜汤和一小块切成六段的象巧克力颜色的窝头。窝头是黑豆做的，因为没熟，粘糊糊的，手拿不起来，只好用勺挖着吃。一个瘦瘦的老头，穿着肮脏的白裤子，好奇地盯着我们。他晒得很黑，骨瘦如柴。我们说话时，他露出了大黄牙。

"你们这些家伙吃的是头等粮食定量！"他惊奇地大声喊叫着。

我对他的打扰很不耐烦，想嘘他走开。但是聪明的顾却微笑着请他和我们坐在一起。

"给支烟抽怎么样，伙计？"老人很高兴地接受了顾的邀请。

"老鲍，给他一支烟，"这是顾大个的一种诡计。他自己不抽烟，需要时就问我要一支。

"你在这多久啦？"

"6个月了。"老人回答道，"我有病。"

"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出不去了，伙计，一条道走到头啦！"

顾大个扬起眉毛，很吃惊的样子。而老人继续无动于衷地说道：

"这地方专门收容在其它劳改营派不上用场，只吃不干活的人。一群被刷下来的！这里没有医疗条件，我们多数人是好不了啦！"

他高兴地大口抽着烟，愉快地享受着这一片刻。

"不过，除了吃的，别的还不算太坏。"他接着说，"活

儿不算太多。说真格儿的，我们很多人根本不干活。可以相互聊天，休息休息。直到……这你也明白。"

他微笑着并用手臂做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动作。

"你们这些家伙吃这么好，真运气。他们准是有什么特殊的道理，要让你们身体有劲儿。我猜是为了让你们干活。"

老人猜对了。我们被送到死亡劳改营，就是因为这里的大部分犯人不能干活。而不管怎么样，有一些活儿又非干不可。

老人的预言当天下午就得到了证实。一个姓冯的大队长分配我们将土运到制砖场。当晚，我们在小茅屋里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挑出挖土和抬土筐的人。10个体弱的人去挖土，其余的两人一对抬50磅重的筐。第二天早晨我们一直睡到6点，才被人叫醒。

"嗨！睡懒觉的家伙！"当我们去伙房拿汤和窝头时，炊事员大声吼着。开始干活了。两人一对抬着筐，只走100码左右。初看起来这活儿似乎还比较容易。没有人发愁达不到定额。可是时间一长，筐就变得越来越沉。抬到一个地方，我要抬筐的伙伴休息一会儿，我走到水井那里想把垫肩用的破布打湿一下。一个犯人积极分子，正懒洋洋地倚在墙边。

"我用水泵抽点水打湿一下这块布，行吗？"我问道。

我做的很周全。在狱中干什么事最好都要先请教一下。

"你知道怎么用。"他轻蔑地耸耸肩说，"你要我给你抽水，还是怎么的？"

"我只想别破坏了规矩。"

"你没破坏什么规矩，如果你破坏了，我会告诉你的。"

这个北元宝村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这里简直没有什么纪律，没有定额，也几乎没有什么警卫人员。这些都不需要。

大多数犯人不是瞎子就是跛子，或者虚弱的都走不动。而我们这些体壮的人又不想将我们现在干的活与刚刚经历过的收庄稼活对调一下。所以，一切都很正常。我们到这儿4天之后，独臂看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告诉我，鲍。被捕前你是干什么的？”

“看守，我是给使馆当翻译的。”

“一个臭知识分子啰！我就是这么猜想的。当然你也是一个反革命了？那你进来要呆多长时间？”

“12年，看守。”

“你要出去也容易。改造象你这种头脑比大粪坑还臭的人，我们挺有办法。等我们把你改造过来时，鲍，你就成为一个新人了，有新的干净的头脑。不过，改造自己就必须下决心劳动。我们只能做一半事——另一半要你自己去做。我负责政府交给我的任务，决定调你去第六小队。你立刻就去。回去吧！”

当我告诉顾大个，我要调离建筑队时，他说我很幸运，我的新活肯定比较轻松。当晚我收拾起自己的衣物搬到第六小队。向南走四所小茅屋就到了六小队。为了这个，我很高兴。因为晚上我可以经常见到顾大个和其它一些人。在劳改营里，朋友是最宝贵的了。

六小队的头头是个50来岁、秃头、圆脸的犯人，姓叶。他有礼貌地用温和的普通话欢迎我到小茅屋，他甚至还向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

“大家注意啦！”他说，“这是我们的新同学，叫鲍若望。我希望大家都欢迎他，明天劳动时帮他一把，让他尽快地熟悉起来。”

“叶是个好人。就是在第一监狱，也没有一个号长或小

队的头头说过这么得体的话。但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紧接着他的温文尔雅的言词，就是让我和新同学们一起参加一次小斗争会。我们的斗争对象坐在房子中央的一个旧板凳上。他大约26岁，长得又瘦又小，黑色大眼睛，皮肤晒得很黑，穿得破烂不堪。当时，他戴了一顶类似棒球帽似的有沿帽子，这是他用各色布拼凑起来自己做的。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可怜的人了。他似乎对最坏的情况都准备逆来顺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潘福康——我们叫他小潘。这样可以把他和姓这种常用姓的人区别开来。我猜想小潘是个混血儿——四分之一白种人血统，四分之三中国人血统。我忘了为什么把他送到劳改营来，如果公安人员一开始就给他判死刑还好些。他始终也适应不了被监禁和粮食定量。他生活在死亡的恐怖中，这竟使他越来越退化成一个儿童。我碰到他时，他的举止已经象呜咽抽泣的婴儿，甚至还会变得更糟一些。我们都喜欢小潘，想方设法帮助他。但是毫不见效，几个月后，他死了，嘴里还叼着一块饼。

那天晚上的斗争会开了不到半小时。没有一个人真心参加，少数几个号友敷衍塞责地指责他劳动态度不好、装病、借发牢骚来诽谤政府。不过，这些话只是为了取得大队头头的欢心。叶宣布斗争会结束，并让文书将潘抗拒坦率而诚恳的批评记录在案。

第二天早上，为了喝碗菜粥，我们六小队5点就起了床。直到那时我还未弄清我们的活就是收集猪粪。我们是积肥员。我心灰意冷地跟着叶到猪圈去，距猪圈100码我就已经闻到了粪的气味。

“别担心，”叶和蔼地说，“你慢慢会习惯臭味的，要不了多久你就无所谓了。”

我好象要呕吐，几百头打着呼噜、哼哼的大黑猪，在争抢犯人向猪槽扔下的土豆皮、野菜和杂七杂八的剩汤剩菜。很难断定什么东西闻起来最臭，是剩汤剩菜？猪？还是猪粪？猪场是砖砌的，象一个天井。所以，一点肥料也丢不了。猪圈是成排的斜顶棚子，每天都要用铁锨铲入一些干净的沙土，仔细地把这些棚子清理一番。我们干的活是把被猪弄得又脏又臭的沙土从棚子里铲出来，再把这些湿乎乎的脏玩意儿扔到边上的沟里，加上稻草（或麦秸）拌匀。猪粪、猪尿很快地与草一起发酵，变成一堆令人讨厌的、肥沃的黑色高级肥料。然后我们把这些粪肥用铁锨挖出来堆成堆。我们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真是多种多样。

10点钟时，叶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一时刻，是因为这时叶教给了我一个制造劳改营式香烟的秘诀。我正要点燃一支普通香烟，他突然制止我。

“等一下，”他说，“你这样太浪费了。”

他把我的香烟拆开，将烟丝倒在犯人们随身携带的一小方块报纸上，再从一个小布袋中掏出数量相等的干的野薄荷叶和烟丝混合在一起，卷成两支粗大的香烟。他递给我一支。

“给你，”他笑着说道，“抽一支薄荷味的烟。”

这一天剩下来的时光，过得很轻松，我对自己能如此快地习惯令人讨厌的猪臭味感到惊奇！快到傍晚的时候，“独臂”走过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检查。正当我弯下身来清除掉在我鞋上的一块粪便时，他看到了这个情景。“独臂”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意识对比的机会。

“你在干什么哪？”他的声音很尖。

“把我鞋弄弄干净，它搞脏了。”



"你脑袋比它还脏，闻起来也更臭。马上停下来，这是资产阶级习惯。你需要的不是清除你的鞋，而是清除你的脑袋！"

由于旱灾，农场生产自给的食品供应已陷入困境，农场管理人员被迫请求政府帮助。这是一个窘迫而又困难的形势。农场领导们为了最大限度地削减他们对政府的需求，制定了寻找代用食品的方法。从那个星期以后，我们的食物就加进了野菜、水生植物和别的植物，掺和着吃了。两个班被派出到地里收集各种可吃的植物秆茎和叶子，其余的人继续干活。我特别记得我们把它叫作"马儿菜"的一种茎类植物。它煮熟后看起来有些象绿色的意大利实心面条，略带酸味，但显然没有什么营养价值。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用野菜喂猪。

第一天劳动后，除我以外每个人都换上另外小心放着的一套干净衣服。我没有其它衣服可穿，叶把我带到图书馆给我解决问题。原来，图书馆员还管分发衣服。他是一个值得结识的能人，一个高个儿老头，姓熊。他戴着角质镜框眼镜、穿着白色衣裤和黑鞋，因而特别显眼。熊把我带到图书馆对面的储藏室里。那里面有很多旧衬衣和旧裤子堆在一堆旧鞋旁边。我每样东西抓了一件。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从中国政府得到的衣物。

熊是个可爱的伙计，他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他是因为偷窃才被送到这里来的。

"我偷了好多东西。"他得意地说道。

他忙着打算盘。接着，拿出一张纸条，写上我的名字又加上一些数字。

"这是在干什么？"我好奇地问。

"是你下个月的零用钱，2元。你是7月1日来的，7月15日可以拿到你的津贴。要是你活儿干得不坏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么多钱。要不，我们就会扣掉些钱。"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津贴？"

"不，只有干活儿的才有。不干活的人每天只有6英两粮食定量。我们这里的规矩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鲍的话多少有点夸张，但和事实出入不大。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张表，上面有些纵横的小方格。

"是墓地，"他平静地说，一边在整理着材料。"我们把名字写进每一块小方格内，就可以记录谁埋在什么地方。"

他办事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样子很吸引人。"坟墓是事先挖好是吗？"

"不是，鲍。"他宽容地笑着，"如果事先挖好，就会被冬天的泥土填满，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现挖的。"

"谁去挖呢？"

"有一个自愿参加的小队，我们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小队，因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

"他们不把尸首送回家吗？"

"噢，是的，可以送。的确可以。不过只有家属提出要求才送——但家属要花钱。一旦人死了，政府就不再对他承担任何责任。你死后就不再把你看成犯人了。"

几天后我碰见顾，他看见我这一身破衣服，闻到我发出的气味，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他们现在让我看牛。我想我会在那儿呆下去。老鲍，我不是一个瞧不起穷人的势力眼。不过，你身上那难闻的味，比他们还糟糕。"

他捂着鼻子走开了。

这种滑稽的场面很开心。但是在这里并不多见。大队里的理发员事件，使我们迅速地回到服从纪律的现实中来。我意外地得知，在北元宝村我们有一个理发员。有一天叶把我带到他那个地方。一间大的方形屋子，用土砸实的地面，还有三张木头椅子。理发员是个40来岁的矮胖子，说话结结巴巴。他按军人的发型给我修剪，一面剪一面和我愉快地聊着天。他告诉我，他是被指控有道德问题而关进来的。但是，我并没有问是属于那一类道德问题，他也没有仔细讲。当我享受刮胡子的安逸时，聊天也聊不成了。

"你以后不要在理发员那里呆这么长时间了，"叶回到小茅屋提醒我说，"他是一个坏典型。"

这种话由叶说出来，是很奇怪的。他是一个聪敏的受过教育的人。他很少用政治教义来困扰他自己。这没关系，我没有和他进行争辩。

我在猪场的劳动越来越成为一种常规活儿，我已经毫不在意了。有一天，分配我们把大沟里的发酵肥料掏干净，我的表现达到了某种最高点。我们用沉重的木勺把又黑又臭的粪肥装到柳条筐里。但是，我感到在打滑的沟边弯下身子把勺弄满很费劲。我向另外两个犯人学习，简单地一跳——粪肥就齐腰深了。正当我使劲地把周围的肥料向上扔去时，那个曾经把我有知识的大脑比作粪坑的王，慢悠悠地来到猪圈。

"不错，鲍，"他很高兴地说道。"你在进步。我知道你正在学习一门课。这很好。就这么继续干。"

可能是因为得到"独臂"的批准，没有几天，我就被分配去干看护菜地这种轻松活儿。我的全部工作，就是坐在树荫下看看书，保证没有一个人溜进来偷东西。这是一个极为

轻松自在的闲差事。上午11点左右，王看守的老婆提着一个篮子从门口进来。我看我的书，没有说话。我们不允许和任何女人交谈，更不用说与那些自由人，当然更不准我们和领导者的夫人交谈了。她摘走一些西红柿和茄子，一句话也没说就回去了。当天晚上，回到小茅屋后，一个警卫来叫我，说“独臂”要找我谈谈。

“坐吧，鲍，”他说道。一副十足的校长样子。“现在告诉我，今天你做错了什么事？”

我们又在玩那套老把戏了，“看守，我不知道。”

他瞪着眼睛说：“不要撒谎。你知道撒谎会有什么处罚。”

我茫然若失地看着他。

“你今天在菜园干些什么？”

“我看一本书。”

“好。”

“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没有人偷任何东西。你妻子来过。拿了一些茄子、西红柿。就这些。”

“所以，还是发生了事情，是不是？你甚至还知道她拿了多少，是不是？她交钱了吗？”

“看守，我不能阻止你妻子。”我争辩着。但是，他进一步说着他的论点：

“我要你阻止任何人——甚至包括我！这些蔬菜是国家的财产，不是我的。你懂得应该怎么办了吗？”

他弯下腰来，拿起他老婆的篮子。

“拿去称一下菜的份量，查一下价格表，看值多少钱。要保证给我记上账。”

他叫我走了，我也完成了这桩小小的商业手续。后来，

我时常纳闷儿他到底是怎么处罚他的老婆的。共产党干部有时也许是一类令人头痛的人；但是，他们是我遇到过的办事最认真、严格的人。

7月25日，来了一大批新犯人，有300多人。他们是一帮看上去很可怕的家伙。

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再也不允许我们留在北京了。"我能明白这是什么缘故。看起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身强力壮的。有些人甚至躺在担架上。剩下的大多数人不是拄着拐棍，就是相互搀扶着。很明白，把他们分配到北宝村就是等死来的。

我突然看见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以前，在旧日的外交圈子里，他是某西方国家大使馆的佣人，和我是旧相识。他的问题就是他对自己的雇主过于忠诚。警察要求他对使馆人员进行侦察监视，他拒绝了，因为使馆人员一直对他很尊敬。对中国警察说"不"字，这不是个好主意。我还在北元宝村时，他就死在那里了。

我在猪圈劳动期间，我的好朋友顾就象他在农场三分场麦收时那样，始终想方设法帮助我解决困难。他是一个寻觅食品的大师，有一个星期他创造了某种记录，先弄来一只小鸡，接着搞到一个刺猬。他和我以及其他几个朋友，分享了这些美味。这当然是反革命行为，不过没多大关系。顾大个用农民传统的方式来烹调这些动物。先取出内脏，然后把它们周身涂上厚厚的粘土作成一个泥球。泥球在火上烤几个小时，然后把它打碎，把土从烤鸡上剥下来，羽毛就连土一块去掉了。稍加上些野蒜和从马食槽里弄来的一些盐，就会把这只烤鸡做成令人难忘的美餐。

10月的第一个星期，我终于做了手术。当然没有麻醉，

而且医生也不是针灸行家。医生切开疖子引脓时，我疼得只能咬着一块破布。虽然如此，手术还是成功了。在"独臂"给我的5天休息时间里，我自我感觉每天身体都在好转。我围着住处闲逛，在图书室看杂志，度过这段时光。现在，我可以用专业工作者的眼光，从熊的墓地表格上注视埋葬尸首的进展情况了。

10月13日，我到野地放猪。这时，叶告诉我看守要见我。我回到院子时，看到看守办公室前面停了一辆木制马车。顾大个站在那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独臂"告诉我，因为我们劳动积极，态度端正，我们要转回到第三农场。我们（我和顾大个）是罕见的例子，到北元宝村，几乎是有去无回；我们属于能活着回来的少数人当中的两个。

"珍重！"老叶说道。他来给我们送行——继续奋斗。

"没问题，叶，"我说道，"祝你走运。"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叶。我推测他终于被埋葬了。

第十一章

这次我们在清河只呆了一个星期。顾和我被派去挖灌溉水渠，但这仅仅是为了消磨空闲时间。在10月2日那个多云的下午，当负责管教的看守集合全体囚犯到大礼堂开临时会议时，我们才得知紧急转移的真正原因。这个礼堂在我离去后的3个半月中差不多已经完工了；舞台四周是醒目的标语和口号。当大个子和我就座时，我们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些陌生面孔——是从北元宝村新来的，他们告诉我们，今天上午刚到这里。他们大约有百把人，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转移来。看守向大家介绍一个穿棕绿色军上衣和蓝裤子，身材高大的男人，他是清河农场的副场长。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大声讲，“你们将要到东北（满洲）去建立一个新农场。你们这些人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将担负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光荣任务。”

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宣传员要求大家“赶快鼓掌！”我们就以豪爽的中国方式拍起手来。

“过几天政府将发给你们棉衣，”副场长继续说，“你们可以给家属写信，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让他们到这里来。你们在四天内出发。”

在通知后那么短的时间内，任何人都没办法把家属带到这儿，但这一姿态告诉我们，可以让家属来探望。

“这是大喜的日子，”他接着说。我觉得自己象一个参加十字军远征的士兵。“你们要自愿参加，但你们不能都去，要经过审查，看谁合适。”

我随着人流涌到一个拿着钢笔的看守面前。我自愿报名去著名的兴凯湖——“兴起热情之湖”。

接着的几天，我们很自然地反复谈论着有关的美妙传闻：北方粮食丰富，满湖都是鱼，树林里有野猪和浆果，田野里长满了大豆、稻子和水果。但是以前曾在那儿的几个老手给我们描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他们说，因为不管穿中国什么地方制造的靴子，脚都会冻坏，所以囚徒们在冬天要穿手工做的草靴。那儿生长一种特殊的草，叫做“乌拉草”。诀窍是把这种柔软的乌拉草衬垫在草靴内面，用它吸收潮气就可以防止生冻疮。那里冬天最冷时气温降到摄氏零下40度，气温在零下30度以下时，就不要求囚犯在户外劳动。劳动定额每周按7天计算——在兴凯湖没有假日。夏天，硕大而凶猛的蚊子满天飞。同它们共处的唯一办法是头上戴着面罩，手上戴着手套到田里去——中国事实上已经成功地消灭了苍蝇，但蚊子仍公然向他们挑战。这对于那些感到憋不住要上厕所的囚犯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农场的工人很快学会了在他们脱下裤子的时候，点燃一把冒烟的草，但较凶猛的蚊子还是会进行袭击。当然，在夜晚没有人敢光着身子睡觉。

从好的方面来说，土地是那么肥沃，不需要任何管理——实际上人们曾把这肥沃的泥土装上火车，运到比较贫瘠的中国中部地区，不必加工就当作肥料。那里4月下旬开始解冻，10月上冻。在这期间的几个月中，种稻子和大豆只要在田里撒下种子就行了，在黑油油的肥沃土地上不需要人去

管理，种子就能发芽。

24日，我们1700人挤进卡车被拉到茶淀车站，这段22公里半的路程，我们曾在太阳底下走过。当我们的列车往北驶去时，我们看见清河的最后标记是“第三石灰窑”的一块标牌。长长的旅程开始了。

我们每人带着一个铺盖卷，里面装有一件6磅重的、胸前有扣子、腰间有带子的黑棉袄，一条黑棉裤，一双用绿色橡胶和帆布做的长筒棉靴和一顶带有护耳的皮帽。因为火车上没有暖气，顾大个和我马上打开包裹穿上棉衣。那天我们只在沈阳停了20分钟。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们就到了中国最北的大城市哈尔滨。这个城市是在沙皇时期由俄国人建造的。我们在那儿停了2个小时。透过烟囱冒出的烟雾，我们在灰濛濛的晨曦中能看见远处东正教教堂的半圆形屋顶。

终点站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城密县。到站时，四五十辆带帆布顶篷的俄国莫洛托夫牌军用卡车已经在等候我们。我们挤进卡车，要向北行驶10个小时去转运站。每辆车的后部都有两名战士警卫，每隔5辆卡车有一辆吉普车随同，吉普车上载有更多的士兵。我们在车内尽可能舒服地在冰凉的铁板上休息，看那乡村田野飞闪而过。临近晚上8点时，我们到了转运站密县。这时天色渐渐昏暗，空气凛冽而清新，可以清楚地看见星星。这地方的一事一物都给人以充满活力、办事效率高的印象。在半明半暗的阴影里，只看见一排排对称的，大约可住60人的帐篷。每个帐篷里点着一盏油灯。在明亮的厨房帐篷里，笑嘻嘻的民工们慷慨地给我们盛出两天以来的第一顿热饭——一盆难忘的面条，上面厚厚地堆满黄豆。虽然我们冻得直打颤，我们还是感到兴高采烈。在满洲似乎一切都很丰富，一点也没有监狱的味道。我们发现那里

的老百姓很愿意用味道浓、质量高的本地烟草跟我们交易，随便用什么交换都可以。我恋恋不舍地拿出自来水笔换了半磅烟叶。大个子虽不会抽烟，也换了半磅。在劳动营里烟叶比钱还重要。我们匆忙回到宿舍帐篷，满意地钻进铺在夯实的土地上的草堆里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当铁锤敲打铁轨时天还墨黑。民工给我们盛出掺着洋葱的玉米粥——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味。大个子和我急忙把粥喝完，在每个人都盛完以后，我们仍站在木桶边。意想不到、令人高兴的是炊事员又从桶底给我们盛出一份——在监狱里吃到第二碗！

那天，从上午早饭后到下午，我们一直沿着新修的、维护得很好的土路往北走。这时我们早已处身在广阔的农场营地范围之内。在我们四周，不仅可以看到耕地，而且还可以看到营房、瞭望塔、村庄和正在干活的其他囚犯。在还没有完全收割的菜地里，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大的大白菜。看来一切都井井有条，照管得很好。我们的警卫并不企图阻挡我们东张西望，也不禁止我们谈话和抽烟。看来很明显，兴凯湖不是一个把意识形态看得比劳动更重要的地方。

我们在下午4点钟到达农场。建筑营最近胜利完工的砖房看来相当坚固和舒适。当我们的卡车停下来时，我们惊异地看到住在这儿的囚犯们已经安排好欢迎仪式。在大幅横条上写着"欢迎我们的新同学"，周围都是微笑的脸和热情的招手。他们喊着兄弟般的致敬口号，敲着小鼓和嘈杂的铜钹。西方人会觉得这些很有趣，但是我们确实深深地感动了。习惯于被当作卑劣的臭虫对待的我们，确实受到了象英雄一样的欢迎！这里有准备好的一桶桶热水和泡好的茶。当我们从卡车上跳下来时，他们递给我们香烟并主动帮我们扛

铺盖卷。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囚犯可能有如此高尚的行为么？我不相信。

喝了一杯茶，分配好营房之后，我们又被集合在一起去听一个身材粗壮的干部讲话。他身穿蓝色棉制服，羊皮大衣，头戴棕色皮帽，帽上突出地佩有红星。

“这里是第九农场，”他说，“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它位于兴凯湖最差的地段。这个农场是为那些愿意格外努力，以表示对政府感激的人们建立起来的。从那时起，我们修建了菜地、果园和大豆加工厂。我们还饲养猪和其它小家畜以提供一些肉类。我姓徐，我不希望你们有任何麻烦，但是你们必须知道我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的，如果你们有思想问题或坏思想需要谈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是，要遵守规定。因为你们需要休息，明天不劳动。但是你们要利用这个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后天开始的劳动做好思想准备。

徐看守讲完话后，我们吃了一顿第一流的饭：加有洋葱的黄豆烧猪肉、白菜叶玉米粥。有一个本地囚犯给我抽一支用本地烟叶做的烟，我刚吸一口脸色差不多就发白了。这种烟味道极强烈，我从来没尝过。

“你最好把它同葡萄叶混在一起。”他开心地说，“开始抽是有点不好受。”

第二天专门用于学习。我们从老犯人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冬天怎样难以想象地冷的情况。不可避免地讲到更多关于冻死人的事。建筑营留下来的一大杰作是所有房间都能够传热。一排砖房的墙与墙之间留有生火的空隙。床——就是在砖砌的炕上放一块木板——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传热。在图书馆里的光荣榜上，有10名囚犯的照片。他们在1955年为了

扑灭灌木丛的火灾而牺牲，在死后得到赦免。这就告诉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精神。

第二天早上开始的劳动是轻松愉快的——把将要收割的大白菜散开的叶子捆起来。没有规定指标，只要求我们尽可能凭良心辛勤劳动。减少口粮的规定是因为劳动态度不好，而不是因为产量低。为了报答这种宽宏大量，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劳动。我现在明白如此好地对待兴凯湖的囚犯是非常聪明的。口粮短缺是建立不起兴凯湖农场的。由此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人驱使和强迫奴隶劳动而终于失败。在田里干了几天以后，我为能生活在这荒凉的土地上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15天后，我失去了我的新天地。这天，有人通知我去见徐看守，说有要紧事。徐看上去很严肃。

“我有责任告诉你，你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狠狠地说，“其他两个人也是这样。我现在不想告诉你是什么事情做错了。但我要你回房间去好好想一想是什么事情。明天有北京来的人同你谈话。”

我万分惊恐，“是我过去的事吗？”

“不，是你被逮捕以后的事。你明天要老老实实回答一切问题，害怕也没有用。”

当我回到牢房时，看见大个子和另一个姓齐的同学也被叫去。到底是什么事？我一夜不得安宁，想解开这个疙瘩。第二天上午9点钟，有两辆吉普车来接我们，我紧张得要命。我们乘车30分钟到达第九农场场部。这是一座相当新的、有突出木檐的灰色砖房。警卫把我们推进铺有木板地面的候客室。室内中央是一个铁炉，墙上挂着毛泽东像和中国地图。一个战士在墙角喝着茶。我们在室内等着。

10分钟后，一个警卫把我带进一间房子，里面有个身穿蓝色呢制服的干部，坐在一张普通的桌子后面，他浓眉下的一双眼睛正审视着我。徐看守和他在一起。他们叫我坐下，但是，我不需要低头。

“你是外国人，”穿呢制服的人说，“一个法国人。为什么从清河转移时你没告诉他们？”

原来为这事，我感到放心了。

“我不知道我应该说明这点，我同其他人一样是自愿来的。”

“我们并不责备你自愿来，但你应该先和看守或监狱长谈谈。”

“这没有用，”我声明说，“5个月以前，我从第一监狱转移出去时，我告诉看守：我是法国人。他说国籍不管事。所有犯人都得听从政府的命令。”

“国籍很重要，”他粗暴地说，“送你到这里来是错误的。到房间去把你的东西收拾好，准备回去。”

大个子和齐受到同样处置。他们不象我持有外国护照，但他们都出生于所谓“华侨”家庭——他们的家属已出国工作并已定居国外。显然那时候中苏边界是一个微妙的麻烦地点，现行的规定是不允许外国人或家属在海外的人进入兴凯湖的。10月29日，我们三个人垂头丧气地乘火车南下。

顾、齐和我以及两个警卫战士乘火车回清河时占用了整整一节车厢，由此可见中国警方何等谨慎小心。我们在旅途中保持绝对沉默。我们三人之间因为心有余悸而不敢谈话，而与警卫人员谈又显得太谦卑，所以也不想谈。

在茶淀车站有一辆吉普车等候着我们。除了天气更冷一点而外，这里一切都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们三个人被送到

第三分场，编入由两个姓杨的看守领导的临时大队。为了区别两个杨看守，我们分别叫他们小杨和老杨。我们在三天里做了杂七杂八的打扫卫生工作。接着全营组织调整，我们被编入第五大队第一小队。我们小队有16个人，差不多各种人都有。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混血儿，姓陆，他四分之一是美国人。学友宋，是我在第一监狱时就认得的。他很漂亮——我不太愿意用这个词。他属于在中国男性中相当常见的那种柔美型。体态优美、颀长，很象米艾·法罗。但他极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是全营最好的劳动者之一。他过去曾是京剧院的学员。

林是我们队里仪表非凡、不同寻常的人物。他是一个魁梧有力的老人，年纪在65岁左右。在20年代他曾是一个军阀将军，后来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他有宽厚的胸脯，满洲式的胡子，剃着光头，象是通俗的中国传奇小说中的人物。他的故事很悲惨，我们不久将会提到。

梁是上海富裕家庭子弟。他的家在解放前夕逃到香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留下来，结果被判罪、逮捕，送进监狱。他家偶尔给他寄些食品包裹。由于他们对劳改营不了解，在包裹里经常装满奢侈品——腌制的美味，香皂，糖果之类。有一次他甚至收到一大听鹅肝酱。只有一次我看到他收到包裹特别高兴，里面是两磅重的一听精炼的猪油。猪油很有用——可以加在汤里，使汤好吃些。

还有两个会讲英语的知识分子，一个姓顾，是年轻的北京学生。另一个叫吉米·秦，后来成为我的好伙伴。他毕业于剑桥大学。他认为教英语应该使用英国教科书，因而被捕。小潘也回到了我们这里，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他已从北元宝村出来了，但这一点也没有使他更幸福。现在他经常不

满、抱怨。

顾大个子被指定为室长，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他是这样一种难得见到的、忠诚可靠的人。每个人都主动信赖他。他的副手是陆。大个子担任了一项最容易但又最麻烦的工作——伙房工作。他负责管理划分和分配口粮。那年秋末，当粮食变得异常紧缺时，他为我们做了他可能做到的一切。但他的善意并不能帮助我们减轻饥饿。

还有一个老孙。他曾是一名警察和好的共产党员。他毕业于警官学院，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但追求肉欲把他毁了。他长得非常漂亮，身体结实，皮肤白嫩。他的眼睛很大，不是中国型的眯眼，身上一定有一些土耳其斯坦血统。

水。

“我从前也习惯于那样，”孙悔恨地说，“总想得点功劳。我过去惯于向上司报告村民放了多少屁。我们警察吃炖猪肉、鸡蛋和大米，老百姓吃窝头。我们一个星期吃二三次肉，他们一年只吃二次。当我看到警卫那种人，我倒比较愿意留在这里。至少我们是诚实的。我们的生活标准比老百姓好50倍。我们有自己的专用伙房，有我们需要的香油和豆油。而国家把我们称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天晓得。”

孙有关食油的评论特别中肯。食油对中国人的营养是最最重要的。监狱或劳改营或公社的口粮毫无例外都是用多少食油来规定的。食油给人以力量，没有食油就不能干活。在那个困难时期，农民的食物只能是经过煮或蒸来吃。通常只有粮食和菜，几乎吃不到肉。一个农民杀了一头猪，如果被发现就会从农场直接送到劳改营来。政府利用一切精巧的说服力竭力推荐粮食代用品。例如，1958年和1959年红薯大丰收，中国1分钱——不到半分美元——就能买到1斤（1.1磅）红薯。农场甚至用赊帐的方式赶紧卖掉红薯并将它们送出去。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赞扬红薯营养价值高——热量超过大米，蛋白质超过小麦——的文章，以及各种食用方法的建议。有红薯面包，红薯薄脆，红薯饼以及各种红薯点心。有一次回到审讯中心，我们被允许用便宜得出奇的价钱买了一堆堆红薯。大量红薯必须在腐烂以前吃掉。两天里我们这些饥饿的囚犯过量地塞进了这些该死的东西，结果腹泻又使我们病倒了两天。

1960年和1961年我在清河时，红薯的收获平常。突然报纸开始叫喊红薯肯定对健康有威胁，会带来胃病，甚至糖尿病。因此要人民免受其害。这就是给你安排的经济计划。

红薯使我生动地回忆起那年秋天我亲眼看到的一段小插曲。当时口粮紧张已成为灾祸。有两个囚犯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争吵，其中一个大喊：

“你不要脸。”

这句话对中国人来说是很大的侮辱。它的意思是无耻，下贱，卑鄙。另一个人——我认出他是我的学友，名叫雷英方——只是说，“我饿。”

我走近一点，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雷从垃圾堆里拣来一些一半已经烂掉的红薯皮，在水龙头下冲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心安理得地掰开来吃。雷不是一个漂亮的人——他那圆圆的脸，又厚又肥的鼻子，实际上极象猪。——但他知道怎样保自己的命，并不拘泥于小节。象孙一样，他也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他犯过错误，并被送去劳教过3年。然而他的顽固性格使他继续进行批评性的评论。有一天他被视为累犯转为劳改。后来雷教给我好多有关找食的方法。我终于成为一个善于找食的人了。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一直运砖，直到严寒降临。因为除了穿在身上薄薄的夏衣外，我没有什么其它衣服（暖和的满洲式服装当然在兴凯湖被收回了），小杨要我在没有弄到适当的衣服以前呆在屋里。在强迫休息期间，他减少了我的口粮，但仅减了15%。小杨是公正的。我用这段休息时间闲坐、阅读和学习中文。

一天下午觉得烦闷，我决定去探望专门住老人和病人的房间。虽然它是这里除看守的住房外，仅有的生火的房间，但实际上是一间没有希望的囚犯牢房。他们躺在草上等着。我记得一个衰老的牧师象小孩一样在吮吸着糖果。他存有一点糖果，整天数来数去。他从许多包糖纸中拿出干净的一

张，举到眼前透过玻璃纸来窥视我。另一个人在织短袜。还有一个人用贮存的烟草卷香烟，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再卷起来。除了吃饭、睡觉，不管什么事，只要能消磨时间，他们就做，直到死。

陆副室长终于给我弄到了一些衣服。第二天我就能去劳动了。他扔给我一条右膝有一块橄榄绿大补钉的裤子。有了这条裤子和一件旧棉袄，我的服装就全了。

“这些是从哪儿弄来的？”我问。

“他不再需要这些了”，陆说。

我回到田里同林，我们的“军阀”一起拣白菜叶。与这样一个精力充沛、非常乐观的人在一起是非常愉快的。在我心中始终保留着这个坚强的老军人在田里劳动或使劲用铲挖水渠时的形象。他用一根绳子在腰里把裤子扎紧。他的棉袄常常不扣，以使劳动时凉快些。他是在刚解放时被逮捕的，判了10年刑。林对劳改营的情况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在思想冻结以前，他喜欢给我们讲无穷无尽的以前的故事。他说当初劳改营并不太坏，几乎象男人的俱乐部，每人努力去做他那份工作。

“最初我以为劳动有损于我的尊严，”他说，“没有人驱使我去做任何事情。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仍尊重我从前的军阶。警卫们对我说，什么都不干会感到烦闷的。他们说得对，但最初并不觉得如此。我不愿劳动，经常在小河或水渠周围闲逛，寻找螃蟹和鱼来消磨日子。当人们从田里回来时，我已煮好一桶螃蟹等着他们。这后来成了一个习惯——偷偷地到各处去看我能找到些什么，用这些东西来补偿我在田里应做的那份工作。这样继续了两个月。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干的活比我想象的多得多，因此我到警卫那里要求让我去

田里干活。

“‘我们可没有马给你使唤，将军。’他们对我说。

“我说没关系。我去劳动了。我花了一段时间才习惯并坚持了下来。劳改营使我懂得了劳动的价值，因此我感谢他们。”

我们都喜欢并钦佩林。我们差不多象他一样，盼望他从劳改营释放。作为我们一伙的老前辈，他的判决在那年圣诞节到期了——到那天刚好10年。他就要成为一个自由劳动者，实现他的梦想：不死在劳改营，而是在家同他儿孙在一起。这是他最喜爱的话题之一。

释放前一星期，我们牢房奉命要给他作出集体评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在思想上宣布一个囚友出狱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应在林服刑期满时对他的优点发表意见，以便决定，从我们看来，他是否真正得到了改造，是否应该得到政府的宽大。经过8个小时，我们的小文件写好了，林得到了很好的鉴定。我们把这份文件传阅后签上名，送给看守。

两天后，一个星期六，警卫叫林到看守办公室去。15分钟后他象遭到晴天霹雳那样，带着惊愕的神色回来。他打开房门，一声不吭地靠在门框上，冷空气直冲进来也毫无知觉。他的脸色告诉我们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但没有人敢问。终于他走了进来，坐在床上，两眼发呆。我们默默地看书、抽烟。到晚上他终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有些很痛苦的事要说，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多么盼望我毕业，但恐怕还得等一段时间。当我去见看守时，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从人民法院来的人。他说我从来没有老实交待，说我在服刑的这些年里，一直在欺骗政府。当我问他认为我有什么罪时，他控告我屠杀群众。”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告诉我，在抗日战争

时期，我们团里的一些人在一个共产党村庄大屠杀。我知道有许多那样可怕的事情。他讲那次屠杀时，我根本不在那里，我已经离开，而且团的指挥权也在另一个人手里。他们凭什么控告我？他们说我仍然要承担责任，因为我是负责人。他们将调查那件事，并将让我知道政府决定采取什么措施。”

1961年1月5日有了答复——再监禁20年。老林一下子垮了，送进了医院。约一个多月以后，他出院回来，但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了。他几乎不说话，也不想干活，经常喃喃自语地徘徊在农场周围。后来，他们终于把他带走了。

同一时期，已是结核晚期的小潘死了。他死前的唯一愿望是要一块饼，我们帮他做到了。

当秋去冬来，我们的粮食情况越来越糟。由于歉收，在中国，粮食根本不够吃。作为社会的渣滓，我们囚犯自然只能处于不利的地位。雷英方的一半腐烂的红薯皮似乎不再那样令人厌恶了。象在北元宝村时一样，正式的找食队早就建立起来了。他们搜集的野生植物和菜，现在干得象一堆干草，成为了我们主要的口粮。把它们掺在汤和窝头里，虽然不能增加营养价值，但至少增加了体积。过去常吃的玉米粥成了只在节日吃的奢侈品。现在每天的伙食是发黑的、粘湿的红薯面包。有时掺上豌豆面或粗糙的连皮磨成的小米面。监狱主管部门委婉地称之为“非传统杂粮”。好一些的日子，汤里有一点生胡萝卜块或白菜、萝卜——这都属于一级菜。从来没有肉或脂肪。

11月，有两个大队的劳教人员来到我们劳改营。他们有600人，看来身体都不太好。他们名义上被当作公民，但实际却和我们干同样的活，吃同样多的口粮。这使他们中间的

一些人感到不满。他们提出了控诉。一个姓刘的看守把我们全体集合起来，在礼堂里给他们训话。

“我收到了你们一些人的控诉。你们有权控诉，因为你们还是公民。但你们好象忘了劳教人员都犯有严重的错误，否则你们不会到这里来。劳教人员在这里应该用艰苦的劳动来弥补他们的错误。至于在农场领导方面，只能有两种管理方法——一种是对那些从来没犯过错误的人；另一种是对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你们这里所有人都犯过错误。对我们来说，劳教、劳改都一样。现在你们回去劳动。”

关于控诉一事就到此为止了。在那个月，有一小段时间我被派去打扫马厩。与猪相比，马闻起来象香水。我们偷一把盐时，马从来不会控诉。在劳改营里总是有一袋盐的。在马厩后面的贮藏室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甜菜窖。我们把甜菜藏在棉袄里带回房间，吃起来又甜又辣。

在所有劳动中最艰苦的是用两轮车为各种建设项目运砖，两人一辆车。因为绳子容易磨破薄棉袄，我们临时做了布垫肩。就是把破布块缝在一起，做成象早期足球运动员的护肩那样，中间有个洞，可以把头套进去。用剩下的旧帐篷，做成帆布鞋罩，可以防止泥土和小石子进入靴里。同样的帆布也可以做成干粗活时用的手套。象西伯利亚的苏联囚犯那样，我们用绳子紧紧地扎住袖口、裤脚管和腰部，把宽松的衣服密封住，千方百计防止身体上的热量散失。

1960年秋天特别冷。在11月的最后一天，农场场长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一些新的措施。当然，首先要唱一些高调。

“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他以老练的理论家的口吻开始说，“国内，产量从来没有这么高，并且正在集中一切力量克服仍然存在的经济困难。1961年的好转是有保证的。国

外，帝国主义的日子不长了。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都面临着失败。我要给你们说的是，你们比以前更应该感激政府。政府认识到我们正在渡过暂时困难时期，这种困难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不正常因素造成的。”

“听他说，”孙低声说，“我敢打赌，他就要讲到再次减少口粮了。”

“你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困难时期很快就会过去。同时，党和政府知道你们的身体没有以前好。因此，考虑到口粮水平，决定要劳逸结合。不多休息一点，就没有足够强壮的身体去承担在春季一定要完成的大量工作任务。从明天12月1日开始，你们的劳动时间是从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钟，因为在寒冷的季节，无论如何在上午10点以前出工是困难的，到下午4点半天就黑了。但在社会上，工人是没有这样舒服的。从现在起，你们只要劳动6小时，但是，政府是关心你们的福利的，你们的口粮仍然保持原有水平——相当于9小时劳动所得。我们希望你们在6小时内干9小时的活，以此表达你们对政府的感激。

由于新的规定，生活的步伐变慢了。有了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和较多的睡眠时间——也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但这并没有使我们强壮一些也没有减少饥饿感。供应的食品仅能维持生存。在收割白菜的最后几天里，我们全体动员起来，到寒冷、泥泞的地里赶在下雪使菜烂掉之前，把白菜全部收回来，搬进地窖。在地窖里面的情景是有趣的。每当警卫不注意的时候，所有收获者都把自己的面孔钻进肥大的白菜里，象小兔子一样把菜心啃掉。

一天下午，当我站在烂泥地里摘白菜并自言自语的时候，有人蹒跚走来，在我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我几乎失去

平衡，便带着怒气转过身来。当我看到是吉米·綦时，我不得不转颜为笑了。他穿着一套破烂而且不合身的黑色服装，蹬着一双长筒胶鞋，戴着一顶他自己做的鸭舌棉帽。看起来象个魔鬼，但透过他的钢框眼镜却在眯着眼睛笑。

“高兴起来，老朋友！”他用英语说。我显然没有那种心境。

“有什么可高兴的，吉米？”

“约翰，只要想我们多幸运——我们每天有的是新鲜色拉，只缺一点蛋黄酱。”

当时綦判了20年徒刑，没有出去的希望。他已经老了而且身体不好，然而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看来他甚至并不懊悔从英国回到中国参加革命工作，而革命却把他送进了监狱。

“他们如何对待你我是无关紧要的，”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已经过过好日子了，约翰——我们可以追忆过去的生活。而这些可怜家伙大多数一辈子受苦，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们仍然是善良、仁慈的人。虽然要他们憎恨知识分子，但他们总是把我当作有身份的人来对待。有一次，我在移交处折叠书页——我是折得最慢的一个——在我后面的一个穷苦的普通工人，看见我肩膀上有一只虱子，便停下折纸，替我把虱子捏死。他可以不那么做，他知道我的经历，但他没抓住它来反对我。对他我真是感激得要掉下泪来。”

在那个冬天最糟的日子里，我变得非常消沉。我对綦说，我已经放弃了出狱的希望，情况不会比现在更坏了。但是吉米，这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优秀辩证学家使我的思想清醒。

“情况不会比现在更好了，”他宣称。

“吉米，不要做游戏，”我表示异议。“你是一个机灵鬼，但你头脑里有些错误思想。”

他笑着说：“约翰，我给你证明。我们正在吃，对吗？虽然吃得不好，但我们是在吃。现在我们想要额外的窝头或许一些肉，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情况不会比现在更好了。就这些。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最好的了。而情况可能变坏——如果明天我们生了病，他们会把我们的口粮减去一半。这样情况会更糟，难道不是这样吗？”

秦对我诡秘地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

“这是一个扭曲了的世界，约翰，悲观者向前看，乐观者向后看。”

第十二章

到11月底，我已经熟悉了清河农场的生活规律，成了内行的囚徒。我以为懂得了怎样在肉体和精神受到考验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我的确生存下来了，但事情比我所想象的更为艰巨。恶劣的气候，艰苦的劳动条件，精神上蒙受的屈辱，甚至由于大量削减口粮所造成的半饥饿状态，这些我都能承受。但是对于周期性疾病和虚弱的侵击，我和其他人都无能为力。不可捉摸的命运老是捉弄人。

在劳改农场最后13个月中，我深深体验到的一系列个人经历和人生遭遇，使得以后我重新参与的外部世界的生活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微不足道。在我脑海中浮现的种种景象是我亲身经历的，或他人告知的，也有偶尔获悉的。这些景象出现在这里好象万花筒那样杂乱无章。

在1960年临近圣诞节的日子里，有两件小事今天仍然记忆犹新。这两件事并无任何联系，平淡无奇。它们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是我想，它们能说明当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人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每年在那个时候，给田里施肥是最重要的任务。劳动的班组天天变化，完全取决于谁在场和有力气能出去干活。一天下午，孙和我两人用水浇灌一个大的积肥坑，把一桶桶水浇在稻草和粪上，使其发酵。我们默默地干活。每人用一根扁担挑两个桶，从水沟到积肥坑摇摇晃晃

地来回走。干这个活是又脏、又冷、又臭。后来我们已经饥肠辘辘，筋疲力尽。这时候孙放下了水桶，木然不动地站在那里，在他脸上露出不堪忍受、痛苦万分的样子。因为孙是我们中间最强壮、最能吃苦的人，这使我感到更为惊讶。

"鲍，你说，"他迟钝地问，"你认为我还会吃上一顿饱饭吗？"

"当然啰，孙，"我机械地回答，"当然会。"

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难以乐观，他的样子很脏。

"什么时候能吃上顿饱饭，鲍？"

可怜的孙，可怜的我们，我们继续干活，再也没有谈论那个问题。

就在那一段时间里，有四五天我被派去同另一个牢房里姓邵的合作，用车把肥料运到田里。我现在还记得他送给我的圣诞礼物。

邵也许是清河农场最强壮的囚徒。他的社会职业是三轮车夫，解放前就干这一行了，那时他还小，在北京帮他的叔叔在后面推车。他的样子很滑稽，在中国人中算是个高个，宽阔的肩膀，脑袋老是剃得精光，有举重运动员那样的肌肉。往往就象身高体强的人那样，他在我们中间是最和气的，好象害怕自己体力过人因而回避冲突。他胜任各种劳动的能力是全营闻名的。但他不去追求超额完成任务获得成绩，而是经常将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一部分算在体弱的囚徒头上，使他们能保持口粮数。当然这种思想是不对的，但没有人——至少没有看守——去查问他。

几天来，我们一起推两轮车。我们随意交谈，回忆在北京时两人都知道的地方。象大多数文盲那样，他对丰富多彩的细节有极好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他所喜欢的某些三轮车乘

客原来是我在海军陆战队的朋友和同事。他记得他们小费给得很多，而且在他们的大节日通常给他礼物。

就我所知道的人中，邵有最好的视力，因此他成了清河农场拣香烟屁股的冠军。人们管他叫“雷达眼珠”，他有奇妙的窍门去发现警卫人员或自由工人扔掉的香烟屁股，即使在别人已经搜寻过的地方他也能找到。冬天来临，真正的香烟同食物一样越来越稀罕。意外地发现一个香烟屁股，不仅可以当作交换其他物品的货币，而且对于最后吸着香烟的人来说，也是消除劳改营生活无穷烦恼的一种难得的享受。（中国人的烟瘾都很大，毛泽东每天大约要抽50支香烟）。

圣诞节那天，北风大作，而天气干燥、晴朗。邵和我把肥料撒在麦田里，从早晨干到下午。差不多到下午3点钟时，我们蹒跚地走到避风的田埂，在太阳下歇息，我们仰卧在地上，注视着天空。

“鲍，外国人的大节日是在新年前一个星期吗？”

邵的问题在那时是如此出乎意外，使我犹豫了一会儿，以便弄清思想。他不知道圣诞节这个名称，只记得有送礼物的礼节。当我说他计算得完全正确时，邵从黑棉袄中掏出一个用报纸方方正正包好的小包，递给我。

“这是给你过节的东西。”

我对此十分惊异并且疑惑不解，但还是接受了。在纸包里是一支一英寸长令人喜爱的香烟屁股。我自然地问他是否合着一起抽。但他不要，说这是专门给我的礼物。那天晚饭后，我抽着这香烟来庆祝圣诞节。

虽然在饥荒条件下，过新年仍有适当的会餐。12月30日晚，顾大个子从伙房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好极了，有好消息告诉你们，”他说，“政府好不容

易给我们准备过个好新年。”

“大个子，你现在倒学会了宣传鼓动？”有人说。这种话确实不象是他说的，他可能感到在这种场合要表示得隆重一点。

“大个子，别说套话，”我说，“我们是否有更多可吃的？”

“正是，”他说，“每人一块年糕，蒸熟后大约1公斤重。”

在那种条件下，我们认为这相当好了。

“每人二两肉，还有一些蔬菜，”他接着说，“二两糖，两块饼，这就全了。”

我们毫无怨言。考虑到国家当时的情况，这样已经是很慷慨的了。30日那天，我们高高兴兴地干活，盼望着当天的晚餐和元旦的午餐。那天晚上，象大多数人那样，我向杨看守祝贺新年好。

“别感谢我，”他拖长声音说，象小孩一样的脸绯红起来。“要感谢政府，只要规规矩矩，接受改造就好。我也祝贺你们新年好，希望你们得到政府尽可能的宽大。”

这回新年会餐的汤里有带肉的骨头，我们用牙齿嚼碎后全部吞下，再用一勺水冲在碗里，把水也喝了。当晚没有学习会。我们回去睡觉，感到接近饱食的无上幸福，而且肯定明天将会有更好的一餐。

我以看守所说的更高思想水平进入了1961年。我的再教育是成功的，并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相信看守所说的话，尊重警卫人员（至少尊重其中的大多数人），并且相信即使政府并不真正爱我，至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合情合理的办

事，在困难时期尽量保持我和同伴们的身体健康。我也很了解，我的行为尽可能符合法律条文，对我有莫大的好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是唯一有机会离开监狱，并且永远离开中国的人。但说实话，我从来不相信有这机会。然而，我不愿轻率地放弃任何机会。

但是，我坚持正直为人终于付出了代价。由于拒绝在田里找食或象其他人那样经常地偷食，我变得虚弱，容易疲倦，两腿感觉象棉花一般，而且老是头晕。于是去找马医生。

所有人都喜欢马医生。我见到他时约摸45岁。解放前，他开业行医十分成功，在北京西郊有一个自己的诊所。因为给一个党的干部妻子做流产手术，使他入狱。流产在中国是合法手术，但是那个干部怀疑他妻子不贞，控告马未获正式批准就动手术。我到清河之前两年他就来了。他设法把一间空牢房改成了诊所。

我告诉马，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但不愿免除劳动。免除劳动听起来是很好的，但是至少被迫休息三天，口粮也要减掉一半。马了解犯人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从抽屉中取出三个粉红色的小纸包，还有一个稍大的绿色纸包。

“每次饭后吃一次粉红包的，”他嘱咐说，“绿包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我建议在晚饭后，晚些时候用。”

回到牢房，我打开粉红包，将白色药粉倒进一杯水中，这是通常的阿斯匹林。由于好奇，我也打开绿包，我高兴地看到，里面是纯正的烟草，足够卷十支香烟。马医生懂得如何关心囚徒。在以后几天里，孙和我分享了这些烟。

随着食物的越来越匮乏，许多朋友采取的办法是自我控制：早晨吃一半窝窝头，保存下来的一半作为晚餐的补充。

他们把宝贵的食物装在小口袋里，用一根线串在袋口挂在脖子上，使漂亮的小袋接近嘴巴，并用彩色线绣上自己的名字。

进食的用具、餐具，当然各有自己的流行风尚。每个人的筷子有自己的式样。比较聪明的人把筷头削尖，去戳大米或窝窝头碎片，遇到节日还可以戳肉。很自然，受人尊重的筷子有使用者自制的布套，上面也绣着名字或姓名缩写。1961年头几个月，勺成为一时风尚——我自己没有赶这个时髦，因为我仍然使用着褐绿色铝匙。这匙是我在第一监狱时妻子带来的。各式勺子风格的冠军是我们的陆副室长。1月初，他用监狱里的传统工具——碎玻璃片，把丢弃的一截10英寸长的竹片削平、磨光。最初我以为他是在消遣。陆干了好几天，到2月份做成了式样精巧的两用餐具：一头是小刀，另一头是勺子。从那时起陆便使用他创造的餐具进食。先用小刀切窝窝头，再调过头来用勺子送进嘴里。我渴望有这样一个勺子，但陆要价太高——六支香烟。因此，好久以来我只得在没有这种勺子的条件下生活。直到有一天偶然发现陆的叔叔和我同过学，为了庆祝这一发现，他专门为我削了一支刀-匙。我带着它度过了监狱中余下的岁月。它成为我的仅次于汉英词典的第二件宝贵财产。当我获释并被驱逐出境时，警察不顾我的抗议，取走了它并把它扔掉了。他们说它对我毫无用处。这件餐具是如此精美，我还舍不得用它。陆可能花了20个小时才做成的。

1月20日，杨大队长临时召集我们在冰冷的没有生火的礼堂开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杨说，有一种恶意的谣言说：警卫人员和看守吃得好而囚徒们挨饿。为了立刻制住这种反

政府的谈论，他下令参观干部伙房。警卫人员把我们组成5人一队，带着我们穿过院子，走进伙房。那里气味很好，一切都不错。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也吃掺合着玉米芯的红薯粉，还有白菜和挂面，但没有面粉或肉。我们看到他们的伙食和我们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汤里的油多些。杨警告我们不准再有任何反政府的谈论，但保证囚徒代表只要提出来，可以继续参观伙房。从那以后，不再听到抱怨了。中国共产党员常常是非常狂热的，但他们坦率、诚实。

诚实并不能使我更加强健。当我踯躅在田里的时候仍然呼吸短促，头晕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我开始掉头发，指甲变得脆软，象在草岚胡同时一样。一天早上，我晕倒在田里之后，孙送我再次去找马医生。他查了血压后，口中啧啧有声，不愉快地叹了口气。

“鲍，你的情况不好，”他最后说，“我只得给你开长期休息。”

我吃了一惊，这肯定要大大削减口粮。我请求不要开。

“你的血压低得难以令人置信，”他告诉我，“你一直死按规定吃是吗？请原谅我问你，你去找过食吗？”

“不常找食，”我回答说。我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思想纯洁性。马透过深度的眼镜片注视着我，撅着嘴唇。

“不错，你是一个有尊严的人，鲍。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必须告诉你，这样下去对你是不利的。你的情况不妙。即使给你开最高级的病号饭，对你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对规定的解释稍灵活一些，有时会更好些。”

这些话出自一个职务上近于监狱官员的人之口，是令人吃惊的异端邪说。实际上，他劝导我造反，虽然是有限度的、私下的意见。

"这里有些人是无法挽救了，"他说，"我不愿你走上那条路。"

他指给我看一个从前我早已见过的浮肿病例。他是一个40岁光景的汉子，支撑着坐在角落里看报，似乎毫无痛苦，然而他的脚和腿肿得变了样。这是几个月来为了驱除饥饿而强迫喝水的结果。马私下告诉我，他可能永远不能走路了。于是我决心去找食。

第一天我从田里带回来的只是两只干瘪萝卜和几根白菜帮子，此外别无所获。宋，即"斯达哈诺工作者"，见此大笑不止。

"鲍，这不多呀！"他说，"我看开头时得帮你一下，跟我来。"

宋抓住他的小推车车把，直奔温室。我胆战心惊地跟在后面。他把小车停在门旁边，敏捷、熟练地环顾四周，然后拉我进了暖和而潮湿的温室。

"我们是不准到这里来的，"我傻乎乎地低声说。

"没关系，鲍，我们不是刚倒掉一车粪吗？自己抓一个萝卜。"

这里种着一长排鲜嫩的蔬菜。我找了一棵，看来很不错，就拔了起来。真是交了好运，这棵萝卜又大、又壮、又漂亮。我赶紧塞进棉袄口袋里。很快，我们就离开了。当晚，孙和宋嘲笑我丧失了思想纯洁性；我啃呀、啃那萝卜，味道真好。

"好吃，是吗？"宋满意地说，"从现在开始，要记住为雨天留一点口粮。"

为了做样子给我看，他打开他的口袋，摆出他找来的东西。有萝卜，菜叶，一些黄豆，甚至还有一小瓶用盐水泡着

的几片蒜头，这是科学的找食。当他到田里干活时，他甚至可以把部分贮藏物留下来。至少我们房间里的人关系很亲密，没有人想偷别人的东西。我正在学习找食，但是几天之后杨看守就当场抓住了我。那天，正当我打开找食袋时，杨出现在我们房间里。他命令我带着拣来的菜叶到他办公室去。我知道在那里至少要给我上堂课。

“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有体面的人，”他打开话匣说，“但是现在我看你和其他人差不多。你干了些什么？”他掰着指头一一列举：“第一，证明你对政府给你的待遇不满；第二，偷窃政府财物；第三，引诱他人从事犯罪活动；还有第四，不讲卫生。吃脏东西会损害你的健康。如果你明知故犯，就是犯了严重错误。我要你把这些东西统统扔掉。”

他穿着制服，严厉地站着，装出父辈的样子，其实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命令我立即扔掉拣来的食物，我极其愤懑而感到一阵冲动。

“杨看守，”我可怜巴巴地抗议，“请别那样说，我花了好几天才弄到这些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把我单独关禁闭好了，别让我扔掉食物。”

于是出现长时间的沉默，他默默地看着我，我的样子看起来已经疲惫不堪。

“鲍，将来你能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孩子，而不觉得羞愧吗？你可以度过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样贬低你自己的身份，怎样对得起你自己呢？”

“看守，在这里谈身份是另一回事，但你的地位同我不一样。”

“是的，”他安静地表示同意，“但我的胃也是血肉做的，鲍，跟你完全一样。回你的房间去吧，”他轻轻地挥挥

手，“把这些东西带走。”

我抓起我的宝贝拔腿就跑，心里充满着对监狱官的尊敬，但也带回满脸愧色。

在所有我亲眼见到的饥饿同规定的冲突中，最可怕的冲突是第四大队姓徐的囚徒。事情发生在春节的前一天，当时我正在接待室值勤。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一般是平淡无事，主要是给小煤炉添煤，烧喝用的开水，替警卫跑腿。警卫负责审查来访者，会见时在旁边看着，检查来访者带来的食物包裹，办过磅手续。原则上只准带5公斤，但象小杨那样通情达理的看守，很少去验查重量。那天的警卫是个死心眼的家伙，这种人尽找别人岔子。

他在那天的第一个来客身上得到了他希望获得的一切。这位来客是穿着军官制服的军人，带着沉甸甸两个包裹。警卫在毛泽东像下面的长桌旁接待了他。在长桌的远端放着一个钟和一个磅秤。

“我来探望我的哥哥”，军人说，同时出示劳改营领导批准他到这里来的探望证。警卫派人去找徐，这个徐是军人的哥哥，长得很英俊。他那塞在俄国式长统靴里的裤腿，黑色棉袄和围巾，特别是那满腮浓密的短胡，显出一副海盗的神态。当军人把包裹从桌子上推给他哥哥时，警卫就跑来阻止。

“我要检查，请打开！”警卫说。

他逐件仔细检查包内的东西，直到把所有东西象军人那样整齐排好队。一个袋中有罐头食品——鱼、肉、鸡、一瓶油，蜜饯水果，还有苹果和柿子。另一个袋中，是50个馒头，警卫点了数。

“只准给他带5公斤，”警卫以天生的官僚的口吻，得意地作出判决。当他准备把包裹放到磅秤上去时，军人提出抗议。

“就要过春节了，”军人说，“能否多给他一点东西？”

“不行，不能超过5公斤。”

“我老远从青岛来，”军人企图说服他，“剩下来的东西怎么办？”

警卫耸耸肩，对他的困境无动于衷，“带回去。”

“我是部队的，我想你可能也是。我们能否进行同志式的谈话？”

“我是部队的。”

可怜的军人毫无办法。他的哥哥不敢参与这场争论，一声不响，只是用目光来回地扫视着其余两人。

“那么是否可以让我去见见监狱领导？”

“去干什么？现在我就在这里负责。”

最后军人发怒了，不加思索地试图从侧面进攻。

“同志，关于这件事我要见见你的上级领导，”他坚定地说。

警卫一言不发地走了，充分相信这个争论的结局。

隔了10分钟，负责管教的刘看守和警卫才一起回来。显然警卫已经告诉他有关情况，因此他对怎样处理已经胸有成竹。

“喔、喔，有什么问题？”他皮笑肉不笑地问。

可怜的军人被串通好的表演欺骗了。他还以为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刚才对那位同志说了，我到这里来探望哥哥，每年

只有一次。我老远来看他，给他带些新年礼物。我知道超过了规定，请您这次破例照顾。”

刘的目光扫视着这堆食品，发出不满意的嘀咕声。当他抬眼回顾来访者时，已经准备好要说的话。

“这些全是你带来的？”

军人点点头。刘打开嗓门训斥道：

“你说你是部队的人？你有的是什么样的思想原则？这些好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当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农民和工人能吃到这些东西吗？因为你在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工人阶级作出了牺牲，供应你这些东西。他们是给你的，不是给反革命的！你不仅犯了错误，而且是原则性的错误。这个反革命不是你的哥哥。他是你的敌人！你带这些东西来是不是说我们这里待他不好？我还不想问你哪儿来的粮票买这50个馒头。”

军人知道他在思想上落入了圈套，现在他唯有等待结束长篇攻击，希望最好的结果。

“同志，”刘大声地说，“现在请你告诉我，你单位的番号和领导的姓名。”

他除了听从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因为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是符合共产党道德的。此外，刘还是公安部队成员。

“现在把这些东西全部带回去，”刘把笔记本放回口袋里，毫不在乎地说，“这个囚徒没有资格得到任何礼物。而且，他自己应对你说不需要得到你的任何东西，他这里不缺东西。是吗？”

“是的，当然是，”徐顺从地回答，“完全是这样。”

当我们进入第五个冬天时，对食物的发愁与对气候的经

常关心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人来说，冬季从12月21日开始，实际上有九九八十一天。三九和四九的温度通常下降到摄氏零下20度左右。这种情况引起我们的长期担心。按规定，无风天气温度在零下20度以下，或有风天气零下15度以下，我们可以不出工。每天早晨等待敲“钟”通知我们是否下地。不知有多少回，我与其他人一起躺着，穿好衣服，盖上被子，心存万一希望：温度下降一二度就可免于出工——就在那时候，一个犯人积极分子爬上挂着一段铁轨的大木架的梯子。当他用槌子敲响——老是敲9下——方圆几里都能听到。停一会儿再敲9下。

“出工！”一个看守就会喊道。我们就勉强拥出去集合。

我们的学习会时间自然伴同饥寒与日俱增。学习目的是使我们在长期室内活动期间思想不得空闲，增强对政府的信赖，尽可能忘却吃食问题。这些几乎没完没了的学习是中国人在刑罚理论方面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劳改营与苏联劳改营的主要区别。一个中国囚犯，实际上不让他独立思考。这种或那种学习占据了他每天的监狱生活。如果我仅仅偶尔提到这件事，只是为了避免重复。但是西方读者应该知道，没有一天是不学习的。

奇怪得很，劳改营的学习有时会变得具有戏剧性。我记得有一次学习会结果是一片混乱。那天给我们出的题目是“热爱劳动”，恰巧是在田里干了一天不寻常的苦活之后学习的。大个子主持学习会。

“我们每人谈一谈对热爱劳动的看法，”他说，“这回要有人帮我一起主持讨论。鲍，你开个头。”

“热爱劳动就是要忘记你的过去，”我说，“卷起袖

子，不管你周围的一切，集中精力干活。就是要超额完成政府的定额，任何时候尽最大努力，就是要毫无怨言，不要求特殊照顾。”

“不对，鲍，”宋不同意，“你没有解释好好干活的意义，你讲得象理论家，象臭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总是“臭”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常用词。象苏联一样，中国理论家真的蔑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讨人嫌地有自己的观点。

“热爱劳动是比政府要求干更多的活，”另一号友说。但宋一点也不满意这样的发言。

“不对，”他坚持说，“你们都错了。首先，我们所有人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是政府的敌人。当然你会说比政府的要求干更多的活，这些完全是空谈。如果明天刮七级大风，温度降到零下14度以下——不是零下15度，就是零下14度，该怎么办？我们吃过早饭全在这牢房里呆着。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不要敲铁轨是吗？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赎罪，并不是为了在房间里休息。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表示如何热爱劳动。刚才发言的两位囚徒并不热爱劳动——他们不过是表示热情而已。我可以打赌，他们在早晨都不愿意早出去15分钟，等待敲铁轨。这就是热爱劳动！对不起，我要说，我们这里没有人热爱那样的劳动。”

杨看守听了宋的发言，很不满意。象其他干部一样，他要到一个个号子查看学习情况，了解讨论的热烈程度。他得出结论说我们队的学习态度很不严肃，而且完全是用歪门邪道的理论来代替老老实实地在总路线范围内讨论。他命令我们暂时停止讨论热爱劳动，换另一个题目“社会主义好”。让我们在讨论前先考虑15分钟，整理思想。

这是一个错误，杨应该更清楚。我们白天为春耕准备搞得筋疲力尽。沉思冥想一会儿是最受欢迎的。几分钟之内我们大多数人都睡熟了。当杨回来检查我们时，门一开，在他还没完全弄清怎么回事以前，一股冷空气把我们都惊醒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的样子极为生气。

“我们，啊……在思考社会主义”，宋吞吞吐吐地说，但他不能令人置信。杨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们，双手叉着腰。

“如果我逐个问你们，”他说，“你们一定会装模作样地发誓说在思考，并且知道社会主义好。我了解这一点。但我也了解你们内心深处在说，社会主义没给我们吃饱。”

“你瞧，看守，”孙毫无讽刺之意地说，“这是你说的，不是我们。”

杨看看孙，叹了一口气走出去，消失在黑夜中。

几天以后，我们有机会来看看我们是否真正热爱劳动。那是给田里送肥料的时候。首先要把秋天和初冬浇水沤熟了的大堆肥料分散送到田里。所有车子都要派上用场，两人一辆，一人铲肥，一人拉车。还有别的小队也来撤我们堆的肥料。这种劳动看起来不太坏，关键是要10天内完成——送到每块田里，很多田地离堆肥处有二英里多路。每车至少要装满240斤。警卫还要检查，不准弄虚作假。每个人的定额是每天跑六趟。每块宣传鼓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漂亮的中国字标语：

“多装，快跑，快卸。”

地形极为不利，从堆肥处到田里的所有道路都是上坡路。除了选择最强的劳力拉车，最弱的装车，以便取得最佳效果外，简直一筹莫展。当天晚上我们只学习了一会儿，专门研究送肥的技术，就及早就寝了。

第一天竞赛，我们号子未能达标。原因是任务太重，时间太少。杨看守建议我们要早点起床。在以后九天中，我们在日出前到地头。第一趟运肥天色尚黑，等空奔回来时，才见晨曦初射。我们在中国阴历大年夜那天中午完工——不剩一块肥料。田里已作好春耕准备。我们的奖品——刚巧是庆祝春节而不是施肥竞赛——每人1斤大米，炖肉代替了菜汤，还有在礼堂里看一场电影。在黑暗里在我周围可听到囚徒们嘎扎嘎扎吃白菜叶子的声音，那堆白菜正巧存放在礼堂的另一角。

几个礼拜以后，我们第五大队解散了，合并到第四大队。我们大队除宋因表现积极而受到奖励，任第七小队队长以外，其余人全都并入新大队。宋在我们号子的铺位由牧师夏神父占用。他是多好的一个人呀！假如所有天主教牧师都象他，教会就永无危机。

夏彼得神父是从杨家泺来的特拉比斯特派修道士。他是一个矮小、瘦弱和皮肤黝黑的人，60多岁，显著的浓眉，头上只有一小绺银发。他来到我们号子不久，就在我面前提出危险的问题。我格外小心警惕，我只知道他可能是一个挑拨者。

“约翰是天主教的名字，”他软言细语地说，“那么你是基督教徒啰？”

他在我睡的床铺上看到写着我的名字，并且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习惯的那样译成了中文。我的中国名字第二部分是若望，这是天主教“圣约翰”的音译。我最好干脆躲开这个话题。

“这跟你没关系”，我告诉他。

“我的名字叫彼得”，他说。接着是沉默，他并不准备

再追问这问题。

那年冬天的一些日子里，夏神父在田里干活，虽然身体很瘦弱，却令人难以置信的非常尽心尽责。每当他有失误，做错事，或者干活干得不如最强的人多时，他总是不断地向我们道歉。

“对不起，耽误你们了，同学”，当他出差错时说。

我们都喜欢夏。经过几星期后，我甚至不再躲避他。当我肯定没人听见时，审慎地同他谈论宗教问题。顾被他的劳动态度所感动，毅然下令小队其余人在他有困难时帮助他完成他的定额，使他维持一级口粮标准。这使他感到很不安。

“你们不要这样做，”他抗议说，“这是违反规定的。如果我不能完成我的任务，就无权获得更多的口粮。”

顾叫他不要讲了，由顾来决定怎样做。但是在 4 月下旬，当我和其他一些人逐个叫去见杨看守时，显然至少有一个号友不赞成这个小牧师。杨采用了神圣化的“猫耍老鼠”的方式来查问。

“鲍，你是否对政府有隐瞒？”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事。

“你知道在监牢里是不准许搞宗教活动的吗？”

我等他继续说。

“我听到有关夏的事是些什么事啊？我听说他在床上祷告。”

杨说得完全正确，但我肯定他没有证据。我说，“如果他做祷告我首先会知道。我虽然不再遵守基督教义，但我仍能听懂祷文。”

“那末你是否以为控告他是没有根据的？”

“不，我没有这么说。”

"好，那末这个喃喃自语的老人在说些什么？"

"大队长，"我尽量合情合理地解释，"你要知道夏是个老人。老人常常自言自语，其他人也有这种情况。有时我睡不着觉，就给自己讲故事。"

"神经病，"他厌恶地说，"你们都是些疯子。"

在顾受到同样查问之后，他回到房间控制着怒火。他在讲话时，话中带有威胁的味道。

"我要对向政府汇报的号友说几句话。我希望你知道我是非常赞成这样做的。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信赖政府说明你走上了赎罪的道路。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如果有人向政府诬告，他就是犯罪。用说谎来获得奖励是最恶劣的犯罪行为。"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顾？"有人问。

"我不过是讲看守说的话，如果有人认为我说错了，你可以去找他。"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倒底也不知道是谁去汇报夏的。当然他的确是在床上作祷告，但几乎没有人能听到。他还在田里给那些还信基督教的囚徒做忏悔。在工休时，当我们躺在太阳底下休息，想做忏悔的囚徒只要挨近夏，眼望着天空向他诉说自己的罪恶。我仍可以看到他们嘴唇在蠕动。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互不相视，或作任何动作。夏可能喜爱划十字，但这样做太危险了。"你的罪得到了宽恕"，他向空中说，那囚徒就飘然而去。

夏非常信任我，他知道我不会去汇报他，所以他在我周围时较少有戒心。有一回我偷听到有趣的交谈。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到他那里听他对偷东西的意见。象其他人一样，他必须靠寻找额外的食物来维持生活，但是偷东西是不道德

的想法仍然使他烦恼。

“警卫人员是否知道你们偷食物？”夏问。

“是的，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在不断找食。”

“那末，”老人慢慢地说下去，“如果他们知道你们在偷，又让你带着偷的东西走，这样的政府很不错，是吗？”

“是的”，囚徒同意这一点，但心里很烦恼。因为这不是他希望得出的结论。夏一直不将这问题说透。

“你认为上帝不如共产党吗？”他问，“不要再为此发愁。”

夏神父肯定是我所见到的最高尚的基督徒。伟大的天主教殉教者可能比他承受更多的痛苦，但他们的信仰并不比这倔强的小老头更坚定。当外国的上司全都离开中国之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使西方传教会的信仰在劳改营中活跃着。把他列为圣徒是当之无愧的。

第十三章

在1960和1961年间什么东西都很缺乏，这样，犁田、整地、建造梯田、搬运石块和填土、挖修灌溉渠等种种工作就落到我们头上。到3月1日，我们较为松闲的冬季作息时间表变成每天劳动10小时，我们又恢复了老样子，因犯们因营养不良和疾病的侵扰而虚弱无力，但上级仍希望我们象身强力壮的劳力一样去干活。有的人勉强支撑着，但大部分人都招架不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落伍者。

监督我们生产的看守员姓赵，是个冷漠的、走路罗圈腿的农民。他经常喋喋不休地提醒我们，我们将来的口粮配给标准与现在的工作好坏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将决定小麦、大米的收成。所以也就决定我们能分到粮食的数量。为了激发我们的劳动热情，他将我们分成若干人数相同的小组，实行一种称之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策略，用食物作奖品奖励组与组之间展开竞争。在每个宣传黑板上，他将各个小组加以编号，并象在移交处那样用火箭、飞机、汽车、自行车、牛车、最后是耻辱的乌龟的图形来标记各组的名次。

这年春季，我的工作是拖拉沉重的平地器在稻田中来回奔走，这是东方独有的一种农活。因为水稻秧苗需要在稻田中保持固定深度的水，所以稻田必须保持绝对平整。在春季，每一处稻田都得重翻一遍。在清河劳改农场，两个囚犯代替

了牛马的作用，他们拖拉的平地器是一块一英尺宽四英寸厚的木板，木板上压着60磅重的砖块。我和另一位伙伴分别拉着木板两端的绳子。

那个倒霉的春季尽管已过去很久了，但有三件事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这三件事都是因饥饿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所引起的。

第一件是关于偷粮大师雷英方的事，他由于饥饿，最后导致神经错乱。这是老孙后来告诉我的，当时他正与雷英方一起在田里干活。随着一天天饿着肚子干活，雷的抱怨也越来越激烈。当送午饭的车子到他们干活的田里时，他在一位看守的眼皮底下将自己的那一份窝窝头拿起来一掰两半，出乎大家意料，他突然大声咒骂，攻击政府开始时让他饿得要死，然后又强迫他吃掺着一半杂质的窝头。

“安静吃你的午饭吧”，看守尽量温和地劝说着，免得发生麻烦。但雷英方不管这一套，他仍大骂不止，并把窝头吐出来扔到地上——这是任何一位看守都无法容忍的“犯罪行为”。他命令将雷英方头对脚地绑起来，派两名囚犯用手推车将他拉回院子去，单独禁闭一段时间。后来我们还必须开会批判他。

另一件是一位姓蓝的中国人愚蠢地偷窃粮食的事。蓝当时约50岁，从1951年起就被关在清河农场，可谓老资格了。虽然我们之间并不很熟，但他是有名的“好学生”、“劳动模范”，曾几次被命名为“劳改积极分子”。就是这个人却干下了偷粮食的事。那天，一名看守在号子内他的私物中发现了他藏一袋玉米；这下他可倒霉了。很明显这是违犯狱规的行为，尤其严重的是，他所偷的竟是供应仓库的玉米种子。我们听到人们说起这件愚蠢的事，但不知道如何处置他。直

到我们连续劳动了13天之后的一个星期日——这是我们的工作时间表上仅有的一个停工休息的日子，才对此事进行处理。那天下午4点钟，第四大队全体犯人都被召集到礼堂。赵看守给我们训话，他一开始就谈到实质性问题："你们当中有人偷了国家的财产"，他大声吼道："站起来！"坐在前面的蓝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的头低垂着。赵看守接着讲道："我叫你们到这里来，想让你们趁着现在天还亮，好好地瞧一瞧这个人。蓝过去曾表现很好，一直是个积极分子，工作积极，学习认真，进步很大，他曾经受住了最艰苦的考验。在目前暂时的经济困难时期，任何人都会感到虚弱不堪，但这正是你们应该坚强的时刻。可他却不是这样，竟然偷了一袋玉米。"

赵看守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让大家体会其重要意义。中共干部天生就是好演员。

"一袋玉米，一袋玉米能值多少钱？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要两毛钱。但是一袋玉米种子足以生产一亩地的玉米，够整个队吃上一年的！偷吃厨房或田里的东西是一回事，但这个人却影响了生产，他在搞破坏。这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

这时，站在赵、杨两位看守中间讲台旁的监狱长走向前来，宣读了他们早已决定的处罚，延长五年刑期。

第三件是有关刘金山的吃玉米事件，但这与蓝犯的玉米事件有明显的不同。刘金山是一个身材矮小、四方脸的农民。我有一段时间和他分在一起干活，清理马厩，耙地松土。他不太爱说话，但我很快就看出，他在寻觅食物方面的才能丝毫不比雷奕方逊色。同时在搞香烟方面就象蹬三轮车的那一样也十分在行。他训练自己每天在吹起床号前一小时起床，然后到院子里那些干部和刑满就业工人的活动区拣烟头。他

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思维方法很直接了当，能无差错地看准事物。有一次，我看见他把那位比他聪明、而又受过较高教育的杨看守弄得下不来台。这位杨看守同我见到的许许多多干部一样是个清教徒式的人物，有一天下午，他忍不住批评刘金山不该捡废烟头抽。

“你知道，抽这些烟可能会得肺病。”他规劝说。

“没关系”，刘金山漠不关心地回答道：“我已经得了肺病了。”

杨看守非常吃惊地说：

“那么你愿意你短命吗？”

刘金山斜眼看了他一眼，脸上带着中国人那种十分擅长的讥笑说：

“看守，何必问我？问问你自己吧！”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我们每人供应一碗大米饭、一碗漂着几片肉的汤，并看了一场电影。节日过后不久，我们的囚室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年近40，长相滑稽；鹰钩鼻子，一对混浊的棕色眼睛，脸上长满痘痕，说话结结巴巴，走路一瘸一拐，摇摇摆摆，象只鸭子。他叫李万铭。中国解放后上演的轰动一时的舞台剧《西望长安》就是以他为原型，由名剧《骆驼祥子》的作者老舍编写的。老舍被誉为中国的高尔基，他写了许多反映旧中国社会现实的著名小说。解放后他开始迷恋于创作讽刺作品，这些作品并不高明。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监狱，此后再未听到他的消息。

在“百花齐放”时期及前后，《西望长安》是中国最热门的话剧。它真实描写了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骗子和政治骗子李万铭——就是刚被送进我们监牢的那位——的经历，他使数百名官僚、党员干部和天真的旁观者上当受骗，相信他

是抗美援朝的英雄。他靠到处显示自己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制服和佩戴勋章的照片，捞到了最舒适的工作。为了使自己扮演的角色尽善尽美，他又伪造证书，证明自己曾在战斗中负过伤。这个伪装的英雄转眼就爬上了党的最高阶层，并被选派去苏联，打算让他趁此机会一面治伤，一面更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苏联人发现他根本没有受伤，而且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就将他送回北京。这样，他过去所编造的故事很快被人识破了。原来他穿军装的照片是自己伪造的。他是将杂志上的人物照片剪下来，把自己的头像贴在剪下的照片上，重新翻拍而成的。他的医疗证是从一个地方卫生所偷来的。官方的印章则是他自己在熏好的豆腐干上刻出来的，用完之后再把它们吃进肚子里。我在北京时很喜爱这部话剧，曾看过三遍。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和剧中刻画的人物原型睡在一起。

有一次，他向我埋怨道："我始终没有从这部剧中得到任何好处，老舍夸大了我的故事，他夸大了我的事。"

我真不明白，那些党的干部怎么竟会相信这个可怜的、说话结结巴巴的骗子是"战斗英雄"，我问他：

"如果他们现在看到你会怎么想呢？"

"嗯，"他板着脸一本正经地答道，"他……他……他们一定会看到我的，因为他们也关在这个劳…劳…劳改营…里。"

5月的某一天，我意外地看见了老熟人崔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草岚子胡同。他没有告诉我多少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只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趣事：他们后来在移交处不再折书页了。为适应当时对塑料制品的大量需求，他们与第一监狱合作生产塑料钱包。现在，犯人们以缝制塑料制品，代替了折纸。但他们仍在发射"火箭"和"卫星"。

崔到来的同时，大约100名少年犯也被送到我们这里，接受一个时期的劳教。这些家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下流卑鄙的一伙。他们最大的只有17岁，因为一满18岁就被看作成年人，送到成年人这边。最小的大约只有9或10岁。他们被从北京遣送到这里，组成了单独的青少年劳教大队。目睹了他们很短时间内的所作所为，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首都要将他们清除出去。他们一肚子坏水，但总是逍遥法外，因为他们只是接受劳教，仍被看作是公民。有好几次，他们拦路抢劫那些从食堂打饭回来的贫穷、饥饿的囚犯。他们把囚犯们打一顿后，就抢走他们的食物。正因为他们年轻，他们的口粮甚至比我们的要多。我们的处境真是可怕极了，每天我们列队上班经过他们身旁时，这些家伙就大声叫骂"坏蛋"、"混蛋"，而我们却不能对他们还嘴。

有一天当他们把我们的衣服偷走以后，我们的忍让终于到了头。那是一个放假的星期日，我们都到澡堂里洗澡，但当我们洗完出来一看，我们的衣服不见了。这些小畜牲索性将我们所有的东西一扫而光，这样他们可以从从容容地洗劫我们的衣服兜，同时挑选最好的衣服据为己有。我们不得不在澡堂里晒了近两个小时，警卫则重新为我们弄回他们所能找到的衣物。这次恶作剧结束了我们与这些少年犯的共处。从那以后，这些孩子与我们大人完全隔离开了，这真是万幸之极！

5月初，马医生开始给我吃病号饭，因为我的身体明显地在一天天变坏，尽管天气渐暖，但病情仍不见好转。后来证明即使病号饭也无济于事。到了麦收季节，我再也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定额了，大个子老顾不得不作出不愉快的决定，将我的口粮标准降到乙级。小组已照顾我好几个星期了，但是

多少好意也不足以阻止队里的一些人对一个不能完成自己工作量的人的抱怨。此外，不可能永久对看守隐瞒下去，尤其瞒不过出身于农民的看守老赵。因此，我最后失去了甲级口粮标准。

在两个星期内，我的健康状况愈加恶化，老孙和大个子只好把我抬到医院去。我的主要病因是痢疾，另外还伴有贫血和低血压。这些都是营养不良和身体虚弱的症状。尽管我已不成人样了，但老夏对此却并不灰心，他甚至还想让我改信天主教，劝我向上帝祈祷，并提醒我记住，人不能只靠面包生存。我说：

"不错，老夏。但面包毕竟有点用。"

大个子也满怀信心地安慰我："别担心，老鲍，我们不会让你倒下的。按照医生说的去做，你就能回到我们身边来。"

"当然，老顾，"我回答说。但我并不相信这话，我已经筋疲力尽，什么都顾不上了。

医院病房是夯实的土地，地上铺着稻草，边上围着两排砖块，呈巨大的L型。老顾把我的铺盖放在另外两个病囚的中间，然后扶我躺下。房间有两个没有玻璃的窗子，冬天用纸糊上，现在则完全敞开。其中一个窗子的外面是沟式厕所，另一个则正对着大厨房，每天清晨2点，厨房里就有人开始干活，嘈杂声使我们无法入睡，而排泄沟里的臭气更使我们恶心呕吐，难以忍受。就连苍蝇——那些机警的在灭蝇运动中漏网的苍蝇——也肆无忌惮地侵扰我们。虽然马医生对我尽力医治，但在这种地方生活是够倒霉的。

医院的伙食要比普通犯人的好得多，有面条、馒头、肉干，有时有一些红豆粥，但我病情很重，吃不下任何东西。

住院第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老孙来看我，他身穿蓝短裤，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脸庞晒得黑黑的，灰尘满面，显然是刚下地回来。

“老鲍，好些了吗？”

“不好，老孙。仍不见好转。”

我并不企求他的同情，当时我已觉得毫无希望了，虽然濒临饿死，但又吃不下任何东西，甚至肚子也不感到饿。

“老鲍，坚持下去，”他说：“不要泄气，我们要你活着出去，懂吗？”

我累极了，就答应他说：“老孙，好，我一定努力！”

“很好，我明天再来看你，现在拿着这些东西。”

老孙的手里拿着三个鸡蛋，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偷食罗卜或卷心菜是一回事，而鸡蛋则是很久连听都未听过的东西。

“老孙，你从哪里搞到鸡蛋的？”

“鸡蛋已经煮熟了，”他避开我的问题，无动于衷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会连蛋壳一起吃下去，不仅能补充钙质，而且可以不留痕迹。”

我再次想表示拒绝，不过这次只是为了走走形式而已。但我还未来得及说完，老孙就大步走了出去。我知道只有在看守的鸡棚内可以拿到鸡蛋，老孙肯定冒了极大的风险从那里弄来的。

第二天晚上，大个子来看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有鲜艳、明快花卉图案的大搪瓷杯，杯中盛着炖煮的野菜、青蛙肉，以及一点从别人袋底上搜寻来的米粒。又稠又热乎。他一匙一匙地喂我。为了调味，他在菜肴里加了一撮在马厩里弄来的盐。

我们小组对我精心照料了三个星期左右，到了7月的第二个星期，我已能在地铺上坐起来了。当我刚刚能趔趔趄趄地走路，就马上请求杨看守让我返回原队，到田里干活。我自认为身体比过去好多了，同时对呆在医院里也感到厌烦。

杨说：

"如果你能照照镜子看一看自己，你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了。鲍，你要到了外面，风都会把你刮跑的。我必须承认你的态度很好，但先在医院里把身子养胖。"

我又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月左右，在这里收拾病房，帮助厨房干点杂活等，这些不是我的正式工作，但它能消磨时间，同时也使我感到自己还有点用处，因为那时我的号友都在外面的田地里为夺取夏收而奋战。每天太阳升起前我总是躺在草铺上，听他们在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国乐曲声中列队上工。在这些乐曲中，《紫鹃花开》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曲子，另外播放一些印度尼西亚园舞曲。那种气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在8月的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一位入院前我未见过的新看守来看望我们。他穿着白衬衫，土黄色短裤和凉鞋，显得精明能干。他记下我们的姓名，一一询问了我们的病历。他走后，我问马医生，这位看守来访有什么意图。

"不好也不坏。"马医生闪烁其词地说。他说话总是令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中国人的一个老习惯。

第二天早晨，这位新看守又来了。同来的还有那个刘看守。

"政府一直很关心你们的福利……"刘看守说。我暗想，又来了，一定是有什么坏消息了。他继续说："第三农场是个生产单位，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来照顾病人。因此政府决定送你们到一个更合适的地方疗养，那里叫五八五营，

是专为病囚们设立的。你们现在去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我们当中能走的就自己爬上卡车，走不了的人被抬了上去。卡车在泥泞的田地里颠簸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停在了一个院落门前。这里有几栋粉刷过的红砖建筑物，周围围有泥筑围墙，入口处钉着一块写着“五八五”字样的大木牌。我们在这里下了车，这时我意外地看见过去的看守“独臂”王。这个王看守的出现使我确信这里一定是更大的北元宝村了，也就是“死亡农场”了。王看守仍很清楚地记得我，由于这层关系，我就成了这群病囚的头头。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忙着迁入一间粉刷好的牢房以及了解吃什么样的口粮。囚犯们也都差不多相互熟悉了。我很快看到了一些来自北元宝村的熟人，他们给我提供了有关这个地方的情况。据他们所说，以前那个地方已被征用了。因为农学家已发现，在这一带种植的一些农作物都生长得特别茂盛。这个“五八五”营是一个让老、弱、病、残囚犯们集中的地方。很少有人觉得能活着出去。我们总共有400人，一天吃两顿饭，几乎都是其他生产队多余的人。我在满地泥浆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看着那些漫步觅食的犯人，心中充满了压抑、无望和被遗弃的感觉，真象死到临头了。

第二天早晨，天上仍下着濛濛细雨，我们同前一天一样在令人厌烦、无聊的老一套中打发着时间。我们没有工作任务，没有劳动定额，唯一的事情似乎就是等着吃饭。下午，王看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你就要离开这儿了，”他漫不经心地对我宣布说。“你将返回第三农场去。快去收拾东西吧！”

我真是惊喜万分。对未来突然又有了希望。我当时根本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是王看守向上级报告说我是"五八五"营不要的人。这是一个完全有意而明显的举动，他想数我的命。因为他完全了解"五八五"是个死亡农场。

我能回到第三农场是个例外。但也不是没有问题。这次，我虽被安排到医院，但给我的伙食标准是丙级——确切地说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伙食的一半。显然主管这里的一些人，也许是刘看守，断定我是一个不满分子，因为我拒绝接受政府在"五八五"营给我的仁慈的医治。后来我只好给劳改营主任写了一封正式的申辩书，解释我是在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且在我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调来调去的，而且我一直是老老实实的，刘看守这才大发慈悲，允许我返回吃乙级口粮的号子。

对于不了解中国监狱制度或干部心理的人来说，写"申辩信"听起来也许根本不可能。但在第一监狱时我就知道，政府鼓励每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囚犯，将自己的心里话老老实实，毫不隐瞒地说出来。因为政府要了解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在想些什么。这样，有错误的或与党的路线不一致的思想就可以得到纠正。谁也没想阻止我将这封信送给农场的顶头上司。必须遵照一些不可思议的形式行事。我的看守对我的肉体和灵魂都具有绝对的权威，但他们有义务听我把话讲出来。而就我这方面来说，重要的是要小心注意自己的思想。言论自由是受到鼓励的，特别是这些言论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从"五八五"营回来后，我的身体康复得极为迅速。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归功于马医生的照料，老孙和大个子的补充食物，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再被送往"死亡农场"。我很快就

其他囚犯们一起下地干活了。那时我们面临的第一件重活是进行稻田除草和给幼苗松土，这就是在西方成千上万个图画、雪茄烟盒以及咖啡桌上所描绘的那种头戴草帽、弯腰曲背的中国传统劳动情景。这是亚洲世代沿袭的情景。我很高兴能回到这种情景中。在田里劳动的最大乐趣（除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外）是捕抓在那里繁殖的青蛙。我一直不明白，前几年自然灾害如此严重，而这里的青蛙怎么还会那么多。不过，对我们来说，青蛙多，无疑是我们的一大福气。这些青蛙极易捕捉，他们常常会径直地跳到我们的腿上。我们当场将其剥皮后生吃，剥皮的方法是先从嘴巴处开始剥，然后再连同头和脊椎一起剥掉。那些有经验的人还把剩下的肉放到搪瓷杯中（那时我们总是随身带着杯子，塞在衣服里），加点水，然后放在太阳处烤制成青蛙肉干。再能放上点盐，其味道很鲜美。插在枝条上用太阳烤制而成的肉干吃起来味道就象烟熏肉。夏末，田野上有了很多野菜，我们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炖青蛙肉的菜肴。

大约是在麦子脱粒时节，我亲眼目睹了一桩可怕的自杀事件。当时我们正坐在树荫下吃午饭——汤和窝窝头。一个身穿破旧白衬衫、蓝裤子的囚犯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田地里，他发疯似地向正在田里作业的一个大型麦子收割机奔去，人们还未反应过来，也未来得及关掉机器，他已扑到了收割机的刀刃下。我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囚犯们采用这种方式来结束"劳改营"的生活并不稀奇。这个人被收割机斩成了碎片。

9月初，老孙告诉我一个秘密，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同志们在我生病期间对我那么好。那天我们在稻田干活，大约下午3点钟，老孙缓步走到我身边。

"老鲍"，跟我来，"他说，"不要太拚命了，干得再多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抽支烟吧！"

为什么不呢？周围看不到看守，同时现在纪律多少有点松懈了，因为小麦已安全收割完毕，水稻看起来长势很好，我们背对着高高隆起在田野上的公路的一侧坐下，然后脱下草帽，掏出一小块报纸，各自卷了一支葡萄叶烟抽了起来。孙用手指着田野说：

"老鲍，你看，那边的景色真好看，不是吗？"我搞不清他说的是不是讽刺话，因为就实际而言，景色确实十分美。那边简直就象一幅全景电影画面，碧蓝的天空中飘浮着巨浪般的、厚厚的云层。一眼望去，眼前阡陌纵横的广阔田野向地平线延伸而去，一望无际。除了一长排刺槐和白杨树并立在公路两旁，没有什么东西破坏这种几何的图形。田野间的田埂和小道星罗棋布、井然有序地延伸着。我们满眼看去到处都是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穿着黑色衬衫，弓着腰干活。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人人都沉缅于自己的天地中，他们有数千人。

"那边不是很美吗？"孙再次问道，"所有的这些人，包括我，谁也不可能出去，因为我们是终生交给这里了。而你是唯一与众不同的人，总有一天你会走出这个'大门'，因为你是外国人。我们则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如果你愿意，你是将来唯一一个能向世人说述这里的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希望你活下去的原因。"

我很感动，但不象他那么乐观：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那么久。"

我这样悲观并不是无病呻吟，因为自1960年8月以来，我们大队中四分之三以上的人都已死亡或被送到"五八五"

营。现已没剩下多少人了。

“不要担心，”孙坚定地说，“只要你留在这里，你就能活下去，对此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被转送到别的劳改营去，那里肯定会有和我们的想法相同的人。你是我们的‘宝贝疙瘩’，老伙计！”

孙一边大声笑着一边摇摇晃晃地走回了稻田。

那年夏天，我们队转来了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名叫卢克西，他对外部花花世界的了解使我吃惊不已。我经常称他为卢克。他年轻、英俊，年龄约25岁左右，尽管瘦骨嶙嶙，但干活很卖力。有一天下午在田地劳动，我信口哼起了“樱桃花儿红，苹果花儿白”，这时卢克出现在我身边，也哼了起来，一个音节也不差。

“你是从哪儿学来的？”我不禁大为吃惊地问他。

“在印度尼西亚学会的”，他得意地说。“我还知道很多的歌呢。”

我们就象孩子一样讨论起了泡泡糖画片。当他给我表演《田纳西州园舞曲》时，我惊诧不已，这首歌一下子把我带回到被捕前的那些日子里。卢克忘记了歌词，所以要我帮助他。虽然劳改营绝对禁止用外文写任何东西，但卢克仍偷偷给我一片印有外文的克拉夫特公司的美国咸乳酪——他家所寄包裹中的部分——来帮助我恢复我的记忆。这片乳酪不仅使我告诉他这首歌的歌词，而且还告诉他《与上帝同去》（或译“再见”）——这算是我给他的一件小小的礼物。我不知道一旦看守们拿到了这些违禁的秘密的东西将会怎样。过后不久，卢克给我一块巧克力条，以感谢我告诉他《我参加过你的婚礼》的歌词。

当收割玉米的季节到来后，我们自然想尽可能多地偷一

些玉米留着自己吃。但看守们警惕性很高，我们一次至多只能偷到一个玉米穗。这些警卫比较狡猾，每天当我们从田里收工回来时，他们就让我们排好队，然后让大家两个一对互相搜身。这样他们既可节省时间，同时免得他们一个一个单调乏味地去搜查。这初看起来可能比他们自己出面搜身更为有效，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犯人们特别怕他们会重新搜身。但后来，小组很快学会了在每次搜查时都能"发现"一些违禁品。当天犯错误的人都是事先定好的。采取这种办法，我们每人每月都要为了全组的利益而去犯几次错误。至于对看守人员，只要我们认错态度好一些，做做样子就可蒙混过去了。

10月1日国庆节，我们美餐了一顿，有包子，一大碗蔬菜汤、大米饭、猪肉丁白菜。饭后，我们正坐在外面休息、聊天，这时看守老赵溜达到我们跟前。他穿着褪了色的蓝色上衣和短裤，他先客气地请求我们同意后，在旁边坐了下来。随即掏出烟丝，把烟斗装满。这时，我们都不说话了，恭敬地等待着他给我们讲话。当看守来到一个组，尽管他是非正式，但他仍是负责人。

"今天我给你们讲讲有关消极主义和懒惰作风的十种表现。"他很随便地说，"这十种表现被称之为消极混泡"。

他以教训人的口气慢慢说着，每例举一种表现就伸出一个手指头。

"第一，只有看守在场时才干活，看守一转过身去，马上就偷懒。

第二，假装卖力干活，其实只不过是手拿工具做做样子，实际上什么也没干。但千万别忘了，看守多长了一只眼睛，我们知道的比你想得要多得多。

第三，老是往厕所里跑，或是假装在大便，一天早上6次，下午6次、每次10分钟，这样你就偷去了政府的2个小时。

第四，假装寻找工具而老是在周围闲逛。

第五，过多地在一起谈论工作方法，说得多，做得少。如果你想知道采用哪种工作方法，应该直接找看守了解。

第六，在精益求精地干好工作的借口下，一遍又一遍地干同一件事，使工作量保持在最小限度。

第七，确定的工作定额低于自己的能力，早晨就定下少干活，这样你能在一整天的时间内轻轻松松地完成它。

第八，借口互相交流劳动经验，而与其他人闲聊。

第九，干完活后，总是不停地捶背，而实际上并没有干多少事。

第十，在上工的路上花费很长的时间，然后借口返回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而早早收工回营。”

傍晚，我们得知谣传已久的关于提高伙食标准的说法最终不会随着收割完毕而实现。就在故事影片《五朵金花》开演前，刘看守到台上，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

“在各大队中蔓延着某种不满情绪，”他说道，“有的人因为你们的伙食标准没有大幅度地提高就竟敢说人民政府说话不算数。哼，你们现在已比冬天每天多吃二两了。因此，你们该知足了。我们不能允许少数人专事挑拨离间，煽动你们在这重要的时刻偷懒。为了使你们明确这一点，我们决定给予两个最坏的犯人以应得的惩罚。”

他命令坐在前排中间的警卫将两个犯人押下去，各关一个星期禁闭。看起来我们要长期吃不饱饭了。

抽烟是忘记肚子饿的最佳办法之一。然而那时真正的烟草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发明了各种代用品，多数是利用干树叶制成的。在我们当中，那些口袋里有真正香烟的人，就被看作是清河农场的百万富翁了。如许多犯人，常常自愿用他们的半顿午饭去换一支烟抽。抽烟，或只是想到它，就常常引起一阵不可名状的激动，最后使我也不得不换烟抽了。有一天，我听说另一个小组的精明的小伙子古文轩收到了一个包裹，内有60张高级烟叶。这一消息使我内心激动不安，我越设法不去想它就越想，最后我觉得必须到他那儿，无论如何要问问他的条件。

“好，我们来个公平交易。”他安之若素地说。“我们各自都有对方想要的东西，你拿你的那本《罗热词典》来换我的烟叶，如何？”

这个家伙，真会要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他所要的东西。他会讲一点英语，所以这本辞典显然会成为他的宝物。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讨价还价者。我提出用别的东西来换，但他不改变主意，要末就用这部辞典来换烟，要末就不换。

“滚你的，”我用英语骂道。这句话他用不着看《罗热辞典》也能听懂。

“那好吧，”他无动于衷地说，“你什么时候想换了，这个条件仍然有效。”

此后几天，每当看见有人吸烟，我就流口水，就象有什么东西在嗓子眼搔痒似的，令人十分难受。一个星期后，我又去找古文轩。

“我的烟叶所剩无几了，”古警告我说。

“看见这个毛毯了吧，我只用四片烟叶就换到了。”

我惊讶极了，真想教训一顿这个乘机发横财的家伙，把

他的鼻子砸烂，但同时又要乞求他换烟抽。

他接着说，“我说，我准备用15片烟叶来交换。烟叶可以由你随便挑，只要你喜欢，要大要小都行。”

我最后只好屈服了，交出了《罗热辞典》。尽管事后我严厉地责备了自己，但当时抽烟的滋味真是妙极了。

几星期后，我的妻子带着儿子小荣来探视我。这是一年半来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因此这时我们实际上已成了陌生人。我甚至不敢肯定儿子小荣还能认识我。他害羞地回答我的问题，就象通常在老师面前一样。在看守的监视下，我和我的妻子杨只能交谈着诸如赞扬政府如何很好地照顾我们等等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们来时带了点糕点，我们一起默默无语地吃着。我吃惊地注意到我可怜的孩子几乎和我一样饥饿不堪。我问他那天午饭吃的是什么，他说是在我过去曾参观过的那个免费工人食堂吃的午饭，有甘薯、白菜和大米饭。我的妻子补充说，政府对他们相当好，从没有人向他们收过吃饭的粮票和钱。

天知道她根本就没有钱。尽管政府说得好听，会照顾囚犯家属的生活，但她和孩子们却一直仅免于饥饿和贫困的境地。我的妻子从未能找到任何工作，因为她“不够格”。她只能在邻居家做家务，照料病人，每月挣得15元人民币（6美元）。

那天晚上，他们没赶上回北京的最后一趟火车。杨看守将他们安顿在一间客房住下。第二天早晨，我被准许陪他们走到劳改营大门口，与他们道别。中午休息时，我到杨看守的办公室，感谢他给予我和我的家属的特殊照顾。他说：

“你一向的表现并不非常好，但我们觉得这并不影响你

享受与亲人会面的快乐。因为有时这样的探视可以鼓励犯人们更加努力地改造自己。所以如果你真的感谢政府，就应当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表达你的感激之情。”

我竭尽全力努力工作。尤其是在11月中旬的一天，赵看守给我们放一下午假，让我们到就要翻耕的地里自由地搜寻漏拔的胡萝卜和甜菜。我们直接到了那里，就象狗找骨头一样，愉快地将冰凉、潮湿的田地挖了个遍。

“嘿！我们比毛主席更有福气！”老孙说着俏皮话。“我们吃的食物比他吃的还要新鲜。”

这时我正嘎嘎吱吱地嚼着一根不干净的甜菜，顾不上说话。那天晚上，我们都满载而归。

11月底前后，我思想上碰到了两个麻烦问题。一个是有关苏联的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小便的问题。真不可思议，正是这个小便问题给我招致了很大的麻烦。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当时正是我们的学习时间，我离开囚室到外面小便。扑面而来的西北风冻得我直打哆嗦，我不想上200码外的厕所了，就走到一个仓库跟前，对着墙撒尿。我自以为，在暗处总不会有人看见。

但是我错了，还没有小便完，屁股上就被人猛踢了一脚。当我转过身来，只看见一个人的轮廓，但一听说话声就知道这是一个看守。

“你难道不知道环境卫生规定吗？”他厉声问道。“你是谁？”

我回答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发生的事情是我永远难忘的一课。

“噢，原来是鲍若望，你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干，你的腿没有毛病。”

当然他说得很对，但这时我沮丧极了，便不顾一切，蛮横无理地对他说：

“看守，我承认我错了。但我所做的不过只是违反了监狱的规章，而你却触犯了法律。因为法律不允许政府工作人员对犯人动手，禁止用暴力伤害犯人的身体。”

那个人影半天一声不吭，显然是在考虑着什么，我预料事情可能更糟了。过了一会他平静地说：

“鲍，你说的很对。如果我承认这件事我做得不对——对此，我将在我们看守人员下次的自我批评会上作出检查，那么你愿意回去给我写一个彻底的检讨吗？”

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同时也使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是一个看守人员在一个犯人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因此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是，看守，我一定写。”

我不想得寸进尺，再冒风险了。我的诡辩已占了上风，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把检讨写得无懈可击。那个方下巴的戴在一号监狱得到的教训在这里同样是有效的。当我跑回囚室，我低声向大家通告：“我刚才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冲墙撒尿了。”

他们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谁管你在什么地方撒尿，”其中有人说道。“你打搅了我们的学习。”

后来我给他们讲了看守如何当场抓住我以及我与看守之间的小小“对话”后，他们才搞清了这件事。号长不禁说道，政府为了使我们改过自新真是费尽了心机。我坐到自己的床铺上，开始写我的检讨。几天以后，在每周生活检讨会上，我用整个囚室都能听见的声音宣读了自己的检讨。

当读完自己的检讨后，我补充说：“我所干的事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那么严重，但如果更深地检查一下，这件事反映出自己无视政府的多次教育，抗拒改造。我是用撒尿这种不光彩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这种作法是怯懦的表现，这就象当我认为没有人看见时，往政府的脸上啐唾沫一样。我只能请求政府给予我最严厉的惩处。”

我将检讨上交到杨看守那里，等待处置。我鼓起精神，准备再蹲一次禁闭。第三天晚上，杨看守来到号子宣布他的决定。他说：

“几天前，你们当中有人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想你们都已知道他是谁和他干了什么事。我已看了鲍若望写的检讨，我觉得它勉强可以接受。所以这次我们就不再追究了。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写一个检讨就总是可以逃避任何麻烦了。”

我暗自叹了口气，无声地向方下巴戴表示感谢。

如果说第二个思想问题没有对我的档案留下什么影响的话，那么第一个问题，即关于中苏关系问题则不仅对我，而且对于我周围的囚犯，对于整个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十分震惊和困惑的问题。中苏之间的关系早已恶化了一段时间，但近来已发展到了不得不公开向普通群众说明党内早已知道的这一现实：中国北面的伟大社会主义盟国，人们一向称之为“老大哥”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万恶的骗子。这样，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我们这些社会的渣滓，都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硬要把过去认为是白的东西变成黑的时期。

在清河农场，我们通过定期传阅学习的三种报纸来适应观念上的转变。这三种报纸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

和《光明日报》。我们从报纸上得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比以往更加恶毒地攻击斯大林，甚至下令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旁挖出迁走。周恩来总理不等大会结束就匆匆返回北京了。苏联报纸指责阿尔巴尼亚对苏联过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援忘恩负义。这是对中国进行指桑骂槐的攻击。《人民日报》也同样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反击，指责苏联撤回技术援助使阿尔巴尼亚陷入困境。于是，共产主义世界分崩离析了。

在那段时间，我们最害怕的是说错话。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已将一些政治框框深植脑中，觉得靠这些有教义的警句就能轻易地应付任何新情况。但现在我们好象突然被无情地抛入一个充满危险的、没人知晓的海域，大家个个小心翼翼，害怕因失言而招致5年或10年的加刑。我们时刻牢记着中国的一句老话："少说为佳"。杨看守经常鼓动我们谈自己的想法，但开始时很不顺利。我忘不了自己因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言论而被关禁闭的教训，所有的其他囚犯也都有类似经历。现在我们就象进入鸦片烟馆的主教一样小心谨慎地对待新的思想观念。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我们谁也没能真正提出对苏联的具体谴责。那真是一段痛苦的日子。

从那以后，我常常怀疑当时观念的突然改变与不久监狱所发生的罢工事件是否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我相信肯定有关系。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条件一点儿也没有改善，我们的口粮只够维持生命而已，而且代用品仍然是我们口粮的一部分。当冬天再次向我们袭来，而政府同时又突然要求我们的思想观念作一个90度的转变。这一切使我们中的一些囚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12月8日早上，我亲眼目睹了一场使我震惊的公开罢工。在劳改营中发生罢工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甚至是第一次听说。

那天早晨，囚犯们象往常一样列队上工，但是当看守问哪些人有病时，有15个人走出队伍。反常的是，这15个人都是大队中身体最壮、表现最好的人。大部分是号长或劳改积极分子。想不到大个子顾竟然也在其中！我不清楚他们是否希望我们其他人也和他们一起行动，不过当时我们都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傻看着。

“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去让医生检查一下”，看守粗暴地说。

“我们没病，”其中有人叫喊道，“我们不愿去干活。”

看守大为震惊，显然这样的事前所未有，处理时需要特别小心，他叫我负责我们这个组，然后叫我们到田里去。晚上收工回来，大个子的床位空着，这样我就成了临时号长。我们听说所有参加罢工的囚犯都被集中关在一个狱室里，但警卫不许我们任何人接近他们。几天以后，监狱才决定将他们关到一个特设的处罚室中，只供给玉米粥和水。赵看守说将强迫所有的反抗分子为社会主义而工作。

后来我曾看见过大个子一次，但只有几分钟时间，而且有警卫在场。我至今没搞清他是如何和何时决定采取这样一个极端行动的。他曾顽强地熬过了所有最艰难的时期，可现在却甘愿认输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几个星期后我将要与大个子、老孙以及其他囚犯们分别了。我在清河农场的最后一次不寻常的经历是夏神父的圣诞弥撒。在12月份，我们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一些零碎的农活，如为稻田划界，清理灌溉渠、修枝条等。圣诞节的早晨，天气晴朗，但气温接近零度，而且刮着五级西北风。我带着18个人正在二十三号稻区内为稻田划线标。

这是一块已全部翻犁过的稻田，约2哩长，120码宽。我们的任务是将这块地划分为60个稻田，立上标桩，然后由另一组人修筑灌溉系统。我将人员分成五个小组，每组3人，余下的3个人派去拣碎木柴用来点火取暖。

大约9点半左右，我看见一个孤伶伶的身影穿过稻田向我走来。虽然相距很远，但我从他走路的姿势就能认出那是夏神父。他走得很快，头上那顶破旧棉帽的两个护耳在风中飘舞，褪色的军大衣和黑棉裤上溅满了泥土。他以他特有的过分有礼貌的口气问我能否让他休息几分钟。我当然不反对，但他也知道我们完成这任务的期限是中午以前，能不能等到午饭时再说呢？他一边难为情地低头看着自己的鞋，一边心神不定地玩着手中红白相间的划线标杆。

“你难道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约翰。”他用英语问我。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是的，我知道。你去办吧，神父。但千万要小心。”

他报以感激的微笑，然后急匆匆地走下沟堤到一条干沟内，那里有一堆木柴正在燃烧着，他蹲在一个即避风又不会让看守看见的地方，举行圣诞弥撒。一刻钟后，我看见远处有一名看守骑自行车过来，就急忙跑到沟旁向夏神父报警。

我从沟堤上朝下看，夏神父刚做完弥撒。他站在选作圣坛的一堆冻土前，从事全世界牧师圣诞弥撒的传统仪式。不过他所用的弥撒祭服是一件破旧不堪的工作服；圣餐杯是一个有缺口的搪瓷杯；圣酒是临时挤的一点葡萄汁，而圣餐则是他早餐剩下的一小块窝窝头。我看了一会儿，深深感到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为虔诚的一次弥撒。我溜下沟沿，当看守骑车经过时，只看到两个囚犯在那烘手取暖。

两天以后，我就从这儿转移走了。那天早上，杨看守把我从集合上工的队伍中叫出来，命令我返回狱室。我担心很可能是把我送回“五八五”营去。因为大约在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左右，我曾昏倒在田里，被别人用一辆手推车拉回狱室。我忧郁地拨弄着炉火，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五六个来自另一大队的朝鲜人来了。他们同我一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特殊待遇的原因一无所知。在九十点钟，杨看守才告诉我们实情。

“政府决定将你们送回北京，”他宣布说。“但你们别忘了，无论你们被送到什么地方，你们都还是在劳改。所以要继续努力工作，听政府的话。”

我问他能否让我与大个子老顾道别，他点了点头同意了，这使我惊喜万分。他带我到处罚室，命令警卫放我进去。大个子看上去十分疲倦和沮丧。自在一号监狱起我们两人一直相处在一起，现在就要离别了，我心里十分难受

第十四章

下午3点钟，一辆卡车来接我们。车上除我之外，其他人都是朝鲜人。此时我才明白，这次转移出清河农场的仅限于外国人。卡车在结冰的田野上颠簸着。当我看到卡车在驶向"五八五"营的路上时，心中不禁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尤其是当卡车开进那个我所熟悉的大门时，我害怕到了极点。我真无法断定，这是否又是杨看守为我设下的一个圈套？原来是虚惊一场。卡车来这里只是为了接走另外几个人而已。接着卡车掉头向茶淀火车站开去。

晚上7点钟左右，我们才到达车站，这时太阳已经落山。车站的月台上和兵营式的小候车室内挤满了黑压压一片紧紧裹着衣服的囚犯，大概有数百名。我听说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满洲（东北）的劳教人员，共有700人左右。我们到后不久，一名看守叫我们到月台上去，并大声说到，我们必须等几个小时才能乘上火车。他证实我们的目的地的确是北京。

"好极啦！"我们当中有人叫道，但看守听后很不高兴。

"你们不要对政府的决定评头论足，"他生气地说，"应该表示感谢。"

我们排着队领晚饭，每人一碗茶和三个窝头，当我打上饭慢慢往回走时，在一个探照灯下我和老熟人翁爱国——就

是在草岚子胡同曾穿着漂亮睡衣的那位——薩个正著。他的头发更加稀疏，并且更白了，身体非常消瘦。皮肤枯黄并令人奇怪地有点透明，通过皮肤我好象就能看到他的脑子。他穿着我在审讯中心见过的西式大衣，里面套一件红毛衣，一条对他来说过分肥大宽松的裤子；脚上是一双令人费解的卧室拖鞋，看上去就象一个很不相称的举止潇洒的叫化子。他用我熟悉的那种冷眼好奇地打量着我。

“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对不对？”他问道。

“你说得完全正确。”我用英语回答说。“我是来自审讯中心的鲍若望。”

“噢，对，对，你看起来身体很糟。”

“你要看到我去年的那个样子就好了。”

我尽量礼貌地避免谈到他的样子，不过我猜想他对这次迁移并不抱什么幻想。我们交谈了几分钟后回到各自的单位。我在月台上与朝鲜人坐在一起。

朝鲜人的头头的确是个人物，是一个英俊而又敏捷的年轻人，姓李，名永俊，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名字，有永远俊美的意思。我后来与这个“永俊”朋友一起颇有些经历。他是我曾遇见过的最聪明能干的囚犯，肯定也是胆子最大的囚犯。可能只是由于他是朝鲜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原因，思想教育从未对他起作用。由于他是成功地逃出劳改营的为数极少中的一个，他在劳改营中赫赫有名。在清河时我曾经常听到不少有关他的事情。现在，他亲口向我叙述了他的详细情况。

李永俊很早就开始了冒险生涯。1954年，他越过北朝鲜的边界到达中国。据他说，在北朝鲜生活很苦，但更可怕的是那种受压制和极其无聊的生活。他毅然奔向自己理解的自

由之路，开始变成了一个靠在火车上行窃，用伪造的证件乘车周游中国进行谋生的大亨。不论是偷窃还是伪造证件，对他来说根本不成问题。他千方百计逃脱警察的注意达两年之久。但在1956年最终被逮捕了。

他最初是在兴凯湖农场服刑，但在1960年夏患了一场大病后被送到清河农场。在此后较长时间的身体康复期间，他成了那些因病卧床的囚犯以及一些农场看守的一个义务勤务兵，给别人跑腿办五花八门的杂事，比如为手头有点钱的人去供销社买东西以及传递通知等诸如此类的事。这样使他成了一个万事通的人。警卫允许他在营内可以自由来往。在几个月里，他一点一点地私存着买东西找回的零钱。

1960年8月，他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在供销社出售一批新鲜水果。李带着每个人的订购数和钱去付款。这笔款子总共约为40元人民币（约16美元）。那天他换上自己干净的、精心修补过的衣服（缝纫是他许多特长中的一项）步行去供销社。但他却径直走到茶淀火车站，据他说，正好来到我们现在坐的地方。路上的人们都把他当作一个探监的人，因为他穿着考究，根本不象是一个囚犯。他完全了解铁路情况和公安干警的心理。他买了一张南去的火车票，因为他是朝鲜人，所以警察会因此断定他向北逃跑。在上海他迷路了，他用殷勤的举止和英俊的外貌很快找到了一个愿意照料自己的女人。几个月后，他向这位妇女借了50元钱，去了青岛。在青岛，他又故技重演。但当他偕同自己新结识的女友去旅馆登记房间时，他的证件第一次被验查，这样他就露馅儿了。李带着镣铐回到了清河农场。第三农场大队的全体人员都被召集到一个专门为他开的大会来看他丢丑。为警一儆百，农场将他关了整整一个月的禁闭，直到11月份才

将他放出来。他经受住了那些可怕的日子，这甚至使警卫都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李很坚强。

晚上11点半，运送我们的火车终于在月光下徐徐进站了，我们小队被安排到紧挨车头的车厢内，我和李以及其他6个朝鲜人坐在前排。警卫告诉我们可以说话，但只能小声说，以免影响其他人睡觉。未经许可，不得上厕所。

在劳改营度过的这些年中，我还听说过另外一次逃跑事件。这次逃跑的是一个中国人。他逃离清河农场后几天就被抓住了。他没有李永俊的胆子大，逃出去后在居民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很多的检查和规定中被识破了。由于每个公民出门必须随身携带证件，吃饭必须有饭票；旅行或住宿必须有介绍信，所以说从中国的监狱里逃出来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问题是你逃出来又能怎样呢？我们大家都早已听说过许许多多有关家庭将逃跑回去的亲属强制送回监狱的故事，所以我们对逃出牢笼根本不抱任何幻想。

早晨5点钟左右，列车到达第一站，在这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打瞌睡，但朦胧中我发现那几个朝鲜人老是跑厕所，我想他们大概水喝多了。

我们的第一站是离北京不远的丰台站。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一幕十分诱人的文明世界的象征——一个食品亭正在出售烧鸡。我们通过上锁的窗子悲哀地盯看着，心里做着白日梦。这时火车又猛地一下开动了。早晨7点半，阳光灿烂，火车终于到达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我们走出车厢，来到一个阴森可怕的站台上。群众早已不准入内，所以显得空荡荡的。一排身穿草绿色军大衣、面无表情的警察在等待着我们，他们个个手持冲锋枪，面戴医用口罩，露在外面的眼睛还监视着我们。东方人爱用这种白色口罩预防传染感冒。看到每个

警卫都戴这种口罩使人有些害怕，如果不是呼吸时还吐着白色的蒸气，它们真象一些没有面孔的机器人。

口罩后面发出沉闷的声音，命令我们各组排好队，准备出发。我们爬上一辆漂亮的捷克产红色汽车，心情愉快地通过北京繁华的街道。当汽车穿过一号监狱地区并又离开该地区时，我们最初产生的一丝希望越来越变得渺茫，最后化为乌有。这时，我们看到商店都已开门，家庭主妇们正在自家的门前点燃小煤球炉，等它冒完烟后再搬回屋里去做饭。一些摊贩正在出售水果、蔬菜以及馒头。街道上到处都是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奔向自己的目的地。汽车驶出市区。我们眼前又出现了一片稻田，然后是一个工业村庄，这里的高炉正在炼铁。当然，这时的高炉都是正式的，并不是大跃进时期那些狂热的农民所创造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玩具了。大约9点钟，汽车终于停在了一个四周围有高墙，上面同样设有瞭望塔和电网的红砖建筑物前。我们穿过没有任何旗帜和标语的大门。面前是两栋四层高的楼房和一栋高度一样、但面积要比那两栋楼大得多的建筑。这显然是一座工厂。囚犯们在建筑物前冰凉的地上坐着等待命令。

这次没有人给我们训话，只有一个和蔼的年轻看守领着我们走进其中的一栋楼，来到四层又长又暗的甬道。在这里看守将我和朝鲜人安排在靠楼梯左侧的第一个房间里。这间屋子十分简陋，水泥地光秃秃的，四周墙壁没有粉刷，将近一半的窗户没有玻璃。一盏灯泡用电线悬吊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唯一的热源是房外过道里的炉子。实际上，这位管理员安排我们住进这栋尚未完工的建筑只是临时性的，但他却懒得给我们说明。他告诉我们可以到楼下找些稻草和砖块来，这样就可以睡觉了。就象在清河农场医院那样，我们在地上

铺上稻草，然后用两排砖头将铺位的稻草围起来。搞好铺位后，我们又找了一些纸将敞开的窗子尽量糊起来，最后我们背靠墙坐在草铺上，又冷又烦地等待着下一步的命令，或者起码要等着吃午饭。不一会儿，就传来了糟糕的消息：看守们很晚才接到我们要来的通知，所以来不及准备食物了。我们必须等到晚上再吃饭。大家都感到又冷、又累、又饿，浑身极不舒服。我开始感到这次转移看来不是个好兆头。我发呆地看着前方，尽量使自己什么也不想。

“你饿吗？”李永俊的声音使我恢复了常态。

“李，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我烦躁地说到。他手伸到衬衫里，拿出两个小馒头递给我，这个朝鲜人使我惊讶极了！

“别人有吗？”我心里犯疑。但正当我说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朝鲜人也都正在嚼着东西。馒头完全是用面粉做的，非常好吃，只有在节日才能吃到这样的东西。

我吃完馒头后，李又说到，“抽支烟吧”，这次我什么也没说。他从裤兜里拿出一张真正的烟叶。我就象在观看一位魔术大师的表演。

“别着急，”他毫不在意地说，“还多得很呢”。

“李，我不是想打听什么，”我不禁说道，“但这究竟是怎么……？”

说到这里，我突然停止了。犯人中的一个最根本的规矩是不打听别人的好运气。不过李永俊不但一点也不在意，而且对我的疑惑大为得意。

“你还记得我们在火车上猛上厕所吗？我想你一定猜到我们并不是真的去上厕所，是不是？事实是这样的，我们中有一个人在紧挨厕所的车厢里头发现了一个食品柜，里面有

一袋馒头及一瓶烟叶，我猜这一定是看守的食物。”说到这里他那聪明的脸上闪现出一丝担心的神色。“这样，我们统统偷来藏在裤子里。火车上有那么多人，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是谁偷的。”

享受过馒头、香烟之后，我们又美美地睡了一会儿午觉。可惜后来被那位年轻的看守打扰了，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学习，而不应该睡觉。他将我们的姓名一一记下来，然后指定我们其中的一名朝鲜人当囚室长。临走时他又补充说，除了睡觉时间外，其它时间不许睡觉。我们听着看守的脚步声到了楼下，就争先恐后地跑向过道，挤在火炉周围取暖。其中一个朝鲜人抵挡不住食物的诱惑，在火炉上烤了一大块馒头。当楼道里飘出馒头的香味时，看守急匆匆地返回这里。

“你们哪来的馒头？”他气哼哼地盘问道。

“从‘五八五’营拿来的。”这个朝鲜人镇定自若地回答说。“是我从自己的伙食中省下来的。”这些朝鲜人的厚脸皮真可与他们的机敏相媲美。

“你姓什么？”

“姓金，”这个朝鲜人仍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所以要在炉上烤一烤是因为医生说这样有助于消化。”

看守愤愤地看着他，但并没作出什么强烈的反应。他说他将核实这件事。金点了点头，然后吃起了他的馒头。

下午5点半，我们领到了正式的口粮：金黄色的窝头和微热的菜汤。我们把汤放在炉子上热了热。

第二天早晨，一位姓贾的身材短粗的监狱长向我们介绍了我们新居的情况。他说，这里是良乡监狱，对外则称为“新首都电子机械厂”。这里的房子原来是准备制造电梯的，但后来改为制造钢管，现在则生产铝制品。在给家人去信时，

不要提良乡监狱或新首都电子机械厂，告诉他们来信时，地址只简单地写265信箱即可。监狱长最后讲了讲有关工作态度问题，然后让我们解散去吃午饭。我们又把汤放在火炉上温热，这时那位年轻的看守正好路过这里，他指责我们贪图享乐。

一连好几天，监狱似乎不知道该让我们干什么。根本没有给我们安排任何工作。我们在闲逛以及同这里的老囚犯们的聊天中消磨时光。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得知了自己所面临的生活条件。我们对这里的伙食所抱的任何幻想，从一开始就彻底粉碎了。由于饥荒，这个北京郊区的生活条件比清河农场好不了多少。伙食标准大体相同。据他们说，只有一个地方的犯人们现在仍能吃到很不错的食物，这就是第一监狱。它作为模范监狱确实名副其实。

良乡，顾名思义就是“善良的乡村”，成立时间不长。新首都电子机械厂的厂房大约在一年前才由修建营仓促建起来，而宿舍只是最近刚建的。我们住的这栋房子还未完工。这片建筑群位于京汉铁路线旁，在北京西南约20英里外。工厂的产品，即那位贾监狱长所说的铝制品，绝大部分是些粗制滥造的锅、盘之类炊事用具。这实在是一大讽刺，我们之所以必须生产这些炊事用具是因为千千万万的家庭在大跃进时期纷纷将自己的锅等投进了炼钢炉的送料斗中。这里的两个主要宿舍区被简称为东楼和西楼。西楼住着自由的工人，东楼住着劳教人员和来自北京各地的几百名病号囚犯以及我们这些外籍囚犯。

不用说，这里也有一套禁闭室，以防万一。后来我所说了有关这些禁闭室的事后，心中十分感动。不知是热心用错了地方还是存心想讨好监狱那些负责管教的看守，修建营的

人们最初建起的一排禁闭室极不人道。其高度不到4英尺，宽只有3英尺，而长度只够一个人盘腿坐下。这些禁闭室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当贾监狱长看到后，立即下令将修建营的总设计师和他的五个工头在自己的杰作中居住5天。他们放出来后，重建了舒适的新禁闭室，这些禁闭室与普通囚室唯一不同的只是没有窗子。它们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禁闭室。不过，我很幸运没有去蹲过。

监狱四周的围墙约30英尺高，四边各长60码，四个角上都建有高高的看守塔。监狱的正门是一个巨大的两扇门，除此外围墙仅有的另一个出入口是监狱后面的小木门，囚犯们称之为“太平门”。因为只有装在棺材内的囚犯才经过这座门。建筑物最后还有一个临时医院，里面差不多住满了来自“五八五”营的没有多少希望的病人；一个中心厨房，一个灭虱站以及由囚犯管理的为一个大菜园服务的几个储藏室和与农业有关的附属建筑物。

与我们打交道的那些刑满就业工人是一批非常捣蛋的家伙。看起来好象他們就是这个监狱里的人，懒惰、笨拙，浑身脏乎乎的。他们显然认定没有任何值得自己去努力的事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对的。但他们同我们囚犯一样常常挨饿，受到警卫和看守的管制。晚上禁止外出。他们同我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探家方面有特殊权利而已。别的方面都差不多。不错，他们现在是领工资的，但他们必须拿这些钱来买吃买穿，因为政府不会再免费发放这些东西了。

在西楼后边，座落着警卫人员的宿舍和食堂。楼前则是篮球场和带有温室的菜园。工厂是整个建筑物中最大的一个，它是一个洞穴状的飞机库似的结构。从外表看，它同我们的宿舍楼一样高，但里面却没有楼层，一个巨大的屋顶覆

盖在大约一英亩的地上。里面放满了生产我们的良乡牌厨房用具的设备。离监狱墙10码远的地方，有一条与围墙平行的围着整个建筑区的宽线，上面的石灰水清晰可见，这就是监狱的警戒线。对任何胆敢冒险向着围墙的方向走到警戒线外的人，可以格杀勿论。

晚上，从各囚犯队伍中挑选出来的荣誉班组在我们这栋楼的通道上进行巡逻。监狱看守人员允许我们熄灯睡觉——这是极难得的享受。我们这间囚室除我之外，还有7个朝鲜人和两个日本人。被称为“外侨组”。开始时我们生活得十分轻松，因为我们无事可做。但缺点是：在我们后来被分配做正式的轮班工作以前，我们吃的是低档的口粮标准——每月33斤。

1月3日，我们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插曲。这天，一个个子很高，穿着旧军装，戴着鸭舌帽及卫生口罩的人来到我们的囚室。他自我介绍叫李天友，是监狱的医生。在汉语中，他的名字有“上天之友”的意思。他对我们逐个地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核对每人的病历。当他来到我跟前时，他问我是不是外国人。

“我是法国人”，我说这话时大概带着点自负的口气。他反讥说：

“你不象，我去过法国。你看起来就象一个叫化子。难道你最近没用镜子照照自己吗？”

我以为他是在侮辱我。因为对于象我这样在思想和举止上已改造得符合政府要求的人来说，他的话显得过分粗鲁无礼了。

“我来这里是接受改造的”，我严厉地提醒他，“过去人们告诉我，政府不许污辱犯人或对犯人无礼。”

这位李天友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他说：

“我不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而是一个刑满就业工人。伙计，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你就当它是一个笑话吧。你以后不必叫我医生。我也是在这里学习的，同你完全一样。”

当我逐渐习惯了李天友的作风后，我发现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进监狱的原因与老孙差不多。他原是卫生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曾陪同几个中国代表团访问外国。但这一切因他在卡罗维发利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没有经受住捷克方面的一位女同志的诱惑而告结束。回到北京后，他被指控有不正当的性关系。他天真地认为与一个姊妹党的成员相爱在思想意识上是可以的。但他的上级所考虑的只是这个女的可能是一个间谍。就这样，他被判了3年徒刑。我们相识时，他已刑满释放，当了一名工人。

李天友检查完囚犯的身体后，给我和另一个得了严重肺结核的朝鲜人开了几天病假。病假休完后，我要了个小花招想逃避工作。因为外面极冷，呆在囚室里则舒服多了。我告诉号长我的身体仍不舒服。但他命令我无论如何必须到外面同工友们一起干活，我别无选择，只得服从。第二天早晨，我闷闷不乐地走下楼，随其他犯人一起穿过院子，到一个工具棚拿了一个结实的杆子、长绳和一捆脏麻袋。我跟在他们后面，进入一个屋顶很低的棚子里。

“下到这儿来”，号长一边说着，一边跳进一个地窖。我小心翼翼地跟着跳了下去，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大堆白薯上。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些白薯搬运到厨房去。这些白薯我们可以随便吃。我为自己早先的固执向他道歉。

“别吃得太多了，”一个朝鲜人警告说：“慢慢吃，否则会造成消化不良。”

我们坐在冰冷潮湿的棚子里，象老鼠一样嘎嚓嘎嚓地咀嚼了半个小时，然后才开始从事我们的运输工作。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经常看见两个体格高大，皮肤白净的囚犯，他们是我与巴尔泰分别后在监狱中见到的仅有的两个非东方人。他们是白俄移民的后裔，即使现在被释放了，他们也无家可归。当他们站在四周是亚洲人的院子里时，看上去十分显眼。尤其是那位名叫布托林的囚犯，长着拉斯普京式的大胡子，腰上系着一件俄国农民衫。我听说这两个人是因屡教不改的流氓行为而被判处劳教的。

2月5日，中国的农历新年来到了。我们得到特殊的优待，每人可以买5包香烟，每包人民币1角5分。我所以对此记得很清楚是由于这种烟的名称的缘故。这是一种叫做"勇士"牌的低级香烟，这种烟早在国民党时期就有了。不过那时此烟称为"红士"，烟盒上是一个美国印第安人酋长的彩色照片。可是共产党上台后，这种烟却带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理论家们作出决定，这种烟不许再卖了，因为这些烟是对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少数民族的侮辱。然而，这种烟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最后，革命的逻辑找到了一个使这种烟继续流通下去的方法。"红士"变成了"勇士"，其含义由印第安红人变成勇敢的人，这样，一切又都符合意识形态了。烟盒上的印第安酋长被中国一位赤手空拳打死老虎的传奇英雄武松所代替。在"百花齐放"运动开始后，党决定要使典型形象与当代特征相适应，所以烟盒上的武松形象又被我们时代的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所取代。烟盒上有一位解放军战士高举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他的身后是红彤彤的太阳。到了1962年，这种烟的质量已变得极其低劣。不过在劳改营中没有人对此作比

较。

这次我们的新年饭的数量仍然给的很少，但李永俊早就找到可以为自己多得到一些的办法。他利用看守对宗教仪式的异常尊重——这是极为奇怪的现象，因为宗教活动是被禁止的——宣称自己是一个穆斯林，这使他有资格在这个盛大的节日期间享受非猪肉的饮食。

“嘿，我不是穆斯林，”他兴致勃勃地对我承认说，“但我特别不喜欢吃猪肉，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些事情方面显得与众不同，你肯定会比别人更有福气。”

果然，那天晚饭开始时，他的一份牛肉明显要比我们其他人吃的猪肉粉丝丰盛得多。这次我们的主食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窝窝头，而是比窝窝头稍大一点的、掺有杂粮的馒头。其成分不再是玉米面，而是精细磨成的、加有发酵剂的小麦面粉。

晚饭后，朝鲜人聚集在过道里唱他们民族的伤感、悲哀的民歌。当陌生的充满思乡之情的歌声在我周围回荡时，我变得烦恼和沮丧起来，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家庭。我可以料想到，他们这次过新年肯定比我们更饿。因为我的妻子来信说她把配给供应本弄丢了。整整一个星期，她和孩子只得靠在住处周围找到的一丁点东西以及豆汁——一种在豆腐制成后澄在锅底的发酸的青灰色残汁，这种豆汁十分便宜，几乎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副食店里吃到——来勉强维持生活。我已写信给杨，让她在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探亲日来这里，但不知道她能否来。第二天，当我在院子里碰见富尔康普尔时，我的精神一下子恢复了。他告诉我，他已见过我的家里人，他们肯定会来这里的。

富尔康普尔同我一样是个中法混血儿。早在童年时代我

就对他略有所知。只是在良乡监狱里，他才成了我的好朋友。他所得到的每一点东西，如家里寄来的烟和食品都与我一起分享。他最近刚转为刑满就业工人，所以偶尔能有机会进城。我开始越来越经常地依靠他作为我了解外部世界的耳目。他总是乐意帮助我。但不久这给我们两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大年初一那天晚上，我的那几个喜欢偷鸡摸狗的朝鲜号友决定采取单独行动来增加我们囚室的食物供应。为此他们已作了好几天的准备和观察。当他们的计划开始实施时，我们全都参加了进去。我们等看守回家去与家人团圆，囚犯组成的荣誉巡逻队走过我们的牢房之后，就偷偷地急奔厨房，安排几个人担任警戒，其他人开始行动。有一个朝鲜人迅速将其他囚犯每人一节藏在衣服下面带来的五节竹杆连接起来，然后在杆头上系了一个非常结实的铁丝钩。象往常一样，厨房的窗子留着一条小缝用来散发蒸气。我们前面的案板上放着一大堆新做的豆腐。我们早为此准备好了水桶。新鲜的豆腐十分坚挺，铁丝钩一钩上就钩住了，如同变戏法一样，从桌子上高高升了起来。这个朝鲜人接着钩了一些白菜叶子和一整捆粉丝。我们准备到此为止。但同囚室的两个日本人中有一个叫义田的家伙，从美食家的角度提出意见，说没有酱油调料到底算什么东方饮食？他将自己的喝水杯子拴在铁丝上，以令人难忘的镇定准确地将自己的杯子伸进放豆腐的那个案板上的大酱油罐中，舀了三满杯倒进我们的桶中。回到囚室后，我们用一个公用脸盆炖了一大盆菜，放在外面过道的炉子上加热。这真比我们晚上吃得东西还要丰盛！

正如富尔康普尔所断言的那样，我的妻子在探亲日——2月11日来到这里。我们在正门一侧白石灰警戒线旁的桌子

那儿谈话。探视结束后，我比见面前更加消沉了。即使我们在警卫的监视下交谈的都是些陈词滥调，但也十分明显地听出她和孩子们的处境极其困难。这次小儿子荣荣是随他母亲一起来的，他庄重地递给我一小包饼干，我竟自私地接住了，根本没有想，他也许同我一样非常需要这些饼干。那天晚上，当我吃着饼干时，我默默发誓将来总有一天要百倍地报答他。他们临走时，我曾问一位姓王的看守，一个正直的小伙子，我能否从自己挣得的零用钱中拿出三元钱给他们，但我的妻子拒绝了。她说，什么也不需要。政府对他们照顾得很好。她在这次探亲过后写来的第一封信中，告诉我那位王看守曾偷偷从自己的衣服兜中拿出三元钱塞给她。我马上到看守那儿去感谢他的好意。

"感谢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工作"。

我非常愿意努力工作，但是力不从心。肺结核病的复发使我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而且头晕仍不时地来折磨我。我决定到设在一层的医院看一看，因为李天友给我的药都是些阿斯匹林。在医院里我惊喜地发现主任医生是我的熟人，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姓阎的东北人，在移交处时他曾是我的第二任号长。

"唉，这不是法国鲍吗？"他和蔼地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和其他外籍囚犯一起来的。"我说道，接着向他谈了我的病症。对此他并没有感到吃惊。因为在1961和1962年间，我所认识的犯人几乎都患有肺结核。阎医生在我的右肺上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空洞，但承认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所能做的只是把我安排到干轻活的大队。两天后，我离开了朝鲜号友，搬到楼下与其他病号住在了一起。我和一个沉默寡言的

年老的蒙古人是这里仅有的两个外籍囚犯。李天友常来串门，他说我搬到这是很幸运的，他知道有许多犯人病的比我还厉害，但仍要在院子或工厂里完成定额。

事实上，在这些日子里，病囚太多，政府照应不过来。近两年来的饥荒不仅使死亡的囚犯人数大增，而且生病的和虚弱的囚犯人数更多。“五八五”营的病囚已爆满，而这个国家每一个监狱医院、轻活囚室以及每一个劳改营都同样如此。由于所有这些无用的躯体是不能产生出什么效益的，所以政府出于对囚犯们的福利的关心，作出了一个精明的解决办法：保外就医。这项决定允许那些病入膏肓的囚犯被送回各自的家中，他们或在那儿送终，或在那儿康复。总的来看，这些病囚死在家中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而且使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变得更好。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无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除此而外，看守也非常清楚，我的妻子对我是无能为力的。第一批保外就医了100人；他们在3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离开了。当时我们统统被叫出来跟他们道别，并听一个负责思想工作的看守向我们讲解保外就医的这个开明的新政策。

我们轻活大队的囚犯们都住在院内离厕所不远的帐篷中。我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干杂活，如用一块碎玻璃块刮树枝上的皮，然后再由其他犯人用这些树枝编制筐子。我所在的这个帐篷共有20名囚犯，囚室长是一个姓关的满族中年人。他稍显受到过西方文化的教育，整天哼着一支名为《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的调子，简直要使我发疯了。我们工作量减少，自然要相应地降低口粮标准。此时，我的口粮已降到28斤半，也就是说每月142个半窝头。这个标准不至于让人饿死，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令人安慰的是，作为一个外国人，

我从一个当年刚颁布的新规定中得到了好处，每顿饭配给我两份菜。这显然是因为外国囚犯很少有机会接到家中寄来的食物，所以应该得到补偿。尽管如此，我仍然常常感到饥饿。在帐篷里呆了一个月后，我要求返回原来的队干正规的工作。

“你的任务是听从政府的安排，”王看守说。“政府会照顾你的，把你的口粮标准问题留给政府去决定。当需要你离开干轻活的单位时，你就得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时，在我们的帐篷中发现有一个告密者，这使我大为震惊。也许是我对清河农场犯人之间那种团结一致的印象使我放松了警惕。事实上确有不少犯人热衷于相互之间的监视。那次告密事件发生在我快吃完午饭，上工铃响的时候。由于长期以来的习惯，我吃饭很慢，铃响时把我吓了一跳。

“在我没有吃完饭之前，我不想干活”，我嘟囔道，狼吞虎咽地将剩下的饭吃完。这按中国的话说就是“没有吃好”。第二天，一个看守来到囚室，他命令我对自己说的伙食不好——汉语就是“没吃好的”——的言论作出公开交代。我毫无提防，一下子惊慌得不知所措，我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没有多少用处。幸亏好心的老关记得那次事件，因而替我说话。

“看守，”他很有礼貌地说，“鲍的话被人误解了，那天我听见他说的话了，他只是说没有吃完饭他不想去干活。”

另一个室友证实了老关的话，于是我就解脱了。我们一直未找出那个告密者，不过看守当场对这个家伙表示了不满：

“向政府报告号子里发生的事情是好的，但你必须坦

率、诚实。如果你把政府当傻瓜，为泄私忿而去打报告，那么一切后果必须由你自负。”

5月底，东楼最后完工了，我们搬进了这里的一间新号子，这是我在中国监狱所见到的最好的号子。其形状同我和朝鲜人住过的那间屋子一样，只是现在都已装修完备，房间有了典型的奢侈品，石灰粉刷的墙，高高的天花板，两个采光很好的窗子，暖气设备，日光灯等。同时，地板上还有20个草垫子，一边12个，另一边8个。干部们对这个建筑极为骄傲，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做每一件小事，以保护好囚室。这就象我的一个陆战队朋友常给我讲述的新兵营的情况那样。比如说，我负责窗户的卫生，就必须先用湿报纸擦亮玻璃，然后拿一个锋利的小木棍将窗户各个角度的尘土清除干净。每天早晨都要检查是否有灰尘。我们的书、水杯、牙刷以及其他各种零碎用品都必须严格地放在规定好的位置上。看守要求我们要把木质地板擦得能照出他的影子。这一切与过去那种以肮脏出了名的中国监狱大不相同了。

大约在那个时候，监狱里发明了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活动，每周虱子大检查。我知道这个主意是聪明的，但我们采取的方式则是荒唐可笑的。囚犯们一个个一丝不挂地呆在号子里，两个人一组互相检查，就象许多顽皮的猴子一样，将对方身体上的虱子挑出来。我们必须极其小心地进行检查，因为谁要是窝藏虱子将会被指控为散布病菌。

6月中旬，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笼罩着良乡监狱。国民党妄想利用民众因饥荒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在沿海几个不同的地点登陆。然而象历次一样，他们打错了算盘——国民党人真是天生的笨蛋——他们希望的群众暴动结果变成了反对他们侵略行径的运动。尽管他们从未成功过，但他们的

潜在的危险被认真地重视着。我们的通信特权被中止了。探亲特权被取消了。而且每次的学习会和阅读时间都被迫集中学习、讨论有关台湾集团的威胁问题。然而，新措施中最不好的是晚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从黄昏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前，监狱的每一扇窗户都必须严严实实地关上并挂好窗帘。我从未彻底弄明白这样做的道理，不过我猜想这可能是为了防止囚犯们传送和接收信号。6月份是北京最热的日子，对人是个可怕的考验。另一个号子里的一个犯人在这场考验中出了麻烦。那些天，我们许多囚犯在这门窗紧闭、闷热难忍的屋子里难以入睡，常常看到不少人影半夜就爬到窗子旁，以便当窗子允许打开时可以享受第一束太阳光。另一个号子里的人从3点钟就起来一直站在窗户边，并将窗帘拉开了一点，透过露出的一条小缝向外凝视着。大约4点钟左右，当他发觉东方渐渐发白时，他猛地打开窗户，欣慰地舒了一口气。尽管是自言自语，但声音却大得使别人都能听见。

“谢天谢地，”他说，“白天终于来了。”

第二个星期六，当每周生活检讨会开始时，一个管思想的看守出现在号子里。使大家普遍吃惊的是，他让这个犯人站起来，向其他犯人们及政府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如果交待得全面、老实，政府将对他宽大处理。看守说完后就转身大步走回自己的办公室，而这个可怜的囚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快点交代吧，”号长冷冷地说，“你已经听见他说的话了。”

作为这个小组的头头，他又能说别的什么呢？命令就是命令，即使他根本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事。

“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这个可怜的家伙申辩

说。

“想想看，”这会儿号长以帮忙的口气说。“想一想，可能是什么事。”

大家在唉声叹气和痛苦中过了很长时间，最后号子里的一个犯人——显然是他告的密——指控他盼望着国民党反攻回来。那天早晨，当新的一天到来时，他不是曾欢喜若狂吗？原来是这件事……那位囚犯极力否认有这样的想法，但当局这些日子正在开展打击坏分子的活动，所以看守們拒绝接受他的否认。我们开会对他批斗了三天，直到最后他低头认罪，承认说，他的确曾盼着国民党回来。

在卫生部的一个X光小组确诊我患有自己早已知道的肺结核后，我又一次搬家了。这次搬到了一个专门的病囚室，我又住到了第四层。当我看到我的新号子的头不是别人，而是李永俊时，我真是吃惊极了（不过我应该早就想到的）。我不清楚他是如何混到这儿来的，但上帝知道他诡计多端，一定想出了某个比牙膏的把戏更为巧妙的办法。曾有几个精明的家伙企图用牙膏皮来达到自己逃避劳动、住进病房的目的，但结果失败了。他们的办法很简单：从牙膏筒上撕一小块铅皮，粘贴在贴身内衣下的胸上。这样X光就会断定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他们本来以为铅皮会被看成他们肺部的阴影，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当他们接受检查时，医生看了一眼荧光屏，就把一个看守叫来，宣布这两个人已经死亡。他们的骗人把戏就这样结束了。

不管怎样说，我又与李永俊住在一起了，并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李永俊马上偷偷塞给我一包香烟。他解释说这是他利用在清河农场学到的一整套服务技能从其他囚犯那里换来的。李永俊的手艺中现在最吃香的是他的针线活。他为囚犯

们缝裤子和上衣，甚至还用囚犯们想方设法弄来的旧布做帽子。李永俊的手真是无所不能。

从各方面来说，病囚室的生活是相当好的。

根据新的规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仅每顿饭额外多得一份蔬菜，而且一个月还发给300克烟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的食物够吃了，但烟叶有助于我忘记食物的缺乏。与我住同一号子的一个犯人由于饥饿的折磨，使他对食物的渴望到了近似发疯的地步。他总是抱怨人们在分发窝头时对他捣了鬼。其他人吃的窝头要比他的稍稍大一点。开始，李永俊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提出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与自己的那一份窝头交换。这样交换了没几天，他的偏执狂又发作了。他臆断在这种交易的后面肯定有一个更恶毒、更狡猾的暗中策划的阴谋。李永俊说，好吧，从现在起你可以从厨房端来的盘子中首先挑选窝头。真令人难以想象，我们看着这个人一个一个地打量着窝头，进行着估量和比较（规定不许用手摸），最后再从一大堆窝头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但即使这样，有一天他又不干了。那天，他对窝窝头精心打量了一番后，抬起头转身提出责难："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总是将最小的窝头放到上面呢？"

从此以后，李永俊不再迁就他了，他命令这个囚犯拿指定的那一份窝窝头，并且不许他抱怨。号子里的另一个难忘的人物是一位姓翁的老家伙，他曾经是北洋军阀的医生，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军医。他有时去给李天友和阎医生帮忙。但他们很不愿意用他，因为他是一个使用草药和针灸治病的传统的中医医生。在那个时期，这一独特的民间科学受到压制，不象现在这样受到青睐。大多数囚犯常常无礼地称老翁为"蒙古医生"，这是中国对江湖医生的一种别称。他冷漠

他忍受着这种嘲弄，自告奋勇地为那些自愿接受他治疗的人扎针。但愿意接受针灸治疗的人非常少。后来有一天，一个看守牙痛得十分厉害，由于某个原因那天他不可能被送到北京去治疗，阎医生给他开的阿斯匹林止痛片毫无效果。在痛苦不堪而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把翁叫来给他扎针。对翁医生来说，解除牙疼如同儿戏一样。因为针灸是治疗牙痛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翁一下子成了英雄。从那时起，他开始与李天友和阎医生一起为犯人治病。我曾患过牙痛，也是翁用了大约几秒钟时间就治好的。但最为离奇的是他治疗我们当中的一个癫痫病人的方法。当这个病人发病时，他就将许多针扎在这个病人的上嘴唇和脚趾上，每次都使其平静下来。这一切真令人不可思议。

9月份，李永俊被查出身体很好，不能再住在我们这儿了，尽管他耍尽了花招，还是没有奏效。他的位置被一位叫周福瑞的占据了，这是一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曾经是北京附近一个矿区的教师，因在教育问题上谈了自己的看法而犯了错误。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教师，当党的基层组织的一位负责人要求大家提建设性的意见时，他就作了不到20分钟的发言，建议整个学校的教学工作由专业人员负责，而不是由党的干部来负责。党的干部应更多地去关心思想教育，而不应过多地插手学术问题。这样，他被指控犯有攻击党的领导的罪行。

“他们对我的发言平均每一分钟判一年刑”，他对我说道。

周的下场使我想起了一件小插曲，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跟同号的一位特别可憎的、喜欢告密的家伙开了一个

小玩笑。当时，我们正在谈论判刑的事，我告诉他我的刑期应该是一天。

“你说的是一年吧？”他纠正我的话说。而他知道一年也不对，他感到困惑不解。

“不”，我坚持说，“一天”。

他向上报告说我嘲弄劳改制度，当看守不出我所料来要求我作出解释时，我早已准备好了答复他的话。

“他肯定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以完全无辜口气说道：“我的意思只是用大跃进的精神来考虑我的刑期。”

看守耸耸肩，转身返回他的办公室。我用不着再说什么了，因为大跃进的口号就是“一天等于20年”。

在这些日子里，我与我的朋友富尔康普尔在院子里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我通过他了解了许多有关刑满就业工人的生活情况。也许，一个刑满就业工人的生活境况要比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

“你知道重新回到社会意味着什么？”富尔康普尔有次曾以中国人特别爱用的那种启发性的自问自答的方式问我。“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从一座楼搬到另一座楼；意味着吃饭付钱。”

刑满就业工人同我们完全一样，也编成几个大队，晚上同样被锁在他们的小屋里，和我们同一个时间起床，和我们干同样的工作，同样有每天的学习会，每周的自我检讨会，以及每一季度的思想总结会；那种自动遵守、相互监视、控告和揭发的做法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如果有钱的话，他们可以一个月探两次亲。但如果他们的思想出现错误时，也会被关进禁闭室。他们每月平均工资为20元人民币，其中大约15元花到吃饭和抽烟上，其余的则花在衣服、电费以及劳改

营生活的其它方面。最后就剩不了多少钱去北京了。不过在放电影时，前十排座位是留给他们的，这对他们来说，倒是挺神气的。

我经常与一位姓田的看守长讨论刑满就业工人的处境。我越来越喜欢把他当我的一个朋友和听我忏悔的神父。我们经常每月至少谈一次话，他积极鼓励这样的谈话，因为它有助于培养犯人对政府的信任感。象我所认识的所有优秀的看守一样，田看守长严格地遵循毛泽东的原则，如果犯人心里有话，就让他一点都不留地说出来，毛泽东曾说过，言者无罪。

有一次我问田看守长："如果我们刑满释放后仍干着同样的事情了此一生，我们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改造自己又有什么用呢？"田看守长连眼睛都不眨地耐心说："你把你的政治观念都搞混了，我担心你现在离政府越来越远。鲍，你千万别忘了，如果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是一座监狱，而对刑满就业工人来说则是一个工厂。政府非常周到地照顾着他们。你们许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时，没有经过什么培训，没有任何技能，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培养你们掌握了适应这里工作的技术，难道你真的愿意让所有这些时间和钱财都白白地浪费掉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田看守长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他继续从容地说：

"刑满就业工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得不对他们加以提防。不错，他们已经赎罪了，但一个从未被判过罪的人，发泄不满是一回事，而对于一个已经犯过罪的人来说则是另一回事。鲍，如果你把一个盘子掉在地上摔碎，无论你怎样小心地将其重新粘合在一起，它总还是会有裂痕的。既然这

样，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从事他所熟悉的工作呢？他们为政府出了力，同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也会生活得更加幸福。这是符合逻辑的。”

我在良乡监狱期间，翁老头成了一名刑满就业工人，但是那时他已年迈，不能工作，不能为社会做出任何贡献了。事实上他也根本不想干什么。一天下午，当我下楼去洗衣房时，在楼梯上碰巧遇见了他。他现在已搬到这栋楼的一个角落里，那里住着他们这些不能参加劳动的老家伙。他和其他9个人一起住在一个非常大的房间里，合用一个床。这是良乡自己的“老年公寓”。从外表看上去，他比我们上次在茶淀火车站会面时好多了，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他。

“年轻人，”他用英语说：“一切事情不会好到哪里去，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它该是怎样就是怎样。我想把我的知识贡献给国家，可是国家并不需要它。我愿意去教学或从事翻译，但他们也不需要这些。我现在每月靠15元钱、30斤口粮生活。我觉得这样很好。当我省下一点钱时，我就进城美餐一顿，看一场电影，或者买一本书。愿意的话，可以来我这里借书看。并且我们可以一块儿说说英语，我才不管他们说什么。”

翁老头什么也不在乎了，他已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再也不怕看守的任何恫吓了。几个月后，当我正在擦窗子时，我看见一个看守正将他的胳膊扭向背后，推着向禁闭室方向走去。我不清楚他犯了什么罪，但我肯定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

李天友后来曾对我说，“翁的问题主要是他太美国化了，他改不了了。”

我在良乡监狱迎来了1963年。由于我的思想有了明显的

进步，田看守长任命我担任副号长，给周福当副手，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是相当高的荣誉。尽管那时我仍营养不良，根本没有康复，但我已适应了这个地方的节奏，并且居然莫名其妙地感到幸福。只是家中传来的消息很糟，我的妻子第一次转弯抹角地提出了离婚的可能性——这是她重新获得一种象样的生活方式的唯一现实的机会。但是对此我能做什么呢？她走的是一条道，而我走的是另一条道。我一切的希望就是她能找到一条摆脱贫穷和屈辱的途径。

1963年春天过去，夏天来临了。我们犯人的生活条件有了稍微的改善：现在我们每周至少吃一次大米饭或小麦面。作为一个病人，我的工作只是一些轻微的小事：从溶渣堆中拣金属渣，从铝铸件中清扫沙子。我按照田看守长对我的要求去做，越来越投身于学习和自我批评中。当我的热情得到一定的鼓励时，我作出了更加积极的反应，更加自觉地投入到有关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为人民服务以及其他时髦话题的冗长而又漫无边际的讨论中去。作为副号长，开讨论会时我必须说得多一点，但我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催促。我越来越不在意过去我所奉行的客观对待生活的态度，几乎变成了一个与孩提时天主教教会学校培养我的那种以冷静的理性方式生活完全不同的人。如果你喜欢说我被洗脑了也行。或者说，我只是接受了良乡生活与我做的交易：按照为你选定的路走下去，不要惹麻烦，你将会过得舒适一些。我接受了这个交易。因为它使我生活得更容易一些。

我唯一一次不好的表现是企图给驻北京的代理法国利益的领事代表送信。一想到法国遗弃我的做法，就象有根针扎在我心里似的痛。当然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足以让法国外交部作为一个外交问题给予关注，但令我痛心的是我持护照

的国家已将我从地球上抹掉了。我几乎对法国完全失望了。自我关进监狱到现在已经6年了，除了收到两条香烟、一点儿钱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收到过，我的家中也只收到了可笑的一点儿钱。而驻北京的代理法国利益的领事代表从很早时候起就与我很熟了，尽管这时法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但他被外交界看作是法国在华利益的代表者，而且法国政府为此给了他可观的薪金。所以我决定采取行动。但这样做我就不得不违反狱规。我请富尔康普尔再去北京时替我向代理法国利益的领事代表转交一个便条。我在厕所里将便条偷偷塞到他手里，便条上用法文写道：

我仓促地给你写了这封信，富尔康普尔先生冒着很大的风险答应将它转交于你。你已从我的妻子那里知道，我被判了12年劳改。请你放心，中国当局给了我应有的照顾。但我家庭的境况不好。我的要求不高，希望你能给我一些衣服和一月两元零钱，帮我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先感谢你。

文盲的富尔康普尔毫不犹豫地拿上了这封信，我把这看作是一种珍贵友谊的表示，因为这有可能是一起谋害毛泽东的阴谋，亦可未知。但他却欣然带上它，只因为这是我的信。

然而他和他带的便条一起被发现了。

我错误地以为刑满就业工人不象我们这些人要遭搜查，但是前门处还是被警卫挡住进行了搜身。当我被叫去见田看守长时还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鲍，告诉我，"田看守长开始说道，"你对自己的思想状况满意吗？你认为你真心拥护政府了吗？"

这是猫捉耗子的老把戏。看守们从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话，而喜欢通过一系列巧妙安排的问题，转弯抹角地将

话题渐渐引到他们的决定上来。这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但就我来说，尽管我现在百分之九十已猜测到了其原因，但我不得不装糊涂。因为一个犯人如果很快地认输就会丢面子，而奇怪地是看守也是如此。所以应允许他将自己的小把戏演完。

“政府从不无事找事，”看守继续说，“它总会知道你所犯的罪。”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谈话就这样继续着，五六分钟后，当田看守长决定结束这场谈话时，我们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关键问题。

“鲍，你知道，犯人是不允许与劳教人员有联系的，更不用说与刑满就业工人联系了。但你知道给外面送便条，特别是给外面送用外语写的便条的处罚吗？”

我一切都坦白了。那天晚上，劳改营副看守长用扬声器高声指责我们。他的话听起来相当不妙。

“我厂有两个人犯了一件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曾企图给一个帝国主义代理人传递情报。他们一个是刑满就业工人富尔康普尔，另一个是囚犯鲍若望。多亏警卫的警惕性高，使他们的阴谋破产了。他们两人必须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彻底的交代，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命令立即将这两个人关进禁闭室单独监禁。”

可怜的富尔康普尔*，这个无辜的送信者，他被单独禁闭了4天，但我较为幸运，阎医生检查了我的身体，告诉田看守我的身体不能关禁闭。他不能保证我在禁闭后还能活下

* 路易斯·富尔康普尔于1964年2月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被允许离开中国，他现在在巴黎生活和工作。

来。他们将我送回了号子。

“你应该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对它的敌人会象我们这样宽大，仁慈，”田看守对我说，而我是相信他的话的。“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如此伟大的原因所在。鲍，应该好好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

他让我给他写一份有关我的罪行的报告，我用五张篇幅叙述了事件的整个情况，后面附上了我偷偷递给富尔康普尔的便条的中译文。然后我等待着处理。几天后，我被叫到了一个新来的管思想的看守的办公室，这位新看守员身高体壮，留着胡子，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他说：

“你的交代虽然不够深刻，但还过得去。你把这个便条翻译出来很好。你很幸运，当你要求法国人帮助你时并没有攻击人民政府。不过，你应该清楚，如果他愿意帮助你，无需你请求，他早就会这样做了，他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在这件事上，我们认为你的动机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决定对你宽大处理。从现在起，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而不必求助于别处。如果我们能帮你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将尽力而为；如果我们解决不了，我们起码可以向你作解释。”

“政府已为我做得够多的了，”我强调说。“我不能再企求什么了。此外，领事代理人从法国政府那里拿钱，以帮助法国公民，所以帮助我是他的义务。”

“你可以采取别的途径试一试。”

“但这些途径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那么，好吧，现在你有什么要求呢？”

“允许我再给他写一封信。”

“鲍，你知道监狱的规章，犯人只允许与他们的直系亲属通信。但我认为你可以要求将你的情况作为特殊的例子。

你写一个申请交给工厂厂长。”

我对自己的情况考虑了好几天才开始写这份申请。重要的事情是既要提出我的要求，又要合乎正确的思想逻辑，这样才能送到。老一套的办法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下面是我写的信：

给工厂厂长的报告

第七大队第四小队的犯人纯若望敬向厂长提出以下请求：

近来，参加了一些学习会后，我为一系列思想问题所困惑，这些思想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将会对我正在进行的改造带来不好的影响。正因为我完全信赖政府，所以我现在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暴露出来。我希望政府对这个报告给予充分考虑，并帮助我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对我进行必要的教育，以再次纠正我的错误观点。

从有关被印度扩张主义者非法关押在集中营的中国侨民所受待遇的报道（《人民日报》1963年8月12日和28日）中，我得知印度扩张主义者禁止中国领事馆官员与侨民之间通信，不让他们进行看望并为难民提供所需要的物品。并且这些被关押的中国人每月只准给中国领事馆写两封信，而且只能用英文写。由于印度扩张主义者强加的无理限制，使被关押的难民现在正生活在极不安宁和穷困的环境中。

我对这些可耻的事情的最初反应是愤慨和震惊。不过我必须承认，这种反应很快被另一种完全不同、非常危险的想法所代替。换句话说，我开始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思想。我问自己，“为什么中国政府指责别人所做的事情而自己也在做

呢？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求别人去做的事，而自己不愿意去做呢？

说得更具体一些：中国政府指責印度扩张主义者不许中国领事馆官員看望被非法关押在集中营的中国侨民，或为他们提供必需品。中国政府谴责印度扩张主义者在通信问题上实行不人道的限制。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正确的、值得赞扬的。它反映出中国对自己人民的关心。但中国自己又做得怎样呢？

几个月前，我要求准许我给法国人写信，寻求一些物质上的帮助。虽然×并没有被中国政府承认为一个正式的外交官，但他负责照管法国及法国侨民在中国的利益。过去我曾得到了他的一些小小的帮助，而且政府也允许这样做。如果你仔细查查我的档案，你就会注意到那个×，1959年3月曾送给我一条“前门”烟，这年12月又送来一条。1962年10月，送来总计15元（6美元）钱。可我提出给他写信的要求至今还未得到答复。中国的难民每月还允许写两封信，而我連一封信也不允许写。中国难民必须用英文写信的事实已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同样地，我的所有信函都要求用中文写，而中文并不是我的母语。这样，我被严重的思想问题所困扰，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中国的一句成语是“以身作则”。但是在政府要求别人做她自己不愿做的事时，我怎样能按政府要求的去进行改造呢？我完全清楚我在这儿表达的想法是错误的，同时也清楚这些想法是对中国政府的诋毁。不过这些想法存在于我的心中，如果我对政府隐瞒这些想法，那我就是对政府不忠诚。我所以有这样不正确的思想是不奇怪的——毕竟这就是我进监狱的原因。我的目的是将这些想法在这儿暴露出来以接受必

要的教育加以改正。我特此要求上级对我的思想状况给予一些考虑，给予我迫切需要的帮助。

信交上两个多星期才有反应。显然我的特殊情况被北京的公安机关反复研究着。最后我被叫到一位负责管教的薛看守的办公室。从他的态度上我马上可以看出事情并不太坏。他有点粗鲁，爱管闲事，但总的看来是比较随和的。他说：

“你很有胆量在接受劳改期间发表贬低政府的言论。你是否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吗？”

我恭顺地回答说：

“知道，看守。我清楚这一点。但我希望通过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即使这些思想是错误的，不好的——暴露给政府而使自己成为诚实、坦率的人。我受的教育是，犯人如果对政府暴露自己的想法，不管正确与否都不是犯罪，不会受到处罚。”

“谁说过任何关于惩罚的话？”薛生硬地说。

“请允许我报告政府，你确实提到了‘后果’这个词。”

“噢，是的，”他说，“我的确说过。”

这是对我的一个小小的暗示。

“不过，”他继续说，想摆脱困境，“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继续保留这样的邪念，后果将是可怕的。你清楚政府总是乐意倾听你的意见，并帮助你解决问题，现在请告诉我，你真正想从这个×那儿得到什么呢？”

“我愿意要一些物质上的援助。”

“政府正照顾着你的需要。”

“我知道。但我希望也能够帮助我的家庭。”

“对他们不必担心，”他说。他象所有政府官员在谈到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时总用的那种慈父般的许诺口吻，但任何能帮助他们的事也没做。

“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社会，政府体谅人民的困难。”

“我只是想减轻政府的负担。”

那不过是个谎言，我们两个对此都明白，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薛满意地接受了这一点。

“你的态度是正确的、很好的。但是还是让政府作出决定吧。现在，我们重点谈谈你在报告中所写的事情，我们从未拒绝你给这个法国人写信的请求。我们只是正在研究这件事。你自身表现出来的急躁情绪事实上反映出你并不完全相信政府。政府将在适当的时候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给这个×写信。但你知道不能保证他会帮助你。

“请允许我向政府报告，我有了一个新的错误的思想。”

这位看守听了表示不满意，他充满疑虑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的思想？”

“我有点担心，因为你一方面告诉我可以给×写信，但同时又断言将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我的信将不会邮出去。”

“鲍，你很诚实，但又疑心太多。你尽可以放心，你的信将会被邮走。因为我了解资产阶级的本性，所以我怀疑他是否会帮助你。但不去管它，先试试吧！”

我向他表示感谢，准备离开。但薛言犹未尽，看来他要我对自己的行为有个正确的态度后才放我走。

“你现在认识到对政府提出这一切毫无根据的指责是犯了怎样的错误吗？”他问道。

“是的，”我恭顺地说，“我请求政府原谅我。”

“那好吧！”他满意地说，“现在你可以回到队里去

了。”

当袋正走出他的办公室门时，他又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你的信必须用中文写。不许在上面写回信的地址，只准写邮政信箱。”

第十五章

代理法国利益的领事代表从未给我回信。我一共发出了18封信，但他一封复信也没有。我将自己的痛苦之情隐藏在沉着冷静的外表中，并使自己更深地投入到良乡的生活急流中去。这时，我已经很善于讲解学习材料了，成了这方面的一名绝对的明星，只要看守要我讲什么，我就能讲什么。但他们总是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来，这就是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对不忠诚于马列主义的俄国人总是耿耿于怀的。

我的能言善辩使我得了一个外号，他们常说我是“故事家”，我同伴中能与我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地领导学习的人是艾明，他们常称他为“理论家”。艾明是个非凡的人，他不仅曾是个党员，而且还是个军队里的上校政委，参加过长征。我们两个人在特别长的学习会上发言，总是令人神往：我的发言有声有色，他则能插进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

了，我要他给我举一个使用辩证法的生动的例子，使我可以在学习会上使用。但他却提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

他告诉我，可以设想一批西方记者被邀请到北京并受到了政府的高规格的接待，政府满足了他们所提出的参观与会见的要求，提供给他们以最好的食物与住处，临行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几天后，在西方报纸上出现了第一批文章，这些文章全都是侮蔑性的，对我们的政权泼脏水。北京的统治集团大为愤怒，但这位伟大的人本身却仍然声色不动，异常平静——他会说，“他们写了这些东西，我们应该高兴。如果资产阶级报纸表扬我们，我们倒是应该开始担心了。”

几天以后，又有一些报纸和杂志到了北京，在这些报纸、杂志里，充满了对新中国的生活所作的阿谀的报导，党内上下为之愕然，但这伟大的人又是例外。“这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会奇怪地问。“这证明即令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已取得的进步。”

艾说，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它能满意地回答任何问题。

我思想上的进步，使我获得被指定负责对50名特别落后的文盲进行教育的荣誉。他们在一间特殊的号子里，我们其他人早已折服的新路线对他们基本上不起作用。他们被委婉地称为“文化水平低的人”。他们大多数是农民、体力劳动者和智力低下的人。在以往的学习会上，他们不是睡觉就是无精打彩地呆坐着。显然，他们脑子里，什么也没有装进去。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来改造他们，由看守指出他们改造的结果将被看作是对我改造的考验。我将这项工作看成是对我的最大挑战。

当我第一次进入这个上课的号子时，我的学生们热情地

欢迎我。我愚蠢地以象艾那样的人能听懂的特殊政治词汇给他们讲课。结果是一团糟：我看到他们的眼睛象巴甫洛夫学说中所说的条件反射地呆看着。显然，我必须更直接了当地讲课。

“你们知道赫鲁晓夫吗？”我问

“那是什么东西？”他们当中一个人问道。我敢发誓，他甚至连赫鲁晓夫是个动物、植物还是矿物都不知道！我不得不解释说他不仅是个人，还是苏共的第一书记。

“啊，”他们发出早就知道的欢呼声。“老大哥。”

这该是我启示他们的时间了。

“不，他不是老大哥，”我语调放慢而坚定地说。“赫鲁晓夫是个坏蛋！”

这一下，群众有了反应。他们表现出怀疑、困惑或愤怒。有些胆子大的人要我在谈到我们伟大的盟国时要注意点。但我对赫鲁晓夫骂得更厉害了。这些人开始窃窃私语，然后激动地抱怨起来了。

“我们警告你，鲍，”其中一个人说，“你再这样说，我们就汇报你。”

他们已在磨刀嚯嚯了。我又骂了一句，整个房间爆出了一片叫喊声和抗议声。这时，有一半人在叫看守，没有多久，看守就来了。

“这儿怎么了”？他在门口问。“你们是这样学习的吗？”

“看守，”这一群人中一个人代表大家说，“对不起，但是鲍在这里辱骂老大哥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他说不好，但是看守知道他说的是谁。他举起了手，整个房间静了下来。

“听着，”他慢慢地说，“赫鲁晓夫不仅是个坏蛋，他

是世界上最大的坏蛋！”

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我的50名学生抬头看着我，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现在，该轮到他们学会黑就是白了。我然后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将我能想起的细节绘声绘色地向他们解释，这不可思议的事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三个月里，我遇到的问题是我无法使他们认真对待阿尔巴尼亚。在我告诉他们，我们这个勇敢的小盟国人口只有100万左右时，他们以中国人的方式嗤之以鼻。只有100万！根本不值得考虑！

但是苏联却是一个大的邻国，是真正的威胁。艾明告诉我，从一开始苏联就是个威胁。

“我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们，”他回想起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与苏联热烈的日子时说。“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的是不同的。美国人到中国来时，他们占用了最好的饭店、房子和公寓，但我们可以说他们本来就是这样行事，还能希望资产阶级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呢？但是当俄国人来的时候，他们要我们给他们造新的旅馆！”

到1963年底，我们已经可以肯定，犯人中没有一个人不非常恨苏联的了。我们都已经全部纳入正轨了。但是，在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在我进行这种强化教育的课程中，他始终感到困惑不解和痛苦，课程结束时，他将原因告诉了我。他是在1956年被捕入狱的，因为他对苏联说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他在脑子里不论怎样翻来复去地考虑这问题，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难道他不应该受到赦免么？我答应将这事向上级报告。但用看守却毫无困难地解开了我的疑团。

“鲍，首先，”他对我说，“这个人在1956年出事是因为

他攻击党对俄国人百依百顺。如果他只攻击俄国人，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就不会被判这么重的刑了。此外，他说过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的话现在看来可能是进步的话，但是，在1956年，这些话都是反政府的宣传。你懂了吗？”

我懂了。我毫无疑义地接受了这个解释。这时，我是个地道的模范犯人，有一次田看守批评我在熄灯后一分钟时还在号子里说话(因为我想将话说完)，我竟然真诚地感到悔恨自己。他对我提出警告说，一分钟的自我放纵可能会使别的犯人不能很好地睡觉，而这又会影响到工厂的生产。怀着一个真诚改变信仰的人的热情，我开始寻找能为政府多做些事和帮助其他犯人的新方法。这种热情更表现在我相信法国已弃我于不顾了。那时，要我们学习的模范榜样是好战士雷锋，他身后出版的日记已成为全国的榜样。他日记中的思想是：在世界上还有人受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他和任何中国人都不可能安心。除了雷锋，还有上海的南京路上的好战士，他们是当代的圣人，他们经常自找苦吃，例如，不肯化几分钱乘公共汽车，而宁愿徒步来回走40公里到他们劳动的地方去。为了学习他们，我就在天暖的月份里打赤脚，为政府节省皮鞋钱。

在田看守手下，我的改造显得比较容易，因为我敬佩他的人道主义和诚实。他象第一监狱的赵看守一样，他能够看透犯人的脑子，在犯人敢于将自己的话说出来以前就能抓住犯人的思想。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在1963年逐渐缓慢地有所好转，他主动按照每个人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劳动产量来增加犯人的口粮。与其他看守不同，他从不用口粮作为威吓犯人的手段。我们以绝对的忠诚报答他对每个犯人的个别对待。在

他管教下的犯人被关禁闭的人数是最低的。每个犯人都循规蹈矩。

即令发生了很不好的事，田也能用他自己的应用心理学来控制他所负责的犯人，而不借助于武力。我能回忆起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关于逃走的事。1962年10月，饥饿与混乱在营内达到了高潮。天黑前不久，他将大队集合起来，五人一排，叫我们走向大门。我们在距大门20码处停下来，他爬到一个凳子上对我们简短地讲了话。他说，干部们一直听到谣言，说在犯人中有些坏分子在谈论要逃走。这可能对其他犯人有危险的腐蚀作用。应该采取某些措施。他命令警卫打开大门，这是多么戏剧性的举动啊！

“我不希望你们有思想负担，”他板起面孔说。“我们现在给你们以机会。既然你们中有些人在政府背后一直在谈论要逃走，现在你们有机会公开地这样做了。现在你们可以走出大门，不会有人来拦阻你们。”

他走下凳子，向主楼走去。一会儿，他停下来，转过身说了最后一句话：

“在你们离开这里以前，最好先想想今后你们到哪里去吃饭。”

当然，没有一个人走出去。我们顺从地列队回到了号子，感到有窝头吃真幸福。正象俗话说的那样，他使我们完全听命于他。在需要时，他也是很坚定的，但他总是避免使用威吓。例如，有一次，他使一个犯人感到难为情而自行改正错误。这个犯人很老了，有60多岁，脾气暴躁，而且有些衰老了。不知什么原因，他对他的家属发了脾气，在探视日骂了他们，并且将他们带来的包裹掷在地上。这种行为是令人震惊的。但田很注意，没有简单地使用关禁闭的办法来解

决这个问题。相反，他将我们集合起来，叫这个犯错误的犯人站在我们前面，对这个人作了一个小时的训话，说明他是个卑鄙的人。他结束讲话时，叫这个犯人写两份检讨，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他的家属。

另一次是与来探视的人有关。田故意假装没有听到一个心灵深深受到刺伤的犯人所说的不恰当和恶意的话。这个人的妻子和儿子来看他。儿子只有十或十一岁，带着少先队的红领巾，学习很用功。

“我是不愿意到这里来的，”儿子大声地说，“是我妈妈叫我来的。你是个反革命分子，是我们家的耻辱。你给政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你被关在监狱里是活该。我只能说你还是好好改造的好，要不然，你就会受到你应该受的惩罚。”

甚至警卫也对这一篇议论感到吃惊。这犯人含着眼泪——这本身也是禁止的——回到号子去，一边嘴里喃喃地说，“早知这样，在他生下来时我就该卡死他。”田连说也没有说他就让这件事过去了。

我见到田用武力的唯一一次是对付绝食的钟。他的名字叫钟高红。他是个高高的英俊男子，30多岁，曾在大学里读书，他的哥哥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师长。他是在1958年因发表激烈的反政府言论被作为右派分子逮捕的，从那时起，他一直为大国在导弹上花费大量经费而感到困扰。他满脑子都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事实与数字。他多次告诉我们苏联、美国和中国在复杂的军事武器上花了多少钱，并且说，要是将这笔钱花在食物上该有多好。钟选择绝食作为他个人的有效的抗议武器。第一次他绝食10天，但因他顽固不化被关了禁闭。他却反而因此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绝食是个有效的武器。这次他赢了一场自我虐待的战争并且说明了他的观点。他一

高兴，就恢复饮食了。但第二次绝食时，田就作好了对付他的准备工作。他让钟躺在号子的那个肮脏的角落里，等到他虚弱得站不起来了，田命令给他静脉注射葡萄糖。

“只要在打点滴，”田告诉他，“你就死不了。你就这样躺在你那个角落里好了。由你自己决定怎么办。”

钟不想永远这样半死不活，他放弃了斗争，再也不搞绝食了。

12月初起，有几个月我被分到一个小号子，号子只有五个人。这时。我已经正式不算病号了，这显然是又进了一步，北京公安局在准备研究怎么处理我。在那个号子里，最可回忆的生活就是打gin rummy（用两副牌玩的游戏）。我们的工作很轻，只是名义上的工作（轻微的园艺工作），甚至长时间的学习会也打发不了一整天，因此我就教号友打美国式扑克牌游戏。他们特别喜欢gin rummy，几个星期后，我就总是输了。这一年，还有一件意想不到的圣诞节礼物。李天友把我叫到他的医务室去，表面上是检查我的肺部。他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并且塞给我一瓶维生素丸。到这时，显然我的情况将有所转变，而且可能向好的方面发展。最近政府方面表现出许多迹象、许多善意。在圣诞节前几个星期，出现了一次“诱惑”。这次“诱惑”对我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1月底的一个下午，我被叫到监狱长贾的办公室去。在办公室里，有四名看守和他在一起。这是很奇怪的事。我胆战心惊地在角落里的凳子上就座。贾告诉我用不着老低着头。在经过例行的询问我的姓名、年龄、罪行后，他开始这次谈话了。

"今天政府有件很重要的事和你商量。这关系到你的改造进程。"

他停下不说了。然后是一个长时间的不祥的沉默。我仍然不说话。贾翻着几页纸。

"这儿说你是法国公民。你到过法国么?"

他想干什么?他完全知道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领土。

"你结过婚吗?"

又来了,这是他知道答案的问题。这是看守们的语言。

"报告政府,我有一个中国籍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他看来对我的回答很高兴。他已到了准备讲话的时候了。

"这样,鲍,按理你可能是个法国人,但是你实际上是中国人,是吗?在你的血管里流着来自你母亲的中国血液。你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你是吃中国食物长大的。你的妻子和孩子都是中国人。你甚至看上去也象中国人。在你身上哪里有法国人的迹象呢?"

这是他谈话的要点所在,他也知道我知道这点。他又进一步作了点试探。

"我没有感到法国人曾为你做了多少事。按我看,他们甚至看不起你。你知道法国人是种族主义者。你可以认为你自己是法国人,但是你认为他们也这样认为吗?对法国人来说,你只不过是个混血儿。法国领事的代理人始终没有给你回信,是吗?他会这样对待一个百分之百的法国人吗?"

贾打中了我的要害。法国领事的代理人对我和我家庭的这种胆小,没有良心的态度是我永远不能原谅的一件事。为了辩护,我侧面地说可能他没有收到我的信,但是这样说只

使我被另一个看守训了一顿。我是说政府说话不算话，没有将我的信件发出去吗？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人民政府是关心你的，”贾继续说。“政府给你吃的、喝的、穿的，甚至还给你零用钱。你对政府犯了罪，但政府还是从各方面考虑你，而你自己的人民却不管你。你想过这些吗？”

我想过吗！不过我没有得到他的这个结论。

“你曾经想过还有什么理由要坚持你的法国国籍吗？这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我们知道你想和你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你的罪行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困苦。你现在是他们的沉重负担，但你有一条出路。还有一个机会。”

我感到既兴奋，又害怕，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要来临了。我仔细地听着。

“政府只能根据你的行动来确定你是否改造好了。如果你真的对你过去的错误有悔改之意，你应该向政府证明这点。你真的想过新的生活么？如果想，就应该与过去绝裂。你应该决定是否仍然要与帝国主义保持联系，还是走到有光明的地方来。如果你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这就能向政府证明你已很好地接受了教训。这样，就没有理由再将你留在这里了，你就彻底得到了改造！”

贾的三段论法是无懈可击的。他所暗示的提议是值得考虑的。但是，我仍然有疑虑。

“象你这样懂外文的人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鲍，”他说。幸而我还清楚地保留着翁老头的形象。贾继续说。

“有不少外国人在为政府工作。他们的生活条件是优越的。但是，我们只能向你指出一条路。主意要你自己拿。”

“我不知道放弃我的国籍是否正确，”我说。

“我们没有要你这样做，”贾坚持说。“我们只是将事实摆在桌面上。只是要你考虑考虑罢了。现在不用说行还是不行。回到你号子去，考虑考虑。”

谈话结束了。我从凳子上站起来准备走了。一名管教看守突然灵机一动，他叫我到监狱长旁边的镜子里去看看我自己。我看上去象一个颜色憔悴的流浪汉。

“你的刑期多长？”他问

“12年。”

“你服了几年刑？”

“6年。”

“一半，”他说。“你想过没有，你能熬过下一个6年吗？”

他们把我送回号子。我神情沮丧，感到为难。如果他们告诉我的是真话，看来只要我放弃法国国籍，我就有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好机会。不管怎样，我得权衡各方面的情况，作出决定。使我下定决心的是艾明。他告诉我，对我这个难题的答案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们沿着菜地走着，他将道理讲给我听。这又是个一问一答的谈话。

“我们是什么，鲍？你，我和其他人？”

“我们是因为对党，对人民和对政府犯下罪行，被劳动改造的已判刑的犯人。”

“是的，但说得具体点。”

“我们是人民的敌人。”

“对了！你记得我有一次对你说的话吗？共产党人不认为应该对他们的敌人遵守诺言。他们认为任何阴谋诡计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可以随意使用这些，欺哄和允诺也包括在内。即令他们让你出去（对这一点是没有把握的），不

论你走到哪里你的档案也总是跟着你的，总是有劳改的污点。只要你再一犯错，你就又会回到这里来，那你就永远也别想出去了。但是有了法国国籍，你总会与我们有差别。你总是会有出去的希望，即令这种希望很小。放弃那张纸（译按：指护照），你只不过是另一名犯人罢了。懂了吧？"

"懂了，老艾，"我说。"谢谢你。"

"不用谢我。只要用你的脑子想。另外还有一点。共产党不喜欢背叛的人。"

这样，我没有上钩。我真对艾的意见感激万分。没有他的忠告，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1月13日，我又被叫去见贾。这次，有8个看守和他在一起。与贾一起坐在桌子后面的人是我在草岚子的审讯者。

"坐下，"他说。他的口气是非常友好的。我在小凳子上就座。

"我到这里来是为别的事的，"他不动声色地说。"我偶尔听到你在这里。我想来看看你进步的情况。"

这显然是捏造出来的原因，当然我不会去揭穿它。

"58年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你了。吸烟吗？"他扔过来一整盒中华烟，这种烟是毛泽东抽的。"说说看从那时以后你的情况。"

这个要求来自于一个审讯者，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按照我思想改造的脚印，详细地谈了我囚犯生涯的整个过程。我在谈话过程中，抽了五支香烟，只到下午五点左右，我才说完。

"看来，你是错误的人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方，"他说，将香烟掘灭，并做了个鬼脸。"现在你给我写一个全面的思想汇报。我要了解你的全部思想和看法。汇报

应说明你当时怎样看待你的罪行，现在又怎样看，你对政府判决是怎么想的。”

“这要花很多时间啊！”

“是的。”他转向贾。“给他所需要的时间和材料。如果需要，他可以不工作。”

在他叫我回去以前，他说了最后一句话：“继续好好表现。你不会后悔的。”

即令艾没有提出忠告，我也看得出这份汇报是极为重要的，这就象是参加期末考试。但是，我仍然对能否毕业不抱幻想。这样想只是完全的愚蠢。

我回到号子里开始写汇报。每隔一天，政府给我一包香烟。这次与在草岚子胡同时不一样，我的汇报是用中文写的，这是我在清河和良乡学习的成果。我花了2个月来写这汇报。

在我还没有写到一半时，1月底的一天，中午扩音器里传出了无线电广播的公报：中国与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强调其重要性，公告广播了二次。看守要我们在晚上的学习会上学习这个问题。

由于我是法国人，显然要我先发言。我说了一个半小时，从第四和第五共和国的简史、阿尔及利亚战争说起，一直说到中法烹饪及文化的比较。我没有忘记指出，中法两国都要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我说完时，田看守把我叫去。他要我告诉他，我个人对建立关系是怎样想的。

“这在国际上是极为重要的事，”我说。“显然，这关系是按中国的条件建立的。”

“你没有其他看法了吗？作为法国人，你没有个人的看法吗？”

"没有。"

"你是不是在想你可能获释？"

这是我的看守第一次说出这种话来。我认为在我的脑海深处的确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尽一切可能不去想它。而且我不会对看守承认有这种想法。这样做是太愚蠢了。

"我认为我的努力还达不到释放的要求，"我说，"我做的还不足以偿还政府提供给我的食物。而且，法国政府现在怎么会开始关心我呢？"

"鲍，你改造得很好了，"他说。

第二天，我的口粮增加到了44斤，而我的同号们只吃35斤。这意味着中餐可以多吃一个窝头，晚上可以多吃一个半。这种对我身体的突然关心却是很烦人的，因为我必须更努力地工作才能将获释的念头从我脑子里赶走。这个星期里，给了我一本阿尔方斯·都德写的《磨房的信》并要我将它译成中文。看守告诉我，这对政府是一个有用的服务，但我完全知道已经有了中译本。现在他们是想帮我恢复我的法文。

这年的冬天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并不难过。整个中国的生活条件都好转了，这种好转也反映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不再有那种过份的工作了。我们的口粮虽不丰裕，但现在已够吃了，特别是我们这些住在轻劳动号子里的人，我们只在院子周围有些轻微的拣东西的活，对我这个受到优待的外国人，就更轻了。但是，奇怪的却是比以前更强调学习了。那时我不可能知道，更加强调学习，不断地宣传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谦逊精神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随着食物和消费品越来越丰富——1964年是个丰收年——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些人对我们相对轻松的生活的影响担心了。到处

资产阶级化的“糖衣炮弹”威胁着革命的纯洁性。当时号召要提高警惕，虽然这还只是警告，但已是在开始酝酿我离开中国后的那场群众运动了。

2月，我又成了单身汉了。杨与我离婚了。我是在与一名看守的短促、匆忙的会面中收到这消息的。

“你的妻子比你进步，”他拉长着声音说。“她和你断绝关系了。你应该为你的儿子有这样一个母亲而骄傲。”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能责怪她，但我的确因她没有及时通知我而感到有一点气愤。看守告诉我法律手续是在11月办的。我昏沉沉地回到号子里，不知道生活为我安排的新道路在哪里。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空白，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4月里，我被任命为号长。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从未有此奢望，但是我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学习又很好，在号长出缺的时候，就选我为号长了。那个4月，出了许多缺，原因很简单，犯人中四分之三的人被派到一个新的劳动营去了。人员大大减少，剩下的主要是老的和病的犯人。我们搬到一楼的文娱室去住。艾明和我在一个号子里，我竟要在思想上领导一个曾经当过政委的人感到惊奇，也感到有些尴尬。

在几个星期里，又有人到良乡来了。第一批是250名被军事法庭宣判的前军人，这是仍然忠于彭德怀的那些倒霉的人中的一部分。彭德怀是被撤职的前国防部长，他在中苏争论加剧时，不明智地选择对老大哥友好的一边。他不可避免地被称为修正主义者，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些军人是乘一队大轿车来的，仍然穿着军装，但没有肩章、领章了。他们跳下车，排成整齐的队形，然后迅速地走向他们的号子。这是颇为壮观的景象。他们始终与我们不接触，虽然他们也是来劳改的。可能是有命令不准与我们接触，但我始终没能

弄清楚。

这些军人安顿好后三天，又来了一批。这批是乘平板卡车来的，这是从第一监狱来的。与军人们相比，他们面色灰白、神情憔悴，脸上还显露出害怕的样子。任何离开第一监狱的人都知道去的地方不如第一监狱。

5月份进行第二次保外就医活动。由于我的同号黄国强也是保外就医，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见到他时，他的肺病已很严重。他是第一批被列入200人保外就医名单中的。他对我说他希望回到他从小长大的那个小村子里去，但是同时，他又有很坏的预感：自从他被捕后，家里没有给他去过一封信。

10天后，这个可怜的人又回来了。他突然出现在门口时，我们正坐在床上准备学习。他面目黎黑，灰尘满身、气喘嘘嘘，看起来完全垮了。

“我受不了，”他说。“我非回来不可。看守让我进来了。他说我还可以吃我原来的口粮。”

以后的几天内，我一点一点地从他那了解到他的悲惨的故事。他出去时拿着7元钱和一张单程车票。他回到村子时，他的父亲骂他是犯罪分子，叫他在大太阳下坐在小凳子上，自己到警察那里去核对他带的因病出狱的介绍信是否是真的。在家的一个星期里，家庭冷淡他，孩子们戏弄他，村里其他人骂他，他决定他唯一的家是在良乡。他拿着剩下的钱，买了一张回来的票，苦苦哀求田看守让他进大门。只是由于田看守特别宽大，他才得以回来。

8月份，又给我一本书翻译，这是蒙铁里出版社出版的《礼仪大全》。这是一本关于礼节的法文书，里面讲的是在文雅的场合应如何举止，在婚礼和葬礼上应如何讲话，怎

样正确地吃、穿和通信等。他们告诉我，不用忙，可以慢慢地译。别人会代我在菜地里工作的。我感到困惑，仍然不愿使自己抱有乐观的想法。我译完了这本书，也完全熟悉了在社会中（法国社会中）应怎样举止了。

8月30日。我的审讯者又到贾的办公室来。这次他没有假装是偶然来这里的。

"我看了你的思想汇报，"他说。"你最大的进步是你的汉语。你现在的汉语已经很好了。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你劳改的成果。你写的都是正确的，当然还可以更好些。我同意通过你的这份汇报，但是我希望你要经常想到改善你的思想状况。"

我说我尽力去做。他这番事先准备的讲话是对我的表扬，我非常高兴。此外，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法国大使馆几次要求来看你。我们还没有同意。这个地方不宜于他们来看你。既不适宜，也太远。我们准备将你转到靠近大使馆的地方。你思想上要准备好接受法国人的探视。我想用不着解释我这话的意思了。你作好准备，尽快离开这里。"

第二天一早，一名管思想教育的宋看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随便聊聊我在良乡的两年里学到了什么。我热诚地向他保证，我只有感谢政府对我的教导。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宋叫进一名犯人积极分子给我带来了一套新衣服——一件新的蓝衣服、内衣、黑色的中国鞋子、毛巾和肥皂。他还给了我11元钱。

下午4时，贾监狱长正式将我交给两名从北京公安局来的便衣。他们带我上了一辆胜利牌汽车，这辆汽车不比1957年逮捕我时的那辆车新。只是车上没有车帘，也允许我抬

头。我们驶过北京郊区，然后进了城，最后驶进第二监狱，这是一个新的审讯中心。它叫功德林。原来的审讯中心（我在那里坦白罪行）已拆掉建了中国科学院的新房子。

一名警卫带我穿过由许多号子组成的迷宫，直至一个小而僻静的号子。在墙角上有一个水桶，一张床和一张小凳子。我将我的包裹放在床上，开始整理我那不少的东西和书籍。警卫带着一张床垫回来并问我衣服够不够，饿不饿。我说饿了（我已养成从不拒绝食物的习惯了），但是当他带着一盘煎土豆饼、小麦面窝头和汤回来时，我又吃不下。我太紧张和心神不定了。我想到老孙，大个子和其他在清河的人时，就更不感到饿了。

“政府对我太好了，”我说，但警卫员不理睬我。他要我全吃光。我吃完后，他告诉我到睡觉时候了。

第二天，我有三顿饭吃！这地方象个旅馆。下午他们带我到操场上散步。我看到在操场的另一端有一个外国人，看上去非常象美国人。我再也没有弄清楚他是谁，但是我估计他很可能是朝鲜战争中不幸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费克图或唐尼，他们到1972—1973年间中美关系改善时才获释。这天晚上，一名医生来给我作检查。

“你会吃得很好的，”他说，好象他很了解情况似的。“你需要长胖些。”

的确如此。

第十六章

又有两个星期，我一直在自己的单人牢房中两眼发呆地坐着，或看一些旧报纸，试着消除因等待法国人来看我而引起的烦闷。这些年来，我总是一年到头与几十个囚犯一起居住在狭小的囚室里，现在虽然生活条件比我想象的要好，但我却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这样等了10天，我给看守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法国大使馆的人不马上来的话，要求将我送回良乡监狱。这也许是看守让我参加“批斗会”这一职业疗法的原因。

后来证明，参加“批斗会”使我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这个胜利直接归功于我的理论知识和对监狱生活现实的了解。在这一阵的“加肥”（译按：指吃得好些）期间，我不时听到犯人被批斗的情景——第二监狱不愧是新的审讯中心——对于这些刚跨入监狱门槛的可怜囚犯，我只能表示同情而已。一天早晨吃过饭后，我正坐在床上浏览一份报纸，这时一个警卫告诉我，有一个管思想的看守要在办公室见我。他给我提了一个很有兴趣的建议。

“我知道你在学习和批斗方面很有经验，”他说，“你曾参加过10多次这样的会，是不是？”

“是的，”我有点骄傲地说：“我曾批斗过别人，也曾被别人批斗过。”

“很好，我们也许能利用你的经验。这儿有一个犯人已

经被批斗了一个星期了，但仍然毫无结果。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他向我提供了有关这个案子的一些背景材料。我答应尽快接触这个案子。不过，我首先必须回号子准备一下。我打开自己的包裹，取出一件从良乡监狱带来的有补丁的破旧衣服穿在身上。警卫迷惑不解地看着我这个他所看守的重要囚犯，我告诉他不要担心。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当他领着我来到开批斗会的号子门口时，我让他把我推进去，就好象我是一个刚刚到来接受审讯的新囚犯。我低着头笨拙地跨进了嘈杂、拥挤的小屋。

“现在我们正在开会，你先坐到那边去，以后我有话对你说。”号长说。

虽然这位号长是一个开了7天毫无成效的批斗会的主持人，但他看起来却相当自负。即使看守不给我提供情况，我也能从人们对他所施加的各种侮辱中，判断出他们批斗的那个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不过，他具有一个庄稼人的那种倔强，一直绷着脸，对人们的辱骂和恐吓毫不退让，任凭周围的面孔发出嘲笑、尖叫，他都缄口不言。几个小时后，号长宣布休息，然后要我作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按正规的程序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和被指控的罪行。

“开始准备交代，”他说，“不要象他那样顽固地与政府作对。”

我回到留给我的一小块床角那儿，注视着这一幕我早已熟悉的场面：一个个焦虑不安，挥舞着拳头，带着强烈的憎恨，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刺耳的骂语。什么“臭知识分子”、“社会渣滓”、“马屁精”（按理这种脏话是不应该说的，但号长却放任不管）、“无耻之徒”、“阴谋家”、“坏分

子"、"坏蛋"、"不要脸的"等等。凡是他们所能想到的各种难听的词都向这个囚犯抛去。在无聊中，我有一次回过头伸着脖子从窗帘的边缝向外面看去。"你向外面看什么？"同号的一个犯人生气地训斥我。

批斗会继续进行着。我一直保持沉默。大约下午4点钟，"批斗会"仍毫无收获，又气又失望的号长严厉地盯着坐在床边的我。我成了他发泄的对象。

"你为什么不发言？"他责问说，"你是同情他还是怎么的？不要以为你是新来的，就可以什么也不说。所有人都必须发言。现在谈谈你的观点。"

太好了，我知道迟早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我的……我的……我的观点，"我推敲着说，"你们开批斗会的方式真是乱得一塌糊涂！"

一些面孔吃惊地转向我。控制这些生手真是太容易了。

"不应该这么混乱和无秩序，"我继续说，"现在，我打算向你们谈谈我的想法，是对是错你们等我说完以后可以进行讨论。大家看好不好？"号长等待着，好奇地看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

"自今天早晨以来，从你们大家发言的态度看，似乎那个家伙是这个号子中唯一的反革命分子。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其他人都是英雄人物，是共产党员或别的什么。我认为我们都忘记了自己也是反革命分子，就象他一样肮脏卑鄙。象他一样名声很臭。"

号子里立刻出现一阵短暂的骚动，囚犯们气愤地嘟哝着。其中一个犯人愤愤不平地大声说我是在侮辱我的号友。对这样的指控我早已作好了准备。

"你应该把他的话记下来，"我向号长说。"他说我侮

辱了他，那意思是说他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没有犯过什么罪。或者他什么也没有承认。他认为他不应该到这儿来。”

我的话立即使这个家伙哑口无言了，这种会不过是政治上的儿童游戏而已。他们忘记了批斗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使一个人民的顽固敌人改过，而且同时要对自己的罪行有所反省。

“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我加重语气说，“包括号长在内都是名声很臭的坏分子，在你们有把握责骂别人之前，最好先想想改造你们自己的事。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在劳改营中你们将相互需要，因为只有互相依靠才是你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所以我认为你们最好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我是被看守委派来主持这个会的。现在我们看看该做些什么？”

号子里象变戏法似地充满了肃然起敬的气氛。号长毫无怨言地退回到墙边去了。他显然除了如释重负外什么感觉也没有。后来在我们吃完晚饭后，我把那位挨批斗的犯人叫到一边，跟他谈了一会儿。我对他说：

“你是个哑巴，也是个自我虐待狂，你让这些人诅咒你，侮辱你，而你这种态度所带来的或许只是更长的刑期。摆脱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去向看守坦白交代。这就象中药一样，如果你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你就会一直感到苦，唯一的办法是闭着眼一下子全部吞下去。”

自那天早晨以来他第一次有了笑容。看来他终于明白了。我返回了自己的号子，我的档案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优点。

9月18日下午，警卫打开我的门，叫我去洗淋浴。当我洗完回到号子时，看到一位理发师正站在那儿，旁边准备了

凳子、推子以及一把剪刀。床上还放着一套蓝色的毛式制服、一双袜子以及中国式的鞋子。理发师给我理发修面后，我穿上毛式制服，非常合身。然后警卫把我带到监狱长的办公室。他正坐在沙发上并指了指自己身旁的一把安乐椅让我坐，现在是成年人对成年人的方式了。从低着头坐在拐角的小凳子上到现在这样与看守员并排而坐，变化真是太大了。

监狱长告诉我，几分钟后将有法国人来见我。我对他们的谈话将被看作是对我的改造成就的直接反映。我只准说中文或法文。有一台暗藏的录音机将录下我说的每一个字。所以我必须格外小心。

两名警卫带我到一个较大的、墙壁光秃秃的房间。在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在旁边放着几把供译员坐的椅子，靠墙放着一套沙发。我们是从后门进入的，可以看到藏在屏风后面的录音机已经开动了。我在沙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不到一分钟，远处的前门打开了，两个欧洲人被引进了屋子。他们是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马克·梅奎和让·科隆贝尔。我对法国人这些年遗弃我的做法所抱的怨恨，大部分被后来发生的事驱走了。

马克·梅奎走到我面前，伸出右手，当我们握着手时，他热情地说："我们到这里来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并没有忘记你。"对我来说这真是个非常感人的时刻。在我当时所处的情况下，这句话听起来也许带点感情色彩，但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而表示的一句简单的问候和鼓励。事实上，梅奎面对眼前这位被中国囚禁的法国公民，用简单的一句话表明了法国的态度，做出了官方的保证。换句话说，法国仍然关心着我。

梅奎和科隆贝尔是代表法国驻中国大使吕西安·佩耶来

看望我的。但从他们与我的谈话方式上，我觉得他们更象是作为朋友来看我，而不象是奉命行事的政府官员。这一切是这样的出乎意料，他们与所谓的领事代理人的态度是这样的不同，最初使我感到相当拘谨。梅奎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向我所提的问题表明他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他说：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一直想来看你，但中国当局直到现在才批准。"梅奎说。

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们听说你在生病。现在觉得好些了吗？你需要什么特别的药品吗？"

"中国政府对我照顾得很好。"

"伙食怎么样？你吃得好吗？你需要补充点别的食物吗？"

"我的口粮够吃了，政府对此很注意。我的伙食比警卫的还好。一日三餐：早晨8点，中午12点，下午6点各一次。"

梅奎一边仔细地听我说，一边不住地点头。然后继续回到他的问题上，试图在限定的探视时间里了解我所处的真实境况。

"那么肉呢？你的伙食中有足够的肉吃吗？"

"我无法确切告诉你我吃了多少肉，因为我没有秤去称它，但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说是足够了，我很满意。"

"牢房如何呢？光线够不够？有窗子吗？"

"我的牢房有两扇窗子，一大一小，除星期日和节假日外，我每天可以锻炼一小时。"

"烟呢？如果你想抽烟可以抽吗？"

"在室外锻炼期间，只要我想抽都允许的。"

梅奎满意地说："那好吧，一切看起来都不错。你还要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的吗？"

"如果你们能给我弄到一本法汉或者英汉辞典以及一些报纸的话，我将非常感谢！"

"我想我们可以设法给你送来《世界报》和《费加罗报》。"

"不，谢谢你，梅奎先生！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报纸，如果你们能搞到的话，我更想看到最新的《北京周报》以及莫泊桑或巴尔扎克的小说。此外要几件暖和的内衣。"

梅奎不住地点头，科隆贝尔将我要的东西一一记下来。临走前，梅奎向我转告了法国大使馆给我的口信：

"帕斯夸利尼先生，你千万别泄气，要继续象以前那样争取好的表现。我们听说你正在学习汉语，并且收效很大。希望你能坚持学习，这样当你有朝一日回到法国时，你就能够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我被授权告诉你，我们的大使已经开始与中国当局商谈你的案子，希望能使你得到宽恕，免除你所剩下的刑期。因此，重要的是你要与我们通力合作，不要给中国当局留下对你的行为进行抱怨的任何口实。不要做任何可能有损大使阁下努力的事。我相信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梅奎临走前所说的这些话，不仅重申了法国政府的立场，而且也使监狱当局知道，法国政府打算在其权力所及范围内将尽一切可能使我获得释放，这一关怀令人极其宽慰。

回到号子后，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异常的兴奋和激情。但我不知道我的表现如何？看守对我应付这件事的方式满意吗？梅奎是否会认为我已被"洗脑"了？那天晚上，当警卫给我送来晚饭时，我从中得到了部分答案。警卫随晚饭一起

送来了两包高卢香烟、一条中华烟，一盒“555”（或译“三五”）牌高级香烟以及10元钱。这种待遇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兆头。警卫告诉我政府正在检查法国人给我送来的一些书籍。如果这些书被认可的话，我很快就能拿到手了。

晚饭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就喊了一声：“报告！”警卫听到后来到囚室门的窥视口处。

“我请求政府告诉我，是否可以允许我在号子里吸烟。”

我知道，按一般的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但既然我已享受这样的特殊待遇，我想值得试试提出这要求。令人惊喜的是，他通过孔口递过来一盒火柴。

“注意不要把房子点着了。”他说。他细心地观看着我点着一支高卢香烟，然后把火柴熄灭。这种烟的劲很大，我刚吸了几下就呛住了。这使我想起了历史悠久的“兴凯湖”的本地烟叶。我吸完烟后，警卫告诉我，监狱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

“政府对这次探视非常满意，”监狱长对我说，“我必须承认你已取得了小小的进步。我们尤为赞赏你对那些试图使你落入圈套的刁钻问题所作的答复。你所说的有关肉和稃的话，非常好。不过你认为他们会继续帮助你吗？你认为他们会把你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吗？你对他们所说的总有一天会把你从监狱里弄出来抱有任何幻想吗？”

这是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我甚至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

“当然不”，我郑重地说，“我清楚我决不能依赖法国大使馆。如果我产生了这种想法，这就意味着我正依赖于帝国主义者。这就证明我没有改造好。我之所以在监狱是因为我曾犯下了反对中国政府的罪行。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中国政

府等内部事务。”这些简洁易懂的口号滔滔不绝地通过我的舌头说出来。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话是我真相信的，有多少话纯粹是由于习惯而信口说出来的。但有一点我可以完全肯定：我所说的正是他们希望听的话。

监狱长坐在那儿紧盯着我看了半天。

“鲍，你真是那么想的吗？你确实是出于真心吗？”

“请看看我的档案，”我提议说，“我想你会发现我的态度一直都是如此。”

又沉默了好一会儿。

“好吧！”监狱长心不在焉地说。他叫一名警卫将我带回号子。

10月1日，监狱除了正式饭菜——满份的牛肉、猪肉、饺子、面条、豆腐和一些蔬菜外，还给我一公斤苹果、半磅糖，各种糕点。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有犯罪情节的大官。我知道我的妻子杨和孩子们远不及我吃得好，但我所提出要见见他们的所有请求都石沉大海。10月5日，警卫告诉我她们正在监狱接待室等着我。

“去见吧！”他对我说：“去见见。”然后陪我一道去了。

我跟着他来到中间有一个大桌子的接待室。我的离了婚的妻子杨和小儿子荣在那里。老大毛毛已经长大了，被送到一个国营农场义务劳动。这是我近一年来第一次见到荣。他已10岁，渐渐长成大孩子了。但我痛心地看到他还穿着那么褴褛、破旧的衣服。尽管天气很冷，但他脚上只穿着凉鞋，没穿袜子。他告诉我他的袜子正挂在绳子上晒干，但我不能肯定他确实是有袜子的。我问眼前的一位看守，我能否把法国人留给我的10元钱（约4美元）给她。他说可以，但探视

结束的时间到了。

“他看望已有了一些进步。”他对杨说，“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但你应该告诉他政府如何很好地照顾你和你的儿子。显然他对此有怀疑。”

“看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提出异议。“我只是想搞清楚为什么他没有袜子。”

杨说政府对他们都非常照顾。随后会面就结束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荣。回到号子后我伤心极了。我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但我至少要有所表示。以后的几天里，我将自己从良乡监狱带来的小棉垫拆开，给小荣缝了一件短上衣。我的那位越来越随和的警卫不仅不反对这一行为，甚至还为我提供了剪刀和针线。我的裁缝手艺很难达到李永俊那双巧手的水平。但我觉得自己缝制的这件衣服至少能使这个孩子保保暖。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好了上衣，让警卫转交给我的家属。

与此同时，法国大使馆第二次来探视我。这次只来了科隆贝尔先生一人。他说，我的事情进展很顺利。我将有获释的希望。这月31日，警卫打开我号子的门，将两本书扔到我的床上，一本是汉英词典，另一个是成语词典。我听说这两本书都是小儿子荣送来的。他在监狱前面寒冷的大街上等了好几个小时，希望能允许他进来见见我。然而规章就是规章，没有事先办好一切手续，他根本不会有机会进到监狱里来。不管怎么说，警卫还是很不错的，把书从荣那儿接过来转交给我。这两本书是他用我给他的10元钱的一部分买的。

11月5日早晨，看守又给我拿来一套衣服叫我试穿。这次是一件灰色毛料西服，一双中国产的皮鞋和一件白衬衫。

鞋和衬衫都太大，所以他拿走了。那天傍晚他又来了，带来另一双皮鞋和一件衬衫。这次除了领口稍大一点外，其它都挺合适。第二天早晨，起床号吹过不久，警卫就打开门要我穿上新装。他带我到外面的院子里，两名背枪的警察正坐在吉普车上等我，这次没有给我带手铐。

吉普车躲闪着自行车流，穿过北京熟悉的街道。当我们经过市中心的人民大会堂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车一定是驶向最高人民法院。这是一栋庄严堂皇的大厦，建筑物有许多雕琢，并有柱子，顶部照例是个红星。我们快步穿过天花板很高的长廊，我们的脚步声在光亮的木质地板上噔噔地响着，间隔固定的黄铜痰盂象路标一样引导我们向前走去，这是中国公共建筑物中必备的设备。

我们进入一间很大的、剧院式的法庭，墙上嵌有黑色檀木板，前面是高高的法官席和旁听者的席位。一幅特大的毛泽东像挂在后面的墙上。台上除法官外，还有一名助理法官。一名书记员和一名检察官。审问程序与往常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

“鲍若望。”

“原名叫什么？”

“帕斯夸列尼。”

“把它拼写出来。”

接着又问了有关我过去的经历，我的国籍、我的罪行、刑期以及改造的情况。最后法官宣读了一个极短的判决书。

“鉴于帕斯夸列尼对自己的罪行已有了确实的悔改表现，中国人民政府决定对他采取特殊的宽大政策，免除他余下的刑期，将他驱逐出境。他将在警察监视下被送往边境，移交给有关当局。”

宣判到此就结束了，对我释放的宣判就如同对我进劳改营的宣判仪式一样来得迅速。这时还不到10点钟。回到吉普车里，一个警察要我把头抬高一点。

“你再也不是一个囚犯了，”他激动地对我说道。“你为什么还象犯人一样低着头呢？”

“习惯了，”我说，“对不起。”

我一回到第二监狱，马上就被叫去见监狱长，他握着我的手时满脸微笑。

“你自由了，有什么感觉？”他高兴地问道。

“等我走出监狱后才能知道。”

“对。”他说。“很对。好了，你很快就要出狱了。同时，你的前妻要见见你。”

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是紧张而不自然的，即使没有警卫在场，也会是这样的。对相互都已陌生的我们双方来说还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呢？她希望我无论到何处落脚都一切顺利。我答应，即使我再也不能看见孩子们了，我也将向他们提供抚养费。这次，监狱用一辆吉普车送她回家。

监狱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做好前往边境的准备工作。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问他以后是否有可能把孩子接出中国。几个星期以来他的声音第一次变得严厉起来：

“鲍若望”他说，“如果你昨天问这个问题，我不认为你现在能够出境。不错，他们也许是你的孩子，但对政府来说，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的前途在这里是可以保证的。即使他们愿意，当然他们是不会愿意的，政府也决不会准许他们生活在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中”＊。

＊ 我已开始通过正式手续将我的孩子们陆续接出中国。法国政府已给予他们必需的入境许可证，可他们仍在等待出境签证。

在我的号子中有一大盘饺子等着我食用，但我一点儿食欲也没有。我吃了五六个，然后告诉警卫我吃完了。当食堂炊事员来拿盘子时，他轻蔑地将我吃剩的饺子倒在地上的水桶里，我大为震惊。

"那是浪费粮食"，我生气地说，但警卫却无动于衷地站在那儿，而厨师只是耸耸肩膀。看到没有吃完的饺子扔在脏桶底上真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11月10日下午，我离开了第二监狱。临走前他们对我作了一次迄今为止最彻底的检查，警卫叫我脱光衣服，然后仔细地检查我的衣物。就是这次，老罗在清河农场为我削的木质的两用刀-勺被扣下了。他们只让我带的东西是我的三本书：小裴给我买的两本辞典和通过劳改营买的一本旧辞典。警卫驱车把我送到北京火车站，送我上了事先预订的卧席车厢。中国的火车分为软席（软垫的座位）和硬席（长凳）两部分，以避免将车厢分成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头等和二等这种不愉快的事。欢迎我的保护人正在车厢里等着我。他是来自北京公安局的一位长着浓密胡子的便衣警察。

"鲍若望，坐下，"他说。"抽支烟。"

他甚至为我点了烟。在他将我移交给我的官方护卫人员以前，他想说几句有关思想意识方面的话。

"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鲍若望，因为年轻所以常犯错误。但我们政府是好的，即使你经受了一些艰辛，但你今天仍活着并且活得很不错，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当你到了国外，如何说我们，这是你的自由，但我们希望你能多讲积极的一面。"

我们以热烈的握手告别，离开中国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特别巧的是，这两个护送我的警卫中有一个正是7年前

在我的家中替我戴上手铐的那个人。他们在我的对面坐下。我们默默地乘车前行，听着头顶上扬声器放出的音乐。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而他们也不想在我面前交谈。

火车开动后的前20分钟，我一直专注地凝视着窗外，指望着能再瞥一眼良乡监狱。我知道它就座落在这条铁路线旁。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最后看了一眼远处的这座红砖建筑物。高兴的是我将永远离开了它，但对所有永远再也见不到的好朋友，却又令人伤感。

过了不久，列车服务员，一个梳着长辫子、面目清秀的姑娘把头伸进车厢，问我们是在这吃晚饭，还是到餐车去吃，那位公安警察说，在这儿吃。服务员递给他一个菜谱，他把菜谱转给我。这时我灵机一动。这是由于我刚才看到良乡监狱才使我想到的。

我放下菜单。

“请给我一碗汤和两碗米饭。”

我的护送人相互瞥了一眼并笑了起来。

“嗳！。”那位公安警察说：“吃得好一些嘛。我们应该很好地照顾你。”

他们没有明白我的诡计。

“不，谢谢你。只要汤和米饭。”

“别担心，”另一个护送人说，“你吃什么我都可以付款。你要什么都可以点。”

我的脸上毫无表情，“我还没有赎完自己的罪，”我说。“我怎么能放肆地订奢侈的食物呢？”

“好了，”公安警察微笑着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政府已宽恕了你的罪。一切都结束了。都过去了！”

“我应该尽可能地减轻政府的负担，”我拖长声音说，

“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其中一个警察想要提出异议，但说了半句就停下了。他们很尴尬，并且很清楚这一点。他们闷闷不乐地看着我，弄不清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人究竟是一个政治机器人，还是仅仅为了愚弄他们。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除了同我订一样的饭菜，别无选择。这就是那天晚上我怎样在警察面前取得了最后一个小胜利的情景——我们三个人每人吃了一碗汤和两碗米饭。一个新秩序的保卫者怎么能让自己表现得比一个社会渣滓还要资产阶级化和奢侈呢？

此后两天去往广东的旅行一直安静无事。不过事实上从那次晚饭后我的护送人轮流着去餐车吃饭了。这样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吃饭时，另一个留下来同我在一起。至于我，则继续吃我的大米饭和汤。我们的火车经过汉口，越过长江到武昌，然后直到广东。

12月12日的晚上，我是在广东省监狱度过的。监狱长对这种有辱我的安排表示歉意。但解释说没有其他适合我住的地方。更特别的是，他问我与另一个人同居一室是否介意？我耸了耸肩。这是最后一件使我伤脑筋的事。

那天晚上与我同室的原来是一位象我一样的中法混血儿，他名叫鲁塞，年龄比我大，来自上海。他是从一个普通监狱，而不是从劳改营中释放出来的。他不喜欢与人同住一间房间，而且这是他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当他看到我的中国相貌时，就向警卫抱怨，但当他发现我同他一样是法国人时就变得温和起来，把我当作一个朋友来欢迎。我们抽了两包高卢牌香烟以庆祝我们新建立的友谊。

11月13日星期五是我留在中国的最后一天。

我和鲁塞同乘早晨的列车去与香港相邻的中国边境城市

深圳。这次我们坐的是普通车厢，而不是软席车厢了。我们坐在一群混杂着从广交会返回的亚洲和西方国家商人中间。几个英国人都说，中国确实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个个看起来吃得很好，生活得很幸福。商店里货源充足，应有尽有。它或许将成为未来的模式。我和鲁塞穿着政府发给我们的衣服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扬声器播送着中国歌剧的乐曲。我们的两个护送者小心翼翼地坐在车厢远处的一个角落里。

在深圳，警卫让我们与其他旅行者分开办理出境手续。自然我们再度被检查，在兑换外币的柜台处，那位工作人员只允许我们每人用人民币兑换不到6元的港币（当时合1美元）。他答应将剩余的人民币（我在监狱省下的零花钱总共有10元人民币）交给我的家人。边境警察告诉我们说可以写最后一封信，政府将免费邮寄。我们急急忙忙地将不封口的信封交给他们。海关检查员用一根结实的纸绳将我的三本书捆扎好，在上面打了一个红图章，然后让我们过去进入餐厅。

中午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坐下来吃最后一顿饭，因为这顿饭是安排在我们日程表上的。我告诉服务员不愿意吃鱼，因为我吃海味东西过敏。他点了点头，10分钟后，他端着一大盘摊鸡蛋回来。让我吃惊的是他同时从盘子中取下了一份鸡肉、猪肉、挂面和一些蔬菜。总共八种。我们只有两个人，并且我们还不感到特别饿。当我们告诉他肯定他搞错了时，他十分愤怒。

“这些饭菜是谁订的？”他生气地问。“现在我们刚刚摆脱了暂时的困难时期，（我有趣地发现餐馆服务员和看守使用了同样委婉的说法）谁也不应该这样浪费食物。这些饭菜足够6个人吃的！”

"鲁塞"向服务员指出我们旁边桌子上的便衣警察。服务员转过去向他提出意见，但当他看到北京公安局的证件后立刻哑口无声了。

"好吧，同志，"他说，"如果是这样，那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下午1点半，警卫将我带到中国大陆一边的罗湖桥，在这儿我可以望见远处穿殖民地制服的英国警察。在右边，蒸汽火车噗噗地来回运行在深圳货运场内，他们的车轮都漆成亮晶晶的深红色，边上是白色。火车上挂着红旗，用以表示他们队已超额完成了工作定额多少倍。停在岔道处的货车上用广告牌那样大的中国字写着口号："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这真是一个晴朗、温暖、充满希望、阳光灿烂的日子。

警卫花了好几分钟给我们拍照片。当他正准备按快门时，另一个警卫叫喊着跑向我们。他对鲁塞的帽子打量了一下，他粗鲁地将其扔在地上。他说，这样会遮住他的脸。他解释说那张照片将发到所有的中国边防站上，以便防止我们某一天重新潜回中国，不知他是否在开玩笑。

当他们拍完了照，警卫告诉我们可以走了。我拣起鲁塞的帽子，头也不回地迈开大步跨过了罗湖桥。

• 鲁塞在他释放后的一年多里成功地将自己的妻子和4个孩子迁出中国。只是成为法国公民同样很困难，现在还在等待入境签证。而这对我的孩子来说却不成问题。鲁塞现在生活在巴黎，为巴黎航空局工作。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